



我的经历

埃里希·昂纳克 著



E. J. Kennedy



1915—1916年间，埃里希·昂纳克同他的
母亲和哥哥姐姐



1922年前后的维贝尔基兴共产主义儿童团

埃里希·昂纳克(×)、格特露德·昂纳克(××)和芙莉达·昂纳克(×××)



1929年前后维贝尔基兴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乐队

前排大鼓后边：威廉·昂纳克、右边是埃里希·昂纳克



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期间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于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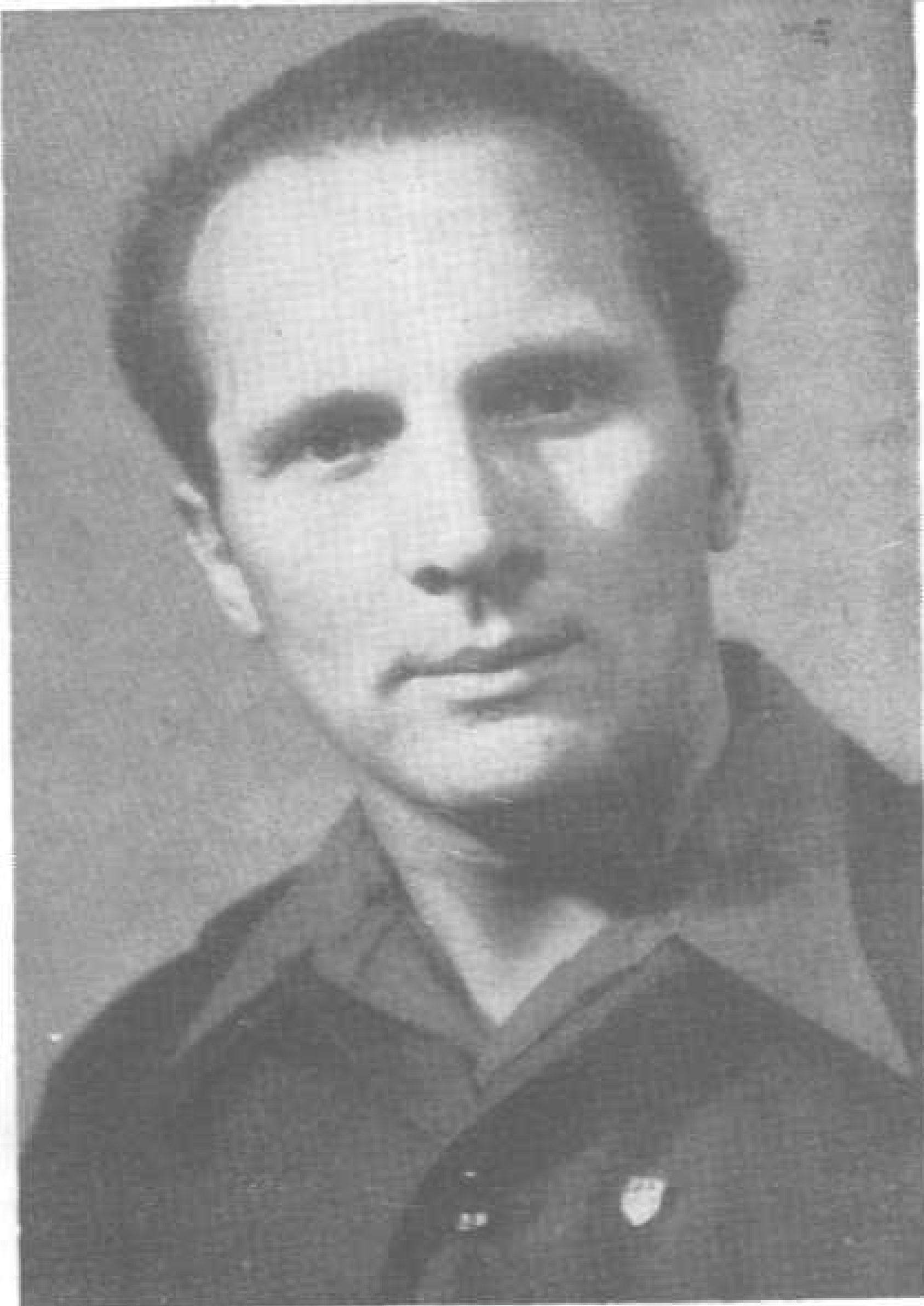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勃兰登堡—戈登监狱
2号单人监禁牢房A排



1935年12月被捕后在秘密警察柏林总部

一九五三年当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



一九五〇年七月初在柏林韦贝尔维泽青年建筑工地上和建筑工人在一起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在哈弗尔河畔的勃兰登堡前往参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九八〇年四月二十一日在民主德国参加一九八〇年普拉西德湖冬季奥运会优秀运动员授奖仪式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民主德国科学院院长赫尔曼·克拉莱教授向昂纳克呈交科研成果。右边是库尔特·哈格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与女作家
安娜·西格斯交谈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柏林举行的全国聚会上：从右至左威廉·皮克、玛戈特·费斯特、埃里希·昂纳克



昂纳克的父母威廉和卡罗莉纳·昂纳克
晚年在柏林的留念

中文版序言

我很乐意为《我的经历》一书的中文版写序言。我认为，我的自传中文版问世，表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了良好的令人高兴的发展。

我们两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工人运动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友谊和亲密的阶级友爱。早在本世纪初，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就义愤填膺地谴责过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特别谴责了德意志帝国军队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1931年，我们德国共产党人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组织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声援活动，我本人对此记忆犹新。

在法西斯的黑暗统治下，我们在与希特勒政权作殊死斗争的时候，还同情地注视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进行的可歌可泣的长期斗争。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这一胜利大大加强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

我们两个国家都是1949年10月诞生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理所当然地存在着亲密的兄弟关系。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起1951年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时，我和新中国的代表初次会见的情景；回忆起与中国青年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的会见和合作。

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中，有过许多重要事件和伟大成就。当然，发展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传统友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是巩固和扩大我们之间合作的稳定基础。

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回顾她走过的35年顺利发展的历程，是造福于人民的35年。其间，由于我国劳动人民的辛勤工作，我国已经进入世界工业国十强的行列。我们与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一道，尽一切努力保卫人类和平，使人类免遭核灾难的浩劫。我们把确保德意志土地上永不爆发战争和保持永久和平视为自己的特殊责任。

我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科学、文化、体育和其他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祝愿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伟大的成就。我们满意地看到，我们两国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保卫和平、制止军备竞赛，并防止把军备竞赛扩大到太空。只有这样，人类和我们两国的和平建设事业才有希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合作有许多有利条件。这样我们可以为加强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对国际局势的健康发展作出贡献，同时承担起社会主义各国对世界和平、缓和与安全的共同责任。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长、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希望它能进一步加深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以利于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事业。

埃里希·昂纳克

原出版说明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应《世界领袖丛书》发行人、董事长罗伯特·马克斯韦尔的请求，为培格曼出版公司在牛津的英美出版社撰写了他的自传。柏林的迪茨出版社负责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行。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I
原出版说明	II
第一章	出生在工人家庭	1
第二章	参加斯巴达克儿童团	10
第三章	参加恩斯特·台尔曼的党	20
第四章	在列宁缔造的国家里	30
第五章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	41
第六章	在鲁尔区从事地下工作	53
第七章	在萨尔河畔和施普雷河畔从事抵抗活动	68
第八章	铁窗岁月	81
第九章	解放的时刻终于到来	99
第十章	朝阳的象征	109
第十一章	工人阶级的统一是青年一代的基本要求	122
第十二章	和平的东方之行	133
第十三章	我们国家的诞生	142
第十四章	和青年一道为社会主义与和平而奋斗	158
第十五章	学习期间	171
第十六章	1961年8月13日	177
第十七章	相信人民的力量	187
第十八章	和体育运动密切相联	194
第十九章	为青年开辟新天地	204
第二十章	担任党的最高职务	214
第二十一章	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之林	224

DBS 723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工业的现代化管理	235
第二十三章	农业政策的丰硕成果	240
第二十四章	鼓励发明创造	249
第二十五章	第 100 万套住房	262
第二十六章	人口出生率回升	275
第二十七章	带领青年为共产主义前途而斗争	284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292
第二十九章	我们的民主	302
第三十章	克里米亚会晤	311
第三十一章	出席赫尔辛基欧安会签字仪式	324
第三十二章	两个德意志国家	333
第三十三章	从马尼拉到哈瓦那	342
第三十四章	对当前政治问题的看法	353

第一章

出生在工人家庭

当一个小生命不知不觉降临人世的时候，人们是应该欢迎还是抱怨？也许事情就是那样普普通通！医学进步未能解除母亲们临产前的阵痛，以及那心灵上的重负。如果作父母的担心不能为孩子踏上人生之路提供理想的条件，特别是当世道不好，屋子又冷又小，家中缺衣少食，父母拼死拼活，省吃俭用，仍然入不敷出，甚至父亲的饭碗朝不保夕的时候，那么对婴儿新生的喜悦就会笼罩上一层愁云。

1912年8月25日星期天，当我在诺因基兴卡尔大街26号的阁楼里哇哇坠地的时候，我母亲的心情如何呢？我那当矿工的父亲（1881年3月8日生于维贝尔基兴）威廉·昂纳克的心情又如何呢？那时，我母亲29岁（1883年6月2日生于诺因基兴），她姑娘时取名卡罗莉纳·魏登霍夫。1905年12月9日我父母结成终身伴侣，他们婚姻幸福，喜欢孩子。他们总是为子孙们尽心尽力。

一个“星期天的孩子”降世了，自然少不了亲朋的祝贺。可是这个星期天对卡罗莉纳和她的丈夫来说，的确不无忧虑。从现在起他们不得不养活四个孩子：卡塔琳娜，爱称凯特，生于1906年2月19日；威廉，爱称维利，1907年9月22日出生；接着芙莉达于1909年5月11日来到了这个家，现在又添了一个“星期天的孩子”。后来又有一男一女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是1917年3月8日出生的格特露德和1923年2月12日出生的卡尔·罗伯特。当

时一家六个孩子并不罕见，可是对我母亲来说，把六个孩子拉扯成人很不容易。在我的记忆中她始终是一位勇敢的无产者。

按 1914 年出版的小百科全书《布罗克豪斯》的说法，诺因基兴是普鲁士政府时期特里尔专区的一个小镇，位于布里斯河畔。1910 年有居民 34,539 人，那里有一个地方法院、两个矿山监督所、一所实科中学、一家水泥厂，还有施图姆兄弟炼铁厂和硬煤矿。它是一个缺乏阳光和氧气的烟雾弥漫的小镇。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肺病容易蔓延，这种穷人病 1925 年 8 月 29 日夺去了我大姐凯特的生命，那时她才 19 岁。我出生前半年，我的祖父安德烈亚斯·昂纳克在诺因基兴附近的维贝尔基兴村（1910 年有居民 8,719 人）与世长辞了。他作了一辈子矿工，1869 年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房子。1913 年 12 月 1 日，我们搬进了威廉大街 64 号（今库赫贝格大街 88 号）这座从我祖父那里继承来的半新不旧的矿工小房子，二层有四个房间，顶上还有两间小阁楼，底层有一个两间一套的住房租了出去。房子周围还有个小园子。我父母结婚八周年那天终于住进了自己的房子，他们感到很幸福。

环境的变化使昂纳克一家有些不适应，但也有方便之处。当时萨尔的矿工忍受着沉重的剥削。1912 年在官办煤矿（属普鲁士国家所有）每天苦干 10 小时，工钱最多不过 4.83 马克，而同一时期，在鲁尔矿区干活能挣 6.02 马克。可是一公斤黄油就要 4.8 马克。10 个小时的繁重井下劳动只值一公斤黄油！

在萨尔地区靠工钱是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的。矿主们清楚，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矿工属于半无产者，除了在矿上做工，他们还要和家人一起耕种一小块土地，养头奶牛，养口猪或者至少养一只山羊，这样才能保证出卖给工业巨头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想用这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清苦的生活，每天必须干 15 个小时，老婆孩子还得另谋点活计。尽管如此，还不敢光顾矿上的饭菜，或送孩子进费钱的托儿所，更不用说送哺乳室了。

后来常常有人把 1914 年前的岁月称为“往日盛世”，实际上那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政治压迫日益加重的时期。1918 年之前，普鲁士一直按收入高低实行三级选举制，工人没有丝毫权利。在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从 1900 年到 1912 年，每年生活费平均上涨 130%，1912 年的实际工资只有 1900 年的 97%。同一时期，近万个大老板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攫取了巨额利润。在普鲁士，1900 年少数几个工业巨头的总收入为 23.5 亿帝国马克，1912 年猛增到 38.1 亿。

1914 年之前的“往日盛世”不仅表现在沉重的剥削方面，它还表现在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上。在瓜分世界的筵席上，德意志帝国主义晚到一步，只剩下残羹剩饭，因此它疯狂地进行着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来说，这一时期是他们为争取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而顽强斗争的年代，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煽动的艰难岁月，是对形形色色的反动阴谋诡计进行复杂斗争的年代，而这种阴谋诡计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以工业巨头卡尔·菲迪南·冯·施图姆—哈尔贝格男爵为代表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诺因基兴的矿工和炼铁工人们最有体会。施图姆—哈尔贝格是施图姆财团的大老板，他的总厂诺因基兴炼铁厂离我家不远。

在家里我们奚落这位 1888 年被封为贵族的卡尔·施图姆为“施图姆国王”或“萨尔阿拉伯国王”。这个称呼是指这位萨尔最有权势的康采恩老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密友象一个暴君一样统治着他的工业帝国。卡尔·施图姆早就是个惯发战争财的人，1870 年至 1871 年德法战争之后，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吞并，他把那里几家大的轧钢企业占为己有，和他在萨尔继承的产业合并成一个巨大的垄断企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竭力鼓吹反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反社会主义者特别法》，人称这一时期为“施图姆时代”。这一时期政策又倒退到俾斯麦时代之前那可怜的起点上。

施图姆在工厂里装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但是他却禁止一切

工会活动,开除社会主义者。因此,反对“施图姆王朝”的阶级斗争成了魏德霍夫一家(我外祖父家,他是诺因基兴轧钢工人和革命的社民党人)和昂纳克一家的传统就不足为奇了。和“施图姆国王”有“世仇”的远不止我们一家。正是由于对施图姆反动统治的憎恨,许多无产者才投了社民党的票。我出生那年(1912年),在国会选举中,社民党在诺因基兴的候选人得票最多,从此诺因基兴被称为“红色村”。

不仅萨尔地区反对“施图姆国王”,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几乎都谴责他的统治:卡尔·马克思最好的朋友和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克拉拉·蔡特金都曾谴责施图姆。

早在1892年2月19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写给倍倍尔的信中就指出,在德国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两股潮流,它们的区别是对君主和容克地主的态度。恩格斯从伦敦写道,“目前在德国,似乎第二种倾向正占优势,同时,象施图姆那样的工业巨头以及工业界股东当然多半都站在过了时的反动派一边。”(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91页——译者注)。恩格斯也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倍倍尔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反对施图姆的演说。

我的外祖父格奥尔格·魏德霍夫总是保持着萨尔人的幽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是讽刺杂志《雅各布真貌》的热情读者。“施图姆国王”是这家漫画杂志的主要讽刺对象。施图姆是一个铁器商的儿子,后来被封为贵族。他贪得无厌,喋喋不休地谈论伦理道德,常常指责社会党人要用“自由恋爱”破坏“神圣的家庭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那种横刀勒马准备单独对抗日益强大的“红色洪流”的样子显得荒唐可笑。这一切使诺因基兴的这位工业巨头兼古堡所有者成为讽刺文学和漫画家难得的描绘对象。

1901年3月8日,当我父亲20岁生日那天,这位男爵在萨尔布吕肯附近的哈尔贝格古堡去世了。《雅各布真貌》为他写了一首

挽诗，题曰：“铁匠王”，并发了“讣告”，为《雅各布真貌》失去了这样一个对象而惋惜。很久之后萨尔矿工还记着挽诗“铁匠王”中的诗句：

“炽热的怒火四溅，
忆往日，
铁匠王向我们疯狂挥鞭！
他的算盘珠子呀，
只有钢才比它更坚。
任凭房子连基震撼，
我们坚持如前。”

“施图姆国王”和他的儿子们为威廉皇帝狂妄的扩充舰队计划提供装甲板和装甲炮塔，他和大炮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冯·博伦—哈尔巴赫一样捞了数以百万计的超额利润。当时这一点在诺因基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同样知道，扩充舰队计划和皇帝提出的“我们的前途在水上”的口号定会被英国视为挑战。

1913年4月18日，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国会发表了关于“国际军火资本”的著名演说，也谈到施图姆之流一方面狂热鼓吹爱国主义，并利用被他们把持的《邮报》日复一日地煽动反对“世仇法国”，另一方面，施图姆康采恩却吸收法国资本，并把施图姆公司研制的武器提供给“世仇”使用。李卜克内西说：“我们从来不怀疑，资本没有祖国，而且它越是佯装爱国，就越是没有祖国。”

卡尔·李卜克内西说，“资本家在追逐利润时是不折不扣地寡廉鲜耻。”现在我们知道他讲得多么有道理！在那“往日盛世”的年代里，“国际军火资本”联合反动军人，无耻地采取一切手段，推动一场对他们有利可图的战争。对此，恩格斯早在1891年10月就警告说，在这场战争中将有1,500万到2,000万手持武器的人互相残杀，整个欧洲将遭到空前的浩劫。

战争暴发户施图姆的名字四年后(1917年4月)在《斯巴达克信札》第四集中再次出现。德国革命左派机关报正在对右派工会

领袖展开一场论战。因为1914年8月他们支持开战，在战争进入第三个冬天之后，他们还要求军火厂里精疲力竭的男工和女工增加生产。“说真的”，《斯巴达克信札》写道：“自由工会头目中少数几个扶摇直上的人对群众那种冷漠的态度，就连那位货真价实的萨尔阿拉伯暴君——已故的施图姆男爵也感到有些望尘莫及了。”

这一尖刻的评论表现了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对社民党和工会右翼领袖背叛工人的行为的愤怒。1914年8月社民党的背叛行为也是维贝尔基兴和其它地区众多矿工脱离他们的主要原因。许多对社民党心灰意冷的工人，其中包括我父亲，后来参加了1918年底到1919年初建立的德国共产党。从此以后，“红色维贝尔基兴”的多数选民就支持共产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两周岁前三星期爆发了。战争爆发时我太小，还不大记得这次战事。尽管如此，它还是给我的童年投下了阴影，并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发生了重要影响。我对战争最早的记忆是：父亲走了，打仗去了，母亲在面包房前排长队，发面包卡，牛奶没了，土豆不足，煤球紧缺，我穿着哥哥、姐姐们的旧衣、旧鞋，总是饿肚子。

放在本书前面的那张有我母亲、哥哥、两个姐姐和我的照片就是战争期间拍的。可以说这是一张“没有父亲的家庭照”。它使我想起母亲为孩子们忘我操劳。当时对上前线失去工资收入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经济补偿。妇女们不得不自己想办法，领着孩子们度日。为使孩子们少挨饿，不知道母亲挨过多少次饿！她是一位缝纫能手和烹调巧匠。旧衣物经她翻翻改改又成了新衣。她用一点点调料能做成美味可口的汤。勤劳、整洁和节俭是她的美德。

我们常常偷喝放在碗橱里的糖汁或偷吃了预备第二天午饭吃的土豆汤。但我们不会因此而挨耳光，她只是告诫我们不要这样。我们家里不兴棍棒教育。父亲是一个正直的人。母亲懂得不用打骂也能把我们教育成正派人。有一次，可能是战争结束后不久，父亲狠狠地揍了我一顿，这次例外的挨打，使我不会忘记，因为我从

母亲的节钱杯里拿了几个芬尼，买弹子和别的孩子玩。我们那里有句俗话，一次没有关系。

1918年4月复活节我在威廉大街（今库赫贝格大街）国民小学上一年级时，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从1917年末到1918年初的战争之年的严酷冬天总算熬过去了。帝国主义战争和它带来的灾难成了我童年时的动乱经历。另一件事也铭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就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和它带来的希望。我还没有读完一年级，就爆发了德国1918年/1919年的十一月革命。

战争爆发不久，父亲不得不离开我们。他在皇家海军里当水手，先后在基尔、威廉港和佛兰德服役。他从奥斯坦德和比利时的其它城市给母亲寄来明信片。水兵们当时唱的歌是：

“佛兰德是一块美丽的地方，
特拉里，特拉拉，
那里有漂亮的姑娘，
特拉里，特拉拉……”

战争可不是“特拉里，特拉拉”。战争的结局与“皇帝陛下”及其盲目的爱国者们的预想完全两样，“皇帝陛下”逃亡荷兰。我父亲安然无恙地从战场上归来，他参加了基尔革命。

当父亲回到维贝尔基兴时，他已经是独立社民党的党员了，这里也已成立工人—士兵委员会。1918年11月初，在那革命的日子里，维贝尔基兴陆军署建筑物上的带着帝国之鹰的旗帜被取了下来，红旗升了起来。红旗一直挂到11月底，后来法国占领军来了，萨尔地区的革命夭折了。

但我们昂纳克一家始终没有忘记这面红旗，尽管1923年出生的小弟弟罗伯特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时期被迫加入了“希特勒青年”，但没有一个人背叛红旗。正因为我父亲是全城早已闻名的共产党、矿工利益的代表和维贝尔基兴的乡镇议员，所以当法西斯1935年进入萨尔地区时试图把罗伯特推上“小头目”的地位。结局是可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伯特在希腊水域被

英军俘虏，后来到了埃及，一定是在沙漠里露宿，他受不了日热夜寒，患了血吸虫病，这是一种血吸虫进入血管引起的可怕疾病。他回家几星期后于1947年10月30日在维贝尔基兴去世。

我大哥维利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共产党人。尽管他患着慢性胃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还一直在希特勒军队里服役当司机。1944年4月22日在匈牙利离开了人间，至今找不到他的墓。前面已经提到，姐姐凯特1925年8月29日死于肺病。

我母亲寿至1963年4月22日，我父亲1969年12月4日逝世。作为共产党员，他在萨尔结束了自己勤劳战斗的一生。因为我的另一个姐姐茉莉达1974年11月29日也去世了，所以昂纳克一家只剩下我的妹妹格特露德和我。我妹妹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

今天回想起维贝尔基兴的生活，我想说，那是艰难的，但却是美好的童年。我们幸运的是，由于十一月革命我的父亲才得以回家团聚。他把各国人民相互屠杀的真正教训告诉了他的孩子们。当时既没有广播，也没有电视。我父母把仅有的一点空余时间用于政治工作和教育孩子。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父亲怎样耐心地深入浅出地回答我的问题，他教育我要有家庭友爱和阶级友爱，要抵制民族主义毒素。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应从工人阶级立场出发来观察事物。

那时候诋毁革命工人是司空见惯的，说他们为个人的妒忌和恶意所驱使。真是胡说八道！我们反对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反对“高雅的人”。我家乡就有几个值得尊敬的人，象天主教修道院院长约翰·许茨（虽然我们当时信奉新教，而且我从14岁起就退出了教会）和我家对面约翰内斯修女院的修女。我姐姐凯特生病时得到了她们友善的照顾，她们常常给我们兄妹东西吃。还有维贝尔基兴的霍赫大街（今许茨院长大街）教会学校的校长彼得·勒泽尔，我在这所学校里从三年级读到八年级。据说很多年之后他还记着我，甚至当我在勃兰登堡一戈登坐牢时，他还托人问候我。

从1918年年底起我父亲的同事和同志们经常在我家聚会。尽管父亲不许我们打扰，他还是允许我到他们开会的房间去。会上讨论各种政治问题，主要是讨论矿区、冶铁厂和德琛矿井的形势。我父亲在那里干了十多年活，到1935年被解雇前，他一直是那里的工会干部和安全员。

有时晚上他们聚集在我家听我父亲念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著作。当然，那时候我几乎一句也不懂。但这类聚会的气氛，那种刨根问底的劲头，与会者之间的互相信赖，他们想以革命方式改变其生活的意志，还有伟大革命家的名字，而且那些伟人的话由我父亲读给大家听，这一切使我陶醉，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会上常说：“我们要象列宁那样干。”德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和后来的年代里一直试图象列宁那样干。为什么奋斗几十年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呢？在1979年柏林出版的《恩斯特·台尔曼传》中详细地阐明了这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了转折。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和1949年建立的、正在发展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十一月革命的日子里，以及战后革命处于危机的岁月里，我父亲用他那通俗易懂的话向我讲解，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怎么会发生战争，谁在战争中发财，谁在战争中受难。对我来说很容易懂，我对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我立志为争取一个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世界而献身。至今我还坚持着这一毕生的信念。

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不曾怀疑过我们的事业，不管在儿童时期和青年时期，还是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政治工作和随后加入德共时期；也不管是在1933年到1935年的反法西斯斗争中，还是在1937年至1945年在法西斯的监狱里，不管是1935年12月被关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总部，还是1937年6月在“人民法庭”上；以及1935年底在希特勒党卫军的兵营里或者在一年半的预审关押时面对刽子手，我都不曾有过丝毫动摇。

第二章

参加斯巴达克儿童团

1977年夏天，在我65岁生日之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电台和电视台在维贝尔基兴采访我旧日的同学，了解他们对我的印象。那些平时把民主德国说得一无是处的记者们这一次得到的情况却是友好的，说我是一个“好青年”，在“学校里算术学得不错”。被采访的人回忆说，“埃里希很早很早就从事政治活动。”这无疑是对的。1922年夏天，我还不满十岁时就加入了维贝尔基兴共产主义儿童团，当时我才读小学五年级。学校不欢迎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儿童组织，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得益不少。

维贝尔基兴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很快拥有50名男女学龄儿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们一起漫游，一路上唱着歌，欣赏大自然的风光，了解我们的故乡。我们开展体育活动，排演小戏剧《奴隶的解放者斯巴达克》，为党的集会练习歌曲，组织生动活泼而又富于教育意义的课余活动，有时就在我家房顶的平台上举行。

那时还没有录音机，歌曲要我们自己唱，其中有一首至今人们仍喜欢唱的青年歌曲：

“当我们行进的时候，

肩并着肩，

唱起古老的歌，

歌声在林中回旋。

我们感到，

一定会胜利，

新时代和我们在一起！

新时代和我们在一起！”

对我们无产者的孩子们来说，自然是“肩并着肩”，我们和那些富家子弟的孤高自傲无缘。在共产主义儿童团里，我们感到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工人阶级政治上的组织性。在这个集体中，我们也预感到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我们从孩童时代起就为之奋争的新时代正是基于这种希望。

我们为党散发传单，卖报，特别是1922年1月2日创刊的德共萨尔地区机关报《工人报》，为罢工工人和苏联募捐，并参加政治集会。“五一”游行我们常常站在最前列，必要时突破警察的封锁。在共产主义儿童团联合组成德共少年斯巴达克联盟之后，从1924年起我们就公开称自己是少年斯巴达克。作为少年斯巴达克，从少年时代起，我们就感到自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战士。

回想起来可以说，维贝尔基兴的共产主义儿童团积极地、机智地坚持了“创建共产主义儿童团的原则”。这些原则终于在1920年在柏林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发表在1921年1月《青年近卫军》杂志上。这一文件谴责资本主义社会从身心上摧残千百万无产者的孩子。文件指出，“这些事实使无产者自己不得不比以往更多地保护和教育自己的后代”。文件规定共产主义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无产者的子女”，“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教育他们团结友爱，向剥削者作斗争”，“出版儿童贫困的统计资料”，以及为“改善儿童的物质生活”做宣传鼓动工作。

诚然，其他政党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把少年组织起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但没有哪一个党象共产主义运动那样从一开始就如此重视青少年工作。这首先是由共产党人的革命目的决定的，他们为人民美好的未来而战——一个保障劳动者、特别是儿童美好生活的未来。儿童代表着革命者所向往的前景。

在充满阶级斗争和牺牲的年代里，有这么一句刻薄话：共产党人是正在度假的死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9年1月15日，

即他被害的那一天，好象有预感似地为《红旗》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不管到那时我们是否还活着，我们的纲领将永存，它将主宰获得解放的人类世界，这一定会实现！”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将继续斗争，直到取得胜利，人民的双手将收获胜利的果实。为了这一目标，任何牺牲都不怕，任何艰难困苦都难不倒我们。把握未来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基本的特点，这里同样包含着对孩子们的爱。

另外，从双重意义上讲，德国共产党当时还比较年轻。与“社会主义者多数派”和“独立社民党”的右翼领导人所执行的僵化的机会主义绥靖政策相反，德共提出了一个革命的纲领，这个纲领充满了改造世界的永葆青春的思想。1918至1919年参加德共的各种力量多数是年轻人，都是在战争的苦难和战后革命风暴中成熟起来的。许多人来自革命的青年运动，把青年运动的传统带进了年轻的共产党。

在无产阶级的青年运动中，从1847年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从革命的德国社民党到德国共产党，革命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6年4月德国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大会上（即著名的复活节大会），代表们在听取了卡尔·李卜克内西的报告之后，坚定地反对战争，反对德国社民党右翼领导人的“安内政策”和背叛青年的政策。

1916年复活节成立了劳动青年反对派中心，经过她的辛勤耕耘，“德国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前破土而出，1918年10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有4,000名成员，1919年2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73个地方组织的51名代表代表着12,000名成员，到1919年10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这个组织已有35,000人。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这个无产阶级的青年近卫军组织已经强大到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自己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大概从1925年起正式称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在反对希特勒独裁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她给自己的名字增添了无限光彩。

德国劳动青年运动一直代表并遵循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不曾有较大的间断。她忠实地履行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 1907 年斯图加特、1910 年哥本哈根和 1915 年伯尔尼国际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要求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其根源——资本主义制度。

当 1919 年 11 月在柏林召开的秘密代表大会上宣布建立青年共产国际时(她是 1919 年 3 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她除了得到苏联共青团的支持外，首先是得到了德国无产阶级青年运动的支持。这个组织的代表莱奥·弗利格和维利·明策贝格被选入青年共产国际五人执行委员会。

明策贝格在创立青年共产国际、创建国际工人救济组织和创办著名的《工人画报》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他在法国流亡中可悲的失败一样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为无产者的孩子们所做的堪称典范的工作却鲜为人知。他为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做了大量工作。

不久，青年共产国际建立了一个负责在世界各地创立共产主义少年组织的工作部。青年共产国际从 1921 年 1 月起定期出版《少年同志——工人子弟国际报》，我们维贝尔基兴的少年组织是热心的读者。国际工人救助组织在许多国家中为孩子们的健康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为罢工工人的孩子们募捐，给孩子们提供食品，组织工人子弟旅行，在国内外为他们组织夏令营和儿童游艺场所。

今天，如果浏览一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出版的《工人画报》，就会对当时共产党人为孩子们的幸福进行的广泛而大量的工作惊叹不已。鉴于无产阶级子弟生活条件差，定期举办运动会和青少年体育比赛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这就是说，早在联合国组织 1959 年提出儿童权益宣言之前，共产党人从事的儿童救助工作已经成为儿童工作的标尺。我认为，民主德国今天在国际上被公认为是一个爱护儿童的国家，正是这种传统的可喜发展。

1900年以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就发誓要把二十世纪变成“儿童的世纪”,但是只有苏联的工农政权才在这方面扭转了乾坤。我回想起小时候读到来自红色十月之国的报道:苏维埃政权向儿童开放沙皇的夏宫,并把它改名为儿童乐园。国家这样关怀儿童,当时我们这些萨尔工人子弟连做梦都不敢想。

1922年我参加维贝尔基兴共产主义儿童团时,在慕尼黑再版了《无产阶级儿童》一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奥托·吕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一道投票反对战争拨款,他也是德共创始人之一,可惜后来他离开了德共。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吕勒揭露了资本主义送给无产者子弟的“礼物”:高的幼儿死亡率、拥挤的住房、淋巴结核和肺结核、缺乏营养、体重不足和发育不良、童工劳动、体罚、劣质教育,还有各种堕落和犯罪的道路。

当时国家花在一个高级文科中学学生(有钱人的孩子)身上的钱是一个国民小学学生的六倍。因此,国民小学教师的待遇低,校舍和教具也很差。没有免费课本,也没有午餐,而这些正是工人子弟迫切需要的补贴。

谁想知道我们在战后经济困难年代里是怎样生活的,请看一看吕勒提供的数据:1921年5月,纽伦堡有46,638名国民小学学生,其中16.8%没鞋穿。1919—1920年冬,慕尼黑有35%的国民小学学生甚至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光着脚或没有象样的鞋。1920年2月,德国大城市中330万小学生中有20万人患肺病,有83万多人营养严重不良。这种状况同今天资本主义的前殖民地地区或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贫民窟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

共产主义儿童团和后来的少年斯巴达克组织都是为对付学校从精神上摧残无产阶级子弟特意建立起来的对应组织。当然,也有许多国民小学教师热爱他们的职业,爱护孩子。我记得有些老师能设身处地地对待孩子们,激发我们的兴趣。我特别喜欢历史和德语,这不但和家庭、少年斯巴达克组织的启蒙有关,也还因为这

些老师教得好。

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好，我也遇到过不宽容的老师，他们让我意识到，他们不同意我参加少年斯巴达克组织，甚至还有威廉皇帝时的遗风，企图用打骂的办法迫使我们接受他们所说的“普鲁士—德国纪律和秩序”。少年斯巴达克成员对这种“教育方法”进行了有意识的抵制。从1921年4月起，《少年同志报》定期出“我们学校里的斗争”专栏。用“公羊——打人的老师”这样的漫画谴责那些棍棒教育家。1924年创刊的《少年斯巴达克报》也经常关注学生们反对体罚的斗争。

今天我颇有兴味地回想起我们跟音乐老师“用鞭子说话”的教育方法进行的斗争。他常常精心地把一根教鞭放在提琴盒里，有时他忘了带提琴，就让学生去取。有一次他让我去取，半路上我干脆把琴盒打开，取出教鞭，把这根培养奴仆精神的工具折成两段，扔到布里斯河里。当然这位棍棒教师又弄了一根新的。但这是给他一个信号，我们的自尊在增长。

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体会到，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无论怎样认真看待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对正义的追求都不会过分。至今我还能回忆起50年前读过的一本小人书，那是一个有趣的发人深思的故事。作者是密尼娅·米伦女士，她是一位作家兼翻译家，尽管出身贵族家庭，但很早就站到革命的工人运动一边。她的儿童作品当时深受欢迎。那本给我留下深深记忆的书叫《麻雀》。现在我知道这本书是国际出版联合公司1922年在柏林出版的。这本有彩色插图的小书把麻雀描写成鸟类中的无产者，一只小麻雀动身寻找一个没有饥饿、没有寒冷的国度。但是所到之处都有穷富之分。它得到穷朋友的帮助，结识了一个立志改变世界的青年。

当时少年斯巴达克组织和法国共产主义儿童组织的一次会见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到了德法交界的福巴克和路德魏勒以及世界大战的战场凡尔登。尽管我们好心的历史老师讲课时很努力，但是学校的历史课主要是王朝更迭史和战争流水帐。看一

看数公里长战壕的真正战场要比死记“伟大战役”的年代要有教益得多。少年斯巴达克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去反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狂热。这一点对当时的萨尔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前边已经提到，从1919年底，我们那里被法国军队吞并了。根据1919年6月28日德国社民党政府签订的、1920年1月10日生效的凡尔赛条约，萨尔州由国际联盟托管15年。国际联盟组织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为法国康采恩老板大肆掠夺萨尔州的自然资源和剥削工人开了绿灯。“一地养二主”的说法就是那时产生的，它刻画了萨尔当时忍受双重剥削的特点。

当时普鲁士的国有矿被正式作为德国军队在战争中破坏洛林煤矿的赔偿，直接成为法国的财产，成为法国工业巨头榨取利润的领地。施图姆的继承人被迫把他们的钢铁王国的一部分让给法国垄断资本，当然他们得到帝国政府的巨额补偿。他们用这笔资本到莱茵—威斯特法伦投资。1923年，萨尔60%的工业落入法国之手。几家工业巨头，首先是赫尔曼·勒希林，开始和“世仇”法国合作。起初，法国亚眠军事法庭指控勒希林犯“盗窃和抢劫罪”。不久勒希林就在弗尔克林根把法国军队当作赶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解放者大加欢迎，把他的“重要战争物资”提供给法国，从而保住了他的工厂。利润不认识爱国主义为何物。

对我们昂纳克一家来说，民族问题必须服从社会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以极大兴趣关注“帝国”内部的发展，当时在魏玛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说的是德语，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父亲是德共党员，我自己是德共儿童组织——少年斯巴达克的成员，我们读德文版的工人新闻。当时，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有一份德文版的《人道报》，也在萨尔地区出售。我们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萨尔地区还会回到德国的怀抱中。对我们来说，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是资本主义的德国还是社会主义的德国，是垄断资本统治的德国还是工人农民掌权的德国。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德国，用当时的话说是“苏维埃德国”。

我们当时反对法国占领。1923年初法国占领区还扩大到了鲁尔区。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视法国为“世仇”。相反，我们欣赏法国文化，地道的法国风度和法国的烹饪。我敬佩法国的革命传统，特别敬佩1871年巴黎公社的英雄们。我们认为自己是法国工人，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阶级兄弟。德共在萨尔地区早已和法共一道为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大垄断资本家进行过共同的斗争。

正如列宁所说，凡尔赛和约的确是一个掠夺性的条约，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和平^①。凡尔赛和约确实可以和1918年3月德帝国主义强加给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相比，当时苏维埃俄国为了争取一个喘息机会，不得不接受这个条约。

德国帝国主义立即利用凡尔赛和约进行伪善的民族主义煽动，而我们拒绝凡尔赛和约首先是出于社会原因：凡尔赛的强制性和约加重了德国工人、人民和小老百姓的负担，他们失掉了仅有一点积蓄，忍饥挨饿，甚至失去了工作和维持生活的基础，而垄断资本却能保住他们发的战争财不受损失。

在占领军刺刀的支持下，资本家对萨尔地区的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我还清楚地记得，1919年春，特别是1923年春萨尔矿工大罢工，1919年3月的罢工斗争，是为了保住德国工人在十一月革命中争得的八小时工作制。法国矿山主想用法国国内的作法，不承认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停工不干了，矿山主把这次罢工说成是一次“反法行为”，动用了军队，21名矿工遭军事法庭审判，有些人被判处长期监禁。大约400矿工被赶到德国，实际上就是被投入失业的行列中。由于缺乏目标明确的统一领导，罢工阵线被压垮了。

1923年的情况不同，当时萨尔矿区99%的工人和职员，大约

^① 此处原书未注明出处，现按原书德文版直接译出；书中其他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引文也同此处理，有些未核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中文版。——译者

72,000 劳动者罢工整整 100 天，抗议实际收入迅速下降，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尽管矿山主和占领军又一次疯狂镇压，但是罢工阵线却岿然不动，结果取得了部分胜利。因为法国矿工也在罢工，所以法国重工业的煤炭供应受到影响，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收敛。

罢工要求矿工作出的巨大牺牲，今天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百天大罢工和我家里的一件事巧合了。罢工是 1923 年 2 月 5 日开始的，2 月 12 日我最小的弟弟、所谓“老疙瘩”罗伯特出生了。当时我家仅靠工会的一点资助和同情罢工的商人的一点捐赠度日，家里添一个吃奶的婴儿真是难呀！1978 年卢特温·比斯写了一本内容十分丰富的书，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联邦德国）出版。书名是：《1919 至 1935 年萨尔地区的阶级斗争——德共在萨尔地区为人民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而斗争》。我自己的回忆完全可以证实书中所写的是实情。

在罢工斗争中萨尔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的拼搏，在基督教和社民党工人中以及工会会员中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这一点也表现在所谓的州参政会的选举中。这个州议会性质的机构本来应该是国际联盟萨尔地区管理委员会标榜民主的遮羞布。共产党人逐步把它变成政治斗争的讲坛。

1922 年 6 月，当我参加共产主义儿童团时，德共在参政会中只有 2 个席位（中央党 16 席，社民党 5 席）。1924 年 1 月我们的党已有 5 个席位（中央党 14 席，社民党 6 席）。1928 年 3 月德共保持 5 个席位（中央党 14 席，社民党 5 席）。1932 年 2 月我们党夺得了 8 个席位（中央党 14 席，社民党 3 席）。

在县乡两级议会选举中，德共的票数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终于使我们党成为萨尔河畔最强大的工人政党。在维贝尔基兴，在杜德魏勒以及其他矿工居住区多数选民早就投票支持共产党。这些政治上的胜利也有维贝尔基兴共产主义儿童团的一份功劳。我们把每一次罢工和选举中的胜利看作是我们的歌声、传单、旗帜和

标语的胜利，是我们叫卖报纸、游行和集会取得的结果，这是有道理的！

对我的兄弟姐妹和我本人来说，参加少年斯巴达克组织的几年是激动人心的有意义的童年。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也曾有过痛心的损失。1924年1月传来了列宁去世的噩耗。我回忆起莫斯科电台的话：“列宁去世了，但是他的事业却与世长存。”维贝尔基兴学校课停了，一位教师赞扬列宁的事业是一位重要政治家的事业。在诺伊基兴大厅为列宁举行了追悼会。从那时起，每年1月我们都举行“三L”纪念会：纪念列宁，纪念1919年1月15日被反动派杀害的德国工人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①

1925年春，我们为失去一位年轻的同志而悲痛：他就是弗里茨·魏因埃克。1924年夏，根据德共中央的决议，成立了保卫革命工人阶级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他是同盟乐队的号手。1925年3月13日，在哈雷人民公园为德共总统候选人恩斯特·台尔曼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这位年轻的热爱生活的号手被魏玛共和国的警察无故开枪打死。在这次残暴的警察袭击中，还有其他9人被打死，另外重伤25人，轻伤100多人。为了纪念弗里茨·魏因埃克，人们创作了“小号手之歌”。我们常常唱，因为这支歌不仅寄托着我们的哀思，也表现了革命的信心。

^① 三人的姓的开头字母都是L。——译者

第三章

参加恩斯特·台尔曼的党

按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通常作法，1979年12月初，我所在的党组织为我加入工人阶级政党50周年向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纪念章。回顾这半个世纪真是光阴似箭呀！我加入台尔曼领导的德共的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1929年我入党的时候，正是社会气氛紧张、政治矛盾尖锐的时期，资本主义体系严重的世界性危机已见端倪。1929年10月29日被称为“黑暗的星期五”，纽约交易所大倒闭，导致了灾难性危机的总爆发。国际资本陷入崩溃，失业率直线上升，千百万人眼睁睁地看着饥饿和贫困向他们袭来。某些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露骨地鼓吹再次对苏联进行干涉战争，那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全世界宣布，计划经济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和竞争。

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激化更增强了我入党的愿望。1930年3月，德共已拥有135,000名党员，她是唯一坚定不移为和平、劳动和面包而斗争的党。就本质而言，加入德共、走上政治工作的道路是我的出身、童年和青年时代生活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我父亲是这个党的活跃成员，他最要好的同事也都是德共党员。我自己也在共产主义儿童团和少年斯巴达克组织中获得了初步的政治经验。当我1926年复活节离开学校后，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就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在维贝尔基兴，德国共青团有一个强大的地方组织，我的故乡不仅是德共的堡垒，同时也是她的近卫组织——德国共青团的堡

垒。开始时我在共青团的地方组织中任司库，1928年我接任了这组织的政治领导工作。后来我又参加了德国共青团诺因基兴团委会议，并且成为团委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次年，同志们把我选进萨尔地区团委，我本应该在那里干到1933年夏天。

不熟悉当时情况的人，会以为我政治上的“青云直上”是由于我特别好大喜功。事实上，这是政治工作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很早就献身于政治工作，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并积极地投身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某些政治工作的天赋、好学习、有追求、对生活的严肃态度以及善于和青年人打成一片等，显然也有助于这一发展。政治工作要求很高，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使我爱上了政治工作。为便于客观判断，这里不妨引用一下当时认识我这个共青团干部的两位萨尔人。一位是阿图尔·曼巴尔，共产党员，我的战友和多年的朋友，法西斯统治期间，他和我一样被关在勃兰登堡—戈登牢房里，如今生活在民主德国。另一位是埃里希·福尔特梅尔，不是共产党人，不久前还是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报纸《萨尔布吕肯报》的副主编。分别几十年后，1977年初他来为该报采访，我们又见面了。

“他当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阿图尔·曼巴尔这样评价德国共青团干部昂纳克，“他领导下的年轻人都信任他。晚上下班后，他们常常到他父母那小得可怜、然而十分干净的家中聚会。当一群初生牛犊热烈地争论共青团的工作时，昂纳克妈妈总是忙着，又是为大家切圣诞糕点，又是煮咖啡。昂纳克的爸爸常常在外奔波，他是个矿工，他们矿上的人都喜欢他。”

当西柏林广播电台问到埃里希·福尔特梅尔对当时的印象时，他在维贝尔基兴一棵菩提树下对记者说：“40多年前，共产党人和天主教青年就在这里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昂纳克是主要发言人之一，或者说是共产党的发言人。有时通宵达旦地争论，当时政治讨论是在街上进行的。昂纳克谈吐自如，是共产党的有见识的发言人。”

福尔特梅尔还回忆说，政治辩论“经常是大叫大嚷，但昂纳克是个例外，他不吼不叫，以理服人”。后来这家电台（它是冷战时期专门为对付民主德国而建立的）的工作人员问这位萨尔布吕肯的新闻记者：“有人说，昂纳克不抽烟，不喝酒，他真是这样有节制吗？”福尔特梅尔说：“是的，他绝对是这样。”

我不敢说自己绝对是这样，我不是“圣人”，也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虽然手头拮据，而且也知道酒能变成无产者的大敌，但有时我还是喜欢喝杯啤酒。吸烟后来也沾上了，随着年岁的增长，遵照医生的嘱咐，我又戒了。我在维贝尔基兴“橡树”工人体操体育协会的活动有助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在协会里我参加徒手操、器械操和手球。我和青年“自然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德国共青团是包括男女青年在内的统一的青年组织。我们组成了一个政治上和个人之间团结的集体，遵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德原则。姑娘们是平等的战友，她们受到尊重。她们的意见受到重视，她们是可信赖的。游行时她们和小伙子一样走在最前列。这一点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显得天经地义，但是在当时这可是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公开决裂。

当然，在绝大多数工人家庭里，妻子和女儿的地位历来比在“供养婚姻”的资产阶级家庭里要重要得多。德国共青团在这方面也继承了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先进性。二十年代中，我从波美拉尼亚一户农民家庭看到无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与其他家庭墨守旧的风俗习惯是多么不同。我生活中第一次较长时间的旅行不仅使我横穿了整个“帝国”，从它的西南角到了它的东北部，同时也使我获得了新的生活经验，其中有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在“后波美拉尼亚”农村，妻子要用“您”称呼自己的丈夫！

我到波美拉尼亚干什么？是这么回事：1923年的百日大罢工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萨尔矿工贫困状况的注意。国联政府委员会为了对付最明显的贫困现象，不得不采取某些社会措施，例如拨款为小学生检查身体。健康可能受到危害的学生被送到了农村。因为

我姐姐凯特患了肺病，因此在最后两个暑假我被送到农村。这样我就来到了波美拉尼亚的诺伊多夫村，住在一家姓施特莱希的中农家里。诺伊多夫村在布比利茨县，位于当时的新什切青北边 25 公里的样子，在当时的德波边界西约 30 公里。

农民施特莱希有六个女儿，但没有儿子。四个女儿已经幸福地成了家。因为他在战争中受了伤，不能干活，农活全靠他妻子、两个未婚女儿、一个长工和我。收割季节雇波兰来的临时工，他们还用镰刀和连枷干活。虽然我和长工一样住在马厩边的棚子里，但我还是觉得这里很有意思。当 1926 年复活节我离开学校时，由于经济形势恶化，我找不到适当的学徒工位置，父母亲和我都觉得还是到波美拉尼亚干农活为好。我在施特莱希家又呆了两年，在我返回萨尔之前，暑假时我小妹妹格特露德也住在他家里。在我到维贝尔基兴镇的诺因基兴大街的房顶修缮工米勒处作学徒之前，我在舅舅路德维希·魏登霍夫那里作房顶修缮帮工。

长工走了以后，农业危机的征候日见严重，农民施特莱希看上了我，他可能想把我作为未来的女婿。反正他允许我这个“诺伊多夫村人”参加布比利茨的“五一”游行，并和德共派到诺伊多夫村做宣传工作的党员合作。当然，我的政治观点他绝对不同意。甚至那个和我一样是农业工人的长工也固执地认为，共产党人星期天到农村进行政治宣传，他们的党一定给他们“不少钱”。事实上，当时德共甚至无法完全支付专职干部的工资，哪里还会有钱付给宣传员？几年以后，当我成了萨尔布吕肯共青团区委事实上的专职干部时，团组织无力定期发给我“薪水”，我仅靠维利·明策贝格领导的新德意志书报发行出版社萨尔布吕肯分社资助的几个法郎（1923 年 6 月到 1935 年 2 月在萨尔区通用法国货币）维持生活。因为没有车费，德共的农村宣传员大都是骑自行车到农村去的。他们出于政治信念响应了党的号召。

1925 年秋末，恩斯特·台尔曼当选为德共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党克服了二十年代初期曾妨碍党发展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台尔曼根据列宁的原则和苏联共产党(布)的经验领导着德国共产党。他的领导作风对德共发展成为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马列主义的战斗政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工人阶级、其他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与日俱增。1926年2月发出“面向农村”的号召,这是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共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联盟政策早期的重要文件之一。

号召书说,“共产党把联合农村劳动人民和产业工人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党首先面向农业工人和小农,建议他们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为实现短期纲领(规定最低工资、日均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减税、提供国家抵押贷款和社会保险,要求为农业工人提供住处、对小农实行补贴并保障产品售价)和长期纲领(没收大地主土地分给农业工人、小农和雇工)而斗争。在以后的几年中,德共的农村政策原则得到了实际而灵活的发展,形成了1931年5月的扶农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它将会保障无数德国农民的生存,为他们提供一个符合历史进程的前景。

1927年末到1928年初的事态发展证明德共1926年2月的号召书是有远见的。当时我还在诺伊多夫村。1928年1月,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生了相当规模的农民骚动。数以万计的农民大示威,他们不是手执红旗,而是打着黑旗要求实行一项对付日益严重的强迫农民典当财产的农业政策。早在1928年,德国农民的债务已经高达108亿帝国马克。无数小农和中农在日益加剧的农业危机中负债累累,到了为支付逾期的利息和税债不得不抵押青苗的地步。

从1928年1月到9月,有1,185户土地在20公顷以下的农民被迫拍卖家产,次年同期已经上升到1,709户。但是1928年6月28日上台的以右翼社民党人赫尔曼·米勒为首的“大联合”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撤销不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这种政策,小农户每公顷的纳税率是最高的。相反,1929年5月16日又通过了一项“东部援助法”,根据这个法律,易北河以东的大土地所有者从

国库里捞到数百万的资助。

这一反动的农业政策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把一些陷入绝境的农民推入最凶恶的反动派——法西斯的怀抱中。他们“取消债务奴役”的伪善口号正是针对濒临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而发的。不出所料，希特勒法西斯 1933 年 1 月 30 日夺权之后根本没有“取消债务奴役”，相反，为了大资本家、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扩军备战的需要，推行了一项不顾后果的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

1933年后，农民拍卖田产、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破产的趋势不仅没有停止，而且由于种族主义法律推波助澜，反倒继续发展。1932年农业危机高潮时期，2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拍卖田产者高达5,820户，1933年下降到1,394户，但是1935年又回升到2,125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每年拍卖田产的户数都高于1928年。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境况也大致如此。

共产党人早就警告说，希特勒法西斯不会帮助农民和中产阶级，只会把他们投入血腥的战争灾难中。到波美拉尼亚的诺伊多夫村解释德共农业政策的农村宣传员也提出过同样的警告。这样做不仅需要耐心和毅力，而且也需要冷静和勇气。多数容克地主和部分富农是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有热中暴力的传统。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庄园就是“自由军团”、“黑色国防军”和其他反革命武装称心如意的庇护所和活动基地。大土地所有制是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经济基础，魏玛共和国对它没有丝毫触动。地主庄园是对魏玛共和国发动叛乱和对工人运动从事恐怖活动的温床。

可惜我不知道农民施特莱希和他的一家人后来的情况如何，我回到萨尔以后联系就断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音信。法西斯发动的反对欧洲各国人民的侵略战争如果没有夺去德国农民的生命的话，至少也葬送了数百万德国农民生存的基础。我只能希望诺伊多夫的农民施特莱希和他那讨人喜欢的女儿们安全

地熬过了战争，找到了新的归宿。我希望他们从悲惨的事件中吸取正确的历史教训。

当时，从维贝尔基兴到诺伊多夫的来回旅途上我路过柏林。尽管我不能久留，只是作为过路人在柏林换乘火车，但当时的“帝国”和普鲁士“共和国”的首都（已有 260 万人）令人神往。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柏林是一个劳动和工人的城市。我曾在《工人画报》上读到埃贡·埃尔温·基施的一篇报道，报道说，在欧洲各国的首都中，没有一个象柏林那样享有工人城市的美名。当时我尚不能对这一点作出判断。后来，当我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维也纳和布拉格之后，我发现基施的判断是正确的。

作为行政管理中心和工业城市，柏林的气质表现在它的政治气候方面，在柏林选举中左派历来占优势。几年后，在 1930 年 9 月的国会选举中，德共赢得了多数票。这样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共产党成了多数派。一个来自红色维贝尔基兴的年轻人自然对红色的大城市怀有好感。

这个施普雷河畔的世界性城市，在二十年代末还有其他许多引人之处。世界闻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麦克斯·普朗克就在这里工作；柏林还是国际上的戏剧中心，1928 年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轰动柏林。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剧作“氰化钾”1929 年在柏林首次公演，是一部反对臭名昭著的“218 法案”的剧作。这一法案剥夺了妇女们自己决定生几个孩子和什么时候生孩子的权利。柏林附近还有除好莱坞之外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诗人和作家住在柏林，如亨利希·曼、埃里希·魏纳特和路德维希·雷恩。几年后在萨尔的一次斗争中，我结识了魏纳特；几十年之后我和雷恩建立了友谊。或者还有阿尔弗雷德·杜勃林，他的著名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刚好在当时出版。

柏林当时有一个新闻区，那里有国际上享有盛名的记者，他们

中的优秀分子不是站在左派一边，就是象埃贡·埃尔温·基施那样本来就是共产党人。柏林有国际上领先的电器康采恩西门子—哈尔斯克和通用电气—无线电器材公司。柏林的电台影响甚广，但是进步记者几乎无不被排除在外。柏林当时已开始研制电视。它也是一个具有历史传统的城市。

从当时的什切青火车站走不了多远就是波茨坦车站和安哈特车站，沿途经过几处1848年、1918年至1919年革命活动的场所。波茨坦广场应该去一下，1916年5月1日卡尔·李卜克内西曾在波茨坦广场上呼喊过“打倒战争！打倒政府！”的口号。拐一个弯就到比洛广场，那里有卡尔·李卜克内西故居，1926年11月起也是以台尔曼为首的德共中央所在地。两年后，在1930年复活节时，莱比锡召开的德国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党的主席恩斯特·台尔曼，工人们亲昵地称呼他“泰迪”。

从波美拉尼亚回萨尔的途中，我路过柏林—利希特尔弗尔德火车站，1926年底担任希特勒纳粹党柏林党部头目的约瑟夫·戈培尔1927年3月20日（星期天）在这里预演了纳粹打算用什么样的恐怖手段夺取政权。在这个3月的星期天，戈培尔把他的500个法西斯打手纠集到车站，等着远足归来的“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乐队23名队员乘坐的火车，列车一进站，戈培尔就命令打手向“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同志们的车厢开枪。然后暴徒们用匕首和铁棍大打出手。社民党领导的警察姗姗来迟，致使大多数同志受了重伤，不得不住院治疗。

当时的工人报纸详细地报道了这次袭击事件。我之所以记得这次袭击事件，原因是从1925—1926年起，维贝尔基兴也有一个“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乐队，我父亲是乐队的大鼓手，我哥哥维利和我也是乐队队员。这是一个管乐队，演奏的曲子和无产阶级游行队伍的行进很合拍，因此深受工人们的欢迎。我们身着“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灰色制服。当时萨尔的纳粹打手还不敢对我们动武。

今天，维贝尔基兴又有一个管乐队，他们继承了我们乐队的传

统。当乐队 1973 年在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时，宣布我为乐队的荣誉队员。

我的舅父房顶修缮工路德维希·魏登霍夫政治上站在我们一边，因此我外出参加活动没有困难，我的师傅房顶修缮工米勒也可以通融。虽然我参加政治活动，但手艺学得不错。我爱上了这个职业，因为它比较自由，可以到处走动，能从高处眺望世界，可以“举目眺望”。这个并非没有危险的工作对我产生了诱惑力，这是一种要求精力集中、谨慎、精确和技巧的工作。这种职业上的技巧后来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期间对我特别有用。

作为一个房顶修缮工，我当然是木工工会的会员。但我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共青团工作。共青团工作的高潮是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年大会。对无产阶级的男女青年来说，坐火车本身就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旅行在当时尚属罕见之事。我们不得不一分尼一分尼地积攒路费。一道旅行，和几千名为了有力地表达他们的目标从各地赶来的青年同志和朋友聚会，更使人心花怒放。

1930年4月第五届德共青年团莱比锡聚会把几万青年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劳动青年组织的许多小组、基督教青年工人联合了起来。德国共青团萨尔地方组织特别重视争取基督教青年矿工参加这次莱比锡活动。和萨尔地区许多青年共产党人一样，我也尽力争取参加这次会议。这向每个人的“钱包”提出了特别的要求。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卖掉父母为我买的自行车，为了参加这次聚会，我只好忍痛割爱。但是不虚此行。10万青年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集会，恩斯特·台尔曼到会讲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近处感受到这位传奇式的工人领袖的感染力。

台尔曼膀阔腰圆，是汉堡码头工人。他了解德国无产阶级的困苦，同时他从自身的经验中也深知他们的斗争意志。德国当时没有一个工人领袖象他那样受到无产者的信任。他的语言简单扼要，清楚易懂，是工人的语言。他手里拿着提纲式的小纸条，演说不用麦克风，不要扩音器，他那洪亮的声音响彻奥古斯都广场（今

卡尔·马克思广场)。在强调重要之点时，他就攥紧拳头，有力地挥动着手臂。在严重的危机时期，他严肃地提醒着、告诫着人们。有一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德国共产党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与无产阶级的青年生死与共。

在全国青年聚会期间，社民党右翼领导的莱比锡警察用赤裸裸的暴力对付无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当发生冲突时，他们甚至向人群开枪。当我们共产党人为促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建设性工作时，社民党的右翼领导人，象普鲁士内政部长卡尔·泽韦林和柏林警察局长卡尔·弗里德里希·左尔吉贝尔之流，却下令向共产党人开枪，相反，他们却对希特勒法西斯执行“绥靖”政策。至少在客观上有利于希特勒法西斯。泽韦林禁止了“红色阵线战士同盟”。左尔吉贝尔对1929年5月血案负有责任，在这一血案中有31位工人被警察杀害。

现在，联邦德国的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煞有介事地说，德共要对希特勒上台负责。这样，我必须强调指出，历史的事实是：德共是希特勒法西斯的死对头。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共产党人是始终如一的光辉榜样，不屈不挠的斗士，宁死不屈的英雄。

1930年莱比锡会议期间，我们主要关心的也是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青年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社民党人以及基督教徒之间在反对日益猖獗的法西斯危险中联合行动。这一目标和在帝国主义列强可能再次发动一场干涉苏联的战争时积极保卫苏联的决心是这次莱比锡青年集会的政治重点。会后萨尔团组织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这一工作。莱比锡集会结束不久，一次重要的经历即将发生：我将第一次踏上前往苏联的旅途。

第四章

在列宁缔造的国家里

193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列宁的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那里住了一年。这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具有重大意义。党和团组织提出，让我到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在列宁学校（即青年共产国际学校——译者）举办的一期训练班，父母也同意我去。这样，在我18岁生日前夕，我满怀期望地从萨尔出发，经过柏林、华沙、布列斯特、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前往莫斯科。

当然，在此之前苏联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我对红色十月之国早就怀有极大的兴趣。从同志们的讲述中、我们报刊的报道中以及书籍和激动人心的苏联电影中，我对这个国家已有所了解。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早已熟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台尔曼党的近卫军，正是立志效法她的榜样，为了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幸福，用革命的手段变革德国的社会现实。当然，即使最好的报道、最引人入胜的书和最精彩的电影也不如自己亲眼所见。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列车披着晨光在巴拉诺维奇到明斯克的路段上缓缓驶过波苏边界的情景，波兰兵端着刺刀下了车，红军战士上了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无比象征力量的过程。我们正在通过的是特殊类型的边界，不是一般国家之间的寻常边界，它不同于萨尔区与法国的边界，也不同于萨尔区和“帝国”的边界。不，这是截然不同的边界，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是资本国家的终

点,工农政权的起点,是一条可以与今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边界相比拟的边界。

1848年初,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无产者没有祖国。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出现了新形势。从此所有在本国受压迫、受迫害、被追捕、遭监禁甚至遭到死亡威胁的革命者能在苏联找到庇护和帮助。列宁的国家千真万确地成了所有劳动者的祖国。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都来这里为革命斗争取经,吸取力量和增强信心。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列宁的国家就是我的祖国,他的党就是我的党,他的青年团就是我的青年团。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我还是把跳上车厢踏板的红军战士看作我的兄弟和同志。我多么想拥抱他们,按俄国的习惯亲吻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这个工农国家,他们那布琼尼式的帽上缀着红星,这红星也是我们德共的标志。我从小就热爱红星,珍视红星,她照耀着未来。是的,前往这个国家并在那里比较长时间地生活和学习,而且是在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学校里学习,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象凯旋门似地悬挂在苏联奈戈雷洛杰边境站铁路上空。这是《共产党宣言》中富有传统的战斗口号,现在变成这个伟大国家的正式欢迎词,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永不磨灭的经历,我来到了自己日夜向往的国家。短暂停留后,列车继续向莫斯科驶去。

列车抵达苏联首都的白俄罗斯车站,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站台上、车站大厅里和车站前广场上的人群首先使我感到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一句俄语也不懂,还要自己找“鲁克斯”旅馆。尽管如此,我毫无孤独或寂寞之感。今天从白俄罗斯车站通往红场的高尔基大街当时还叫特夫尔斯卡亚大街。我沿街信步而行,以便观赏一下这个传奇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心脏。

当时我觉得特夫尔斯卡亚是一条宽阔的大街,但是是鹅卵石路面。当时还不能想象今天这种车水马龙般的交通。二十年代苏

联已经生产少量机动车,但是比较大的汽车厂是1930年才在莫斯科和在伏尔加河畔的诺夫哥罗德兴建起来的。诺夫哥罗德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出生地,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尔基城。我从报纸报道中得知,1930年2月苏联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批载重汽车就是那里生产的,所以难怪我到苏联半年后莫斯科的街上跑的主要还是一匹马拉的小马车。

特夫尔斯卡亚大街有许多商店,但没有橱窗陈列。相反,橱窗里挂着标语,号召提前完成1929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知道,为了分配得合理,某些食品和日用品是定量供应的。这一点我并不在意,因为萨尔地区几年以前也并无两样,况且在家时我从来也没有钱从琳琅满目的橱窗里购买我所需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红色十月的国度里,在约·维·斯大林的领导下(自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正在坚定不移地建设社会主义,虽然条件极为艰苦,然而热情却更高。

我不由自主地来到红场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列宁陵墓那时即将竣工。这座用乌克兰红色花岗岩和卡累利阿斑岩砌成的建筑物,在193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时正式揭幕。我从照片上了解到,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座木结构的陵墓。红场上的游行、阅兵式和陵墓主席台上苏联领导人的照片当时已发往世界各地。约·维·斯大林和他身边的维·米·莫洛托夫、拉·莫·卡冈诺维奇、米·伊·加里宁、克·叶·伏罗希洛夫、谢·米·布琼尼,还有尼·伊·布哈林、杰·约·西诺维耶夫、阿·伊·李可夫和拉·勃·加米涅夫,这些最重要的名字当时代表着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

我知道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写了一本《共产主义ABC》。这是一本解释联共(布)纲领的流传很广的通俗读物,1919年底在苏联出版,1921年已经译成德文出版。它和卡尔·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样,是我父亲的读物之一。现在在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我一定可以更深入地学习这些著作。

虽然共产国际的“鲁克斯”旅馆就在特夫尔斯卡亚大街上，我却走遍了这条街没有找着。我又返回车站，想乘马车或出租汽车。那里停了几辆出租车，一个司机很快懂了我的意思，他知道“鲁克斯”旅馆，这么近还要坐车他感到好笑，然后把我带到旅馆门口。“鲁克斯”是遵照列宁的指示改为共产国际宾馆的。那里的人了解我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他们告诉我去共产国际所在地的路怎么走，说明离克里姆林宫不远，房顶上还可以看到沙皇的鹰徽。

幸运的是我在共产国际碰到了一位德国女同志。几年后，我在柏林的秘密接头点又见到她。现在她生活在民主德国，为我们的事业奋斗着。她叫勒娅·利希特，后来和久经考验的德国共青团干部弗里茨·格罗斯结了婚。1936年3月格罗斯被法西斯判处终身监禁。解放后，他活跃在民主德国的外交战线上。勒娅·利希特弄了一辆车，把我送到位于沃罗夫斯基大街国际列宁学校。

亚历山大公园西边的沃罗夫斯基大街是以列宁的知交和战友、老布尔什维克沃罗夫斯基的名字命名的。沃罗夫斯基任苏联驻瑞士大使时被一名白卫军杀害。当他的遗体从洛桑经柏林运往莫斯科时，柏林的共产党人在西里西亚车站（今民主德国首都的东车站）向这位勇敢的革命家表示了最后的敬意。在晚上临时举行的追悼会上，人们举着火炬和红旗，卡尔·拉德克谴责杀人凶手的幕后指使者。

在列宁学校，我立刻感到象在家里一样。办完入学手续，从真正意义上讲，我成了列宁的学生，我带着自豪感向我的宿舍走去。我和安东·阿克尔曼同住一个房间。阿克尔曼后来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局委员。

从各个方面向我们讲授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教授中也有几位将军。弗雷德·厄斯纳和埃里希·沃伦贝格也曾作为红色教授在列宁学校任教。1945年后我在柏林又见到了弗雷德·厄斯纳，那时他已经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负责宣传工作。埃里希·沃伦贝格在列宁学校讲授历史和当前的国际工

人运动问题。通过他写的《慕尼黑的红军战士——来自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1929年柏林国际工人出版社出版),我知道埃里希·沃伦贝格的名字。沃伦贝格后来成了托派,1945年后可悲地参与了美国和联邦德国对苏联和民主德国的煽动性攻击。但当时他还是帮助我更深入地了解列宁的革命学说和苏联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在阶级斗争中他还是经受住了十多年的考验。

那时莫斯科有一种特别的气氛,社会主义正在各条战线上展开攻势。什么叫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上展开攻势?对这个问题在我到达前不久召开的苏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清楚的回答。党代会于1930年6月26日至7月13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列宁的党有近200万党员,他们选出的2,000名代表总结了过去的工作,提出了新的目标:加速国家工业化和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农业全面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根据新的要求彻底改善武装部队的装备并建设必要的工厂。

苏联共产党(布)坚定地执行了列宁关于工业化的路线。在党的领导下,苏联发展成一个工业大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重工业,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改造提供必要的新机器和新设备。1930年的生产资料生产比1913年高2.8倍。较高的工业增长率和农业全面集体化一样,对新的社会制度来说是客观的需要和必然的规律。党代会谴责了右倾反对派抑制发展速度的观点。大会呼吁苏联人民发扬英雄主义,并委托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保与战斗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相称的高速度”。

半个世纪过去了。根据这50年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不容置疑,当时通过的发展速度客观上是必要的,事关社会主义存亡,没有捷径可走。在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艰苦岁月里,工作繁忙,而食品却不足。但是苏联各族人民以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后来战胜法西斯入侵者,也为把我国人民从党卫军野蛮统治下解放出来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正确衡量苏联各族人民在那些峥嵘岁月里所创造的历

史业绩, 必须注意当时的内外条件。二十年代初期, 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即无产阶级革命能在德国或工业比较发达的其他国家中取得胜利, 能对苏联各族人民为摆脱历史落后状态和战争破坏的艰难起飞中提供一点帮助。二十年代中期, 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预示着在较长时间内苏联可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年代末期,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迫近, 帝国主义的干涉战争又一次威胁着列宁的国家, 当时苏联经济恢复时期刚刚结束, 1930年工业产值第一次略高于农业产值。

面临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威胁, 苏联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当时国内还存在着一个相当有力量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它梦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而国际反革命也把它们希望集中在这个阶级身上。1928年, 富农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行动, 妄图卡死对苏维埃政权的粮食供应, 迫使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向他们让步。当苏维埃国家不准备屈服时, 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破坏活动, 烧毁粮食, 毒死牲畜, 甚至不惜进行谋杀和其他恐怖活动。

对这类反革命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加速组织小农和中农的集体经济。为了保护和加强集体经济, 不得不没收富农占有的最好土地。这一发展速度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这是一次翻天覆地的革命。1930年初已有一半以上的农户组织了起来, 为了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 尤其是共青团员参加了集体农庄。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大面积耕种需要机器, 特别是拖拉机。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建设必须加速, 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能。但是建设突击队终于使拖拉机厂于1930年夏天投产了。为了保证拖拉机厂的生产, 乌拉尔新的冶金基地的建设也必须加快, 因为无法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更多的钢材, 况且国防现代化也需要更多的钢材。

简而言之, 事情是一环扣一环。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必须同时高速发展。后来我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才亲身体会到, 对

劳动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作为国际纵队的成员，在那里参加了几个星期的义务劳动。对这次义务劳动后边我还要说到，反正，当时我对全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坚信不疑。在布尔什维克党和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后来的顺利发展创造了决定性的条件。

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曾两次见到斯大林。1931年1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大剧院召开的苏联列宁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也坐在主席团里，就在斯大林后边第四排的位置上。后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的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见到了他。那次是埃里希·沃伦贝格把我带去的。在通往大厅的台阶上，迎面遇见了传奇式的骑兵将军布琼尼，《工人画报》刚刚发表了一篇关于他机智灵活打击白卫军的动人报道。沃伦贝格认识布琼尼，他把我介绍给布琼尼，为此至今我还十分感激沃伦贝格。虽然如前所述他后来站到敌人一边去了。我也结识了卡尔·拉德克，不仅了解了他的风趣，而且了解了他的为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他象右派领导人布哈林一样为《消息报》撰写重要文章。在这里我也还想提一提我和马克斯·赫尔茨的相识。十一月革命之后，他成了德国中部地区阶级斗争的传奇人物，魏玛共和国时期他坐了多年监牢。我俩在“鲁克斯”旅馆共度了1930年除夕之夜。

比结交朋友更重要的当然是在列宁学校的学习和深入莫斯科的社会生活，和莫斯科劳动人民的联系。在学校里我严守纪律，勤于学习，这是工人子弟的本色。许多年后，苏联同志把列宁学校档案中关于我的记载复制后送给了我。文件中有这样的结业评语：“爱学习，有天资，是一个坚强的、能独立思考的青年。”还说：“推荐他参加考试。”笔试和口试的结果均被评为“优良”。评语写道：“是一个很有天赋又肯于吃苦的同志。积极参加会议和讨论，表现出色。完全掌握了所学的教材，善于把理论和德国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能认真地完成学习任务。成绩5分。”

“5分”是苏联计分法的最高分。我可以心满意足了。除了学习之外，我们还参加社会活动。我是苏联共青团员，我们参加莫斯科市的苏维埃选举，甚至城市清洁委员会中还有我们的代表。我们定期到工厂参加义务劳动。那时我们既没有观看十月革命节游行和阅兵式的票，也没有参加“五一”游行的票，只好爬上房顶观看节日的盛况，这是当时莫斯科青年喜爱的一种体育活动。我作过房顶修缮工，自然喜欢参加这种运动。还有一种体育活动和我们的学习有密切的关系，我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5月2日我们的骑兵中队通过莫斯科大街的情景。

社会工作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俄语知识，而且使我们有机会了解社会问题。加速工业化需要巨额的投资，用于住宅建设的钱所剩无几；战争和内战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各个城区主要是革命前的木房子；街上还能碰到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投机商以黑市价格贩卖紧俏商品；还有内战的产物——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虽然有许多孤儿院和儿童收容所，他们还是露宿街头，冬天靠街上和广场上的公共火炉取暖。

加速工业化也有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苏联已经消灭了失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全国上下形成了学习风气，最后一批文盲开始学文化。专门人材奇缺。许多地方碰到外国专家，其中也有来自德国的进步建筑师和德国建筑艺术学校的代表。他们为苏联建筑工人的热情所感染，在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巨大的成绩。无数苏联青年奋发学习，为使自已能够成为专门人才。工厂里劳动纪律有所加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数十万非熟练工人进了工厂。当我作为焊接工在莫斯科一家重要电器厂参加义务劳动时，对这一点有亲身感受。

我们常到集体住房去作客，某些年轻夫妇把这种生活集体视为共同生活的新形式。至少在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是切实可行的，人们可以互相帮助，可以更好地利用住房。夫妻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倒比传统的生活方式更密切。因为在电器厂参加义务劳

动期间我和许多共青团员交上了朋友，所以也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在国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同志们的安全，共产国际列宁学校也受某些秘密工作规则的约束。我在莫斯科时期的假名字叫弗里茨·莫尔特。我入学表格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现在我还保存着这一表格的复印件。在那里，埃里希·昂纳克的名字根本没有出现过，但是其他情况（出生年月、出生地点、家庭出身、职业和政治发展、曾任职务等）全是真实的。

表格中用多种文字提出问题：“是否积极参加过内战、罢工等活动？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何种方式参加？”我如实地填了“罢工——1930年2月在诺因基兴钢铁厂前秘密散发传单”，就是在钢铁巨头“施图姆国王”的纪念碑前。这座所谓的施图姆纪念碑至今还竖立在诺因基兴钢铁厂入口处。我常常站在这座碑前散发传单。我也把1931年夏天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列宁冶金联合企业”的义务劳动看作是反对军火商施图姆之流的阶级斗争。

我们28个德国青年共产党人是一个小组，作为国际突击队前往南乌拉尔，帮助加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劳动条件是难以想象地艰苦。今天这里是一个拥有34万人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有高大舒适的住房和许多公共设施，而当年这里是一片不毛之地，只有帐篷和土房。伙食时好时坏。我记得很清楚，大多数建筑工人是刚招来的农民，穿着自制的鞋子。晚上，当工地上的嘈杂声平静下来之后，俄国民歌和革命歌曲之声还在草原上回荡。

1929年以前那里基本上还是沉睡的铁矿山，1932年1月第一次流出了铁水，1933年7月又生产出了第一批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已经是苏联国防工业的支柱，生产三分之一的榴弹用钢和二分之一坦克用钢。用这些武器终于给法西斯侵略者以歼灭性的打击，这对后来的所有军火商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占领者”都是一个教训。

开始全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西欧和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讥讽说，五年计划的指标至少要50年才能达到。当1931年第一批新建企业投产时，西方的预言家们就比较谨慎了。在资产阶级专家中已能听到称赞苏联各族人民成就的声音。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是美国的哈里钢铁厂，它是用了10到12年的时间才建成的。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速度几乎比它快三倍。莫斯科电器厂到1931年3月31日为止，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

苏联各族人民的成就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共产党的报刊报道红色十月之国的巨大变化。革命实践的规模往往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青年国际》杂志当时报道了由青年同志们组成的国际突击队的义务劳动。奥托·文策尔当时在《青年国际》当编辑，后来他长期担任民主德国外交部长。那时热火朝天的建设不仅为苏联作家们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且也给资本主义国家某些进步艺术家提供了素材。埃贡·埃尔文·基施1927年发表了第一部关于苏联的著作《沙皇、平民、布尔什维克》。1930年到1931年，他再次访问红色十月之国。他和安娜·西格斯、汉斯·马尔希维查和约翰内斯·贝希尔一道参加了哈尔科夫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为他1932年出版的《亚洲在巨变》一书收集素材。

我认为，1943年在柏林—普吕策恩湖被法西斯杀害的捷克共产党人作家尤里乌斯·伏契克1930年发表的《在我们的明天已成为昨天的国家里》，是那年给人印象最深的作品。据说，伏契克的朋友们劝他不要用这个费解的标题，建议他改用“按颠倒了的日历行事的世界”。但是伏契克坚持用这个看起来似乎矛盾、但对亲身经历了这一迅猛发展的人来说不但可以理解、甚至认为十分切题的题目。事实是：当我1931年夏天离开莫斯科时，和我一年前到莫斯科时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我已经熟悉了她，我体会到这里每天都

在创造着历史。列宁曾天才地预见到这一切。但是现实超过了他最大胆的设想。1945年以后，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能看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着历史。从莫斯科到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的旅途上，一条巨大的贝加尔湖——阿穆尔河干线正在兴建，从莫斯科到卡马河，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塔什干或伊尔库次克，所到之处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五章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

1978年年底,德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所属的“卡尔·马克思”高级党校出版了一本《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小册子,内容包括1931年到1934年德共在萨尔河畔的斗争。在差不多50年后,有机会重读了1931年夏秋之间我从苏联回国后不久为萨尔区德共机关报《工人报》写的几篇文章。当时我才19岁,是党和青年团的干部。政治事件的报道中也提到我的名字,使我回想起那充满战斗的时代,它和“狂飙突进”时代一样,是带有青年烙印的天翻地覆的时代。

在我离开的一年时间里,萨尔工人的处境和全国一样灾难性地恶化了。失业人数一天天增加,在德国,1931年2月490万失业者,当年底猛增到560万。失业者中领不到失业救济、依靠“慈善机构”施舍度日的人越来越多。根据官方统计,1931年年底已经接近100万!1928年以来,萨尔地区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1931年更是直线上升:1930年年底失业率是5.24%,1931年年底猛增到13.11%,次年翻了一番,达到30.17%!据萨尔地区统计局的报告,1932年年底三个劳动者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实际上许多地方两个工人中就有一个找不到工作。

遭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之害的不单单是失业工人,缩短工时的事比比皆是。这些暂时还没有失去工作的人的收入也减少了,资本家利用劳动市场的这一形势,无情地削减工资和薪水。美国新闻记者尼克博克1932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欧洲还会崛起

吗?》的书,书中说这次“创造了削减工资的世界纪录”。中产阶级的状况也明显地恶化了,日益增多的破产说明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生存忧虑。越来越多的职员,甚至科学家和艺术家失去了工作,每况愈下,而他们常常弄不清楚其中的真实原因所在。

受危机打击最重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青年。对许多工人子女来说,学校毕业就是失业,按规定,只要家庭成员中还有一个人有工作,他们就得不到任何救济。对青年们来说,最好的情况就是有机会做临时工时可以免费吃到一顿午饭。这是政府为对付失业而采取的临时措施。根据1908年威廉皇帝时代的帝国结社法,萨尔政府断然禁止青年们参加政治活动。面对没有工作、没有权利、没有前途和营养不良,青年们怎么办?难道他们不应该寻求取代资本主义弊端的代替物吗?为什么不能争取他们走共产党指出的革命出路?

从苏联回国后,我受德国共青团中央的委派到萨尔地区担任共青团宣传书记。几个月后,即1931年年底,我被指定为萨尔地区共青团政治领导人。从此我也是德共区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兼“红色青年阵线”区委领导人和“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青年组织负责人。当时《工人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区党团组织都设在萨尔布吕肯的赫伯特大街(今毛尔博士路)。我经常到萨尔各地去,亲眼看到青年工人的社会困境。

1931年春,“帝国”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游行方式——反饥饿游行。上点年纪的人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饥饿游行。英国、美国也发生了反饥饿游行。1931年4月,德共在埃森举行失业者代表大会,号召举行反对物质贫困的群众游行。鲁尔区有两万失业工人参加了反饥饿游行,游行队伍举着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名字埃森(德语“埃森”系多义词,其复数形式ESSEN是吃,单数形式ESSE是工厂的烟囱。——译者)。几年后,我在埃森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工作。下面还要谈到1933年底除旧迎新之际搞除夕食品的冒险行动。

从1931年到1932年，在工人集中的“帝国”城市中爆发了反饥饿游行。萨尔河畔情况也是如此。失业者的境况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与1916年到1917年的饥饿冬天不同，1931年到1932年冬天有足够的食品库存。特别是在美国，在众目睽睽之下，机车用粮食和咖啡作燃料，把大量的牛奶倾入大海，以便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中保持高价。利欲熏心的大康采恩老板宁可销毁“过剩”的食品，也不肯分给失业的工人。

值得庆幸的是，在物质供应困难时期，只要工作允许，我就经常到维贝尔基兴老家去，因为我母亲总能为我弄点吃的东西。象早年一样，屋后的小园子和家禽对她是一点补贴，她用这个大家庭的厨房垃圾喂了鸡、兔和猪。母亲让我带回萨尔布吕肯的糕点，我总分一些给失业的同志吃。我们尽力互相帮助，我们是一个为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志同道合的集体，苏联始终是我们的榜样。

我不得不无数次地向同志们介绍我在列宁的国家的经历。我在苏联住了一年，这已不是秘密。我曾从莫斯科给许多同志和朋友寄过明信片，也曾给替我理发的维贝尔基兴的理发师寄过明信片。1977年，当联邦德国电视台采访他时，他还愉快地回忆起此事。对于我到国际列宁学校学习一事只有少数同志知情。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和法官从未得知此事。

我从莫斯科一回国，就给《工人报》写了一篇长文章，发表在1931年7月19—20日的周末版上。文章是为1931年7月11日至12日的“萨尔劳动青年战斗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而写的，这是我从国际列宁学校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对代表大会的性质和德国共青团当时的政治活动作了详尽的介绍。文章熟知青年工人的处境，引导青年在反对危机和法西斯的斗争中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目前，当资产阶级企图把危机的所有负担转嫁到各阶层劳动人民肩上的时候，“各阶层劳动人民必须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和共同反对一切掠夺者的同盟”。鉴于由德国共青团

召集的这次大会的半数代表来自其他青年组织或是没有参加组织的青年工人，文章强调指出：“青年矿工、企业和失业救济机构的男女青年已经站起来了，他们用被剥削者的纯朴语言，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贫困。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他们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不管是社会主义劳动青年、希特勒青年，还是基督教青年，大家都亲身感受到贫困。”

大会表明，建立各阶层劳动人民参加的统一战线是可能的。关键是青年共产党人必须大大加强在企业中、特别是在基督教青年工人中的工作，争取多数青年参加共同的解放斗争，参加消灭危机四起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民革命。

我在文章中还提出反对所谓的多米那尔学校。这是法国萨尔矿务所建的学校，目的是确保法国资本的长期影响。这种学校用各种小恩小惠，如发零用钱、免交书本费、赠送衣物和圣诞礼物，引诱德国的孩子们，把他们培养成法国矿主俯首贴耳的帮办。我要求：“退出这种学校！把德国孩子们送进德国学校，并在德国学校里进行革命的教育工作……”

在这里，文章引用了德共1933年以前的一份重要文件：“我们反对德—法双重剥削的奴役。德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和民族解放的纲领性声明还没有充分深入到劳动青年群众中去”，关键是用德共的原则立场揭露“回到德意志祖国去”这一口号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煽动，代之以“我们的任务是和德国工人阶级一道，为进行人民革命而斗争”。

1930年8月24日，在我18岁生日前夕，“关于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声明”在德共机关报《红旗》上发表了。当然并非因此我才记住了这个文件，而首先是因为它的重要政治内容。虽然文件是1930年9月14日国会选举前发表的，但它决不是一个为竞选目的而发表的临时性政治文件，而是对德共政策具有长期的纲领性的原则声明，为党的总路线奠定了基础。文件的高瞻远瞩和历史影响在后来的年月里越来越明显。

根据台尔曼的提议制定的纲领声明是建立在列宁联盟政策的经验和马列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原则基础上的。党提醒说，她自成立之日起就坚决反对凡尔赛强盗和约。她宣布，如果她在竞选中获胜，将废除“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一切义务”。为了解放德国人民，只废除凡尔赛和约还不够，必须同时推翻本国的大资本统治。

为此，德共明确要求：将大企业、银行和大商业收归全民所有；将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分配给缺地的农民；与苏联结成经济联盟；通过公共应急工程消灭失业；提高工资；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定公正的税收政策；停止提高关税；降低煤气、水电和公共交通工具的费用；采取措施，解决住房困难以及使妇女和青年获得平等权。

这一纲领性声明为共产党人与社民党工人和基督教工人建立通情达理的关系，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实行更广泛的联盟政策，以及为建立由一切反希特勒人士参加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指出了道路。1930年9月14日大选中德共比1928年增票133万张。社民党虽然仍是第一大党，但它丢了近60万张选票。但是希特勒法西斯的得票率从1928年的2.6%增加到1930年的18.3%。纳粹党的沙文主义歇斯底里使其他所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望尘莫及，夺去了它们的选票。这证明了德共在纲领性声明中阐明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原则的正确性。

在莫斯科列宁学校期间，我自己也深入地学习了德共纲领声明。回到萨尔后，我把它看作是在无产阶级青年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准绳，它不仅决定了1931年7月在萨尔召开的劳动青年大会的内容，而且也决定着我们的集会和游行（如1931年9月的国际青年节游行）的内容。

1931年9月6日是一个激荡不安的星期天，如今还历历在目，好象就发生在昨天。由于我们作了周密的政治和组织准备，我们成功地把至少200名警察弄得晕头转向。早在8月份，我们就在《工人报》上为国际青年节作舆论准备，我们公开宣布要在诺因基兴和萨尔路易游行，警察宣布禁止一切青年集会，我们秘密地准

备到圣·英格贝特游行，并邀请所有能邀请到的社会主义青年工人和基督教青年参加。

星期天早晨，我们在诺因基兴举行了简短的集会，把警察吸引到那里后，我们则穿农田、抄近路到了离诺因基兴七公里的圣·英格贝特，在这个小城市的街道上不受干扰地举行一次大游行。

9月8日《工人报》在头版位置以“国际青年节17周年游行队伍不顾禁令在诺因基兴、萨尔路易和圣·英格贝特举行游行”为题作了报道，报道说：“虽然在诺因基兴出动了200名警察，200名青年还是在诺因基兴无产者居住区举行了游行，青年共产党人还在两处向集会者发表了演说。1小时15分钟后游行队伍自动解散了，开过来的警察扑了个空，他们拿孩子们撒气。圣·英格贝特的青年举行了游行和集会，而又大出警察意外。当警察从诺因基兴、霍姆堡及其附近地区赶到圣·英格贝特时，又晚了。”

《工人报》进一步报道说，在萨尔路易的集会上，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的一名成员讲了话，宣布他要加入德国共青团。另外还有三位成员在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效法了他的榜样。警察的猛烈攻击对事情的发展大概也起了催化作用。许多儿童和青年被警察打伤，但警察未能解散集会。

今天，资产阶级和社民党的历史学家们常常指责德共当时“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错误的，政治上是灾难性的，相反，共产党应该搞“自上而下”的统一战线。在学术论文中这种马后炮可能是“十分高明”的。对亲身经历了当时政治斗争的人来说，这种指责未免有点违反历史和脱离现实。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难道共产党人会不去选择较为易行的“自上而下”的（只存在于理论中！）统一战线，却宁愿选择更为困难的“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吗？好象共产党人在政治工作中会象那些历史学家一样如此不辩证，如此公式化，如此肤浅，不是“自上”就是“自下”！事实上，我们始终既希望第一种方式也希望第二种方式。遗憾的是，社民党和工会中有影响的领袖们病态的反共态度限制了我们的愿望的实现。

在萨尔河畔，不仅有长期在“帝国”选举中得票最多的社民党，而且还有中央党。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基督教工人参加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我们有意避开有争议的世界观问题，争取在政治问题上寻找共同语言。我们不仅和基督教青年工人进行讨论，和基督教两派神职人员也很谈得来。希特勒在“帝国”上台后，有些接触变成了可靠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

当然，我们当时也愿意与天主教主教或者教皇本人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自然只存在于理论上），因为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根本无希望。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5月15日“教皇通谕”中用激烈的语言谴责、诅咒共产党，而不是法西斯。

在很长时间内，社民党和工会右翼领导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如此。到了1934年6月30日，即法西斯夺权一年半之后，在萨尔地区也已面临法西斯危险的情况下，德共和社民党才在萨尔的布尔巴赫举行了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集会。会上，萨尔地区两个党组织的代表终于公开宣布要采取反法西斯的联合行动。

在此之前，社民党领导人对共产党提出的所有统一战线建议不是公开拒绝，就是视而不见。社民党右翼领袖对1914年8月的背叛和1919年1月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负有罪责，他们总是极力诋毁苏联和共产党。这样共产党人除了在工厂里、在居民区和失业救济机构中和他们的阶级兄弟搞统一行动外，没有其他路可走。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历史的必然。统一行动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共产党人为建立统一战线所进行的耐心争取工作深得萨尔地区劳动人民的称赞。他们对德共日益信任。在1932年2月16日萨尔议会选举中，德共获得的选票几乎是1928年的两倍（84,112比46,541）。社民党丢了7,500张选票。德共第一次成为萨尔地区获票最多的工人政党。

前面已经提到卢特温·比斯的书《1919至1935年萨尔地区的

阶级斗争——德共在萨尔地区为人民的社会和民族解放而斗争》，他在书中赞扬共青团为德共在1932年2月16日选举的胜利出了力：德共坚定不移的青年政策对此次胜利作出了贡献。这项政策“日益广泛地赢得了德国共青团的支持”。比斯还谈到我当时的活动，提到我曾为德共1931年在萨尔布吕肯出版的小册子《自由之路》写过一篇文章，文章把发展反法西斯和反对克扣工资的广泛统一战线看作当务之急。

在1930年8月24日“关于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性声明”的基础上，德共萨尔地区党组织于1931年制定了“关于萨尔地区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性声明”，发表在1931年9月20/21日萨尔布吕肯《工人报》上。我参加了纲领的起草工作。为了说明萨尔河畔阶级斗争的特点，我想引用其中的几段：

“为了加重剥削，为在牺牲劳苦大众利益的基础上挽救气息奄奄的经济，萨尔地区勒希林和奥托·沃尔夫(施图姆)与法国大资本家施奈德—克罗伊索特及德文德尔狼狈为奸。鉴于这一形势，德共萨尔地区党组织根据德共中央关于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性声明，声明如下：只有共产党真正反对凡尔赛强盗和约，这个和约是萨尔无产者忍受德法双重剥削的开始。”

对于萨尔回归德国问题，声明说：“萨尔地区劳动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不可能通过纳粹分子的欺骗性的、蛊惑人心的民族空话来取得，……只有和全德国的革命无产阶级并肩地对国内外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进行最尖锐的斗争，直至推翻资本统治，建立苏维埃德国才能实现。”文件也赞扬了苏联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英勇卓绝的努力，德国共产党可以指望从他们的胜利中获得支持。

声明还向法国阶级兄弟表示声援：“法国无产阶级也正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下呻吟，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正在准备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法国的苏维埃政权。”

关于德共的目标，声明说：“德国和萨尔地区的无往不胜的无

产阶级不仅要无偿地收回法兰西国家占有的萨尔矿山，也要没收德国工厂主及国际股东的钢铁厂和其它工厂，把它们还给合法的主人——劳动群众……我们要实行七小时工作日，每周五天工作制，通过提高生产满足需要，从而消灭失业。我们将提高工资，办法是取消资本家利润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非生产性费用，立即停止支付帝国主义强盗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一切贡赋和利息以及战争赔款。”

在这一明确无误的纲领性声明的基础上，我为萨尔的劳动青年起草了一个战斗纲领，收在题为《自由之路》的小册子里。卢特温·比斯把这个纲领收进他的书的附件中，使它多年之后再次和广大读者见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青年战斗纲领从现实生活中提出了几点非常具体的要求：如实行青年六小时工作日、同工同酬、青年有权取得失业救济、把第一次参加选举的年龄规定降到18周岁、废除限制、甚至禁止青年参加政治活动的反动法律。

1931年11月15日，在萨尔布吕肯大厅召开的第一届萨尔劳动青年反对民族和社会压迫的自由代表大会上，德共和德国共青团的纲领性文件得到热烈的拥护。代表大会向列宁故乡的劳动人民祝贺红色十月胜利14周年，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看作劳动人民求解放的光辉榜样。

自由代表大会对希特勒的法西斯本质深信不疑。纳粹当时在萨尔地区还不成气候，德共和中央党的基本选民使纳粹党在选举中没有机会取胜，但是我们对“帝国”范围内“纳粹运动”所暴露出来的危险性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德共萨尔地区组织的纲领性声明也指出，大资产阶级除了传统的政党和组织之外，又组织了“新的民族主义的暗杀机构”。在德国，“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正扮演着这种角色，它的手法是，用骗人的民族和社会空话把走上极端的劳动者置于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德共萨尔地区党组织曾预言，法西斯的“第三帝国”将比“目前的贫困”更严重。

今天，某些资产阶级著作家企图制造这样的假相，仿佛共产

党人是在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才开始认清希特勒法西斯的本质和危险的。这是历史谎言。早在1923年6月20日，克拉拉·蔡特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曾谈到“反法西斯斗争”，并根据法西斯统治意大利的情况指出：“法西斯是无产阶级极其危险而可怕的敌人。法西斯是目前世界资产阶级发动总攻击的最强烈、最集中和最明显的表现。制止法西斯是最基本的需要。”前面已经提到台尔曼的传记，从他的传记中可以看到，他作为德共主席，在1933年以前的几年里曾一再指出法西斯是工人运动和苏联的死敌，并警告法西斯带来的战争危险，最后在1932年初总统竞选中提出下述著名口号：“选举兴登堡等于选举希特勒，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历史不幸地证实了这一警告的正确性。

1931年11月10日，德共中央作出决议，坚定地提醒共产党人不要因为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日渐猖獗的恐怖谋害活动而采取个人恐怖活动。认为，对纳粹既阴险又残暴的恐怖作法的唯一正确回答是开展反法西斯的群众斗争。中央提醒说，个人恐怖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倾向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把战略和战术建立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上的基本思想截然相抵触。”这种倾向也和共产国际的纲领相抵触。

1931年11月15日至16日，萨尔布吕肯《工人报》发表了这个决议和为决议发表撰写的社论。我是社论的主要执笔人之一。

社论说：“纳粹分子的武装袭击、暗杀活动和其它无数罪行可能会使人产生个人报复和个人恐怖思想。但是感情用事的人不是共产党人。”社论接着说：“采用个人乱打一气的办法对付法西斯的袭击无济于事，只有群众斗争，有组织的防范和在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基础上的真正的群众自卫，才能有所帮助。”

我之所以重提德共的明确立场，是因为许多资产阶级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学家至今仍声称，魏玛共和国是因为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恐怖”而失败的。当时资产阶级和社会改良派的报纸也

散布这种说法。因此，我们在那篇社论里不无原因地指出，共产党员的任何个人恐怖活动只会有利于反动派，为他们加紧反共的暗杀活动提供口实。

不，共产党人既非恐怖主义的发明者，也非恐怖主义的实践者。相反，自1919年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他们的战友被暗杀以来，共产党人一直是来自右派的恐怖活动的目标，他们成了诺斯克的军队、反革命的“自由军团”、国防军以及长期由社民党领导的警察的恐怖活动的对象，最后更成了希特勒法西斯的恐怖对象。

根据帝国内政部长泽韦林(社民党人)的提议，从1929年5月起，在“帝国”范围内禁止“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但它在萨尔地区几乎一直合法地存在到1935年。红阵同盟成员活动时和军训时纪律严明。集会时他们保卫会场，游行时维护秩序，他们还负责通讯联系，这些任务都需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用军火工业大量捐款武装起来的希特勒冲锋队敢碰一碰阵容整齐的红阵同盟的队伍，即使在1928年和1930年选举中也没有发生过。身穿褐色服装的冲锋队打手们和所有雇佣军一样，从本质上说是怯懦的。只会暗箭伤人，要么就是他们人多势众或有警察撑腰时才敢进行恐怖性暗杀活动。

1932年11月14日至15日，我在柏林附近的普里罗斯参加德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们的永生难忘的恩斯特·台尔曼，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和他交谈。

首先由德国共青团新主席弗里茨·格罗斯作有关形势和德国青年工人斗争的报告，然后来自各地区的代表发言。会议进行到第二天，我有机会向大会报告德国共青团在萨尔地区为争取青年参加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经验。我还谈到我们与法国同志的良好合作，并表示，我们将在萨尔河畔制止法西斯的发展。接着是恩斯特·台尔曼讲话。当他从一辆摩托车上下来时，我们在门口热烈地欢迎他。他站在我们面前，对我们的政治工作方法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教导我们要经常学习，掌握理论知识，在政治领导工作中要寻找最适合青年特点的形式。他劝我们要学会青年人的语言，要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青年中促进同志式关系的发展，不要忘了青年农民和大中学生。面对纳粹反理性的、神秘主义的虚伪宣传，德国共青团要用心理上正确的方法捍卫共产党的总路线。不论是在法西斯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还是在监狱里，恩斯特·台尔曼最后的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我没有料到，我再也见不到台尔曼了。他也不会知道随后的几个月里会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不仅你们年轻人，我们年纪大的人也会看到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当恩斯特·台尔曼 1944 年 8 月 15 日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遭杀害时，他知道，红军终将打败希特勒法西斯，从而将为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开辟一个新前景。

第六章

在鲁尔区从事地下工作

1933年2月10日星期五晚6点左右，当时德国最大的煤气贮存罐在诺因基兴发生爆炸，爆炸的巨响在22公里以外的萨尔布吕肯都听得见，当时我正在萨尔布吕肯。事故发生后马上封锁了诺因基兴。不幸的消息象野火一般迅速传开。100多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部分伤者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位于诺因基兴铁厂附近的萨尔布吕肯大街上的工人居住区（主要是施图姆兄弟炼铁厂的工人区）全部被毁，满车乘客的电车被抛到空中，电影院倒塌，电影观众被压在废墟下。在1931年建造的炼铁厂贮气罐爆炸后，工厂的贮苯罐也有爆炸的危险……

事故原因从来没有查清楚。也许是技术失误造成了这次灾难性事件。说来也怪，诺因基兴的灾难正好发生在1933年1月30日登上总理宝座的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第一次准备发表全国广播演说的时候。纳粹报纸在1933年2月11—12日的周末版上出现这样的大字标题：“元首在体育宫发表重要讲话——向马克思主义提出最尖锐的挑战——诺因基兴发生大爆炸”。

如果今天回过头来想一下，希特勒在2,000万广播听众面前“向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诺因基兴的爆炸事故在时间上的巧合，那么2月10日晚从诺因基兴铁厂贮气罐喷出的火焰好象是一个历史的不祥之兆——类似贝尔沙扎尔（拜占廷末代皇帝的儿子。——译者）在举行一次盛大筵席时突然在墙上闪光的“神书”预言着一个可怕的下场一样。作为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拥护者，我不相信什么“神书”和预示灾难临头的信号。就这件事而论，我想说，几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从斯大林格勒到伦敦，无数条街道和1933年2月诺因基兴的萨尔布吕肯大街一样遭到破坏，希特勒“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最尖锐的挑战”最终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

到了1933年2月初，希特勒上台将给德国人民、欧洲其他各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已无需用火焰和“神书”来预兆。到1932—1933年之交，凡有理智、能进行政治思考的人只要对某些“参数”稍微注意衡量一下，就能预料到，由德国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阶级中最具有侵略性的集团所豢养的希特勒匪帮推行反共的民族主义歇斯底里将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混乱！恩斯特·台尔曼多次明确地指出：“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

1932年夏天，在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已无法进一步取得更多的选票。1932年11月6日国会选举中，该党已经失票200万张！相反，德共增票60万张。德共和社民党的票数加起来明显地超过纳粹党。在11月13日和12月4日的地方选举中，德共的得票率进一步上升，而法西斯继续失票。情绪发生了转折，某些小资产阶级开始脱离“纳粹运动”，这使希特勒的幕后老板更加强了他们的活动。

百万富翁数以百万计的贿金源源不断地流进纳粹党的腰包（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底到1945年初至少有七亿马克）。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银行家库尔特·冯·施罗德男爵供认：“当国社党1932年11月6日遭受第一次挫折，也就是开始走下坡路时，它急需德国经济界的支持。”与选民的意愿相反，一个由大工业家、银行家和容克地主组成的集团1932年11月19日要求帝国总统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国防军的研究报告支持这一要求。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和巴本在银行家施罗德的科隆公寓会面，为夺取政权做准备。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意志帝

国”总理。这些事情都是数得出来的。

纳粹党公开的纲领及其当时的政策丝毫不容怀疑，这个党的屁股不仅坐在最具有侵略性的军火商一边，而且准备不顾一切地为这个阶级的利益效劳。尽管这个党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无以复加的程度和蛊惑人心的伎俩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和社会的煽动，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所谓的“工人党”既不代表民族利益，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是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用专制的手段“消灭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和用战争扩张的手段为德国帝国主义“夺取新的生存空间”。

自1925年以来多次再版的公开出售的希特勒的自供书《我的奋斗》把德国法西斯的专政和侵略意图和盘托出。尽管如此，国内外的确存在着某些直接支持或间接纵容、绥靖希特勒法西斯的政治势力，例如，没有北美某些金融巨头的同意，对美国负债累累的德国银行家们是难以把希特勒扶上台的。的确，早在1931年10月，德国大工业家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在纽约向美国工业家的一次讲话中就夸奖纳粹党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许多后来成了法西斯刀下鬼的德国资产阶级和社民党政治家以及一些后来成了法西斯侵略牺牲品的国家的政府都曾支持或纵容过希特勒法西斯，因为它极端反共反苏。

历史证明：只有台尔曼的党是德国唯一立即和毫不妥协地起来反对希特勒政府的党。早在1月30日德共就号召举行反对大企业主和军国主义内阁的政治总罢工，指出这个内阁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是对劳动人民和德国工人阶级最残暴、最露骨的宣战”。就在同一天，德共中央建议社民党理事会象1920年3月为保卫共和国反对卡普政变时举行的胜利的总罢工一样，联合举行反对希特勒的总罢工。但是社民党理事会拒绝了这一建议，并于1933年1月31日表示，希特勒政府是“根据宪法取得政权的”，社民党将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斗争，只有在希特勒破坏宪法的时候，社民党才会采取议会外的行动。

在那些命运攸关的日子里，在萨尔布吕肯我们也在紧张地等待着来自“帝国”的每条新消息。有关抗议集会、抗议行动和抗议罢工的每一条消息都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每一条关于社民党和工会领导人拒绝和共产党联合反对希特勒的消息都使我们感到沮丧，越来越多的有关法西斯对共产党人和坚定的社民党人犯下暴行的新消息，都激起我们新的愤怒和更大的仇恨。眼睁睁地看着帝国边界那一边的冲锋队、警察和国防军的联合政权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残忍首先而且主要扑向共产党人，占领他们的办公室，破坏他们的住宅，威胁他们的生命，真是憋气。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战争到头来毁了半个欧洲，导致了奥斯威辛和马伊达内克（两个法西斯集中营。——译者），但他从1933年开始首先是凶残地迫害德国共产党人。

当法西斯当权者清楚地知道社民党领导不同意举行反对希特勒的总罢工之后，他们才敢于在1933年2月2日占领柏林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2月4日发布“保护德国人民的总统法令”。法令规定对纳粹政府的任何批评都将受到惩罚，这就为迫害共产党干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事实上迫使德共转入地下。但是共产党人奋起自卫。2月7日德共中央在柏林附近的“齐格哈尔斯”体育之家举行由党的专区一级干部参加的中央会议，会上台尔曼重申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并采取了保存党的措施，使她能够在地下继续进行斗争。由于在社民党工人和干部中要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愿望日益强烈，加之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担心在这种情况下3月5日的国会选举可能会遭到明显的失败，所以他们在2月27日晚制造了国会纵火案。根据共产党人纵火的谎言，第二天就发布了臭名昭著的“保卫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法令实际上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为国家有组织地对一切反法西斯人士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基础。下令逮捕德共领导干部。纳粹匪帮也占领了社民党的《前进报》编辑部。有人告密之后，3月3日台尔曼在他的秘密住所被捕。然而3月5日

仍有近500万德国人投了德共的赞成票。纳粹违背魏玛宪法，立即宣布德共的席位无效。

面对这一件件事实，谁还敢坚持认为希特勒是合法上台的？

从1933年2月底起，我们这些在萨尔的人不断地从秘密过来的同志们口中得知纳粹对德国工人运动进行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动。我们没有指望法西斯会干好事，我们担心的倒是发生最严重的事情。我们了解到他们抓人、刑讯、恫吓、集中营、暗杀、谋杀、讹诈、盯梢以及对妇孺的暴行是如此残忍，范围之大，系统性之强，是无法预见的，是无法想象的。

后来人们试图从哲学上说明，为什么在产生诗人和思想家的人民中竟会发生如此大量的蔑视人和消灭人的举动。法西斯恐怖的基本点早已有之：如美国对有色人实行私刑；沙皇俄国屠杀犹太人；英国在南非把布尔人投入集中营；一次大战后德国臭名昭著的“就地正法”的反革命暗杀活动；帝国主义在大多数殖民地进行大屠杀；以及实际上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刑讯拷打、逐出境外和草菅人命；在俄国、德国、匈牙利、波兰和中国，反动派以反革命的大屠杀来对付革命的发展等等。

纳粹德国的不同之处是，希特勒法西斯以绝对的肆无忌惮、日益完备的技术和“德国人的彻底性”来运用上述思想恐怖形式和杀人形式，并第一次把全国的舆论工具（包括广播和有声电影等新的媒介手段）赤裸裸地用于反共的谋杀煽动。

1932年12月德共有360,000名党员，纳粹上台短短6个星期，就有180,000党员被监禁，遭拷打。上万人被关进集中营，仅在1933年3月建立的达豪集中营就准备关押5,000名反法西斯人士。据“红色互助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35年有5,000名反法西斯人士遭杀害，其中主要是共产党人。21,000人遭审讯，19,000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帝国司法部有案可查的政治处决从1937年的86起增加到1944年的5,764起。

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始终没有屈服，因为这个抵抗运动的灵

魂和中流砥柱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弃斗争，他们不顾恐怖和死亡威胁忠于自己的事业。我们在萨尔地区也加强了反法西斯的斗争。1933年“五一”节，当希特勒在“帝国”准备大肆打击工会的时候，我在萨尔布吕肯组织了一次大游行。虽然地方当局禁止一切公开集会，青年工人还是在德国共青团的领导下走上了街头。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在主席恩斯特·布劳恩的带领下，参加了这次游行。布劳恩后来参加了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如今住在格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1933年春到初夏之间，我多次到“第三帝国”（当时纳粹狂妄地公开把他们的国家称为“第三帝国”）的曼海姆、美因茨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地，和德国共青团领导人秘密接触，交换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讨论支持共青团在希特勒德国进行秘密工作的措施。为了减轻我这个政治书记（实际上的第一书记）日益繁重的地下工作的负担，维利·罗姆于1933年5月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来到萨尔地区，担任区共青团的组织书记（实际上的第二书记）。与萨尔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领导人和天主教青年联合会领导人的多次讨论，维利·罗姆都在场。他如今住在民主德国的柏林—马尔察恩。

1933年夏，在萨尔地区的各小城镇，如维贝尔基兴、诺因基兴、苏尔茨巴赫等地，德国共青团、天主教青年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工人、自然之友青年组织和耶稣教青年组织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定的政治联系。我们一道组织远足，利用这种形式讨论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但是正式协议和联合行动步履艰难，因为天主教青年联合会代表认为，公开和共产党人联合将为他们的工作带来困难。

1933年6月4日至6日，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反法西斯工人代表大会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还记得，一个由我带队的小小的萨尔青年代表团乘坐一辆老掉牙的奔驰车去巴黎。我们觉得这比坐火车既便宜又安全，会议空隙还有机会看一看法国

首都，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几年里，我至少去过巴黎三次，每次时间都很短：1933年6月去参加会议；同年9月22日至25日又去参加青年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世界大会；1935年5月初，当我不得不永远离开萨尔时，再次来到巴黎。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1933年6月我们在巴黎参观了一些名胜，其中有著名的巴黎公社墙，公社的英雄们1871年就是在那里遭杀害的。还有贡比涅森林，1918年停战协定是在那里的一节火车车厢里签字的。1940年6月22日，希特勒法西斯在同一处进行报复，这一次是法国卑躬屈膝地接受了停战条件。

在巴黎召开的两次大会对于动员国际舆论反对希特勒法西斯造成的战争危险是重要的，亨利·巴比塞、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知名人士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在6月的会议上，我代表德国青年发言，忆及台尔曼提出的警告：“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六年之后，战争变成了严酷的现实。1933年的两次大会的确起了唤起国际声援、帮助法西斯受害者的作用。在9月召开的大会上，第一排留了一个空位，上边放着鲜花，这是为了纪念1931年8月1日被刀斧手杀害的年仅20岁的汉堡工人和德国共青团员布鲁诺·特希。他是纳粹血腥法律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1933年夏天，除萨尔地区的青年工作外，我还负责扩大与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共青团专区组织的秘密联系；准备8月初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德国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在曼海姆我认识了钳工海因茨·霍夫曼，一位积极的年轻共产党人。后来他参加了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现在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大将兼民主德国国防部长。当时库尔特·米勒也在那里工作。战后他曾积极地参与西德共产党的工作，后来加入了社民党。1933年他在西南德地区接受考验，因为他在争取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过程中“违背了路线”。我也认识了威廉·弗洛林。他一度认为“社民党已经一蹶不振”，这种看法不利于争取建立统一战线。

关于1933年8月初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的情况，后来弗里茨·格罗斯作了生动的描写。前面提到过，我和他是1933年11月在普里罗斯会议上认识的。阿姆斯特丹会议是在一条比较大的汽艇上举行的，这是为了防止窃听。我们装成旅游团的样子，从阿姆斯特丹的水域一直开到北海运河。其中讨论了与天主教青年合作的问题，我介绍了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会议决定让我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指导员和共青团的政治领导尽快到鲁尔区开展地下工作。

1933年夏，埃森共青团领导人被捕，专区领导机构实际上已不存在。团的情况和党的情况差不多：1933年6月初，22个德共专区领导机构中有17个几乎全部被破坏，但党的组织继续存在，因为总有新的战士起来把同志们团结在一起。埃森和全鲁尔区一样，虽然遭到种种迫害，仍然有许多政治上活跃的青年共产党人小组。其中有一个组由1930年担任过共青团鲁尔专区宣传书记的阿尔伯特·魏希尔特领导。1933年8月，我在埃森和他建立了联系。联系暗号是：我说出一句确定的暗语，拿出规定好的半张香烟盒画。我的假名叫赫伯特和赫伯特·容，然而我还带着真名真姓的萨尔身份证。

那时埃森是一个开采塔和高炉林立的工业城市，很象我的故乡诺因基兴，只是埃森要大得多，有65万人口。汉斯·马尔希维查1930年发表的、1931年被禁止的写实小说《埃森风暴》生动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面貌。白天烟雾弥漫，天昏地暗，到了夜间工厂里发出永不停歇的嘈杂声，火光照得通明。对我来说，埃森不是克虜伯之流的城市，而是战斗的工人阶级的城市。

阿尔伯特·魏希尔特在埃森西区和一个果园里为我们找了几处安全住处。我们坐到一起，分析地下工作的形势。两三天后，我们已经相当准确地知道，哪些力量是活跃的，哪些力量能够发动起来和怎样使用这些力量。我们确定了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然后投入了实际工作。

阿尔伯特·魏希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首先把大组分开。我们组织了五人小组，后来又分成三人小组。这种组织形式很适合做地下工作。因此，1933—1934年盖世太保在埃森未能抓到青年团地下组织的成员。在埃里希·昂纳克的领导下，我们从组织上改变了工作方式，我们可以说：这个组织形式相当安全。”

阿尔伯特·魏希尔特认为重要的是，“埃里希·昂纳克带来了新的政治路线：抛弃了宗派主义思想，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在这方面，当时鲁尔区还有很大的潜力。为了动员这些力量必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共青团。

1933年9—10月间，我在埃森各个城区秘密地重建了德国共青团组织。我们和德共地下组织有很好的秘密联系。当时我们在埃森西区布克哈特大街一位青年同志家里有一架油印机，能印传单。我主要在夜里起草传单。我们甚至出版胶印的《鲁尔青年近卫军》。维利·罗姆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0月他从萨尔区到鲁尔来帮助我从组织上重建共青团专区委员会。奥托·维斯纳尔也协助我们工作。他曾是鲁尔区红色少年先锋组织领导人，后来任专区共青团指导员。他搞到了一架打字机和一架油印机，藏在奥伯豪森一家天主教医院烧暖气的地下室里，我们在那儿印传单和供散发的小条子。奥托·维斯纳尔今天生活在民主德国。

由于在莱茵—鲁尔航运公司工作的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秘密地从荷兰得到许多传单、报纸和小册子。1933年夏天出版的著名的《关于国会纵火案和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揭皮书》以及其他有关1933年9月21日开始的国会纵火案的审判材料都用不引人注意的伪装封面。我想起一本揭露1934年2月1日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总部里约翰·舍尔同志遇害真相的小册子，封面是《蒙达明菜谱》。蒙达明公司的代表前往全国各地提醒人们注意这类伪装书，这样更使许多人知道了这一本书。虽然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人经常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我们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只要有机会，我们还要讽刺敌人。我听说1933年夏

发生在多特蒙德体育场的一个例子。当时冲锋队参谋长恩斯特·罗姆和其他高级冲锋队头目搞同性恋已是公开的秘密。冲锋队计划在多特蒙德搞一次大游行，罗姆上尉想检阅他的队伍。就在头天夜里，共青团的男女青年们在体育场的墙上贴出了这样的大标语：“冲锋队注意！扒下裤子，罗姆来了！”

第二年的6月30日，在一次恐怖的罗姆大屠杀中，冲锋队头目和其他上千名接近纳粹领导的恶棍被他们的同伙所杀。在这次希特勒法西斯内部狗咬狗的暴力事件中，巴本的秘书也丢了命。前不久还自命不凡到萨尔处理诺因基兴爆炸事件、并无耻地为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辩护的巴本这一次也丢了副总理的肥缺，被弄到国外当了一名公使。罗姆血案后法西斯体系巩固了。在此之前，法西斯体系并不象今天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严密。

直到1934年，德共和德国社民党在鲁尔地区还有一定力量。1933年11月12日，希特勒把“国会选举”和要求退出国际联盟的“公民投票”联系在一起，结果仅仅在多特蒙德市莱茵街就有2,000人投了反对票。尽管每一个到投票站去的人都发给一枚有“赞成”退出字样的纪念别针，以从心理上对选民造成压力，但是仍有200万人没有参加投票，300万人投了反对票。

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回忆起这些，是因为我在多特蒙德的几个投票站列席了“检票”工作。这一天我和共青团多特蒙德区的青年同志们住在一起。恩斯特·瓦布拉也在那里，当时他受共青团中央委派，负责中莱茵地区、下莱茵地区和鲁尔区的工作。贝尔塔·卡尔克住在我们旁边，她是一位勇敢的青年共产党人（今天生活在联邦德国），在1934年初被捕之前，她在下莱茵地区谨慎地从事政治工作，人们都称她罗拉。罗拉把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扩大到天主教青年中。由于约瑟夫·罗塞特博士的介绍，她对40—50名“天主教冲锋队”成员讲了话，争取他们参加反法西斯的统一斗争行动。

贝尔塔·卡尔克从莫斯科列宁学校回国做地下工作，截至

1934年1月底之前，她一直与罗塞特和“天主教冲锋队”领导人弗兰茨·施特伯尔保持着联系。到1936年这个组织还有40,000名成员，其总部设在杜塞尔多夫青年之家。纳粹上台后立即关闭了这个青年之家。1933年7月20日，梵蒂冈和希特勒政府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宗教协定，青年之家重新开放。1936年12月1日“希特勒青年法”出笼后，禁止了除“希特勒青年”之外的所有青年组织，这个青年之家再次被封禁。

罗塞特、施特伯尔及其周围的年轻人都是极好的人。他们勇敢地对法西斯开展斗争，即使当他们的宗教服装已经不能保护他们免遭迫害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斗争。1936年1月，罗塞特、施特伯尔和其他60位天主教青年骨干被捕，次年4月遭“人民法庭”的审判，罗塞特和施特伯尔被分别判处11年和5年监禁。这件事是我在勃兰登堡—戈登牢房时从弗里茨·格罗斯那里得知的。格罗斯认识罗塞特。格罗斯1936年3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5年后，约瑟夫·罗塞特博士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地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今天，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1902年生），还担任着联邦德国纳粹政权受害者协会主席的职务。施特伯尔今天也生活在联邦德国。

在1933/1934年间，无论在社民党还是在基督教青年中，同德国共青团合作的愿望都在加强。年轻人一道远足，共青团员也参加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尤其是天主教青年联合会在教堂里组织的活动。教会办的当时尚属合法的杂志也刊登共产党人写的文章。甚至共同散发秘密传单。

阿尔贝特·魏希尔特与埃森的“自然之友”组织保持着联系。有时他们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我们的传单、杂志和伪装小册子投进预先确定的住户的信袋中，当然他们必须严格遵守地下工作规定，有时不得不带着手套干这项工作。维利·罗姆和格尔森基兴的神甫等宗教界人士保持着联系。在神甫的帮助下，1934年春联合召开了一次共青团和天主教青年联合会会议。虽然地下工作

的性质不允许我与更多的人建立个人接触，但我还是参加了那次会议。

1933年底，虽然天寒地冻，但在一段时间内我仍然住在埃森—哈尔措夫一位同志取名“阳光”的林中小屋里，就在埃森西南的一片旷野上。夜幕降临后，我可以在那里和来自鲁尔区各地的同志们碰头，不会被发觉。在那里我们几个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还在小范围内共度了除夕之夜。尽管1933年的经历是严酷的，对1934年这新的一年又心中无数，但我们还是愉快地度过了一个值得回忆的除夕。1945年之后，每逢除夕我就经常讲起那个愉快的夜晚，就象我常常说起1930年我和马克斯·赫尔茨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个除夕一样。可惜1933年底，马克斯·赫尔茨已不在人世了，他是1933年9月15日在苏联不幸遇难的。

阿尔伯特·魏希尔特大胆的想法对1933年除夕的小小庆祝会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12月31日早晨他把我们几个搞地下工作的青年干部介绍给当时尚未统管起来的“和睦”消费协会的可靠司机当助手。这一天运送食品和饮料的车很多，进门时不问姓名和地址。我们轻而易举地进去了，整天搬运着装满香肠、炸面包圈和酒的木箱，我们从中捞了一点。一位同志的女儿是消费协会的负责人，她设法使我们除夕有充足的食物。我们这些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对这种无声的支援感到特别高兴。

1934年年初，我拿定主意，要向公众发出我们存在的信号。阿姆斯特丹的报纸报道了柏林成功散发传单的消息。1933年7月，几个同志散发传单引起了轰动：他们在柏林市中心熙熙攘攘的百货大楼高层上往下撒传单。这在埃森也是可以办到的。林贝格广场边上的百货大楼“阿尔特霍夫”（在战争中被烧毁，重建后属卡尔施塔特康采恩集团）处在繁华的市中心附近，百货大楼朝林贝格广场方向有一个钟楼式房顶建筑，上面是一家咖啡馆和一个厕所。我和阿尔伯特·魏希尔特观察了地形后，觉得这是散发传单的理想地点。我起草了一份充满激情的传单，我们油印了至少250张。

我们挑了一个刮风的天气，选择了交通高峰时间，来到预定地点。开始时还真有点紧张。为了安全起见，阿尔贝特不引人注目地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把厕所门插上，在门外就可以看到“有人”的字样。然后我拿出了传单，分成几份，从窗口撒了下去。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传单飘飘落地，然后迅速离开了现场，阿尔贝特紧随着我。

几分钟之后我们跳上了开往菲霍夫广场方向的9路有轨电车，这时冲锋队和警察的汽车急驰而来，封锁了百货大楼周围地区。为了从安全处观察事态的发展，我们按预先商定的那样，在菲霍夫广场又上了开往埃森西克虬伯工厂区的电车，这样我们又驶过林贝格广场。那里集聚了大批身穿警服和便服的警察，正在手忙脚乱地捡着剩下的传单，搜寻着作案的人。虽然许多在场的人经历了这一事件，城里的人对此议论了好几天，但纳粹报纸对此讳莫如深。盖世太保不愿公开承认，德国共青团的同志们又一次摆脱了他们。

今天，当我回顾在鲁尔区将近一年的地下工作时，我感到奇怪的是，纳粹庞大的国家机器居然没有发现我。在鲁尔区众多的城市里，我们和许多同志保持着联系，相当大的地下交通网建立得如此巧妙，如果不发生意外，纳粹密探只能无可奈何地在外围转，而无法逼近指挥中枢。无疑他们预感到有一个中枢。1934年夏季之前，我不得不停止在鲁尔地区的工作，因为春季发生的几件事表明，法西斯的缉捕手段越来越狡猾，我的处境已不怎么安全了。

可能是1934年2月，我和阿尔贝特·魏希尔特一起到杜塞尔多夫参加一次重要的德国共青团干部会议。当我们准备在杜塞尔多夫车站下车时，在我前边的阿尔贝特发现站台上正在检查身份证，我们有两位同志已经遇到了麻烦。据阿尔贝特回忆，这两位同志被捕了。事已至此，阿尔贝特和我不能自投罗网。我们没有下车，象阿尔贝特·魏希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一直坐到本拉特，从那里转车回到了埃森。为了谨慎起见，我换了住处。

令人不快的事件接连发生：一天晚上，我和两位青年同志碰头后，在埃森“利希特堡”电影院前，一个侦探为了“查明我的身份”，要我跟他走一趟。检查后他们放了我。有人“盯”上我了吗？他们知道或者估计到我在搞政治工作吗？我这个萨尔布吕肯的共青团干部是否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先擒后纵，是不是想破获我的秘密联系？难道因为我是萨尔人就手下留情吗？（当时萨尔地区不属德国管辖。——译者）他们当时正在争取萨尔，这一点很快就表现出来了。1934年5月9日，他们破例地允许一个萨尔工人代表团到狱中探望被监禁的台尔曼。或许真象埃森警察抓我时所说的那样，以为我是一个有扒手嫌疑的流浪青年吗？

对这一系列问题，当时我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必须作最坏的准备。警察肯定对一个从萨尔来的叫埃里希·昂纳克的人在埃森逗留或者逗留过一事立了档。我自己觉得令人信服地使警察相信，我在埃森只停几天，了解一下鲁尔区的工作条件。他们放了我之后，我制造种种假象，使警察相信，我已立即启程返回萨尔布吕肯。

三年后，在1937年6月“人民法庭”审理我的案子时，表明警察对我的情况一字不落地记了下来。起诉书说：“1937年（当然是指1934年。——作者）2月15日区刑警长秘书施罗德发现被告昂纳克在埃森和两名在逃的共青团干部魏南德和马克斯接头。警察以有扒手嫌疑为由在“利希特堡”电影院前短时间地拘留了他，以查明其身份。因为昂纳克估计到这次拘留和他的政治活动有关，所以他当天动身返回萨尔布吕肯。”

在“人民法庭”审判过程中，审查过“被告昂纳克”是否就是1933/1934年间在鲁尔区领导德国共青团活动的那个“赫伯特”。因为所有出庭作证的同志都否认这一点（这件事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样，关键就取决于出庭作证的刑警秘书施罗德的证词了。他为了强调自己的刑警干练，夸口说，从1934年2月我由萨尔地区来到这里，直到我在“利希特堡”电影院前被拘留审查后离开，一直

盯着我！这个刑警的吹嘘无意中排除了我就是“赫伯特”的疑案。这个情况对量刑的确是有益的。

2月15日，我绝不敢奢望“利希特堡”事件会对我产生有利的结果。相反，盖世太保只需在萨尔地区了解一下我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在德国共青团中的作用。过了很久，即1945年之后，我从保存下来的档案中知道，他们曾在春夏两次向柏林报告了我的情况：3月初杜塞尔多夫的盖世太保报告说，德国共青团干部埃里希·昂纳克从萨尔地区到了埃森。另一次是1934年7月，摘自一份指控几位同志从萨尔非法往德国运送宣传材料的起诉书，起诉书说，其中有一人提到了我的名字（他一定以为我在萨尔处境安全）。从此我被指控，被追捕。

如前所述，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34年春天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向我敲起了警钟：埃森盖世太保3月份传讯了17个女青年和12个男青年。他们都是阿尔伯特·魏希尔特以前认识的“自然之友”小组的成员，1934年1月他让他们一起散发过传单。我也知道这一件事，曾和这个小组的领导成员谈过话。阿尔伯特终于及时地使被传讯的人统一供词，排除了警察的怀疑。他让他们告诉盖世太保，他们一起远足、唱歌、练习民间舞蹈，仅此而已，没有政治。这些男女青年都坚持这一说法，都放了回来。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1934年春天，一个从柏林来的地下交通告诉我们，党的特工人员探听到，盖世太保已经掌握到鲁尔区德国共青团领导人的化名，我们必须马上到荷兰去。阿尔伯特因为母亲病危，继续留在埃森，我们要他暂时“安静”几天，然后去荷兰找我们，我们依依不舍地分了手。1934年12月，他在埃森被捕，被判四年监禁。1937年我们又在柏林“人民法庭”上重逢，当时我们不能打招呼。那时他被关在赫尔福德监狱，是带来作证的。在这种逆境中他继续进行着勇敢的斗争。

第七章

在萨尔河畔和施普雷河畔 从事抵抗活动

1934年秋，德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我从“帝国”的法耳茨、黑森、巴登—符腾堡的地下工作调回萨尔地区，因为那里即将举行公民投票。我和当时的德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今天联邦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赫伯特·魏纳同行，他当时的化名叫库尔特·冯克。当我们路过维贝尔基兴时，他问我，这里投票结果将会如何（指对萨尔是并入法国还是留在德国的公民投票。——译者）？我说：“最多30%至35%！”（指主张与法国合并的。——译者）他不相信。1935年1月13日投票结果比这个数低得多。虽然自1933年以来已经是希特勒法西斯的“第三帝国”了，可多数票仍赞成并入“帝国”。

萨尔居民大多数绝对不是赞成希特勒，而是反对希特勒的。然而他们上了民族主义宣传的当。1935年3月1日，希特勒使他们“返回祖国”，1939年9月1日把他们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萨尔地区回到“第三帝国”后仅仅过了四年半的和平时期，这是准备战争的四年半。这场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血腥的战争，也给萨尔居民带来了死亡和破坏。历史证明，同意并入希特勒德国是一场灾难，在当时萨尔唯一理智的选择就是保持现状。凡尔赛和约规定萨尔地区脱离德国15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这里包含着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并入法国，这是绝大多数萨尔居民不能接受的。在法国占领和国际联盟托管的15年期间，70万萨尔人中投票

赞成萨尔并入法国的从来没有超过 2.7%。如前面所说，从1918/1919年起，德共就主张萨尔回归德国。当然，我们希望“红色萨尔并入一个进步的、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德国，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劳动人民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德国，一个军国主义分子和军火巨头被剥夺权力和财富的德国，一个站在苏联一边的德国。”这是共产党人多年来所提口号的全部意义所在。1931年9月，我为“自由之路”这一纲领性文件撰文时，我曾把这一口号作为文章的结束语：“为红色萨尔区回归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德国而进行的斗争万岁！”

这一战斗目标并不象帕特里克·冯·佐尔米伦在他的书《“在萨尔河畔打击希特勒！”——1933—1935年萨尔地区的公民投票、流亡与抵抗》中认为的那样不现实。这本1979年在波恩出版的材料丰富的书本身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德共那时在萨尔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帝国”里，军火资本中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把他们的希特勒扶上了台，让他用血腥的独裁来扼杀台尔曼的党及其统一战线政策在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影响。截至1933年，出现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德国”已不是想入非非的梦幻，而是现实的可能性。随着依靠恐怖和蛊惑人心宣传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巩固，以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全面斗争议而不决，我们实现预定目标的实际可能性就越越来越小了。1934年党改变了看法，同意维持萨尔现状。

卢特温·比斯在他的关于1919年至1935年萨尔的阶级斗争一书中说，1934/1935年的公民投票是一场“艰巨的，力量悬殊的斗争”。这句话切中肯綮。不要以为我们当时会觉得“维持现状”特别有“宣传效果”！对于大多数参加投票的人来说，这个拉丁文概念的内容和词义本身着实需要一番解释，这的确是一个障碍。拉丁文的“维持现状”译成德文就是：保持现有状态不变。萨尔居民中有谁愿意保持当时的状态呢？不论从经济方面或者从社会方面来说，都没有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手工业者，一个小商人和小业

主会真的愿意保持 1934 年的状态。

公民投票前，法国资本家竭力转移他们在萨尔地区的资本，甚至拒绝给萨尔商人提供购买法国货的短期商业信贷，尽管萨尔商人多年来一直使用这种信贷从优购买法国商品。德国经济界在纳粹当局的扶植下，更多地买进萨尔商品，冻结“帝国”卖主的银行存款，直到公民投票结束。用“资本外流”和“削减资本”的手法，法德金融界配合默契，在公民投票前人为地在萨尔制造了一场财政危机。这场财政危机自然而然地加深了尚未完全克服的经济危机。1934年失业达 51,000 人，这是萨尔有史以来失业的最高纪录。

拥有可观的法国和比利时股份的萨尔地区钢铁工业早在1931年已经加入了德国重工业销售卡特尔。尽管如此，自 1933 年起，萨尔钢铁大王从法西斯德国的重新武装中获取大量的利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法国马其诺防线提供大炮和其他战争物资。当 1939/1940年冬天，在“西部防线”和马其诺防线掩体里作为“世仇”德法两国士兵们相互对峙、互相射击时，有谁会想到同一个萨尔钢铁大王已从这两个确无军事意义的战争工程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呢！？

当时萨尔最有权势的钢铁大王是赫尔曼·勒希林，他被称为“福尔克林的上帝”。1933年 3 月 31 日，勒希林拜见了希特勒，向他献策如何利用 1935 年公民投票把萨尔重新并入德国，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方案。勒希林知道，国社党在萨尔取胜的可能性极小，因此他向希特勒献策，在萨尔建立一个包括选民最多的中央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权宜同盟。中央党是“第三帝国”时期唯一宣布“自行解散”的党。几星期后希特勒的目的达到了。1933年 5 月 3 日，在纳粹分子袭击德国工会大楼的第二天，勒希林再次求见希特勒。卢特温·比斯在他的萨尔阶级斗争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勒希林—希特勒阴谋的各个阶段。1933年 7 月 15 日宣布成立资产阶级政党和纳粹分子“联合”的“德意志阵线”，从而这些政党和在“帝国”活动的政党一样实际上已经自行解散。“德意志阵线”的口号是“谁

不投德国的票就是赞成法国！”这一民族主义的煽动比拉丁文的维持现状更具“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它有强大的物质支持作后盾：勒希林的资本力量、“第三帝国”的财力和宣传手段。纳粹极其狡猾地利用了当时已经深入各家各户的广播，对群众进行歇斯底里的政治宣传。戈培尔亲自到茨魏布吕肯漫天许愿：将在几天内消灭失业，在萨尔回归德国后将会“大刀阔斧”地解决一切问题，说得天花乱坠。

面对这一由金钱、谎言、煽动和讹诈交织在一起的强大力量，我们也必须迎战，虽然我们现实地估计到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对公民投票结果就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共产党人深知，“大刀阔斧”地解决，对萨尔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中间的确也有少数人严肃地表示，“哪怕进集中营也要回归德国去！”这一口号当然没有市场，特别是在那些曾在“第三帝国”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中得不到共鸣。我们从切身经历中深知法西斯的所作所为。我们亲眼看到“第三帝国”失业者的出路：军火工厂和义务劳动军。我们知道“第三帝国”工人的物质境况没有丝毫改善。我们目睹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会员怎样遭逮捕、受酷刑、被杀害。因此，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顽强精神投入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

1934年秋天，我返回萨尔时，我已经搞了一年艰苦的地下工作，那是紧张戒备的一年，不断改变住处的一年，没有生活来源的一年，是希望与挫折交织的一年，是时刻受威胁又得到多方鼓励的令人欣慰的一年。今天，当我听到民主德国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对受迫害的外国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战士发出声援时，我常常以感激的心情想起当年我所得到的帮助。例如，在我被迫离开鲁尔区来到荷兰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多方面给予我的帮助（后来我又回到德国西南地区从事地下工作）。当时阿姆斯特丹住着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逃来的叫安妮·弗兰克的一家人，后来她的日记使千百万读者震惊。

1934年夏，我作为德国共青团西南专区团中央指导员准备前

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已办好护照，买了机票，后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为筹备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将会议推迟到 1935 年上半年举行。这样，我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萨尔的斗争。当时我负责的西南专区包括法耳茨、黑森、巴登和萨尔。赫伯特·魏纳是负责这个专区党的工作的德共中央指导员，当时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在约翰·舍尔遭暗杀后，他为萨尔布吕肯《工人报》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这位勇敢的共产党员，文章深深地激励着我。

人们常常以为，在 1935 年 3 月 1 日萨尔地区重新并入德国之前，一定有许多在“第三帝国”被取缔的政党的领导人合法地呆在那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是萨尔人，可以在那里以合法的身份工作，而在“第三帝国”却不得不秘密活动，来自“帝国”的同志们在萨尔地区也只能秘密地从事政治活动。尽管如此，在那里我还是遇到了党内许多有名望的同志。

除赫伯特·魏纳外，我还结识了德共的国会议员马克斯·玛达勒纳。那时他已经是国际上受人尊敬的著名工会领袖，1937 年被纳粹判处无期徒刑，由于长期监禁损害了他的健康，1943 年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去世。此外，还有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弗兰茨·达勒姆。他经过流亡和集中营的坎坷生涯后，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德国党和国家建设的领导工作，今天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积极从事政治工作。我还认识了当时的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赫尔曼·舒伯特。

在萨尔参加斗争的一段时间里，我还认识了其他许多同志，他们是：亚历山大·阿布施（当时从事党的新闻工作，现在是民主德国著名的政论家兼作家）、莱娜·贝格（民主德国著名的马列主义社会学家）、埃里希·格吕克奥夫（后来曾参加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斗争，毕生从事党的工作）、汉斯·基彭贝格（1923 年参加过汉堡起义，长期从事军事政治工作）、阿尔伯特·诺登（当时已是著名的党内新闻工作者，1946 年从北美流亡归来后参加领导民主德国新闻

工作的建设,很早就是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著有不少历史著作)、马克斯·雷曼(1920年参加红色鲁尔军,1945年后长期担任西德共产党领导工作)、汉斯·施雷克尔(现在在柏林外交周刊《地平线》工作)、弗里德尔·施泰因、安东·施维塔拉(1923年参加汉堡起义,1933年参加反法西斯斗争,1936年在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斗争中久经考验,1945年后长期在民主德国武装部门工作)和奥托·文策尔等。

青年团领导干部中我比较熟悉的有:保尔·维尔纳和汉斯·延纳斯。维尔纳当时是共青团机关报《青年近卫军》主编,后来参加过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斗争,现在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延纳斯1934年受共青团中央委派,从荷兰来到萨尔区担任共青团专区领导,我们俩几乎天天在一起工作,合作是成功的。他是外地人,只能秘密活动,我是本地人,暂时还可以公开活动。结果是汉斯负责组织集会,由我到会上(常常与社会主义青年工人代表和基督教青年代表一起出席)讲话。汉斯·延纳斯现在是联邦德国纳粹受害者协会秘书长。

许多进步作家也支持我们在萨尔的斗争。我记得和《埃森风暴》作者汉斯·马尔希维查的会面。和埃里希·魏纳特并肩战斗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他是一位诗句惊人的政治诗人,我曾在工人报刊上读过他的诗,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听他的讲话,认识他本人。魏纳特被逐出德国,住在靠近萨尔地区法国一侧的福巴克镇的一家林中旅馆里,从那里用他的诗句支持我们的公民投票斗争。萨尔当局在不准谈论政治问题的条件下,才准许这位非萨尔人公开讲话。集会时常有一名宪兵在场监视这位诗人是否遵守规定。而魏纳特每次讲话前先说明,他只朗诵诗,抒情诗当然不是政治。宪兵们信以为真,可是纳粹报纸对每一首新的战斗诗篇都暴跳如雷,要求禁止这位受人爱戴的诗人上台讲话。

魏纳特注有“福巴克 1934”和“萨尔布吕肯 1934”的许多诗篇1945年之后才得以出版。1947年魏纳特在柏林出版了他的诗集

《向黑夜呼唤——1933年至1934年写在异乡的诗》，并加了序。他在序中赞扬了萨尔同志们的勇敢。正是这些同志们1934年经常保护他免受潜入萨尔的法西斯打手的干扰和暗算。

魏纳特当时写的许多诗中还有：1934年写于福巴克的《约翰·舍尔和同志们》、1934年写于萨尔布吕肯的诗体信《致一位青年同志》和告诫的呼声《致陷入迷途的德国人》。当魏纳特以铿锵有力的声音朗诵到为了“约翰·舍尔和同志们”向杀人犯清算时，掌声经久不息。魏纳特告诉在“第三帝国”从事地下工作的青年同志们：

“李卜克内西的青年坚贞不屈，
多少人默默为之如同你，
忠于职守何惧死，
绞刑难折你的凌云志，
这杀人的制度将被你送入坟墓！”

这时我就想起鲁尔区、黑森、巴登—符腾堡和法耳茨的共青团的同志们。在那首《致陷入迷途的德国人》的诗中，魏纳特警告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并预见到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惨景。五年后果然变成了血的现实。

1934年，每当我和埃里希·魏纳特一起参加集会或群众大会，特别是参加1934年11月和12月公民投票前的一系列大型集会时，都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工人报》11月20日号召参加在矿工之家“恩斯多夫”举行的一次青年集会，报告人有埃里希·昂纳克、萨尔布吕肯社会主义青年工人领导人维利·梅尔维希、青年天主教徒和到狱中看望过台尔曼的萨尔工人代表团成员彼得·多马；“埃里希·魏纳特朗诵”。11月23日《工人报》预告当晚在萨尔路易的“市民啤酒馆”举行统一战线青年集会，再次列举了上述报告人和“埃里希·魏纳特诗朗诵”。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整天奔忙，有时一个晚上先后在几个相邻的地方讲话。

全萨尔青年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1934年11月17日在萨尔布吕

肯发表的号召书中也提到了埃里希·魏纳特的名字。这个筹备委员会体现了在萨尔已经形成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筹备委员会的成员有：律师瓦尔特·桑德尔博士、布鲁诺·冯·萨洛蒙、弗里茨·普福尔特（自1934年6月任德共萨尔专区政治领导人）、萨尔社民党主席马克斯·布劳恩、全德工会联合会青年部领导人埃米尔·舒勒尔、青年天主教徒彼得·多马、德国共青团的弗里茨·尼古拉、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维利·梅尔维希和瓦尔特·肯内尔、青年农民赖因霍尔德·比斯、义务劳动军的尼古劳斯·施佩尔茨和上面提到的埃里希·魏纳特。

1934年12月16日星期日，萨尔青年代表大会在布尔巴赫的“德意志之家”召开。来自各个阶层和抱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和世界观的663位青年代表出席会议，其中甚至有一些陷入彷徨的“希特勒青年”。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反法西斯大会。《工人报》详细报道了这次代表大会。今天对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已无争论，会议文件已经收入《为统一战线而斗争——德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文件汇编》中。卢特温·比斯在他的《1919—1935年萨尔的阶级斗争》一书中也详细地介绍了会议的情况。这里我可以简要地引用三段话，其中两段引自我在大会上的讲话，一段引自代表大会致萨尔青年的一封信。

“今天的德国不是青年人的德国，”我对与会的代表们说，“法西斯厚颜无耻地、残忍地践踏青年的一切希望、一切追求和需要。青年人被逐出了工厂，不仅是今天，不仅是今年，而是永远失去了前程。几天前，这里的希特勒青年机关报写道：‘谁效忠我们的旗帜，谁就再没有属于他个人的东西了’（听众喊道：这话不假！笑声）。是的，这话不错，谁效忠希特勒的旗帜，谁就失去一切，他必须牺牲青春，牺牲工作，交出仅有的一点救济金，甚至用他的理智换得一把匕首（活跃的掌声）。”

我首先指出希特勒法西斯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转而谈到青年的理想：“有人说，青年人总要有理想，不能事事都从物质角度来

观察。我的回答是：青年人不仅需要理想，他们还要自己创造理想。各个时代的青年的最高理想是为反对暴政，争取自由而斗争。这是为实现自身要求的斗争，为争取生活权利的斗争。但是我们在希特勒德国看到的却是断送青年的理想，是利用青年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未来和全体人民的未来犯罪。谁把战争视作理想，谁就是毁灭青年。”

代表大会致萨尔青年的信号说：“在与萨尔劳动青年命运攸关的1月13日，不分党派和信仰都应为维持现状而奋斗，这是对褐色暴徒最有力的打击，将有利于生活在‘帝国’的同伴们挣断锁链。为德国劳动人民着想的人，不愿使德国青年枯萎凋零，希望他们幸福的人，他就必须全力以赴，为维持现状而奋斗。维持现状将使萨尔成为德国自由斗争的桥头堡，如果我们现在能在萨尔击败希特勒，不久我们也将柏林把他打翻在地。推翻希特勒后，萨尔将在第二次公民投票中（国际联盟最后一次会议同意举行第二次公民投票）决定并入一个自由的德国。”

这就是我们1934年12月16日致萨尔青年的信。但是正如安德烈·西蒙内1940年在巴黎出版的《我控诉》一书揭露的那样，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于12月2日在巴黎会见了希特勒未来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私下答应萨尔公民投票结果将使希特勒满意。作为“报答”希特勒保证在萨尔问题解决后，德国不再向法国提出其他要求。历史以它特有的方式惩罚了这一阴谋：赖伐尔因勾结希特勒德国被法国判处死刑，1945年被惩处；里宾特洛甫作为战犯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死刑，1946年被处决。

1934/1935年法共中央支持我们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口号，她声明，法共在反对法德财政资本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萨尔和德国劳动人民一边。但是特里尔和施佩耶尔的天主教违背萨尔教会中劳动人民和多数神职人员要求维持现状的愿望，指示各布道坛宣读他们支持把萨尔并入希特勒德国的主教通告。尽管萨尔传统上获选票最多的政党——德共、社民党、中央党和基督教工会的一部

分——明确主张维持现状，但由于赖伐尔的允诺和主教通告，实际上使希特勒在公民投票中“获胜”已成定局。

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一位维贝尔基兴人1977年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1月13日的公民投票前夕，可能是12月底或1935年1月初，埃里希·昂纳克拿着一大包传单，站在‘施图姆纪念碑’前，即诺因基兴钢铁厂门口，正好是换班时间，他向从工厂走出来的工人散发传单……我佩服他的勇气，和他打了个招呼。他说，这是他的信念，不需要特别的勇气……”投票结果比我预料的还差：54万选民中有47万赞成并入希特勒德国，只有47,000人投票赞成维持现状。当时估计有人在票数上做了手脚，也存在某些怀疑的理由。美国《南大西洋季刊》1946年发表的“1935年萨尔的公民投票”一文总结了各个疑点。在选票上弄手脚可能大大地增添了赞成并入德国的票数，但对多数赞成合并这一点本来是无需操纵的。从1934年夏德共和社民党就维持现状取得一致意见到1935年1月13日，时间太仓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没有可能向多数萨尔人讲清希特勒法西斯残暴好战的本质。

虽然按规定1935年3月1日萨尔才移交希特勒统治，但投票一结束希特勒的恐怖统治就开始了。1935年2月28日我被迫离开萨尔。我告别了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告别了维贝尔基兴、诺因基兴和萨尔布吕肯。我的目光最后落在诺因基兴钢铁厂，工厂门前是“施图姆国王”像（这座像至今还立在那里），……整整10年后，即1945年年底，我曾短暂地回到了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派出所1935年2月28日在我的名字下加了这样的注：“户口已销，去向不明。”

我到了巴黎，找到德共国外部领导机构。1934年12月13日至18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德国共青团全国会议上，我被选为团中央委员。我本人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12月16日我在布尔巴赫为来自萨尔的青年代表作报告。我被选进团中央委员会一事是我12月在萨尔得知的。巴黎的同志们给我分配了新任务：领导柏林共青

团地下组织，也就是说要到“虎狼窝”去活动。当然，我不可能以“萨尔地区维贝尔基兴的埃里希·昂纳克”的面貌前往柏林。我必须逐步适应我的新身份：水手“马丁·恰登”，1911年9月21日生于阿姆斯特丹，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在巴黎拍了照片，到瑞士后弄到了荷兰护照。经巴塞尔到苏黎世，在那里住了四周。然后从瑞士经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前往柏林。

为了了解新的政治形势，我研究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文件，尤其是为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准备的材料。这次会上深入地讨论了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并从理论上做了总结。反对法西斯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任务。这一政治路线很快在法国和西班牙表现出它的现实意义。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星期，我从布拉格坐火车经纽伦堡和埃格尔进入“第三帝国”，过边界时，荷兰护照没有引起怀疑。这样我到了柏林，住进一个秘密住处，熟悉一下“帝国首都”的环境，和共青团各个地下组织接了头，特别是和布鲁诺·鲍姆接上了头，在我到来之前，他领导着柏林团组织。1945年解放后，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长期在柏林和波茨坦专区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我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工作。

1935年夏，从表面上看，柏林和其它世界大都市一样，和1933年以前也没有什么变化：车水马龙的交通，五光十色的广告，川流不息的人群，熙熙攘攘的旅游者，一派繁忙景象。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下令在歌剧院广场上焚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许多德国进步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如今广场已看不见焚书的痕迹。驱逐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行动还不那么明目张胆。但是细心观察一下，读一读戈培尔“一家之言”的报纸，听一听由他操纵的广播，注意一下工人区居民脸上的表情，就会发现与1933年以前的差别。从街上穿军服的人明显增多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柏林正在变

成准备一次新的世界战争的总部。

1935年秋，在希特勒的“帝国首都”食品店门前已经出现了长蛇阵。纳粹公开叫嚷：“要大炮，不要黄油。”共青团的年轻人把买东西的长队拍了照，复印了许多张，加上了标题：“商店前的长蛇阵！不在莫斯科，而在柏林！”我被捕时在我的住处搜到一张这样的传单照片，并装进对我的起诉档案中。

1935年3月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规定，恢复义务兵役制；6月颁布“帝国义务劳动法”，规定18至25岁的男性青年参加准军事性“义务劳动”；接着又发布“防空法”。工厂里军火生产不断加速。所以在纳粹军队秋季演习时我们印了一份传单，散发时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措施。我们采取步骤，巩固共青团，扩大团组织，并协调抵抗运动。通过秘密交通我和布拉格的同志们保持着联系，11月我亲自到捷克斯洛伐克和他们交换看法。在那里我和好几位德国共青团成员进行了交谈，其中有凯特（莎比娜）·哈格尔，1946年后她在柏林国际妇女联合会和德国民主妇女同盟工作。另一位是马克斯·施潘根贝格，他现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工作。

1935年秋末在柏林做政治工作期间，我和库尔特·哈格也有了接触，当时他是德国共青团派驻中德、北德几个专区（柏林、下萨克森、波美拉尼亚、萨克森-安哈尔特）团组织的指导员。现在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后来我得知，和我一样从事地下工作的库尔特·哈格1935/1936年之间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盖世太保发现他就是1933年2月15日引起震动的斯图加特抵抗行动的领导人。当时反法西斯战士切断了通信线路，使希特勒的一次全国广播讲话未能讲成。库尔特·哈格离开德国后到了西班牙，参加了帮助西班牙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国际纵队。

今天，当我回想起1935年秋那段时光，我觉得最使人难以忍受的不是地下工作的复杂条件，而是失去了同1935年2月前密切合作过的同志们的联系。对留在萨尔的亲人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使我不

安。当时矿上已强迫我父亲退休，父母为糊口不得不养一头奶牛。后来我妹妹格特露德获准到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看我时，我才得知这些情况。

第八章

铁窗岁月

1935年12月初，盖世太保发现了布鲁诺·鲍姆、我和共青团柏林—勃兰登堡专区领导机构其他同志们的活动。1935年12月3日，团中央的一个交通员从布拉格来，负责接她的工作人员由于某种原因没去接，我自己到约定的接头点柏林索林根大街。交通员是一位捷克的女同志，叫莎拉·福多罗娃。她交给我一张箱子提取单，箱里是德共和共青团的报纸和伪装书。当晚我就到安哈尔特火车站行李寄存处提取箱子。当我接过箱子时，发现有人盯梢跟踪。我坐上出租汽车，终于在柏林动物园车站摆脱了盖世太保，可是第二天，在我离开柏林—威丁区布鲁塞尔大街住处时被捕了。

1935年12月4日之后的几天，我是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总部和在柏林—滕珀尔霍夫党卫军兵营“阿道夫·希特勒”里度过的，这段经历在我近十年铁窗生活中没有再次出现。这种日子人们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同时对一个生活刚刚开始的人来说（那时我才23岁）是经受考验的日子。无论是盖世太保对我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是法西斯预审法官在一年半的预审期间对我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审讯，都不能使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

当我翻阅“人民法庭”第二合议庭1937年6月7日和8日两天的审讯报告时，我今天仍为我们的共青团、她的干部和团员感到自豪。1935年12月初柏林—勃兰登堡专区共青团组织八名领导成员被捕，在“人民法庭”受审时还有四位同志，宣判时只剩下三位：布鲁诺·鲍姆、埃德温·劳滕巴赫和我。

这是怎么回事？1935年夏，我受德共中央的委托，从法国动身，经瑞士、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回到德国，负责柏林—勃兰登堡专区共青团的工作。当时库尔特·哈格和布鲁诺·鲍姆逐步把关系交给了我。布鲁诺·鲍姆要到国外去，从国外支持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

盖世太保虽然对我们用尽了种种阴谋手段，他们仍然无法得知抓到的竟是柏林—勃兰登堡专区共青团领导核心和一位共青团中央委员。从预审档案和起诉书中可以看出，“人民法庭”的预审法官汉斯·约阿希姆·雷泽使用了更“巧妙”的办法，也没有弄清楚我们的身份。顺便提一句，战后，雷泽因参与谋杀和其他纳粹罪行被判五年徒刑，他交了20万马克保释金，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就放了他。至少几年前汉堡的“明星”杂志是这样报道的。

面对我的战友们的坚定和勇气，盖世太保和预审官员一筹莫展。1933—1934年间，曾经积极参加过鲁尔区共青团反法西斯斗争的莫尔斯分区共青团政治领导人埃米莉·克纳普以为我已到了国外，因此在一次审讯中根据我的照片证实了我的身份。当我被捕后纳粹要她出庭作证时，她收回了从前的供词。在“人民法庭”第二合议庭的法官面前，她否认认识我，否认和我在鲁尔区合作过，也否认给她看过的照片和我是同一个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位勇敢的、使人永志不忘的格蕾特·瓦尔特，当时她是共青团柏林—滕珀尔霍夫分区的政治领导人。1935年10月21日她被押到在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再次受审，为了摆脱折磨和保护同志们免遭逮捕，她从三层楼上跳了下来。

在当时的德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中，这样顶天立地的妇女和姑娘有成千上万。没有她们的献身精神，她们的胆量和机智，我们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深度、广度和卓有成效。纳粹统治时期，无数无产阶级妇女继续为革命的工人运动忘我地、英勇地、不怕牺牲地工作着，经受了历史对她们的最严峻

的考验。由青年共产党员赫伯特·鲍姆领导的抵抗小组的姑娘和青年妇女们就是这样无畏的人。这个主要由犹太青年妇女组成的小组 1942 年 5 月 18 日放火烧毁了柏林游乐园的反苏展览“苏维埃天堂”。1942 年到 1943 年间，敌人把她们从柏林巴尔尼姆大街的女牢押到柏林—普吕祖恩湖监狱杀害了。

再回过头来谈谈“人民法庭”的审判吧。开庭的那天早晨，我被从柏林—莫阿比特的预审监狱带到贝勒乌厄大街的单人牢房，我见到了战友阿尔伯特·魏希尔特。从 1933 年 8 月到 1934 年 7 月，他也曾在鲁尔区工作。

1934 年 12 月 28 日他不幸被捕，次年 3 月被哈姆/威斯特法伦州高级法院判处四年徒刑。还在预审阶段，我的化名“赫伯特”就引起敌人的注意。阿尔伯特·魏希尔特被关进明斯特监狱后，他就被前面提到的那位“人民法庭”预审法官雷泽四次提审，要他交待我在 1933 年到 1934 年间在鲁尔区作共青团指导员、秘密交通兼政训负责人的活动，以及我和阿姆斯特丹的联系情况。结果一无所获，因为法西斯法官从他的口中什么也没有捞到，连我的真名实姓也没有问出来。

1936 年底，盖世太保把阿尔伯特·魏希尔特从明斯特监狱转到赫尔福德监狱。1937 年 6 月初，又把他押解到柏林，要他在“人民法庭”审理我的案子时出庭作证。在从明登到汉诺威的押解犯人的火车上他见到了里夏德·蒂茨。蒂茨在盖世太保严刑拷打之下，承认在鲁尔区从事反法西斯工作时认识我。阿尔伯特·魏希尔特在途中，后来在汉诺威和柏林—普吕祖恩湖监狱，一再劝他收回以前的供词。

当我在“人民法庭”又一次见到阿尔伯特·魏希尔特时，我们绝不让人们发觉我们认识。在“人民法庭”第二天审理我的案子时，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另一位青年同志也否认照片上的人就是我。

在“人民法庭”第二合议庭的律师和法官们从他们的“证人”口

中一无所获之后，于是官方为我指定的辩护人（党卫军的一个头目）就露出法西斯原形，从辩护人变成了起诉人。他起劲地翻阅着案卷，想找到能加罪于我的东西。最后他向第二合议庭庭长出示一张散发给法西斯国防军士兵的传单，传单是我起草的，当然在法庭上我否认这一点。有一个情况对我有利，那就是莎拉·福多罗娃的辩护律师曾提到过我的证词。我在证词中说，福多罗娃不知道箱子里装的什么。由此，这位律师认为，我到现在为止说的都是真话，因此，在这一点上也没有理由怀疑我的话。在士兵中散发这种传单可以说成是瓦解军队战斗力的行为，当时是要判死刑的。

1937年6月8日“人民法庭”第二合议庭作出判决：布鲁诺·鲍姆13年、我10年、埃德温·劳滕巴赫两年半，同时剥夺我们的公民权。这后一条的结果是，在1939年甚至在1943年最后一次审查，仍认为我“不配”参加希特勒的国防军。这显然是盖世太保的报复，因为他们在许久许久之后，才意识到他们抓到的是一条大鱼，所以他们说，即便放了你，将来你还会“再来”的。加上一年半的拘留期，我应该是1945年12月8日15时50分获释。我幸运的是，1945年4月27日，即我获释前几个月，红军到了。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还要忍受多年艰难的铁窗生活。

如前所述，法西斯的法官无可奈何地在案卷中记下了我在法庭上的声明：“今天我没有改变我的信念，今后也不会变。”判决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被告鲍姆和昂纳克替共青团组织干秘密工作范围之广，次数之多，以及审判中他们的直言不讳足以证明他们二人系共产党的顽固不化、不可救药之追随者。他们甚为卖命地去干交给他们的谋反任务。从他们在秘密组织中的地位看，他们深受决策机构的器重。”

从根本上说，我对法西斯司法机关给我的评语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特别是对第一部分。纳粹法官这一次例外地说到了事情的本质。对于第二部分我认为有必要做一点说明：如果“人民法庭”的法官们知道我们在德共和共青团中的反法西斯活动的规模，

那么不论是对布鲁诺·鲍姆的判决或者对我的判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人民法庭”第二合议庭当时大概觉得，我们这样年轻，还不致于犯死罪。

解放后从缴获的盖世太保档案中证实，当时纳粹司法当局除了对我在柏林的反法西斯活动零零碎碎地知道一点外，其他一无所知。奥托·文策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初，备课时不得不翻阅一些盖世太保的档案（讲课内容后来收集在《反法西斯和反战的十二年》一书中）。在档案中有盖世太保关于埃里希·昂纳克的报告。事情有点蹊跷，这个通缉令是在埃里希·昂纳克被投入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很久之后才发出的。显然是埃里希·昂纳克在许多地方的政治工作和地下斗争搞得盖世太保坐立不安，以致他被捕后，他们还在找他。工人阶级和人类的凶恶敌人——希特勒法西斯——如此仇恨和追捕，无疑是对一个革命者和工人阶级领袖的最高奖赏。”

1937年6月10日，我从柏林—莫阿比特预审监狱被解到柏林—普吕祖恩湖监狱，同年7月6日又被押到勃兰登堡—戈登监狱。这座监狱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普鲁士社民党政府修建的。指示修建这座监狱的人们大概没有料到，他们自己也会在这里受折磨。法西斯分子把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看作世界上最保险的监狱之一。高墙把监狱变成与世隔绝的现代地牢，意在吓唬和压服囚犯。那里的气氛的确是这样，服刑的目的就是使囚犯，尤其是政治犯（这里3,000名囚犯中约有2,200名政治犯）丧失斗志和自我毁灭。不少看守对政治犯极为残酷。伙食、卫生和健康状况是灾难性的。那些年里饥饿就象影子一样伴随着我们。许多同志死于肺病和其他疾病。

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是在监狱一个车库里的处决，大多数遇难者是我们的同志，常常是熟人和好友。开始时这类处决不常发生，后来越来越频繁，直到一周两次，每次30几个人。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到1945年4月共有2,000多名反法西斯人士被杀害。

尽管有一套严格的隔离和监视措施以及种种刁难，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还是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她坚定不移地领导着抵抗活动，组织政治犯相互支持。我到这里不久，还处在单独监禁时已经感受到这种团结。有人偷偷塞给我一片面包，向我传递有关国内外形势的消息，小声告诉我狱中发生的事情。这给我以力量，减轻了一点单独监禁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我确切地知道在牢房里党组织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战斗。

每当我妹妹格特露德和她丈夫汉斯·霍普施塔特尔到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看我时，我总是特别高兴。监狱管理处难得批准探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两三次，每次只有半个钟头。我们谈着我们关心的事情，不受在场看守的干扰。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难得的几次探监也被取消了。我们相互写过几封信，全都丢失了。不管怎样，当我知道我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健在，并没有屈服时，对我是极大的慰藉。

为了扩大知识，在单人牢房和随后的多年监禁生活中我读了许多书，主要是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历史作家费利克斯·丹的《罗马之战》。从自然科学到古典文学，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我不感兴趣，这些书我们可以从监狱图书馆借阅，当然进步书籍借不到。当时的图书管理员助手布鲁诺·洛伊施纳总是给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最好的最有意思的书。解放后，他曾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被两年单独监狱（包括预审监禁）之后，由于罗伯特·门采尔（从前的共青团干部，1945年解放后，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后来任民主德国交通部副部长）的推荐，被批准离开牢房到政治犯中管派活，这使我取得了有限的行动自由，可以和其他政治犯接触。

党组织逐步成功地把政治犯安排到监狱管理人员助手的位置上。这样，我、马克斯·于克尔和哈里·胡特尔都成了监狱医生的

助手。马克斯·于克尔在牙科医生那里作助手，我在监狱医生米勒大夫那里干活。这期间我又见到了共青团主席弗里茨·格罗斯和马克斯·玛达勒纳、弗里茨·格布勒尔以及其他同志。

我们在狱医那里当助手，对地下党组织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我们能建立和保持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之间的联系，传递消息，并帮助急需帮助的同志。不久医生放手让我们安排囚犯检查身体和看病的时间。这样我们可以通知牢房哪一天哪些同志到医生那里去。我们先把他们锁在候诊室里，最后才叫他们，使 they 有机会和时间谈话。新来的犯人一般先要到医生那里去一下，这样我就能和他们中间的党员接上头，从而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从这些同志口中我们能够得知党的有关政策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国际形势和“第三帝国”的局势。

偶尔弄到几张法西斯的报纸，有时听到一点看守闲谈，从这些少得可怜的消息中我们越来越感到，法西斯当局正在日益露骨地准备一场侵略战争。许多事实证实了这一点：1935年3月1日，希特勒把萨尔并到“帝国”后，1938年3月12日到13日，德国军队又开进奥地利，并吞了这个国家；1938年10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苏台德地区被“收归帝国”；1939年3月12日到16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其余地区又被鲸吞；1939年3月23日，又把梅梅尔地区“并入帝国”。由于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的干涉，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不干涉政策”，1939年3月在西班牙内战中民主力量遭到惨痛的失败。几千名德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士曾和西班牙民主力量并肩战斗，其中有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和恩斯特·布施。后来诺伊曼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多年，布施成了世界闻名的歌唱家和演员。他们两位在战争期间也都曾被关进勃兰登堡—戈登监狱。许多人为了西班牙人民的自由献出了生命。

所有这些法西斯侵略行径之所以发生，和英法两国对希特勒德国采取绥靖迎合政策分不开。通过1938年9月28日的慕尼黑

协定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送给德国法西斯是这种政策的顶点。这一方针的辩护士们声称，满足法西斯当权者的政治和领土要求能使“世界得到和平”。实际上他们阻挠苏联一再提出的集体防御侵略的倡议，从而纵容了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兼并别国领土。他们希望把德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引向东方，导致对苏联的军事干涉。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失策，使欧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

众所周知，直到1939年夏天，苏联仍在努力和英法一起共同防御法西斯侵略。由于伦敦和巴黎统治集团的顽固态度，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苏联才被迫于1939年8月23日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宣布之前两星期，我们从狱卒的言谈中已经得知两国外长正在谈判。1939年8月24日一早，当法西斯报纸报道条约签字的消息时，马克斯·于克尔和我在7点钟以前在牙科候诊室和马克斯·玛达勒纳、弗里茨·格罗斯碰了头。我们都认为，条约的签订是苏联的一次外交胜利。这样苏联就摆脱了单独对付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危险，同时也保留了行动的权利，赢得了加强自身防御力量的时间。后来的事态发展证实了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大多数政治犯当时也持这种看法。

数日之后，事实证明台尔曼在1932年国会选举之前发出的警告是多么正确，当时他曾说：“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选举希特勒，就是选择战争！”在纳粹统治的岁月里，我们共产党人对日趋严重的战争危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8年这一危险成了严酷的现实，但是更严重的灾难还在后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天，也就是希姆莱的党卫军策划的“还击波兰袭击”格莱维茨电台那天，我是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医务室度过的。当医生和站在他们周围的狱吏得知国防军已经开进波兰时，都面如土色。当英国和法国1939年9月3日参加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1939年10月初第一次发出空袭警报时，他们都显得

忐忑不安，随着“大德意志国防军”的胜利他们又重新活跃起来。对我们这些政治犯来说，国防军取得的“闪电胜利”丝毫不使我们怀疑这场战争必将以法西斯政权的完全失败而告终。

1939年底，我被从狱医助手的位置上换了下来，因为按监狱规定干这项工作不许超过两年。随后我和布鲁诺·洛伊施纳、罗伯特·门采尔一起干了一个时期杂工。我们的任务是把要拆的麻袋扛到牢房里去。我们同样利用这种工作机会和同志们保持联系。虽然这里的看守是一个极严的家伙，但也阻止不了我们。

1940年春，我在勃兰登堡的“林瑙尔”玩具厂的工段长手下干活。战争一开始就把做士兵玩具的生产转到了监狱里边。我必须把原料运到牢房里，然后把做好的玩具收起来。这样我就有机会出入牢房、工场和伙房。工段长不是纳粹分子，他默许我和政治犯交谈。这样我就可以传递消息和情报，当然必须使用暗语，我们称它为“奴隶语言”，我们很快出色地掌握了这种语言。因为工段长很少检查，而且从不细查装原材料的箱子，所以我能经常在箱子里给同志们塞点阅读材料或吃的东西。

和法西斯打过交道的人都懂得，这样做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在监狱里做地下工作可谓是在断头台上继续干革命。一旦被发现就要再次受审，战争期间无疑会被判处死刑。

另一方面，同志们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团结一致起了很大的作用。它能帮助同志们保持抵抗的力量、增强战斗的意志、度过艰难的时刻，这一点可以从库尔特·赛普特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赛普特被法西斯判处无期徒刑，解放后长期任我党中央监委主席）：“我被判处无期徒刑，投入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开头几天我和几位同志在一个牢房里，不久我被严格地单独监禁起来。那是一个又窄又小整年见不到阳光的朝北的牢房，高处有一扇小小的铁栏窗，牢房里有一张折叠床、一个小折叠桌、一个小板凳、一个小壁橱、一壶水和一个马桶。我的一些同志……不得不在这样的单人牢房里苦熬许许多多春秋。

“正是同志之间的相互支持使我们能在这种逆境中保持生活的勇气，这种支持在监狱里尤为重要。我们的世界观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对无产阶级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这里变得更加坚不可摧。我从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同志们之间这种真诚的团结。在那与世隔绝的单人牢里，帮助过我的同志中间就有埃里希·昂纳克同志。我知道他是共青团干部，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减轻了一点单独监禁的痛苦。有时他在送活的箱子或袋子里……放一张报纸，尽管是纳粹报纸，我毕竟有机会看一看。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懂得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了解形势的发展。此外，有时他还给我带块面包或者一小块香肠。了解监狱生活的人会懂得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满足了胃的要求，而且温暖着我的心。”

我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做监狱杂役期间遇到了许多同志，如恩斯特·阿尔滕基希、伯恩哈德·本克、伊格纳茨·比亚拉斯、罗伯特·戴维、赫尔曼·迪诺夫、马克斯·弗伦策尔、埃马努埃尔·戈莫拉、费迪南德·格兰多夫、弗里茨·霍夫曼、弗里茨·雅明、埃尔温·克尔贝、弗里茨·朗格、阿尔弗雷德·勒姆尼茨、阿图尔·曼巴尔、弗里茨·门采尔、汉斯·米金、瓦尔特·米金、汉斯·米基什、托马斯·穆洛赫、埃里希·帕特尔纳、马克斯·森斯、埃里希·温克勒尔和埃里希·齐格勒。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最终战胜希特勒法西斯的必胜信心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1941年春我和威廉·蒂勒关在一个牢房里。我是作狱医杂役时认识蒂勒的，后来做“林瑙尔”玩具厂杂役时又多次见过他。这时法西斯国防军已经把许多欧洲国家置于它的铁蹄之下，并准备大举入侵苏联。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阴险地突袭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国防军进逼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这牵动着我们的心。在多次长时间的讨论中，我们想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点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坚信不疑，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将彻底粉碎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强盗。我深信，苏联人永远不会向侵略

者屈服，因为我 1930 年到 1931 年间在莫斯科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耳闻目睹了苏联人民的干劲、创造力和横扫一切困难的凌云壮志。这一切以及苏联巨大的工业潜力更增强了我的信心：苏联人民一定能经得起战争的严峻考验，把法西斯赶出他们的国土。

这一点很快得到证实。1942 年 1 月，当我们得知德国军队在莫斯科城下吃了大败仗时，我们欣喜若狂。从东线回来的狱吏也常说起苏联游击队如何在被占领区打击法西斯的事。

1942 年秋，“人民法庭”首席检察官从不同的法西斯当局了解了我的情况，这样使我第二次直接和盖世太保打交道。这一次是一个瘦高个的举止文雅的年轻人，他是大学毕业生，受过相应的“人道”教育，是所谓党卫军的新一代。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总部派他来和我进行一次有“人情味的”谈话。这样我第一次来到监狱长、政府官员兼党卫军头目蒂姆勒尔博士的办公室。但这一次有“人情味的”谈话和 1935 年底到 1936 年初那几次没有人情味的谈话一样，盖世太保也没有得到他们想得到的结果。

1942 年 10 月 12 日，监狱当局认为我“至今表现不错，干活卖力”，似乎得出我服刑期间有了“悔改”之意。

柏林盖世太保总部的看法却完全两样。1942 年 11 月 13 日在给首席检察官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昂纳克过去的政治表现和他积极地为德共地下组织工作来看，他是一个顽固的共党干部。在预审期间，他甚至还试图进行有损国家的活动，当时法庭也认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信徒。我不相信他改变了信仰。鉴于战争形势，他有再次卷入地下德共的危险，特别是在没有充分监视的情况下。……因此，我不能同意提前释放他。”

因为我学过房顶修缮手艺，1943 年 3 月，被分配到监狱建筑队。让我管阿拉多飞机制造厂大厅屋顶的修缮工作。勃兰登堡—戈登狱中只有两个房顶修缮工，这样我自然成了师傅。作为房顶修缮工我有很大的活动自由，因为不管在勃伦纳博尔厂、阿拉多飞机制造厂，还是在勃兰登堡轧钢厂，没有一个看守能爬到房顶上来监

视我。

1943年秋，阿拉多飞机制造厂大厅的房顶修缮基本结束。我和建筑队的另外一位狱友被派到监狱办的一个农场。农场位于普劳湖畔，在基尔希默塞尔对面。我们在一个旧的磨坊里住了下来，又开始房顶修缮工作。普劳农场里关着苏联战俘，许多人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为使他们不致饿死，我们不时地给他们一点面包吃。农场的外面有几块土豆地，我们在看守的眼皮下偷土豆，房顶修缮工有一个烧沥青用的炉子，我就利用这个炉子煮土豆，托人把煮熟的土豆送给苏联同志们吃。虽然我们能做的事不多，但至少使他们少挨点饿。

1943年底到1944年初，英美的空袭明显地加强了，成千架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几乎天天轰炸，甚至一天数次轰炸柏林和其他城市。他们向毫无军事意义的居民区投下数以万计的炸弹、燃烧弹和空中地雷，成千上万的妇孺老人被烧死，但大部分军工厂却安然无恙。

我们的建筑队经常被派去排除哑弹。必要时，我们把哑弹背到别的地方去排除险情。我们清理瓦砾堆下的防空洞，挖出死伤的人或清除街上的废墟。如果遇到空袭——这事已司空见惯——就让我们上房顶去排除燃烧弹。所以说我是在“升天队”里干活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居然能活下来，真是奇迹。

1944年春，我被分到柏林的一个劳改队当房顶修缮工。在那里我又碰到了埃里希·汉克，我们俩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建筑队里一起干过活。他是泥瓦匠出身，解放后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执委会中央书记处工作，后任柏林洪堡大学工农专修学校校长，后来又在高等学校任教授。

起初，我们住在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玛格达勒纳青年女监狱里，后来住在巴尔尼姆大街的女监狱里。我们的任务是修理被炸坏的法西斯机关的建筑物。在这里我的活动自由更大了。无论是党卫军指挥官泽拉芬还是其他官员都不敢爬到遭到严重破坏的房

顶上去监视我们干活。这一段，我们先后在埃尔斯霍尔茨大街的柏林高等法院、柏林一舍内贝格的地方法院（后来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在地）、在动物园区的意大利大使馆、在总理府对面的所谓德意志法学院和贝勒沃大街的“人民法庭”干活。

在两座女监干活的劳改队中，只有我们几个男人（几个男看守遇到空袭就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成了救火队和抢险队。一次偶然机会，我认识了巴尔尼姆大街女监的一位看守，从交谈中了解到，她曾是工人体育协会的会员。我也曾在会多年。由于这点关系，她允许我们在英美空袭时收听外国广播，如英国广播电台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从中了解一点前线的情况。

我不会忘记1945年2月底英美轰炸柏林，从亚历山大广场到利希滕贝格整个地区顿时变成一片废墟。当时我们正在巴尔尼姆大街女监的房顶上干活，不一会儿我们一个个满脸尘土，就象刚从矿井里出来的矿工。这天下午，天昏地暗，阳光暗淡，好象夜幕突然降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女监房顶上不断落下燃烧弹，都要排除。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燃烧弹上装有定时器，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爆炸。

这次轰炸中，监狱中的一排牢房中弹被毁。我负责营救被锁在牢房里的妇女，我们从监狱长的防空掩体里找来灯、铲和镐，从废墟中营救幸存者，大多数身负重伤，其中有23人已经没救了。

1945年1月底至2月初，红军已向奥得河挺进，在河的西岸建了桥头堡，这也是我们从已经提到的那位女看守那里得知的。这时我们清楚地知道，纳粹政权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法西斯的恐怖统治越是临近灭亡，它就更加疯狂。我们这些政治犯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

1945年2月底，埃里希·汉克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逃离劳改队的事。促使我们最后下决心的是，我们听说党卫军小头目泽拉芬计划释放我们，但主管劳改队的柏林最高法院的总监察官要求他担保我们的政治“可靠性”，而泽拉芬拒绝担保。当埃里希·汉

克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当机立断：现在任何讨论都已成为多余，我们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我们作了周密的越狱准备，等待着有利的时机。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劳改队，争取和红军到达柏林的时间衔接起来。

三月初，各种迹象表明，监狱长打算把我们“运走”，以便消除隐患，因为我们是他们对囚徒为非作歹行为的见证人。究竟把我们运往何处，当时我们只能猜测。我清楚地记得审判结束时盖世太保发出的“将会再次遇到”我的威胁。我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再遇到这些家伙。我们必须行动。当我们从另一个女看守那里听说盖世太保正在谋划干掉政治犯时，事情就更紧迫了。解放后我了解的情况证明，1945年2月，盖世太保曾指示把柏林的所有政治犯装上拖船，连船带人沉入柏林附近的哈韦尔湖中。

我们又回到了玛格达勒纳大街青年女监狱干活了。因为一天前我们从地下室越狱的尝试由于意想不到的事件而失败了。但1945年3月6日上午，我们成功地从我正在修理的牢房顶扒着避雷针爬到邻近一幢公寓的房顶上，再由那里进入阁楼和楼梯间。从监狱的院子里或从街上发现我们的可能性相当大。更加冒险的是，我们穿着黑色犯人服，裤缝和衣袖上有宽宽的黄布条，穿过阿尔弗雷德大街和瓦格纳广场，向法兰克福大街走去。如果谈得上“伪装”的话，我们唯一的“伪装”就是手里提着泥瓦匠用的木桶，带着一把长长的凿子、一个榔头和一根长绳子。

当我们拐进法兰克福大街时，上百名警察和士兵正在那里清除大轰炸留下的瓦砾。回头已经来不及了，看样子还没有引起怀疑。我们就这样硬着头皮来到柏林—利希滕贝格火车站附近的西格弗里德大街，我们想找埃里希·汉克的一位叔叔，他住在沃坦大街，可惜他不在家。附近有一幢炸塌了的居民楼，我们在地下室里撕掉了囚服上的黄布条，这样看上去，象是外籍工人。

穿过柏林—利希滕贝格的约瑟夫·奥尔洛普大街、默伦多夫大街（今雅克·杜克洛斯大街）和柏林—弗里德利希斯海因的戈尔

特大街，我们继续寻找埃里希·汉克的亲戚朋友。所到之处不是房子被炸毁了，就是人不在家。万般无奈，我们只好在柏林一新克尔恩区的贝尔—阿里盎斯广场旁一所被烧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寻找栖身之地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在弗里德里希大街我们去过三家，无济于事，因为房子也都被炸坏了。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随时可能遇到大搜捕或者突然的检查，没有证件，没有钱，我们既不能乘地铁，也不能乘有轨电车，既不能坐公共汽车，也不能坐市内火车，况且这些地方监视得很严，加上频繁的空袭，交通工具越来越少。

1945年3月，柏林变成了一个兵营，所有重要路口和主要街道上都筑起了防坦克路障和街垒，部署了坦克、大炮。希特勒、希姆莱、博尔曼和戈培尔下令，“竭尽全力”保卫每一条街，每一幢房子和每一间住房。为了对付红军新的攻势，他们把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精锐部队调到总理府周围，准备负隅顽抗。盖世太保、党卫军和宪兵队到处搜捕逃兵、逃走的战俘和抓来的劳工。

经过这一番周折之后，我们终于在3月7日在柏林一新克尔恩找到了我从前熟识的一位女同志，真是喜出望外。她是阿尔弗雷德·佩尔的妻子。关于佩尔后面我还要写到。虽然我们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但她还是乐意帮忙，留我们在她家里过夜，用凭食品证买到的一点点食品为我们做了汤。这是我们两天来第一次吃到热饭。晚上发出空袭警报，我们不敢进防空洞。不过这次轰炸的是另一个城区。

这位女同志尽了最大努力，到第二天早晨仍然未能为我们找到安身之处。她只能送给我一套较为合身的西服。我和埃里希·汉克一早就动身去柏林—舍内贝格，又是一片废墟，一无所获。我们不得不到柏林市中心的比洛广场（今罗莎·卢森堡广场）再去碰碰运气。步行要三四个钟头，我们已经走不动了。新克尔恩的那位女同志给了我们一点钱，因此我们大着胆子到动物园火车站上

了开往亚历山大广场的市内火车。

我们顺利地到了那里，可是我的熟人不在家。等了几个钟头还不见人来。我们决定再去找埃里希·汉克的另一个叔父，他住在奥得贝格大街。他倒是在家，不过我们不敢把真相告诉他们夫妇，因为我们想在他们家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决定分头去找安全住处，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时商定下一次碰头的时间。后来因为发生了空袭，我们的联系暂时中断了。

后来我听说，埃里希·汉克比较幸运。我的情况不太妙，虽然我暂时在兰特贝格大街37号的格龙德老妈妈家里找到了安身之地（离贝尔尼姆女监只有100米）。她的女儿正在应征服役。我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不牵连别人，空袭时不能到房子下面的防空洞里去。有时我躲到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地铁站或者留在后院的二层楼上。有时玻璃震得粉碎，却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安全感。空袭也就是那么回事。不仅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而且所有躲避空袭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945年3月18日，英美飞机对柏林进行最后一次狂轰滥炸，顷刻之间前楼成了一片废墟。这一次轰炸是破坏性最大、伤亡最多的一次，也使我在兰特贝格大街的停留更加困难。直接对我停留造成威胁的是，1945年4月中旬我熟人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他们和我的处境都变得十分困难。如果我不想在最后一刻再次落入盖世太保手中，除了返回巴尔尼姆大街女监劳改队之外，无路可走。

我的熟人为我返回劳改队作了巧妙的安排，先疏通了柏林最高法院代理总检察官，请他按商量的办法为我说话，对付党卫军头目泽拉芬。因为我在巴尔尼姆女监抢险中表现不错，几周前曾受到这位总检察官的表扬。

他们轻易地放过了我，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原因何在？是由于连续轰炸在法西斯办事机构中引起了混乱，还是因为纳粹政权正处在分崩离析之中呢？或者法西斯官员在“关门”之前既不愿再

加重自己的罪责，也不想因为我们越狱成功让盖世太保斥责他们失职，或者是因为当时已经有释放我的决定呢？显然各种因素都有点关系，最主要的可能还是第一点。

许多年之后我从监狱的档案中看到，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管理处1945年3月14日已向“人民法庭”总检察官报告了我从柏林—利希滕贝格女监劳改队“溜掉”一事。到1945年3月19日国家检察院着手处理此事，几天又过去了。1945年3月21日有关我3月6日越狱的报告送到了柏林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盖世太保总部和柏林警察局长手中，并起草通缉令。从起草到寄出通缉令，两天又过去了。因此，通缉令最早1945年4月7日才有可能列入“德国通缉令登记册”。但是1945年3月21日的记录说：“……德国通缉令登记册在1945年2月3日的一次恐怖轰炸中被毁，新的登记册还没有到。”这个过程再循环一次需要四个星期，也就是说，1945年5月9日之前无法把通缉令记入登记册，而5月9日纳粹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真是谢天谢地，在战争的最后几周里法西斯的搜捕机构失灵了！

1945年5月4日，我又回到曾经住过的兰特贝格大街37号，正如韦拉·屈歇迈斯特回忆的那样，“回到了潮湿的残垣断壁之中，面前是堆积如山的焦土瓦砾”。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坐在厨房窗台上，灵巧熟练地钉着窗子上的破洞。他很瘦——当时我认识的人也都很瘦。但他有一张清秀的脸，一双明亮的眼睛。那双眼睛友好地、几乎是考察般地看着一个默默站在旁边看他工作的16岁的女孩子。……许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第一次的见面意味着什么。”

1945年4月中，我在巴尔尼姆大街的女监劳改队里亲身经历了纳粹政权的垂死挣扎。1945年4月6日，红军从奥得河的桥头堡开始攻击柏林。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我在写这本传记时翻阅了苏联军人回忆录——苏联先头部队第3军第79炮兵团的远程炮和第47军的炮兵旅第一营首先开炮轰击柏林。我永远不会忘记

“领袖最后一次生日”那天中午，苏联的第一发炮弹落在巴尔尼姆女监对面，第二发落在关押我们的监狱旁边。后来炮弹落到了市中心，显然苏联炮兵要轰击总理府，这是纳粹要员最后的庇护所。

1945年4月21日，红军坦克部队前锋已经逼近柏林东北面的布卢姆贝格，巴尔尼姆大街女监的看守们失魂落魄。他们不顾炮击和轰炸，急速把我们押回柏林—普吕祖恩湖监狱。路上我第一次看见苏联战斗机，心情十分激动，这是即将解放我们的使者。

他们在柏林—普吕祖恩湖把我们赶上大卡车，开往勃兰登堡。最后一段路我们只能步行。1945年4月25日红军包围柏林前，我们又被关进了监狱。

第九章

解放的时刻终于到来

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我又见到了许多同志和战友，其中有库尔特·赛布特和阿尔弗雷德·佩尔。当时赛布特是我们那排牢房的党组织负责人，阿尔弗雷德·佩尔是2号牢房党组织负责人。其他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法西斯刽子手在他们末日到来之前又杀害了许多人。最后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945年4月20日。有的同志，如马克斯·玛达勒纳死于非人的监狱生活，长期的饥饿毁坏了他的健康，夺去了他的生命。

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们获得解放的时刻越来越临近了。我们政治犯对红军势不可挡的推进喜形于色。同时我们也紧张地、不无忧虑地注视着监狱管理处和看守队的活动，因为我们不得不提防那些虐待狂可能在最后一刻对政治犯来一次大屠杀。

看守们变得焦虑不安，象热锅上的蚂蚁。那些最残暴的家伙已开始溜之大吉。留下来的看守们的腔调和行动也变得温和起来，对我们不遵守狱规睁一眼闭一眼。他们显然看到法西斯不可避免地要完蛋了，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我们也促使他们这样做。我们明确地对看守们说：“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你们将来也没事。”同时，党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准备尽一切力量保护并解放政治犯，成功地建立了监狱委员会，各排牢房都指定了负责人。这件事监狱管理处虽然没有同意，但却默认了。4月末，他们也接受我们的条件，不再锁政治犯的牢门。尽管如此，我们从亲身经历中

深深懂得，法西斯分子反复无常，因此必须百倍警惕，特别是当我们突然又被关起来时更是如此。

在惨无人道的监狱管理体系土崩瓦解的时候，我又一次被叫到监狱长兼党卫军头目蒂默勒的办公室，这一次盖世太保不在场。蒂默勒先生正在忙着什么事情，露出心急火燎的神色。在根廷附近，国防军还占据着一个易北河的桥头堡，勃兰登堡市本身还在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控制之下。蒂默勒说，柏林最高法院检察长关于依法释放我的通知要晚几天交给我，这是为我好，因为监狱中的情况还不明朗。

几天之后情况明朗了，当然不是监狱长所梦想的那种明朗。他曾痴心妄想“坚守”将军文克的部队会开过来，此外，他还煞费苦心要把一些党卫军调到勃兰登堡一戈登来屠杀政治犯。他的“锦囊妙计”没有得逞。

我和同志们渴望已久的解放之日终于到来了。1945年4月27日早晨，阿尔弗雷德·佩尔打开了我的牢门。大多数看守跟着监狱管理处的人已经西逃。顺便说一句，几年后，蒂默勒在西边又当上了策勒监狱的监狱长。西部地区“克服”法西斯的历史意味着什么，由此可见一斑。

我向大门口走去，岗哨已被解除武装。时间不长，苏联的第一辆坦克已经开到监狱门口。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兴高采烈地和苏联士兵拥抱的情景。当我们欢迎红军战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会为自己喜悦的眼泪而羞惭。红军战士是我们的解放者，是阶级兄弟和朋友，是人类崭新的光辉灿烂未来的开路先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苏联人民在列宁缔造的党的领导下，为把人类从法西斯统治下拯救出来所做的巨大努力和不可估量的牺牲。

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和1941年至1943年间的狱友威廉·蒂勒以及其他许多战友又重逢了。威廉·蒂勒在解放我们的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5年4月27日，他负责监狱的保卫工作，等待红军的到来。

两年不见了，我们有多少话要说！但是我们把思路和话题首先转向未来。我们尤其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全部、彻底根除法西斯统治以及战争留下来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废墟，如何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存。

答案只有一个：工人阶级的所有政党和组织联合行动，团结一切从我国人民灾难的过去汲取教训的反法西斯力量，组成广泛的联盟。艰苦卓绝的充满牺牲的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经历要求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来说，劳动人民的团结，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团结是我国人民生存之必需，历史之必然，绝不象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著作家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是为了确保被法西斯恐怖统治削弱了的德共在今后的阶级斗争中和选举中取得多数地位。那天晚上我们也谈到希特勒之流之所以能建立起独裁统治，发动一场几乎是反对所有欧洲民族的血腥毁灭战争，原因就是德国工人阶级以及人民中其他民主力量的分裂，而且相互敌对；我国各种进步的思想派别不是共同对付法西斯和反动派，而是相互对立。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我国人民在抵抗纳粹统治和反对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我的党，即德国共产党在这一斗争中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我们决心利用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个对我国人民来说难得的历史机会，绝不允许再从德国土地上爆发战争。和其他被解放了的监狱和集中营一样，勃兰登堡监狱的人也发誓，竭尽全力建立我国人民反法西斯的团结，发誓根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建设一个新型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使社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前发展。

我急不可待，希望立刻到柏林去，与同志、朋友一道参加党的斗争。我向负责政治犯安全的苏联军官说明了情况，1945年4月28日就和阿尔弗雷德·佩尔动身前往柏林。动身前，我领回了自己的东西，跑去和威廉·蒂勒告别。他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分手时，我们刚刚从仓库里领回了我们入狱前的衣物。我发现，我进监

狱时连大衣也没有。一贯助人为乐的埃里希听到后，把他的一件漂亮的、几乎全新的风雨衣送给我。由于法西斯分子疯狂炮击，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混乱之中，可惜我把衣服包和这件漂亮的风雨衣弄丢了。”

1945年4月底，柏林市中心还在激战，到柏林去不容易，也不是没有危险。交通全部中断，阿尔弗雷德·佩尔和我不得不徒步跋涉，而且还不能径直前进。在勃兰登堡和柏林之间国防军和党卫军的残余部队还在到处流窜，企图越过易北河。同时国防军和党卫军部队不断打“护送炮”，企图为纳粹头目突破红军对柏林的包围圈，到西边寻找美国军队的保护。要是落到这些法西斯顽固分子手中，他们一定会对我们采取断然措施，那无疑于自杀。因此，我们必须多次改变路线，最后经瑙恩来到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

一路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遭破坏的村庄和居民区、被炸毁的桥梁和铁路、弹痕累累的工厂、和无主的牲口，偶尔也遇到几个怯生生的、多疑的、无精打采的人。面对这一切，我反复地问自己，现在战争又回到了它的策源地来了，要多少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这场战争造成的惨祸呢？而且首先是，依靠谁来完成这一切呢？

在我们1945年4月底经过的地区，红军的部队和兵团粉碎了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最后抵抗，俘虏了所有14岁至70岁的男性公民，不论穿军装与否。因为他们无法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法西斯，谁是共产党，谁免服兵役，谁曾当兵打仗，现在对战争厌倦了，想回家了。

1945年4月28日晚上，阿尔弗雷德·佩尔和我在奥拉宁堡附近的一片森林中迷了路。突然我们听到说话的声音，我估计是苏联士兵，我用俄语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政治犯，一天前刚刚被解放。我身上唯一的书面证件是“无资格服兵役”、“排除参加国防军”的证明，这不能使他们信服。在这些日子里，发生这种事并不奇怪，因为有许多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正千方百计想潜伏下来。在苏联同志看来，我的证件

的确是不充分的。

1945年4月28日晚，阿尔弗雷德·佩尔和我是在一个谷仓里度过的。那里还有其他被收容的人，有开小差的国防军士兵、党卫军成员和法西斯政权的官员以及被抓到德国来的劳工。第二天早上，在一位苏联女翻译的协助下弄清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切就发生在康拉德·沃尔夫住处前，当时他就在房间里。他是德国著名的共产党人、诗人和医生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儿子，当时康拉德是红军少尉。现在是民主德国艺术科学院院长。说来也怪，我们是在许多年之后才见面的。

1945年4月29日，我被分配到苏军一个共青团书记手下作顾问。我和他一起来到贝尔瑙附近，5月4日从贝尔瑙来到满目疮痍的柏林。1945年3到4月间，柏林遭到英美400余次轰炸，其中40次大轰炸。37%的民房被炸毁（全国平均20%），战后整个德国清除废墟四亿立方米，其中柏林占5,500万立方米。英美轰炸夺去了50万居民的生命，其中10万以上是儿童。

当我1945年5月4日经潘科和魏森湖到市中心时，到处是可怕的破坏。少有的几栋未遭损坏的房子外面都挂着床单布做的白旗。

过了两天，苏联城防司令部发布命令，5月8日，希特勒政权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那一天，所有街上和房外都要悬挂四个盟国的旗帜。这样5月6日到7日都换上了盟国的旗。

兰茨贝格大街37号我的那位熟人安然无恙，我很高兴，后来几个月我一直住在他们家里。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立即着手恢复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的党团组织。为此，我们在兰茨贝格大街的一家饭馆里设了一个由我领导的办公室。在与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苏军司令部初步接触之后，我于5月10日前后来到苏联红军设在柏林—阿尔特—弗里德里希斯菲尔德的柏林城防司令部。在那里碰见了理查德·吉普特纳尔和汉斯·马勒。马勒从前也是德国共青团的干部。现在任西柏林统一社会党机关报《真

理》杂志主编。当时他们两位都是德共中央特派小组成员，他们把我带到王子大街80号（现在艾恩贝克大街41号）德共中央临时所在地。

我被带到瓦尔特·乌布利希那里。当时他受德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正忙于采取步骤恢复首都生活，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管理机构和准备恢复党的合法活动的工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日理万机的干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介绍了形势和最紧迫的任务后，委托我在近期内拿出德共青年工作的基本方针。当时党中央特派小组工作人员沃尔夫岗·利翁哈德已经为他起草了一个草案。利翁哈德后来背叛了我们的事业，疯狂地污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瓦尔特·乌布利希在他的草案上简明地批道：“不能用”。

11年后，我又见到了奥托·文策尔。当时他是德共中央特派小组成员。1945年5月19日被任命为大柏林民主市政府人民教育局局长。1945年5月底或6月初，我第一次见到了埃里希·米尔克。多年来他在团内和党内从事反法西斯和反战工作，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米尔克大将今天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那时，我还认识了洛特·屈恩（后来是乌布利希的夫人）和格蕾特·凯尔逊。他们俩当时是德共中央的工作人员。

我立即投入工作。我曾经是德国共青团中央委员，担任过共青团萨尔区、鲁尔区和柏林—勃兰登堡区政治领导人和黑森、法耳茨、巴登和符腾堡区的指导员。青年工作的经验对我有用。然而在新形势之下交给我的这项任务，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才深有体会。

当时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民主青年组织，应当找到当年的共青团干部和团员，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同时开始和从前的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青年组织的干部和成员建立联系，争取他们参加相互信任的合作。

我们也关心团结一切从痛苦的历史中汲取了教训的青年力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14岁至21岁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被迫参加过纳粹青年组织“希特勒青年”和“德意志女青年同盟”。他们是在法西斯的淫威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受法西斯的熏染、欺骗，被纳粹利用，纳粹思想在他们身上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许多人面对他们信以为真的理想的破灭，变得绝望和消沉。绝望和没有出路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争取青年人参加民主重建工作的困难。另外，饥饿、失业、疾病、瘟疫和流离失所更加重了这种情绪。多数人对新的起步采取观望态度，有些人采取拒绝甚至敌视态度。

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男女青年由于目睹了法西斯政权末日惨绝人寰的暴行，迈出了与旧制度决裂的第一步。他们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出于对家乡的爱，参加了立志建设的行列。他们帮助清除废墟，帮助上年纪的人安装水管、电线和煤气，帮助恢复交通。总之，他们参加了使濒于死亡的城市得以恢复活力的各项工作。心灵手巧的小伙子们在各个新的管理机构之间安上了电话，年轻的姑娘们又坐到了打字机旁。小伙子和姑娘们组成装卸队，卸下红军运给柏林居民的土豆和面粉。

在从法西斯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最初日子里，取得了一条基本经验，那就是要给全体青年，不论他们的社会出身、政治信仰和世界观如何，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他们需要信心，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消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残余的活动，赋予自己的生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必须使所有青年人感到，共同的前途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前提是要坚定不移地相信青年，同时也要求取得青年的信任。把信任作为长期合作的基础，只能靠全心全意去争取，只能靠谅解、耐心和持之以恒。

当我1945年5月和同志们一起着手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运动时，我就抱定了这种态度。因此，这个运动包括了所有阶级和阶层、各种政治和世界观倾向的青年人。

1945年6月初，瓦尔特·乌布利希再次叫我到他那里去。他介绍我和海因茨·凯斯勒（多年来一直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和民主德国国防部副部长）认识，他5月底刚从莫斯科回到柏林。他出身工人家庭，希特勒德国开始进攻苏联后不久就站到了红军一边。从1943年起，他是“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受这个委员会的派遣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侵略，争取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德国。从我们1945年6月第一次见面起，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政治信仰和在共青团内共事多年，而且还因为他那坦率的、同志式的为人。

乌布利希派我们筹建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凯斯勒负责柏林党组织的青年工作，我作为德共中央青年书记负责全国青年的组织工作。接着，我们找了从前德国共青团的干部，和当时的社会民主青年组织以及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干部和青年，象埃迪特·鲍曼和特奥·维歇特建立了联系，同时也和教会方面的反法西斯青年组织取得了联系。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吸收参加过法西斯青年组织的人一起工作。为使统一的反法西斯青年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参加。

我们牢记德共在法西斯统治时期，特别是1935年和1939年党代会上得出的结论：为了克服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我们必须同时克服青年工人运动的分裂，克服德国青年的四分五裂状态。德共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和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的团结，德国人民才能摆脱法西斯造成的灾难。

希特勒政权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烂摊子。600万德国人为希特勒统治世界的妄想付出了生命；数百万德国士兵被扣留在战俘营里；几百万难民无家可归，到处寻找着栖身之地。几乎没有一家不留下纳粹统治的创伤和战争带来的后果。40%的人的财产全部丧失，25%的人的财产大部损失。水电供应设施和生产设备被毁或遭严重破坏，交通和通讯大部分中断。农业方面，由于战争的影响，收成锐减，牲口存栏数大幅度下降。据估计，德国人民的损

失约2,000亿马克。与1936年相比,人民的财产减少了三分之一,劳动力资源减少了15—20%。许多教育和科研机构变成了废墟。德国人民和人类丧失了不可复得的艺术珍品和其他历史文物。大多数人过一天算一天,他们每天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弄到面包和住处。

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元帅朱可夫为首的苏联驻德国军事管制当局于1945年6月10日发布了历史性的第二号命令,允许反法西斯民主政党和自由工会恢复活动。德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公开活动的政党,她的中央委员会于6月11日向城乡劳动者发出呼吁书。正如1976年3月我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写的题为《稳健的方针——献给德国统一社会党建党30周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带方针性的马列主义文件“向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指出了推翻垄断资本统治的目标和道路。正是德国垄断资本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培植了法西斯,是法西斯暴行的罪魁祸首。德共在这一重要文件中总结了历史教训,引导建立反帝民主制度,使德国人民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共产党人,我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但我们同时也知道,德国当时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德共直接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建立一个保障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议会民主共和国。

呼吁书提出要解决的迫切任务符合德国青年最切身的利益。它要求彻底清除希特勒政权的残余,严惩纳粹和战犯,把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人民支配。呼吁书提出,开除所有纳粹骨干分子的公职,建设民主的管理机构,其中包括司法民主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以及文化和精神生活改革,目的是保障劳动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和自由,争取和世界各国人民进行和平合作。

呼吁书为在青年一代中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呼吁书的基础上,通过在柏林已经建立的、在外地正在建立的青年委员会,努力把更多的年轻人吸引到建设新生活的工作中来,这种青年

委员会是根据共产党、社民党和其他反法西斯力量的建议组织起来的。

根据德共的建议，1945年6月12日，近200名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世界观的反法西斯干部云集在柏林帕罗夏尔大街1—3号的市政厅。他们中有社民党的奥托·布拉斯和马克斯·费希纳；前各工会组织代表赫尔曼·施利默、伯恩哈德·戈林、罗曼·克瓦莱克、雅各布·凯泽和恩斯特·莱默尔；前中央党的代表福克尔博士；宗教界代表彼得·布赫霍尔茨和海因里希·格吕贝尔以及德共方面的代表瓦尔特·乌布利希、奥托马尔·格施克、约翰内斯·罗·贝希尔、汉斯·伊德莱茨基和奥托·文策尔。海因茨·凯斯勒和我作为青年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德共中央的呼吁书。他还受德共中央的委托，建议组织一个反法西斯民主联盟。

德共中央和社民党中央1945年6月19日通过的行动协定是我们开展青年工作的依据。两党商定放弃建立各自的青年组织。在德共和社民党合作的基础上，在苏占区各州县和城镇组成了两党行动委员会，这对我们团结一切青年极为有利。在青年工作方面，两个工人政党开始的统一行动取得了越来越明显的效果。

第十章

朝阳的象征

1946年2月26日，特奥·维歇特、保尔·维尔纳、我和反法西斯青年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其中有埃迪特·鲍曼、新教牧师奥斯瓦尔德·哈尼希、海因茨·凯斯勒、天主教副牧师罗伯特·朗格和鲁道夫·米斯纳联名向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递交了一份申请，恳请批准建立统一的民主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她的团徽是一轮以蓝色为背景的初升的太阳。我们想用这个团徽表明，联合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德国青年经过法西斯的黑夜之后，新生活正在开始。他们的未来再不会笼罩上过去那可怕的阴影，而会象在万里无云的碧蓝苍穹正冉冉升起的一轮光芒四射的朝阳。只要青年们一致行动，坚决清算灾难性的过去，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未来将是美好的。

几天后，即1946年3月7日，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同意建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这样，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民主的青年组织诞生了。那一天我思绪万千。我深信，我们在魏玛共和国年代和法西斯统治时期长期奋斗的目标终于变成了现实。

我在九年漫长的铁窗生活中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从前的共青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工人、工会青年组织成员以及天主教和新教青年组织成员，总而言之，各阶级和各阶层的青年，都已联合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之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建立是我迄今为止政治活动的高潮，是1945年4月底5月初我们获得解放以来11个月中在建设一个新型的民主德意志国家过程中

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我的一生中，有许多日子是我不会忘记的，1945年7月2日就是这样的一天。当时我在柏林东区的艾恩贝格大街41号那座不起眼的房子里，从外表看，它和附近的其他建筑物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任何牌子或标记可以说明在这里工作的人的建设意志比他们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时近中午，没有迹象表明这一天会不同于往日。几星期以来我一直和我的青年朋友们在争取那些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的青年。这一工作不容易。我正在思考几个要解决的问题，门开了，走进来一个人。他的名字是忠诚、信任和进步的代名词：威廉·皮克。德共布鲁塞尔会议决定在恩斯特·台尔曼被监禁期间，由他接替党的主席。1945年7月1日晚，他从长期流亡的莫斯科回到了柏林。他站在我面前，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花白的头发，浓浓的双眉下有一双智慧、友善的眼睛。

几个月之后，我记下了我此刻的心情：“当我确信突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代表着德国工人运动最优秀传统的伟人时，一股喜悦的暖流流过全身。握手之后交谈起来。我回答得对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并马上感觉到，这位伟人有一颗为德国跳动的火热的心，他呕心沥血，为德国人民及其青年的现在和未来操劳。握手告别时，他叫我下午3点向他谈谈德国青年的情况。我心情激动，深信威廉·皮克是德国青年最好的朋友和支持者。”

威廉·皮克在德共中央书记处也兼管青年工作和领导青年工作委员会。自从1945年7月初我担任德共青年书记起，我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我来说，他始终是慈父般的朋友和榜样。在这段时间里，我也经常见到中央书记处成员安东·阿克尔曼和弗兰茨·达勒姆，以及主管经济政策的布鲁诺·洛伊施纳和主管宣传的弗雷特·厄尔斯纳。在共同工作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们可贵的品质。

1945年7月中，德共中央迁到柏林市中心的瓦尔大街76—79

号(现在是迪茨出版社),在那里我又见到了海因茨·霍夫曼。我们是在1934年在曼海姆从事反法西斯工作时认识的。后来他参加了国际纵队,支持西班牙人民的革命解放战争。当时他是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1945年7月中,我第一次出席柏林规模比较大的反法西斯青年大会。大会由柏林青年总委员会主席海因茨·凯斯勒主持,他宣布向在法西斯统治下牺牲的抵抗战士默哀。对在法西斯统治下牺牲的人表示敬意,实现他们的遗愿,始终是我、我的朋友和战友们最关心的事情,今天也是如此。

当时柏林有21个青年委员会,苏占区的其他许多地方也建起了青年委员会。1945年7月7日,在德共中央机关报《德意志人民报》上我曾经对青年委员会的活动作过这样的描述,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青年运动,应是一切关心我国人民前途的人的希望和目标。这一运动的基础是地方机构自治的青年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青年基督教徒、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愿意团结那些真正和“希特勒青年”及其野蛮思想决裂的年轻人共同工作。青年委员会的工作得到了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的支持。1945年7月31日管制当局通知说,在苏占区的大中城市中准予建立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第二天,管制当局的报纸《每日评论报》上发表了通告的内容,指出青年委员会的任务和宗旨:“青年委员会在教育德国青年工作中肩负重要责任。它的任务是,在德国青年中唤起被纳粹窒息了的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真理和谎言、道德和罪恶的感情,把纳粹思想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教育青年成为诚实的人,使他们以青年人的热情投入到振兴反法西斯民主德国的伟大任务中去。”苏联通过这一决定,再次表明她对德国人民中反法西斯力量的态度,这与反希特勒联盟关于德国前途的决定是一致的,符合苏美英三国领导人1945年夏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的使德国民主化、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的国际措施。

在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准予建立反法西斯的青年委员会,

并为委员会的活动指明方向之后，我们更加努力建立新的青年委员会，同时促进现有的委员会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我于1945年5月初认识了赫尔曼·阿克森。他因为进行反法西斯活动，被关进集中营多年。解放初期在德共莱比锡县委工作。现在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他后来回忆说，到柏林市中心的瓦尔大街的一座被燃烧弹破坏了的房子里去找中央青年工作部，真是不容易。青年工作部设在最高层，这是传统。1933年之前，德共中央还在比洛广场（今罗莎·卢森堡广场）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办公时，青年工作部也设在最高层。赫尔曼·阿克森怎么也没想到青年工作部设在瓦尔大街被烧毁的阁楼下面。

“相互认识以后，”他继续写道，“埃里希立即言归正传。他不是先作指示，而是提出大大小小十多个问题：问党的情况，青年的情况，问我们城市已经建立起来的青年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埃里希对每一个问题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说明实际工作中的原则问题。他赞扬我们动员青年工人自愿去埃斯彭海因褐煤矿工作的倡议，向我们介绍柏林和苏占区其它地方的工作经验。……然后埃里希问道：‘你会写文章吗？坐下，为第一期反法西斯青年杂志《新生活》写一篇关于你们在莱比锡活动的短文吧！’我用四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了一篇短文，埃里希认为还可以。”

1945年7月14日，德共、社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民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民主党派联盟。这一发展无疑有利于我们团结各阶级、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和世界观倾向的青年。各党声明，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彻底铲除法西斯，在反法西斯民主的基础上建设国家，并与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

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参与政治生活民主化过程的各种活动。他们帮助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秋收，帮助工厂恢复生产，参加民主管理，投入1945年9月开始的民主土地改革和高校的民主改革工作。

青年委员会广泛的活动迫切需要集中统一领导。根据德共中

央和社民党全国委员的建议，我们同社民党全国委员会负责青年工作的特奥·维歇尔和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处（1945年8月成立，由保尔·汪戴尔领导。汪戴尔后来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现在任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的代表一起筹备在柏林召开一次苏占区各州、省及柏林代表参加的会议。在1945年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我报告了青年委员会的工作经验和今后的任务。会议决定建立反法西斯中央青年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早期的中央委员会由德共和社民党各派五名代表组成，10月到11月间又增加了天主教和新教青年组织的代表。当时苏占区有五个州和省：勃兰登堡、梅克伦堡、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都已建立起青年委员会。

在我担任这一新职的最初几个月里，整天忙于谈话、开会和讨论青年们关心的问题，对青年委员会的目标和方向、任务和实际作法都有争论，意见不总是一致的。德共内部和社民党内部一样，都有一种意见，认为建立各党自己的青年组织更好，象两党一样，然后再联合。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人青年的领导作用。在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青年组织里，不能保证这种领导作用。新教和天主教也想建立宗教性的青年组织。有人认为，一个统一的组织不能代表青年的不同利益。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反对这样的立场：即不能把过去参加过法西斯组织的人吸收到青年工作中来，因为他们必须首先接受考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青年不成熟，不能从事政治活动，或者说政治对青年有害。当时这种观点很普遍。

不难理解，诸种观点无非是要否定统一青年运动的必要性。我们不动摇，坚持已被我们自己的经验证实了的信念，即只有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符合全体青年的利益。经过长时期的、有时是十分激烈的争论，我们终于赢得了多数伙伴的支持，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青年组织。

经过12年法西斯独裁统治和战争，当时也讨论这样的问题，即在战后的艰苦岁月里青年们是否可以跳舞、唱歌、参加文体活

动。按这种说法办,就意味着剥夺青年们交际和娱乐的权利。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年在少年斯巴达克组织和共青团里总喜欢唱唱、跳跳、玩玩、郊游和体育活动。正象郊游、唱歌、跳舞、游戏、音乐、文学、戏剧和艺术属于青年活动一样,愉快的交际活动也不例外,它们给人带来乐观和生活乐趣。不让青年享受这种权利,等于否定他们是青年。因此,我主张要创造条件,让青年们更多地享受这种权利。

今天回顾青年委员会的工作,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青年委员会在反法西斯民主改革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德共和社民党的联合行动对此起了决定作用。在革命变革过程中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和两个工人政党于1945年秋末开始的初步联合,是发展统一的、民主青年运动的决定性条件。当时正在形成的统一工会对青年运动的联合是一个促进。此外,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的共同政策也是一个推动。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的负责人给我们的青年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1945年6月在柏林—卡尔斯霍斯特我第一次见到了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长官朱可夫元帅。此后,我常见到他以及当时的大将、现在的苏联元帅崔科夫。他们总是仔细地了解青年问题,尽力帮助我们。我和图尔帕诺夫上校有过密切的合作。他当时是军事管制当局的新闻处长,后来升为少将,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教授。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不只是谈论工作中的困难,也讨论怎样为青年工作提供方便……我记得,昂纳克同志认为,强调工人和知识分子共同的革命和人道主义传统,唤起青年人对这一传统的自豪感很重要。他在探索和强调青年在建设反法西斯民主制度中的共同点”。

许多苏联同志,象贝丁少校等青年军官,为推动我们的青年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对事物的了解、他们的行动、他们同志式的态度和友好的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同感。苏军中的许多党团员设身处地地出

主意,想办法,帮助尚缺乏工作经验的青年朋友。通过和他们的直接接触,不少青年人消除了反共和反苏的成见。

青年委员会在克服物质匮乏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们帮助建立学徒培训车间和青年之家,修复教室,保证1945年10月1日按时开学。在柏林,有一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修复遭破坏的房顶,并修建了200个青年之家和运动场。在德绍,青年们修理住房和教室,为居民劈柴。图林根的青年们为柏林的孩子们募捐了两万公斤苹果。青年委员会还协助为孩子们筹备多年来第一个和平圣诞节。同时他们还组织各类文化、文学、娱乐和体育活动。

我们不仅看到这些成绩,同时也看到,我们的工作才只吸引了一部分青年,多数还置身运动之外,采取观望态度。1945年10月23日我为《柏林报》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由此产生的任务。“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立前四周,即1945年11月1日,青年杂志《新生活》创刊号问世了。我作为中央青年委员会主席,成了杂志的发行人。从报头可以看出我们要建立青年团的明确意图,当时我们称这个刊物为《自由德国青年杂志》。在出版者的话中我写道:“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新生活。文化和文明中一切伟大和美好的东西就是这一新生活的内容。为了实现这种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摆脱贫困,从街上和从头脑中清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垃圾,必须鼓足干劲,推进城乡的经济恢复。只要我们所有的人——姑娘们、小伙子们、青年工人、学生——出于对我们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爱,同心协力,形成一个伟大的集体,我们就能够重建家园。”

1945年12月2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这一天柏林最积极的男女青年在推翻纳粹统治后,第一次举行工作会议。柏林各青年委员会的4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中央青年委员会成员和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勃兰登堡和梅克伦堡州青年委员会的代表,在柏林—潘科的安娜—玛格达勒娜—巴赫学校(今卡尔·冯·奥西茨基学校)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大厅里,济济一堂。他们都是14—21岁的学生、学徒工、青年工人和店员,平均年龄只有

18岁，所以差不多都是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7个月对12年！这是那些职业怀疑家们的对比。但在12月2日那天，到会的青年们把所有这种对比统统掷进了垃圾堆。当社民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强调以他的名义，同时也以他的朋友威廉·皮克的名义，向青年们讲话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他们以青年的朝气和热情赞同他的话：统一的力量将使民主重建工作获得成功。

这时有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挤满了人的大厅，在后边坐了下来。当柏林青年委员会主席海因茨·凯斯勒宣布说：德国共产党主席威廉·皮克来到我们中间时，古老的大厅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欢呼。一股动人的感情巨浪向他涌来。青年们认识这位深受老一辈人尊敬的工人领袖的时间还很短，这些簇拥在他周围的年轻人中，七个月前只有少数人对他略有所闻。当柏林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得知他来到了他们中间时，他们欣喜若狂。

这种友谊是怎样形成的？自1945年5月以来，凡有青年们参加反法西斯民主重建工作的地方，共产党人就和对重建有责任感的积极分子并肩劳动，他们很快取得了青年们的信任。

在这次会议上，我谈到青年在重建中的任务。我提到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牺牲的英雄们，告诫说，这些英雄的血不能白流，他们的斗争和活动不仅是我们的榜样，而且也是一个极大的教训。此刻我不由得想起差不多10年前的这个时候，即1935年12月4日，我在柏林被捕了，一直被关到1945年4月。这一切已经过去，应该面向现在和未来。在民主土地改革中，我们已经剥夺了容克和大土地占有者的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要制止康采恩老板在我们决心建立的反法西斯民主国家内获得任何权力和影响。保障和平和我国人民的幸福、未来要求我们这样做。

在热烈的讨论中，威廉·皮克也发了言。当时在场的大部分青年人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话。例如他指出，当时一切紧张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青年们都在聆听他的

讲话，他们感到这位伟人的真诚、豪爽和强烈的感染力。他讲话时的平静沉着和实事求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45年春天那些死亡和毁灭的日子里，青年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托。现在他们立刻感到，站在讲台上的这位身材魁梧的伟人，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坚实基础，即使曾经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和“德意志女青年同盟”的人也同样感到这一点。信任唤起信任。他给德国青年带来了信心。从讨论中可以看出，青年们完全证明了他的信念的正确，德国将有一个新的未来。

第二天中央青年委员会、各州青年委员会的代表和柏林青年总委员会联合发出题为“生活向我们青年人召唤”的呼吁书，这是统一的青年运动向整个苏占区发出的第一个文件。在呼吁书中我们声明：“我们将在和平的劳动中重新站起来，取得各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等待着我们的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事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将不分种族、民族和信仰，相互爱护和尊重。在这个社会里，伟大的文化遗产和科学技术成果将成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为这些理想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统一的反法西斯青年组织的建立，既不是“奉命”，也不是“被迫”，而是为了彻底铲除法西斯，消除战争后果，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们越是投身到这一斗争中去，他们就越能从自身的经历和实际行动中深切地认识到，为了德国劳动青年的和平与幸福的未来，一个统一的组织必不可少。

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当局以及在各州和省里负责青年工作的红军军官支持一切有利于吸引青年参加民主重建工作的活动，但美、英、法军事当局很快就千方百计阻挠反法西斯人士的活动。他们施加压力、制造障碍、发布禁令、甚至拘捕共产党人、有阶级觉悟的社民党人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以此阻挠在西占区彻底铲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建立反法西斯民主制度。显然，这符合当时美、英、法最有权势的阶层的意图：给德国垄断资本一个喘息机会，让他们从最惨重的失败中恢复元气，重新组合他们的力量，恢复摇

摇欲坠的权势。在冷战中他们需要德国帝国主义充当反苏的马前卒。这一点很快得到了证实。

早在1945年底波茨坦协定和盟国关于德国的其他决定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就被蔑视和遭破坏的情况，我有亲身体会。受威廉·皮克的派遣，我于12月到西占区邀请德共领导干部参加1946年1月初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从柏林经埃尔富特到埃森纳赫的旅行绝非一次美差。车厢里拥挤不堪。如果车门挤不进，车窗也爬不进去，胆大的人就索性坐在踏板上、缓冲器上、甚至车厢顶上。这是战争的另一后果。法西斯分子在面临灭顶之灾前，破坏或运走了属于苏占区的三分之二的机车和60%的客车车厢。

虽然我带着朱可夫元帅签署的证件，但是在埃森纳赫过占领区界时，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如果这种证件连红军战士都感到异乎寻常的话，那么，西占区的人将会如何对待？我先是绕道越过勒恩山峰，到达美占区，然后搭乘一列空荡荡的客车继续走。实际上我是非法乘车，因为当时那里禁止德国人乘火车。当我发现有可能被查出来时，我改乘了货车。在富尔达，我找到了德共的同志们，他们用车把我送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在西占区，同样到处是被炸毁的房子、工厂、桥梁和道路。但是我从报道中读到的消息得到了证实。这边遭破坏的程度远远没有苏占区严重。在苏占区，法西斯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对红军的挺进进行垂死抵抗，破坏了大量桥梁、道路、铁路、工厂、电厂和其他基础设施，给红军留下一片“焦土”。另外，美英在战争的最后一时间里集中空袭按盟国协定归苏军占领的地区。

在西占区，所到之处我都感到共产党人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士参加民主重建的积极愿望和急切心情，同时也感到占领军设置的重重障碍。

这次我也有机会到维贝尔基兴看望父母、两个姐妹格特露德和美丽达以及许多老朋友。我的弟弟罗伯特当时还在英国战俘营里。当我到家时，我母亲恰好准备好了圣诞节蛋糕。阔别十年，重

逢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我们有许多话要讲，可惜时间太短，几天后我又离开了家。

我又回到了柏林瓦尔大街德共中央所在地。1946年1月我遇到了保尔·维尔纳。他刚结束了一次冒险的旅行，从瑞典经波兰回到柏林。12年前，也就是1934年，我们是在萨尔布吕肯做青年工作时认识的。从1946年1月再次见面到今天，我们共事35年了，主要是在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里相互合作。因为保尔·维尔纳很久以来就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我们那次相遇的时机正好。正象保尔·维尔纳事后回忆中所说的那样，我马上找威廉·皮克商量，一定要保尔留在青年工作部。保尔在回忆中写道：“当天我的工作就定了下来。我成了埃里希领导的德共中央青年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杂志《新生活》的主编。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和其他许多当年的德国共青团员，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成员以及前基督教青年的干部和无党派青年一起着手建立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她是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截至1946年2月初，各州青年委员会代表会议都已开过了。他们日益强烈地要求建立青年组织。事实越来越证明，由地方管理机构委任的青年委员会领导机构不能代替独立的、由青年们自己领导的组织。德共中央委员会和社民党全国委员会的代表考虑到了这一情况，1946年2月7日，他们就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宗旨和组织结构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他们强调未来的统一社会党（当时正在筹建中）将放弃建立青年组织，愿意全力支持即将建立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

与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民党理事会负责青年工作的人以及与新教、天主教代表的谈判较为困难。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政治和世界观的不同，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取得了一致。

正如本章开头我已提到的那样，1946年2月26日，我们请求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准予建立自由德国青年组织时，我们也呈上

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宗旨和组织章程。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目标归纳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在德国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决心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基础上支持重建家园。通过共同努力，帮助克服纳粹为我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这种意志把青年团结在一起。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应在所有占领区活动。1946年3月7日，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但是由于美、英、法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百般抵制，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到1947年10月中才准许在柏林正式开展活动。在西方三国占领区，她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五年后，即1951年6月26日，被禁止。

除“希特勒青年”的专职干部外，凡年满14至25周岁的青年都可以加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理事会在毛尔大街39/40号（今《青年世界》出版社）开始工作。根据两个工人政党的代表提出的建议，我被指定为临时理事会主席。这样保尔·维尔纳接任德共中央青年工作部的领导职务。

1946年3月2日至3日，在柏林召开德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1945年6月11日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讨论了两个工人政党实行联合的步骤。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从那时起我是历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基层组织很快在苏占区的各州、县、市、镇建立起来，四周之后已经有16万人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建立意味着记取了历史教训，从而结束了年轻一代的分裂。在德国人民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它把不同世界观、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和职业的、但是拥护社会进步的青年人团结在一起。这是德国青年运动的真正转折。

在翻阅好人好事记录时我看到，1946年3月我在一个单行本上作过这样的批语：“不要让1976年的青年回头来说1946年的青年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30年后，当我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十届议会上向代表们谈统一社会党第九

次党代会的任务时,我又想起了这个批语。是的,民主德国的青年可以自豪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在1945年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都光荣地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

第十一章

工人阶级的统一是青年一代的基本要求

在1946年6月8日至10日圣灵降临节期间，哈韦尔河畔的勃兰登堡市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届议会的东道主。这个城市的确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回忆，因为城门外就是勃兰登堡—戈登监狱。但是1946年圣灵降临节之际她却显现出了她最美好的一面，许多居民用工人阶级的红旗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蓝旗、花环和横幅标语装饰了市内的建筑物，为我们提供住处。他们确实是热情的主人。天气晴朗，气温宜人。总之，一切都烘托着这个盛大的节日和我们的喜悦心情。有许多理由使我们感到喜悦，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催人奋发进取的日日夜夜。

1946年3月，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建立证明：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和合作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大的吸引力，德共和社民党合并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给青年对团结的追求带来了多么强有力的推动。在逐步形成的联合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中，我们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致力于促进青年一代接受新事物、发挥干劲、参加和平建设。我在《统一》（当时是为准备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而创办的，现在是我党的理论刊物）杂志1946年3月号上曾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教育青年成为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时刻不忘记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儿女，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的继承人。

共产党和社民党的联合过程迅速取得进展。在工厂、乡镇、城市、县和州里两党先分别开会，然后召开联席会议，实现联合。党员群众的决定和劳动人民的积极关心清楚地说明，德国统一社会

党不仅在其原则和宗旨上表明她是真正的民主先锋，而且的确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民主意志的体现。但是敌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强制联合”的滥言，只是为了企图转移人们对下列事实的视线：即西方占领国采用各种强制手段反对工人要求联合的基本愿望。

1946年4月19日至20日的德共第十五次党代会对1935年10月布鲁塞尔会议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代表们自豪地回顾了台尔曼的党为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和战争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我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大会。正如威廉·皮克在报告中强调指出的那样，在这一斗争中德共坚持的目标始终是：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把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夺取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代表们一致同意和社民党联合的决议，并为联合党代会的执委会选举遴选了共产党的40名候选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联合党代会于1946年4月21日至22日召开。能直接参加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使我喜悦和兴奋。1946年4月21日上午，数以千计的柏林人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海军将军宫”（今天的大都会剧院）前欢迎出席党代会的代表和来宾。10点整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渥从两边走到主席台中间，相互握手。大厅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格罗提渥说：“长期以来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德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威廉·皮克回答说：“为了打击一切内部敌人，为了完成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要把我们的统一社会党建成一个数以百万计的劳动人民参加的党。”这些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德共主席和社民党主席的握手实现了两党的联合。德共和社民党在各自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执委会候选人被选进了主席团。我也坐在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马克斯·费希纳、弗兰茨·达勒姆和奥托·布赫维茨等德国工人运动有经验的著名领袖中间。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威廉·皮克和奥

托·格罗提渥发了言，他们的讲话一再被掌声打断。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准则和宗旨”。这是一个把反帝民主变革进行到底，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统一社会党的宗旨是：“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摆脱经济危机、贫困和失业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我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问题。”

在准则和宗旨部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下了简要而明确的定义：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声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符合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说。

在通过了准则和宗旨、党章和告德国人民书之后，我们又一致通过了关于德共和社民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历史性决议。我们大家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唱起国际歌。然后党代会选举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渥为统一社会党主席，并选出了党的执委会。青年代表埃迪特·鲍曼、恩斯特·霍夫曼、海因茨·凯斯勒和我也被选进执委会。告人民书对青年一代说：“我们祖国的未来在你们手中。我们的世界观应该成为青年一代的信仰。你们可以从中找到最高的理想。德国统一社会党在高校里、在工作岗位上和在公共生活中保护着你们的利益，她希望看到你们参加和平建设和学习，也希望看到你们在业余时间里跳舞、娱乐和郊游。她代表着一个新时代，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的战斗的政党，因此她是你们的党，是德国青年的党。”

用今天的眼光看，可以说，工人阶级在革命基础上的统一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成就。没有工人阶级的统一，就谈不上我们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从纳粹政权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废墟中的振兴，同样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创造了一支统一的革命力量，使他们能够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保卫和平和安全的斗争中履

行自己的义务。工人阶级的统一是历史性的事件，它的意义和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更加显现出来。

联合党代会闭幕后不久，我在一次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会议上谈了今后的任务，赫尔曼·阿克森谈了组织工作，保尔·维尔纳谈了宣传工作。我们决定在哈韦尔河畔的勃兰登堡召开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一届议会（即代表大会。——译者）。我们有意选用“议会”这一名称，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精确地体现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民主性质，表示她不倦地为发展反法西斯民主、为劳动人民及其青年充分行使民主权力而努力。同时我们重视通过民主的方式来讨论青年感兴趣的一切问题，争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青年加入我们的行列。

同时，以这一次会议为起点，开始公开讨论“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草案。这个草案是根据德共中央委员会的建议、由我领导的工作小组草拟的，党中央青年委员会已经对这一草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基本权利”的内容就是青年的政治权利——平等地参加政治生活、年满18周岁行使选举权、年满21周岁享受被选举权以及在国家机构和经济中担任领导职务。此外，还有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娱乐的权利。当我们起草“基本权利”时，我们着眼于向青年提出他们容易理解的和感兴趣的、愿意为之实现而努力的要求。这是一条使他们熟悉反法西斯的民主、使他们有能力行使民主权利的道路。这样我们才能把他们争取到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民主重建工作方面来。公开的讨论使许多青年人了解我们关心的事情。正象我已经写到的那样，同时也暴露了一些相当普遍的错误看法。甚至自民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青年干部也认为，这些权利太过分了。后来他们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曾积极地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

我认为，仅仅参加对基本民主权利的讨论——这是革命的工人运动几十年来的实践，自1945年以来我们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还不能使全体青年参加到反法西斯的民主建设工作中来。民主问题同时始终是权力问题。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使用这种权力，必须具有扎扎实实的知识，必须深刻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早在少年斯巴达克组织和共青团内，学习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学习科学和文化就是我们最主要的活动内容。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立后不久，即1946年春天就建议开办青年学校。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干部应该在这种学校中通过学习了解德国人民、德国工人运动史和反法西斯的民主变革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在第一届青年议会开幕前几天，我们为座落在贝尔瑙附近博根湖畔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高等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这所青年高等学校后来改名为“威廉·皮克青年高等学校”。我和海因茨·凯斯勒曾多次到柏林郊区寻找合适的校舍。这所建筑物符合我们的要求和计划的用途。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同意并支持我们开办这所学校，威廉·皮克和其他同志都定期到博根湖畔讲课。

在哈韦尔河畔的勃兰登堡召开的第一届青年议会上，我阐述了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这时苏占区约10%的青年人参加了我们的组织，西占区也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代表来参加会议，他们报告了那里的青年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代表们通过了“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号召全德青年走上消除废墟和贫困的道路，走上重建家园的道路。他们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争取所有男女青年投身到为实现自由、人道主义、战斗的民主、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伟大斗争中去，投身到祖国的重建工作中去。议会选出了联盟中央的领导成员，一致推举我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至此，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组建工作顺利完成。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是在反对企图再次把青年分裂成许多政治和职业团体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形成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统一和反法西斯的民主性质必须在反对各种攻击中得到维护。争论的中心是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问题。若想实现这些基本权利，就必须把反法西斯的民主变革继续推向前进。

议会闭幕不久，就遇到了一场真正的考验。根据统一社会党的建议，并在取得反法西斯—民主党派联盟同意的情况下，于1946年6月30日在苏占区的工业中心萨克森州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决定无偿剥夺战犯和纳粹罪犯的财产。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准备和贯彻。我记得那时与西占区的垄断资本主义势力和右翼机会主义领袖以及我们这边的反动政客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和干扰公民投票。他们惧怕人民投票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和战争，所以他们制造出种种无聊的谣言，胡说一切私有财产都受到了威胁，严密的经济组织将遭到破坏，手工业和其他行业将被消灭，一场混乱不可避免。

这一切不会不影响到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向所有青年解释公民投票的真正目的，说明那些对法西斯独裁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负有罪责、对和平和人类犯有罪行的阶级势力应该铲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第一届青年议会上说：青年们最关心的是创造条件，使战争贩子们再也没有可能利用青年一代。因此，我们呼吁萨克森的青年选民行动起来，使战争的罪魁祸首受到人民的应有惩罚。

首先是劳动青年中的大部分人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深知，这关系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战争的新生活，关系到未来自己能否主宰自己命运的大事。通过大会小会、宣传队、文艺体育表演、自行车下乡、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等多种形式，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对公民投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结果是77%的选民赞成把属于战犯和纳粹罪犯的企业变成人民的财产。

在这个基础上，苏占区的州、省管理机构随后发布了相应的法令，没收了战犯和纳粹罪犯的企业。至1948年已有9,281个康采恩归全民所有，其中有IG法本、曼内斯曼、弗利克、西门子、通用电器公司和克虏伯等重要企业；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等大银行、储蓄所和其它金融、信贷机构也归全民所有。

这样在苏占区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基础，这是民

主力量在为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德意志国家的搏斗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同时也符合盟国关于铲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的协定和决议。

将垄断资产阶级的企业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新建立的国家民主机构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全民所有制企业使经济恢复得以有计划地进行，有助于消除战争的严重后果、饥荒和贫困；有利于提高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同时还可以根据人民的利益，逐步实现合理分工、专业化和生产的集中。而且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必须把垄断资本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成社会所有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有一个巩固的经济和物质技术基础，为了保证我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社会安全，这样做也是必要的。后来的整个发展充分证明了我们当时的考虑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一点下面我还要写到。

对青年来说，公民投票是一所政治斗争的现实学校。他们的反法西斯民主觉悟提高了。这一点和公民投票的结果也有利于实现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在贯彻“同工同酬”原则时已证明了这一点。在统一社会党执委会里，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里，在当时的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负责人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那里，我都表示主张实行这一原则。1946年8月17日，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规定工人和职员中不分性别和年龄，一律实行统一的计酬办法，所有的劳动青年都很高兴。与此同时，主要是老一点的工人和职员对这种“慷慨”有疑虑，甚至拒绝。试图破坏这一原则的事也不少，但是青年工人们坚持他们的原则。我多次在机关、企业、青年团和其他会议上支持他们。

青年人用他们的干劲和工作成绩作回答，而他们的工作成绩不亚于比他们年长的人。我想起无数青年人自1945年5月以来帮助清除废墟、修复工厂、桥梁、铁路、公路和房屋的例子。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和青年群众在民主土地改革后立即动手为新农民建住房、牲口棚和粮仓。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把一些完全毁坏的

村庄修复一新。最为人熟知的是格罗森海因县的阿德尔斯多夫村的重建工作，这个村庄后来改名为“青年村”。数以千计的青年帮助收割，帮助扑灭图林根和勃兰登堡林区的松毛虫。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青年作业组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策尔普斯特纤维厂的建设。为了让孩子们战后过上第一个愉快的暑期，我们组织的许多成员参加了“为孩子们准备暑假”的活动。这仅仅是无数例子中的一鳞半爪。

1946年8月17日至18日，在鲍岑召开的第一次东萨克森青年大会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威廉·皮克和奥托·布赫维茨代表统一社会党在劳齐茨（今民主德国东南，数百年来斯拉夫族索布人一直在这里休养生息。）向出席会议的两万名青年发表讲话。我在会上解释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宗旨和任务。所有三个政党的萨克森州执委会青年书记都出席了会议，其中有自民党萨克森州代表、该党青年事务书记沃尔夫冈·米施尼克。他现在是联邦德国议会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

此前一个多月，建立了“索布青年”组织，这一组织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紧密合作，并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联合。索布人第一次不再因为是少数民族而受压迫，他们和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义务。他们的文化发展得到鼓励，传统得到保护。索布青年一直是青年团中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苏占区将于1946年9月上半月举行地方选举，同年10月举行州议会选举，鲍岑青年大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呼吁青年在竞选中坚持“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支持那些同意青年权利的候选人。1946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屈隆斯博尔恩召开的统一社会党青年书记工作会议也对选举表了态。会上威廉·皮克强调，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能够随时得到工人阶级政党的支持。我建议把经过考验的青年团干部作为地方选举的候选人。当时规定年满21周岁才有选举权。虽然大多数青年

还不能参加选举，但他们积极地参加竞选活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们被列入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民党候选人名单。统一社会党政策的本质决定了她的候选名单中吸收了大多数青年人。统一社会党的竞选纲领中采纳了青年的重要要求。如培养得力的技术工人新生力量；免费培养青年新教师、技术员和农艺师；提供免费医疗；开辟青年休养院、体育场、青年旅社和扩大职业教育等。

在1946年秋季的选举中，统一社会党是得票最多的党。9月份的地方选举中，在900万张有效选票中，统一社会党得票500万张；10月的州选中，在990万张有效选票中，她得票470万张。统一社会党在132,356名地方代表中占100,886名；在6,045名县议员中占3,124名；在519名州议员中占249名。这些清楚地表明，苏占区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青年中有1,500人当选为地方代表，250人当选为县议会代表，13人当选为州议会代表。这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竞选中作为一个统一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组织经受了考验。

1946年夏秋，同苏占区的反动势力的斗争，同西占区的在西方占领国庇护下企图卷土重来、分裂德国的垄断资本的斗争表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全体青年一样，在日趋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必须更好地武装自己，特别是当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无所不用其极、竭力分裂民主青年队伍时，尤为必要。他们首先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代言人推向前台，并利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的某些势力。他们绝非偶然地再次把矛头指向青年一代的权利。

因此，在1946年9月28日至30日召开的联盟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我主要谈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我们讨论了苏占区青年个性自由发展的新条件和我们利用这些条件的可能性。同时我阐明了坚定捍卫青年队伍团结的重要性。

面对青年们的警惕性，一切从内部或外部分裂自由德国青年

联盟的企图都失败了。由于我们有为人民的正义事业服务的觉悟，我们克服了一切困难，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发展成群众组织创造了基础。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许多领导机构和小组帮助居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度过了1946年的漫长而严峻的冬天。萨克森和梅克伦堡州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们劈木柴4,000立方米；青年矿工加班挖煤。为了保证1947年的春播工作，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勃兰登堡省组织成立了21个农具修理队和86个劳动队。1947年春奥得布鲁赫地区发洪水，55,000公顷农田被淹，无数农舍被毁，许多值钱的大牲畜被冲走。在这次抗洪斗争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经受了考验。勃兰登堡省的青年组织组成169个义务劳动组，这些小组不知疲倦地为消除灾害造成的损失而工作，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还为奥得布鲁赫农民募捐。这些行动提高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公众中的威信。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出版《青年世界》，1947年2月12日创刊，开始是周报，从1952年3月改为日报。《青年世界》很快受到青年的欢迎。我在创刊号上写道，《青年世界》的任务是以青年特有的干劲来维护青年一代的利益。在随后的数年中，《青年世界》协助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实现了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捍卫了青年的团结。

1947年5月23日至26日，在迈森召开的第二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议会上我们看到，与许多悲观主义预言相反，绝大多数德国青年和过去决裂了。至此，仅苏占区就有454,000名青年加入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他们在自己的组织中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爱好和平的德意志国家而奋斗。

更重要的是，由于统一社会党坚定不移的政策，由于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其他反法西斯党派和民主管理机构的支持，我们在实现“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过去的梦想现在变成了现实：实现了同工同酬，14—16岁的青年每周工作时间缩短为42小时，16—18岁为45小时。在中学和大学学习的工农子弟人数

大大增加了，到1947年春已经占到大学生的15%。在萨克森州议会中，根据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建议，把第一次选举权的年龄降到18周岁，被选举权的年龄降到21周岁。建了许多体育场、青年文化站和青年旅社，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有了质的改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青年享受着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成了自己新生活的建设者，在我国人民生活中，他们得到了与其社会作用相适应的地位。我们都感到，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力量。

第十二章

和平的东方之行

1947年8月5日，赫尔曼·阿克森到柏林舍内费尔德机场迎接我们的代表团。我们从7月19日开始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间。对我来说，这是1930年至1931年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之后又一次访苏。这次访问是怎样促成的呢？有何意义和成果？

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推动下，我于1947年7月14日写信给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请他们促成德国青年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青年运动会。我在信中说：“我们把建立德苏青年之间的友好关系看作保障持久和平的前提，如果我们的代表得以参加苏联青年的节日，那将是对我们批驳德国青年中存在的反苏宣传的重要支持。”

发信后的第三天，我就得到通知：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邀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派一个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时，大家非常高兴。在我们看来，这一邀请不仅证明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共青团对德国青年没有仇视和报复的情绪，而且愿意帮助我们。同时，我们把它看作我们的青年运动在争取国际承认方面所取得的第一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

1947年7月19日清晨，一架苏联飞机腾空而起，载着我们飞往莫斯科。准备的时间很仓促。代表团成员有爱迪特·鲍曼，她于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工人组织，因为她参加反法西斯活动，

1933年到1935年间遭法西斯监禁。解放后她协助创建统一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青年运动。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海因茨·凯斯勒、罗伯特·门采尔和赫伯特·盖斯勒。盖斯勒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中负责体育工作，1948年他脱离了青年工作。

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我们受到了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位副会长的欢迎。在海关，我随身带的斯卡特纸牌引起了一点波折，因为当时苏联禁止玩纸牌。我在青年时期就喜欢玩纸牌，所以旅途中也带着。我们花费了不少口舌，纸牌才没有被没收。

我们受到莫斯科朋友们的热烈欢迎。然后，我们乘车到市中心。我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的莫斯科市容，现在已认不出来了。大片大片的居民区、宽阔的街道、桥梁和人行地下道，到处都在建设。

1947年7月20日，我们出席了壮观的体育盛会，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接着我们和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成员进行了初步会谈。7月21日，我们在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受到接见，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米沙伊洛夫对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各种活动都感兴趣。访问结束前，爱迪特·鲍曼和我再次和他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他向我们介绍了共青团工作的经验，表示支持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争取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

在所有的接触中，我们感到处在朋友中间。这种感受和我们到处目睹希特勒法西斯侵略政策留下的可怕后果，使我们感到压抑和羞惭。为了医治战争给苏联各族人民带来的空前惨重的创伤，人们在难以言状的艰苦条件下工作。残垣断壁的城市和村庄、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农场、农庄、科研机构和无价之宝的古迹到处可见。许许多多伤残者。2,000多万苏联公民在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或者遭到纳粹刽子手的杀害。我们看到了苏联人民的不屈意志和坚强决心。他们希望和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一道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虽然法西斯侵略者给这个国家

带来了巨大的牺牲、惨重的破坏和无法估量的苦难，人们还是把我们作为一个新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德国的代表热情地接待。

那些印象至今历历在目，这里没有必要一一赘述。我们本来在莫斯科停留5天，结果停了18天。这里我仅谈一些最主要的事。在莫斯科，我们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列宁图书馆、大学和列宁陵墓。在莫斯科的一个夏令营里，我们了解了列宁少先队的活动。

按照苏联朋友的建议，我们来到一所疗养院，在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一些身负重伤的光荣的苏联红军战士在这里得到护理。关于这一次参观，海因茨·凯斯勒写道：“参观时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我在那里看到的是这样的苏联人，由于追随德国帝国主义的德国人的过错使他们失去了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健康……”

“1947年夏天，仇恨一切与德国人有关的人和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苏联朋友们的话归纳一下，可以这样说：‘这是痛苦的，可怕的。我们付出了苏联人民所珍惜的许多东西，数百万人付出了生命，我们胜利地击败了阴险的侵略者，有效地保卫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们用生命和鲜血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战，并为他们夺回了自由。我们从来不把德国人民和德国帝国主义及其万恶之源法西斯混为一谈。’”

能听到下述的话，对我们是一大鼓舞：‘我们很高兴，在我们这里见到象我们一样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现在和将来仍将斗争的德国人，和我们一样决心建设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属于劳动人民的新世界。’”

我以我们代表团全体团员的名义激动地回答说，我们无限感激苏联人民所做的一切，感激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告诉苏联同志们，在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中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同心协力为根除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建设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添砖加瓦，这个国家将同苏联建立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各国人民的幸福一道前进。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们报

告，我们从苏联军队同志们那里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我向那些正在疗养院康复的同志们保证：“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苏联各族人民的朋友和阶级兄弟。我们将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使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

1947年7月26日，我们飞往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战争给这座城市留下了特别残酷的痕迹，整座城市几乎全被夷为平地，我参观了传奇的“巴甫洛夫之楼”，军士巴甫洛夫和另外9名红军战士面对法西斯的强大优势，在这幢房子里坚守了58个日日夜夜。

即使在这里，人们也把我们作为朋友接待，主人们还不得不忍受物质匮乏之苦，却拿出吃的喝的招待我们。这里再一次表现出尽人皆知的俄罗斯人的好客。1930年到1931年我在苏联时已经了解并感受到这一点。但是这期间经历了四年战争，这场战争是德国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本来正在从事她的社会主义建设，她对德语历来有好感，对德国的文化和科学成就极为敬佩，更不用说她一向高度评价德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工人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及恩斯特·台尔曼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共青团市委邀请我们游伏尔加河，主人唱俄罗斯民歌，我们也得唱德国民歌，然后我们又一起唱工人阶级的战斗歌曲。在“红色十月”炼铁厂，我们看到了斯大林格勒人的建设意志。这座在战争中遭到全面破坏的工厂，现在生产能力已经恢复了75%。

在斯大林格勒之行即将结束的那个晚上，我们和苏联共青团的干部欢聚一堂，为友谊频频举杯。我的的确确不反对令人“心旷神怡”的饮料，但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注意不要喝得太多了，第二天我还要在电台发表讲话。7月30日，当我们向斯大林格勒的主人告别时，他们请我们回到德国后，把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德国人民。我们答应一定这样做。

晚上我们乘火车前往列宁格勒。在那里我们将会获得新的感

受。在这个被法西斯军队围困了 900 天的城市里，在这个饱尝苦难却不可征服的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十月革命发祥地，我们也没有听到责备的话。我们参观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彼得宫和几乎未受损坏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在访问结束之前，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1947年 8 月 5 日，我们启程回国。归途中话题很多，各人谈着自己的感受。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处处都能感觉到苏联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意志，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丽。我们了解到他们无限热爱和平。在与工人、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交谈中，我们没有听到关于一场新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言论，倒是听到了许多关于尽一切努力为和平承担义务的话。我们没有听到唾弃德国人民和青年的话，听到的都是对法西斯不共戴天的仇恨，因为它是人类的祸殃，是社会进步的最凶恶的敌人。

我们的访问作为“和平的东方之行”载入史册。为打破法西斯战争给我国人民、我国青年造成的孤立，我们已经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我们一到柏林舍内费尔德机场，记者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苏占区的各大报纸均报道了我们对苏联的访问，许多单位请我们谈观感，我们尽力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仅把它看作我们对我国青年应尽的义务，同时也是对我们的东道主表示谢意的一种方式。

在当时我所做的几次报告和写的许多文章中，总是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凡是争取与世界青年建立友谊的人、仇恨战争热爱和平的人、凡是把和平视为德国人民及其青年一代的未来幸福的人，都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是符合我国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一再强调，我们代表团的这次访问是从柏林到莫斯科的飞行，我们在苏联的逗留，为苏联青年和德国青年的和平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根据直接感受提出的上述看法，在后来的年代里得到了

证实。我们的“和平飞行”不仅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和苏联共青团的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与其他国家青年组织之间建立联系，以及我们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关系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要求每个代表团成员对这次访问做一个小结，并到各地做报告。我们的设想只有一点没有实现，那就是到西方占领区报告我们的访问，因为西方占领当局不发给我们入境证。西方占领国、垄断资本集团、令人遗憾的还有西部地区社民党某些领导人，都不愿意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与他们的反苏反共政策不协调，与美国1947年6月5日宣布的马歇尔计划更是格格不入。这个“振兴欧洲”的伪善计划旨在使美国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主宰欧洲，为建立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军事集团创造条件。

美国也“慷慨”地表示愿意向苏联、东欧和南欧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当然有附带条件，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最终放弃主权、独立以及这些国家和人民已经取得的成就。因此，他们拒绝了这种“援助”。但愿今天西欧国家的当权者用历史的眼光自己判断一下，马歇尔计划为他们国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福音”，他们为此受制于人，在内外事务上不断受到干涉，他们付出了何等代价！这个马歇尔计划肯定没有给本大陆带来更多的和平、安全、民主和进步，相反，它是使冷战激化、对立加重的根源之一。关于马歇尔计划对民主德国的影响，我将在其他章节谈。

在苏占区，我们能够象向东道主保证的那样，利用报纸和广播、群众集会、讨论会和座谈会等形式，如实地报告苏联的情况。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为发展我国青年和苏联青年、我国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新关系做出了贡献。从此，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始终感到有义务这样做。1947年7—8月间开始的接触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苏联共青团之间长期兄弟友谊的序幕。

1948年，我们进一步巩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当时苏联青年反

法西斯委员会会长和后来的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切马索夫访问了柏林。后来他这样描写我们的第一次会见：“我们就德国青年的政治觉悟、就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任务和目标、就苏联共青团的经验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昂纳克同志提出了一个既切合实际又指出未来的对青年一代进行反法西斯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明确计划。这些交谈以及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和干部的会见使我确信，一代青年人正在成长，他们将对和平事业、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对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做出巨大贡献。”

一年半以后，即1949年3月，我和保尔·维尔纳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共青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时，我能够告诉我们的苏联朋友，德国东部的青年日益了解和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苏联共青团1947年建立的关系为德国进步青年加入世界青年组织、为克服法西斯主义为德国青年造成的孤立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1月10日，在伦敦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当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就邀请我们反法西斯青年总委员会向联盟派一名观察员，我们派出了海因茨·凯斯勒。在1945年12月2日至3日召开的青年委员会大会上，谈到此事时我表示，我们将用自己的态度证明，我们是多么认真地对待维护和平的问题。1946年11月10日纪念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一周年时，我为《每日评论》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德国进步青年的共同利益。同时批驳了这样的看法：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必须先“清理”过去，才能被接纳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鉴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许多团员的反法西斯立场，因此，进步的德国青年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自然不是到“卡诺莎悔罪”。和平、自由、民主和进步同样也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我们虽然忍受了各种牺牲，但从未停止为这一准则而斗争。因此，我们同样有权利平等地、受尊重地加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我们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是建立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基础之上

的，因为我们了解德国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如果恰恰要求青年为这些罪行承担责任，那肯定是错误的。1947年2月，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研究了我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关系。我们认为，与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建立友好关系是对德国青年的民主发展的宝贵支持。中央委员会认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原则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原则和宗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1946年3月和1947年3月举办世界青年周，表明我们对这一立场是认真的。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对其他的青年组织的要求，而且首先认为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1947年5月26日至6月14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苏占区。代表团成员由来自波兰、法国、挪威、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美国的青年组成。代表团未能获准进入西方占领区。他们对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活动表示赞赏，同时关切地注意到，波茨坦协定在西方占领区未能充分执行。

1947年7月到8月间，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还没有邀请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参加。但在1947年8月下半月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布拉格会议上，我有机会第一个用德语报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活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热烈响应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组织的声援希腊、西班牙、越南和中国青年的活动，以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对德国和平与民主发展的坚定主张，对世界民主青年联盟1948年8月21日根据波兰代表团的提议，同意接纳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为她的成员一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对我们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反帝团结精神教育我国青年的支持。1949年9月，国际大学生联盟也接纳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为其会员。同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大会上，我被选进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在这次大会前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威廉·皮克到柏林东火车站欢送代表团。我们组织中750名最优秀的代表参加了这一世界进

步青年的节日活动。海因茨·凯斯勒是我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在世界民主青年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委员。我们的代表在这次联欢节上代表了我国青年组织的尊严。因此，把1951年举办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委托给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不是偶然的。

第十三章

我们国家的诞生

在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中，有些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和深远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属于这类事件。纵观30年的发展，可以说，在德国土地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不仅标志着德国人民的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而且构成欧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今天，这一点已为国外的许多不同倾向的政治家所承认，但在30年前却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对于我和统一社会党执委会（自1946年夏季，执委会设在普伦茨劳门附近的“统一大楼”里，即今天威廉·皮克大街1号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同志们来说，每天都在争取实现我们的战略，这种战略符合已经成熟的德国现状，同时也向德国人民指出了通往社会主义未来的道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和工人、农民、科学家及艺术家，特别是和青年进行讨论，因为事关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国家，建立青年自己的国家。

同时我们也和民主联盟中的其它政党进行肝胆相照的会谈，共同探索，以便这个新国家能有一个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民主爱国力量在内的广泛基础。

还必须与反动政客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拚命反对建立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国家，他们同1949年9月建立的帝国主义德意志国家的复辟势力狼狈为奸。

自从1945年5月从法西斯魔爪下解放出来后，我们走过了一

条深刻变革的道路。那些年头，工作是艰难的，物资是匮乏的，同反动势力的争论是激烈的。

1949年10月，我们破天荒建立了一个德意志国家，她的道路完全是由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世界历史时代的特点和规律性所决定的，是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这个新的历史时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苏联人民打败希特勒法西斯这一历史性胜利之后，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体现。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德国土地上出现，加强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影响，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次惨败。随着民主德国登上国际舞台，欧洲变成一个和平与安全的大陆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鉴于这一切，反动势力、复辟势力和复仇主义势力不能容忍建立这样一个德意志国家，这是不奇怪的。当它们不能阻止她的建立时，它们就煞费苦心要扼杀她。今天对每一个人来说，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民主德国是一个政治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一个生机勃勃的经济体系和现代化的教育事业，有发达的科学和艺术，她实现和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德国的诞生是各种民族因素和国际因素发展的历史必然。1945年5月从纳粹统治下获得解放以后，我们反法西斯战士全力以赴，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德意志国家而奋斗。

我们在反法西斯的民主基础上建立这样一个国家是完全符合反希特勒同盟和波茨坦协定宗旨的。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事实，是因为美、英、法各国统治集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拟定了各种肢解德国的方案，臭名昭著的摩根索计划就是其中一例。不管这种或那种方案的用意有何不同，例如有的方案把德国垄断资本看作世界市场上难以对付的竞争对手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劲敌，试图加以排除。这些计划的共同点都是无视德国人民的生存利益。所有这些方案没有一个被列入1945年同盟国的各种协定，完全归功于苏联，归功于她坚定不移地主张给德国人民一个和平民主的前

途。

通过深刻的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在德国东部地区为一个热爱和平、真正民主和社会进步的国家奠定了基础。苏联根据波茨坦协定的规定，向我们提供了全面的协助。

当帝国主义国家和西方占领区的垄断资本集团看到，尽管存在着各种困难，我们的革命变革正在取得进展时，他们知道，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德国已无可能。因此，他们选定这样的行动信条：“宁要一半完整的德国，不要完整德国的一半。”（即宁愿把半个德国牢牢控制住，也不愿和苏联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平分秋色。——译者）西方占领国伙同德国垄断资本的代表做出了对德国人民、对民主和社会进步、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孕育着严重后果的决定。不顾苏联的抗议，英美占领区于1947年1月1日在违背盟国管制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下，合并成两国共同占领区，组成两国共同占领区经济委员会。这是建立西德分裂国家的措施。

虽然1946年12月1日黑森公民投票中近72%的选民赞成铲除大土地占有制和垄断资本，虽然德国西部大多数州也发布了相应的法律和法令，但在西占区既没有铲除大土地占有制，也没有铲除垄断资本。反动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和各种雇主协会基本上原封未动，反动的思想意识重新大肆泛滥。当时从这些事实中已经可以看出筹划建立的那个国家的性质。

1948年2月，根据美英军事长官的命令改组了两国共占区管理机构。改组后的这一机构实际上具有一个分裂政府的性质。不久，美英占领当局于1948年3月1日命令完全切断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贸易、铁路运输和过境交通。1948年6月20日，西方占领国在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不久又把这种改革扩大到柏林西区。历史上形成的经济统一体遭到破坏，和西占区的经济分离既成事实，统一的德国币制已不复存在。

更为严重的是，1948年7月，西方占领国命令德国西部各州的部长建立西占区的分裂国家。1948年8月1日，法国占领区和英

美占领区合并成三国共同占领区，终于于1948年9月1日组成了所谓的议会委员会。1949年5月，这个委员会不顾德共代表的反对，背着人民，暗中谈妥了一个基本法。基本法是建立在1949年4月8日占领章程基础上的，是与波茨坦协定背道而驰的。1949年9月7日，联邦议会在波恩组成，以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的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正式建立，这样国家分裂已成定局。对此社民党右翼领袖也要负一定责任，社民党主席舒马赫1947年10月就曾声称德国的分裂已成事实，要求建立西德分裂国家。

1948年我再次——这是最后一次——前往西占区。在大小会议上，我一再指出德国即将分裂的现实危险，并谈到通过广泛的群众运动扭转这种危险的必要性。在杜伊斯堡我和马克斯·雷曼一起出席了会议。我利用这次机会回去看望了住在维贝尔基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1946年12月，萨尔地区再次被置于法国管理之下。

我的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一发现分裂迹象就尽一切努力维护德国的统一。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倡议下，1947年底掀起了一次争取统一和正义和平的人民代表大会运动，团结了各阶层的公民，赢得了西占区许多人的支持。但西方占领国禁止了这一运动，迫害同情这一运动的人。

我是德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届会议于1947年12月6日至7日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当时的德意志国家歌剧院（今大都会剧院）召开。反法西斯—民主党派、工会、群众组织和企业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农业、科学和艺术等全德各界代表2,215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二次大战后第一次全国性人民代表会议，要求建立一个由一切民主党派组成的德意志中央政府和选举国民大会。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关于就德国政治和经济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大会选出了一个包括我在内的代表团，代表团将向1947年11月25日至12月15日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转达德国方面关于签订和约、重建统一

的想法。英国不同意代表团入境。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态度。更明显的是，西方国家外长不同意苏联提出的与德国签订民主和约、立即组成一个德国政府的建议，他们要求修改波茨坦协定。由于他们的破坏，会议中断了。

1948年春，当西方国家勾结西占区的反动集团明目张胆地在社会各个方面系统地破坏德国的统一时，号召民族自救更显得紧迫。1948年3月17日至18日，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担负起了这个任务。我是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德国人民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团成员。代表大会提议举行全民签名运动，由人民决定德国的统一问题。

从1948年5月23日至6月13日，共有1,470万有选举权的人签了名，占各占领区选民总数的38%，尽管美、英、法军事当局严禁签名活动，西占区仍有150万公民签了名。这就为公民投票提供了合法前提。1948年7月7日，我们在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内部深入研究了签名运动的结果，请求四国占领当局军事长官准许举行公民投票。西方占领国当局对申请不予置理，只有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支持我们的要求。

我国人民的爱国力量在争取国家民主统一的斗争中，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找到了可靠的盟友。1948年6月23日至24日在华沙外长会议上，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谴责西方国家1948年2月至3月和4月至6月的伦敦单独会谈及其结果是对反希特勒同盟国家之间达成的协定的粗暴践踏。会议要求四个占领国采取共同措施，保证德国全面实现非军事化和制止德国军国主义恢复其军事实力。会议支持人民代表大会运动争取组成民主政府并在波茨坦协定的国际法基础上签订和约的努力。

在1949年5月23日，苏、美、法、英四国外长在巴黎召开会议，苏联代表团再次坚决反对西方国家的分裂政策，要求回到波茨坦协定的原则上来，制订和平条约，撤出占领军。此外，苏联还提

议接待德国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这一建议在德国人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以她数百万会员的名义表示支持这一建议；1949年6月1日至5日，在莱比锡参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三届议会的2,000名代表打电报给外长会议，要求他们接待德国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认为，代表团也有资格代表青年说话。

1949年春，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争取建立统一民主的德意志国家的斗争进入了决定性阶段。1949年5月15日至16日，在苏占区和柏林民主区举行直接的无记名普选，选举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于禁令和迫害活动，自由民主选举在西占区和柏林西区无法进行。

在1,280万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790万人，即三分之二，选举了各政党和群众组织共同提出的候选人，我又一次当选为代表。

1949年5月29日至30日，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选举了新的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即将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草案。我也参加了宪法起草工作，宪法草案是根据统一社会党的建议于1948年完成的，并在全国居民中进行了讨论。波恩的基本法是秘密的，背着劳动人民暗地里谈妥的。与波恩的基本法相反，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经过公众讨论的。居民们在9,000余次大小会议上，在报刊上或通过广播电台对草案进行了讨论。德国人民委员会收到了15,000条意见和503条修改建议。参加德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来自各个占领区的1,969名代表呼吁德国人民通过群众运动在最后时刻制止西占区分裂出去，制止西占区加入一个旨在反对苏联、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条约体系。

新选出的人民委员会由330名委员组成，其中统一社会党90名，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各45名，民主农民党和国家民主党各15名，柏林社会民主党5名，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30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德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德国民主文化复兴联

盟各 10 名，农民互助会 5 名，纳粹政权受害者联合会 10 名，农民合作社 5 名以及知名人士 35 名。

人民代表大会运动不断扩大，开始发展成广泛的全国阵线。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等各个阶层通过全国阵线的形式联合了起来。

1949年 10 月 4 日，统一社会党执委会决定就组成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临时政府一事同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协商，接着通过了“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文件，这个文件是德国人民中一切爱国力量的共同纲领。

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和反法西斯—民主政党派联盟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决定于 1949 年 10 月 7 日在柏林召开德国人民委员会会议。做出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上面提到过的 1949 年 10 月 4 日统一社会党执委会会议上，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声明：“我们考虑再三，是否要由我们出面建议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形势是如此严重，使我们不能再回避这一步了。”苏占区的几百万群众纷纷通过集会、游行、决议和写信等形式，要求统一社会党和德国人民委员会立即建立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各政党和群众组织支持广大群众的呼声。我代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致函德国人民委员会，期望人民委员会立即采取步骤成立全德政府。

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巩固反法西斯的民主现状，有计划地把革命的变革引上社会主义道路；要么放弃反帝民主成就，放任垄断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合乎逻辑地选择了前者，建立了我们的工农国家。这样我们适应了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要求，同时也是对德国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中反革命复辟势力分裂德国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回答。我们的目的是：根据德国帝国主义在本世纪内发动了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的教训，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永远铲除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基础，把政权交给劳动

人民，同各国人民和平友好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最高准则。

1949年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员会在威廉·皮克的主持下在柏林开会。根据统一社会党、其他党派和群众组织的提议，人民委员会组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议院。代表们使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开始生效，从而巩固了解放以来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成果，已取得的革命成就变成了宪法原则：工人阶级联合劳动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剥夺垄断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保持国民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制成分；承认劳动人民最大的阶级组织——工会的作用；有劳动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妇女和索布族的平等权利。1946年公布的“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宪法的原则。在德国历史上，宪法第一次保障年满18周岁的青年有参与决定政治事务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休息和娱乐的权利。

当我们完成了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历史性行动时，我和所有与会者都感到心潮澎湃，因为我国人民中最优秀的力量——德国革命的工人运动——长期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变成了现实。

宪法规定，人民议院中最大的议会党团提名总理候选人。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提议由她的主席奥托·格罗提渥组阁。

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苏军驻德军事管制当局最高行政长官崔可夫大将于1949年10月10日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机构。苏联和苏联政府继续对德国人民执行国际主义的政策。

1949年10月11日是我一生中不会忘却的日子。自从苏军及其盟友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以来，德国东部地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展现在我面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干部在中央开会，许多问题牵动着我们的心，因为在反法西斯民主改革中和创建统一的青年联盟组织中表现突出的数十万青年男女，将要到刚刚诞生的共和国首都柏林参加盛大的集会。在交通状况仍然十分困难的

情况下他们能准时赶来吗？他们的情绪将会如何？

几小时后，在去参加临时人民议院和州临时人民议院联席会议的路上，我们已经感到一种充满期望的气氛。在市内各处，我们已经看到身穿团服、手举团旗的青年，旗上象征着初升朝阳的团徽闪耀着光辉。青年们举着横幅标语和口号，欢呼民主德国的诞生。他们还表演文艺节目，歌声此起彼伏，特别是新的青年歌曲使人耳目一新：“建设吧，建设吧，自由的德国青年！为了更美好的明天，我们去建设家园。”此情此景使我更加坚信，我们最初几年的工作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对自己说：这样欢唱的年轻人一定感到与他们的未来有密切关系的大事正在发生。

当威廉·皮克当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总统时，我们大家都非常兴奋。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最年轻的议员玛戈特·法伊斯特以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所有成员的名义祝贺威廉·皮克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玛戈特·法伊斯特当时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议会党团的成员。

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今天处在德国历史上的转折时期。由于德国人民中最优秀分子的不懈努力，由于苏联政府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们现在才能够开始德国人民国家的起步。让我们大家以负责的、真诚的和友好的合作来证明我们有能力胜任历史性的伟大任务，证明我们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评判。”

傍晚时我们一起来到奥古斯特·倍倍尔广场。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场所。在1918年11月革命的日子里，海军的水兵和革命的工人在菩提树大街上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站在一起，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战斗。30年后的今天，近百万柏林人和来自共和国其它地区的劳动者到这里集会，与20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代表一起庆祝木工出身的共产党人威廉·皮克当选总统，表达他们与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国家休戚与共。晚上，柏林经历了战后最壮观的群众集会，人们的脸上流露出充满希

望和信心的表情。他们高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万岁！”“我们建设自己的未来！”“我们感谢苏联！”“工人保卫自己的共和国！”。

威廉·皮克和工农政权的其他代表在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中走上用红旗、黑—红—金黄三色旗和鲜花装饰起来的主席台。目光所及是一片火炬的海洋，它映红了远处的夜空。世界青年之歌结束之后，柏林市长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宣布大会开始，他一再被“我们的威廉万岁”的呼声打断。我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的身份发言，在这个时刻向威廉·皮克转达我们“德国青年的誓言”。誓言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们德意志青年宣誓忠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为她将给青年带来和平和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将成为和平劳动和战斗博爱之大厦的建设者！”

威廉·皮克激动地向与会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柏林和萨克森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代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举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万岁”的横幅标语。1,000名系着蓝领巾的少先队员走过主席台时，游行进入第一次高潮。当来自联邦德国各州的数千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举着“西德青年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致敬”的标语进入游行队伍时，广场上响起了掌声。

游行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气氛再次高涨起来，德国人民警察队伍向他们的共和国致敬。在警察游行队伍中我认出了不少青年联盟的干部，他们把捍卫我们年轻的共和国不受侵犯看作自己的天职。游行结束时唱起了传统的工人歌曲“兄弟们起来，向着太阳，向着自由！”

我记得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外国客人，他们之中有军事使团和外国新闻社的代表。那天晚上的场面使他们当中一些人感到意外和惊奇。不难看出他们的疑问：“被法西斯利用和欺骗如此之久的青年怎么能在1945年以来短短几年里这样热烈地拥护新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呢？”

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建立以来，我们受统一社会党的委托，一直做青年人的工作，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首先证明了共产党人坚

定地相信青年，积极地引导他们参加社会改革的基本立场的生命力和绝对必要性。前面已经提到过，1945年12月，威廉·皮克接见了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的代表，当时他谆谆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与青年的关系总是着眼于争取他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人类之爱和人类的幸福以及为和平和人类的自由而奋斗。如果在这个意义上给青年人委以重任，那么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也是愿意为上述目标奋斗的。

游行队伍中的青年在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年代里，确信他们生活的新意义。他们亲身经历了怎样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并借助苏联的支援，一步一步地消除了战争的后果，改善了生活。

绝大多数青年对民主德国采取这种积极态度还因为他们一起参与筹建这个国家。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立以来，她已为建设新生活争取了数十万青年。民主德国诞生时，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已经拥有90万成员，他们信心百倍地、热情满怀地为建设反法西斯的民主制度，为实现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为以和平、人道和各国人民友好的精神进行自我教育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民主德国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给这个工农国家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和物质技术基础，而这一点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和提高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为达到此目的，除了使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对劳动有一个新的态度之外，没有其他道路。因此，在统一社会党内，我历来主张各级领导和组织应该唤起青年人追求新事物的热情，促发他们的意志和干劲，把他们放到民主建设的重点工作上去。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团的基层组织工作上。象对工人一样，也要使青年意识到，他们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主人，提高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人民的财富，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反法西斯民主改革的敌人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助长一部分人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观点，“先有更多吃的，然后才能多干活”。但是

要想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只有一条路：首先要多生产，而后才能有好生活。我们突出地强调这一点。为了争取青年工人，我提出，先在工业中，然后也在农业中组织积极分子小组和青年突击队。我还建议青年团员要站在1947年掀起的劳动积极分子和劳动竞赛运动的最前列。许多积极分子小组和突击队以自己的榜样鼓舞了其他青年向他们看齐。1948年初已经有450个青年积极分子小组和4,000个青年积极分子。

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广泛地开展积极分子运动，在我的提议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1948年1月决定召开一次全民所有制企业青年工人代表大会。1948年4月11日至12日，青年工人代表大会在蔡茨召开，成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统一社会党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和副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到会讲了话。我要求青年把积极分子运动发展成青年的群众性运动。我说，“工人沦为奴隶、倍受剥削的世界已成废墟，我们的青年正在德国东部开始一个建设的新时代。我国劳动青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使自己能够在政治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中成为行动和创造的力量。我们想，如果我们把已经开始的工作轰轰烈烈地进行下去，这个青年积极分子运动就会发展成德国劳动青年的伟大的群众运动。”

一年以后，青年积极分子已经增加到两万人。这和阿道夫·亨纳克1948年10月13日的先进事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我到工厂里和许多青年工人交谈，鼓励他们承担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项目。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增强青年的信心，考察他们的能力，从自身的经验中体会到共同劳动产生的巨大力量。当时，随着苏占区1949—1950年两年计划的实施，开始向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过渡，但经济形势仍然相当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发挥青年的积极性尤为重要。因此，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号召青年为实现计划而奋斗，并为此承担额外任务。

关于青年建设热情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想举几个突出的

例子。1948年底,许多青年工人和大中学生,其中大部分是青年联盟成员,响应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利用义务劳动修建了一条五公里长的引水管道,把萨勒河水引到下韦伦博恩的马克斯钢铁厂。这是我们当时唯一的钢铁厂。在“马克斯需要水”的口号下,青年们经过90天的紧张劳动,完成了任务。1949年4月1日,引水管道交付使用,钢铁产量大大增加。

1949年4月初,几千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响应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号召,在埃尔茨山脉的索萨附近帮助修建一条拦水坝,解决周围城市和农村的饮水问题。我建议把索萨水坝工程作为第一项青年工程,由青年自己负责。这个建议得到青年们的热烈响应。此后许多重要的国民经济项目列为青年工程,青年一代通过这些工程的建设发挥了他们的干劲和主动精神,考验了他们的创造力。最重要的是他们从中获得了经验和知识,使他们能够在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承担更大的任务。从这些青年工程建设者的行列中出现了许多党、国家和经济方面的领导干部。

为了支持小农和中农,1948年秋末我们组织了全民所有制的机器租赁站。在农业上,青年拖拉机手成了青年积极分子运动的带头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号召,“联盟成员争当拖拉机手!”截至1949年5月中,有4,600名青年在机器租赁站工作。1949年10月11日,也就在我国刚刚建立的日子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布鲁诺·基斯勒发起农业积极分子运动。基斯勒后来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多年,主管农业工作。

青年们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多种方式,站在建设的最前列。他们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为民主德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当然,青年们不仅在生产中助了一臂之力。因为我们知道文化、文学和艺术对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作用,对人道和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对陶冶情操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统一社会党中央执委会从一开始就对青年工作的这个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

方面，我们得到了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贝希尔、布莱希特、布莱德尔、巴特尔(古巴)、科普洛韦茨、朗霍夫、莱加尔、马尔希维查、纳加尔、西格斯、瓦根海姆和沃尔夫的支持。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肖洛霍夫、阿历克赛·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阿拉贡、笛福、狄更斯、法斯特、高尔斯华绥、吉卜林、杰克·伦敦、麦尔维尔、辛克莱、莎士比亚、史蒂文森、斯威夫特、马克·吐温、惠特曼、王尔德等世界文化代表人物的文学作品帮助一些青年人找到了生活的新意义。1946年5月成立的德国电影股份公司(简称德发公司)的首批电影，如《凶手在我们中间》和《阴影笼罩着的婚姻》有力地支持了对刚刚过去的事情的清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卡塔耶夫的《白色孤帆》对青年们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为了推动青年联盟的文化工作，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和新生活出版社1948年10月中邀请作家座谈。68位作家和200名青年，其中有许多是青年积极分子，参加了会议。我请作家们更多地关注青年问题，表现他们追求新生活的斗争。我们不仅要激发青年人完成经济计划的热情，而且也要使他们具有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对生活的乐观主义，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书籍、电影、戏剧和报纸文艺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沃尔夫建议作家们深入工厂、学校，到青年人中间去，亲身体验一下新事物是怎样脱颖而出的。

在歌德诞辰200周年时，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1949年3月21日至22日在魏玛国家剧院举办了一次德国青年歌德纪念会。会议开始时，我谈了青年对歌德遗产的态度。我说：“我们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为这次活动的举办人不是偶然的，作为青年组织，她第一个向从事精神生活的人们提供机会，让他们向青年人介绍歌德。”我还说，为使德国青年具有民主与和平的理想，为发掘德国文化和外国文化遗产中的精华，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充分认识到了了解歌德作品的重要意义。

奥托·格罗提渥谈了这位伟大的德国人道主义者的生平和事业。他把他的报告和这位诗人的话联系起来，取题为“不做铁砧，就做锤子”。他激发青年人对人道主义思想财富的热情，鼓励他们坚定地实现这种思想。他对青年们说：“你，德意志青年！你必须奋起，否则就会沉沦。你必须战胜那些黑暗势力，它们过去利用了你，把你从一场灾难推进另一场灾难。你必须赢得你的自由、你的和平、你的前程和你的独立……你不应是铁砧，铁锤才应该是你！”

1949年历史性的十月，是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刻。德国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是利用青年为一小撮统治者和剥削者效劳，为他们的强权利益上战场，流血送命。青年们深切地希望我们的新国家将执行一项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永远不许发动战争，从根本上转变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我国，包括青年人在内的许多人长期梦寐以求的事，1949年10月12日已经成为确定无疑的事实。奥托·格罗提渥总理在人民议院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这是一个为经济恢复、社会保障、民主和社会进步而工作的纲领，是一个为和平，为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而奋斗的纲领。正象民主德国3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我们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这些原则和宗旨。我们工农国家的性质为此提供了保障。

1949年10月12日，我代表青年向人民最高代表机构（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这个机构的一员）说明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声明。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政府的政策原则和宗旨与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完全一致。政府与人民如此心心相印，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我表示相信，格罗提渥的政府是青年一代利益的可靠维护者，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将永远站在政府一边。

1949年10月14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讨论了民主德国成立后青年联盟的新任务。我以兴奋的心情欢迎威廉·皮克出席我们的会议，我提议选举他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名誉成员

和名誉主席，这个建议得到雷鸣般的掌声。我说，“我们相信，有威廉·皮克这样的人担任我们新的国家的最高职务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仅把威廉·皮克尊为我们青年一代的榜样和导师，朋友和支持者，而且也把他看作德国人民健康和积极传统的化身。”

威廉·皮克对当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名誉主席一事深为感动，他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已经为许多重要事件所证明，我想起……10月11日菩提树大街的那个壮观的夜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通过他们的游行队伍表示了他们与这些日子里发生的事件同呼吸，共命运。今天也应该如此。在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时，我们需要依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而我们面前的各项任务没有一项是轻松的。”

今天，带着庆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典的新印象，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民主德国的建立是社会主义与和平在德国土地上胜利前进的一个明显的标记。至今国内外肯定还有许多人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件的深远历史影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1949年10月13日打给民主德国政府的电报中说：“爱好和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30年来发生的事情完全证实了这一论断。民主德国证明了她千真万确是人民的祖国，是欧洲和平、安全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随着民主德国的建立，我们将在德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革命者、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多少代人之前已经开辟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我们的前人在这条道路上为了幸福的未来已经进行过英勇不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由于法西斯统治被粉碎，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宽广。无论如何，我们是利用了1945年春苏联和反希特勒同盟其他国家解放我国时所形成的历史良机。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在地下工作中、在监狱中、在集中营中、在流亡中和在反对纳粹暴行及反对战争的各条战线上，不惜牺牲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民主德国方兴未艾，他们的遗愿正由可以信赖的人去完成。

第十四章

和青年一道为社会主义与和平而奋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建立之日起，她的特点就是国家与青年之间、政府与青年一代之间保持着心心相印的关系。人民议院1950年2月8日通过的第一批法律中就包括一部青年法，瓦尔特·乌布利希就这部法律向人民议院作了说明。该法全称叫“关于青年参加民主德国建设和鼓励青年参加教育、职业、体育和休养的法律”。我作为人民议院青年委员会主席可以愉快而坦然地请议员们同意这一法案。这一法律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所捍卫的“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固定了下来，并增添了新的内容。

它与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所谓“保护青年”法不同，因为它不仅规定了各项鼓励措施，而且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它赋予青年一代以责任。这不仅仅是为青年人的政策，而且也是在青年人参与下由青年人贯彻执行的政策。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有权利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提出倡议。更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30年的岁月弹指而过。我可以这样说，事实反复证明，相信青年，把责任托付给青年是多么正确。民主德国人民议院1964年5月根据我们党的建议通过的第二部青年法也坚持了上述原则。现在第三部青年法已经生效了，它同样遵循着上述原则。民主德国青年在各种条件下和各个方面经受了考验。第一部青年法为今天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的领导者、为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干部、为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创造伟大业绩开辟了道路，使他们能为个人的追

求和集体的利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我们的人民议院也注意妇女的权利和对母亲们的关怀和照顾，关心改善农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今天，当失业几乎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蔓延的时候，当那里的统治集团和雇主协会以各种理由说明为什么不能保障劳动权利的时候，更容易看出我们的第一部劳动法体现了多么重大的成就。1950年4月19日，民主德国建立的第一年通过的第一部劳动法保证每一个劳动者有一个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可以胜任的劳动岗位，并且实行同工同酬。与今天的情况不同，当时我们并不缺少劳动力，而是必须创造就业岗位。我们青年组织特别主张每个青年掌握一种劳动技能，得到扎实的专业培训。

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我们国家开始起步，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成分越来越多地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革命过程转入社会主义阶段，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之后，接着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没有工农政权，没有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的成果，没有苏联的帮助和保卫，没有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种过渡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没有遇到反动派武装抵抗的情况下，逐步完成了这种过渡。在1946年通过的原则和目标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所遵循的方针是，通过民主的途径，用和平的方式，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当然，这个过程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因为在经济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私有成分，它会产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还存在着梦想恢复垄断资本权力和所有制的势力，他们甚至在国家和经济最高机构中还有代理人。我们准备运用不同的斗争形式把革命推向前进，其中包括一旦资产阶级离开了民主基础，我们也将采取武力手段。

我们西边的联邦德国是这样的国家，它的统治集团和有影响的利益集团认为，民主德国的崩溃或由于内部危机被外部吞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民

主德国，西方国家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企图用外部封锁孤立民主德国，否定她的主权，甚至否定她的存在。当然，我们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得到世界许多朋友，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和其他进步运动的支持，但是他们不能决定他们国家的政策。这样民主德国在起步时与联邦德国相比在经济起点上是很不利的。由于我国公民的辛勤劳动，今天民主德国已跻身于最重要的工业国之列，在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大家庭中赢得了受尊敬的一席。

1950年7月20日至24日，统一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透彻地分析了形势，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发展阶段的方针，强调了民主德国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重任。党代会还指出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严重危险。一切爱国人士应为实现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一个爱好和平、统一、进步的德意志国家开展民主斗争。这样才能制止此种危险。这次党代会上，我们通过了1951—1955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为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而且为同期的整个社会发展做出了安排。计划的目标是奠定社会主义基础。两年后，即1952年7月，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党代表会议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是中心任务。

对我来说，第三次党代会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1950年7月25日，在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我只有38岁，我作为最年轻的一员进入了由工人领袖组成的集体之中。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有：统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和奥托·格罗提渥、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以及功勋卓著的干部弗兰茨·达勒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赫尔曼·马特恩、弗雷特·厄尔斯纳、海因利希·劳、威廉·蔡塞尔；候补委员有：安东·阿克尔曼、汉斯·金德莱茨基、埃里希·米肯贝格和埃丽·施密特。多年来共同的政治活动把我和这些同志们联系在一起，我们都坚持过反法西斯斗争，不论原来是德国共产党的，还是社民党的，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以后，我们共同经历了反法西斯的民主改革

道路和创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了，成熟了。各个不同斗争阶段和政治、经济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不同领域的经验都汇聚到这个集体之中。

政治局里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比迄今为止担负的责任重大得多的任务，因为这里要讨论各方面的政策。现在我已经是这个领导集体的成员。这个集体的主要任务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深入地分析政治形势，考虑各种可能性，为基本战略问题和许多现实问题做准备，做决策。

我虽然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的职务仍是我的主要任务。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经济方面的建议在我们的活动中更加突出。我们要争取全体青年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为民主德国创造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对保卫欧洲和平最有效的贡献。因为一个经济上不稳定的和政治上无抵抗能力的工农国家只能诱使帝国主义冒险家迫不及待地把民主德国从政治地图上抹掉。同时，我们对经过战争、饥饿和困苦岁月之后的我国劳动人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帮助他们过上社会安定、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生活，而这些只能通过紧张的劳动才能实现。

作为从前的国民经济的一部分，民主德国的经济和现在属于联邦德国的经济机体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开始时我们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联邦德国进口原料、机器、设备、半成品和零配件。这就发生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遭遇过的情況——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企图给我们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我们的问题是来自联邦德国的经济讹诈。1951年上半年，联邦德国把两国贸易额压缩到两亿马克，到1952年下半年，又减少到900万马克。这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今天分属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地区之间商品往来的一个零头，当时两个地区的贸易额达60至80亿帝国马克。

诱使民主德国的科学家、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干部以及熟练工

人外流给民主德国造成了重大损失。当然，有些人离开民主德国有其特殊的政治原因，因为他们的法西斯历史，由于在我们这里不能满足他们的利润欲望，由于他们要追求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目的缺乏了解而离开的也不罕见。不言而喻，也存在这个或那个国家机关处理不当的问题。的确，我们西部邻居为了使民主德国“放血”，也无所不用其极。不少人上当受骗，有些“逃离共和国的人”以为在那边能找到达到物质富裕的捷径。在他们看来，“西方”能为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实际上，由于比较雄厚的经济潜力和马歇尔计划的贷款，“西方”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做了。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继续行之有效的作法，把重要项目作为青年工程承担起来。我经常到东方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工地去看望在那里劳动的男女青年，这个企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大最重要的工程。我也到柏林韦贝尔维泽附近去看望参加一幢居民楼建设的学徒工，这栋楼也是青年工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特拉滕多夫电站有联系合同，我也常和电站的建设者们聚会。每当我们要求青年们勇敢地向困难作斗争、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劳动组织和文体活动时，总是得到他们的支持，并付诸行动。这种接触常常给我许多值得向团的干部转达的启发。

我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发挥青年的主动精神。民主德国在加强其经济的斗争中，青年工人以一支反映青年特点的力量登上舞台。当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1950年11月号召向科学和文化进军时，更显出了他们的作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根据我的建议设立了“知识奖章”，1950年以来，每年都有许多青年联盟的成员努力争取知识奖章。号召青年们学习马列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对象我这样来自革命工人青年的联盟干部来说，建立科学世界观、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并不困难。许多年轻人的经验也是如此。如果他们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他们就能更加得心应手地、自信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缔造他们的生活。自

由德国青年联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成熟了。1957年4月，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宣布，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48年12月13日建立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儿童组织——少年先锋队——发展得也很好。少先队员们以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朝气驳斥了那些对儿童接触政治持怀疑态度的人。1949年中，少先队已经有55万队员。1949年至1953年的少先队组织主席是玛戈特·法伊斯特，她成长于工人家庭，她父亲在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1945年玛戈特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46年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干部。

1952年8月18日至25日，少先队在德累斯顿举行第一次少先队代表大会。会上赫尔曼·马特恩受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托，将光荣的名字“恩斯特·台尔曼”授予少先队组织，奥托·格罗提渥总理和不朽的工人领袖恩斯特·台尔曼的妻子出席了命名大会，这一切使我特别兴奋。事实证明，卡尔·李卜克内西开创的、恩斯特·台尔曼进一步发展的我党青年政策已经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作为青年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干部，一向致力于青年政策。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坚信聚集在德累斯顿的上万少年儿童将完成台尔曼的遗愿。

每当我回顾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的岁月时，总是想起历次大型青年集会，青年一代一再表明他们决心巩固自己的工农国家、保卫和平、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进步青年的友谊。

1950年5月底，德国青年节在柏林举行，这是欢乐和兴奋的日子。10万青年云集民主德国首都，带来了生产和学习中的好成绩及数百万支持斯德哥尔摩反原子弹呼吁书的签名。

1950年5月27日，在柏林维尔纳—泽伦宾德大厅召开青年和平代表大会，7,900多名代表中有2,000名来自联邦德国，国内外著名人士如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瓦

尔特·乌布利希、马克斯·雷曼、罗莎·台尔曼、安娜·西格斯、阿诺尔德·茨威格、伊利亚·爱伦堡、苏联共青团第一书记米哈伊洛夫、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盖伊·德博伊松和秘书长雅克·丹尼斯出席了大会。斯特凡·赫尔姆林主持了开幕式。他说，大会的目的是“向全世界宣告，除了和平的思想，再没有任何别的思想能激起德国新青年的热情”。

1950年5月28日，70万青年和平战士举行空前规模的大游行。我以他们的名义声明，我国青年不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扛枪，他们永远不会去反对他们的解放者苏联。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他们代表数百万青年决心为禁止原子弹贡献一切力量，不畏艰难险阻粉碎西方侵略集团的罪恶勾当，永远不允许把德国人民及青年再次拖入一场反对苏联、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反对社会进步的战争。斯大林在复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我感谢参加全国青年节的德国青年和平战士们的问候，希望激流奋进的德国青年在为建设一个统一、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一年以后，即1951年8月5日至19日，民主德国首都举办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依然弹痕累累的柏林接待了来自104个国家的26,000名年轻人。他们和200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20,000名少先队员以及35,000名西柏林和联邦德国（在此之前六周联邦德国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被禁止）的青年一起庆祝这个青年盛会。

我们接受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委员会的建议，在柏林举办青年联欢节，我们的喜悦和满意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因为仅仅在五年多之前，被希特勒强拉进侵略军的德国青年还是以敌人和占领者的形象出现在别国人民面前的。1950年11月召开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委会决定在柏林举办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在会上表示：“对德国青年来说，建议在柏林举办青年联欢节，是对我们联盟为争取和平和祖国民主统一的斗争的又一次支持和声援……在

这一时刻，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是她给我国人民和青年开辟了通往新的光辉未来的道路。我们从内心深处感谢光荣的苏联共青团和她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中的代表，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德国青年和平战士的组织，也不可能担负起这样责任重大的光荣任务。”

真应该目睹一下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是怎样热情满怀地准备这次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他们努力使客人们看到我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发生的变化。1951年8月，德国青年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和平和各国人民谅解的土地上与世界各大洲的青年聚集一堂。亲身经历这种国际团结，给许多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正在保卫祖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朝鲜青年赢得了极大的同情。青年们以崇敬的心情围在我们的客人马克斯·雷曼身边，他是德国共产党主席，在联邦德国一再受到迫害和逮捕。8月15日，10万青年和平战士在西柏林举行游行，他们在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斗争中得到的是痛苦的经验，警察大打出手，976名青年受伤。这也是那些日子的情景。

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我还认识了当时世界青联主席——今天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和当时世界青联秘书长——今天法共中央委员雅克·丹尼斯。我也结识了雷蒙德·迪恩和尤普·安根福特和其他许多忠于和平事业的同志和朋友。由于迪恩勇敢地阻止为肮脏的反越殖民战争运军火，她受到我们的尊敬。安根福特是当时联邦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后来因为他从西德监狱中冒险越狱，引起了很大轰动。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始终把自己看成一个青年和平战士组织。1950年，她发起了“准备劳动，准备保卫和平”和“青年为和平尽力”的竞赛活动。当时有些人认为和平与斗争水火不相容。直到今天各国支持和平的人中还有这种观点。我曾反复阐述过我对武力、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这些看法是由我的世界观和我的经历决定的。

我们共产党人历来最不愿意看到世界上兵戎相见，人类经常处于战争危险之中，我们永远不会干这种威胁和平的事。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幸福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之一，但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我们懂得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阶级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告诉我们，只有对敌视和平的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赢得和平。

在我看来，有效地保卫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只是马列主义学说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经验的认识。我说过，这是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阶级斗争中成熟起来、在十年法西斯的铁窗生活中得到巩固的认识。我亲身经历过，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动派，手无寸铁意味着什么。许多和我一起战斗过的共产党人、社民党人、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成员和社会民主国旗社成员倒在阶级敌人的枪弹下。我国的革命进程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内外敌人，他们在暗中窥测时机。因此，我们不能没有武装和安全机构。

我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及政治局的同志们一样，认为军事问题和国防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我的任务是通过我在青年团内的工作，把我们作出的决议付诸实施。五十年代初，形势显得更为紧张，联邦德国出现了危险的发展。

当时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是否把威胁看得过于严重了，形势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当两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破坏波茨坦协定，在联邦德国恢复他们的经济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时候，自然不能粉饰和平，掉以轻心。这个国家的总理和主要政党在国际局势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朝鲜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宣布他们的单独代表权，声称代表“所有德国人”。他们不加掩饰地向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妄图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宣称要解放“东部地区的兄弟姐妹”。联邦德国先是把法西斯军事力量的残渣余孽保存下来，转眼之间开始重新武装。在当年的法西斯将军施派德尔和豪辛格的主持下，从1950年起他们开始组建军队。众所周知，今天这支军队是北约在西欧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面对这一事实,对我们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只是希望和平是不够的,还必须用行动来维护和平,并在必要时准备拿起武器去捍卫和平。在这个意义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早在1949年3月就坚决反对对苏联进行战争煽动和侵略阴谋,政治局声明说:“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德国人民必须为反对侵略而战,并支持苏联军队赢得和平。”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从多方面为武装保卫民主德国作出了贡献,她首先是争取青年人自愿到警察后备队(1952年改为人民警察)、边防警察、乘警组织或到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截至1962年1月,民主德国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许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干部,其中包括联盟中央委员和书记,如格哈德·海德赖希、海因茨·凯斯勒和沃尔夫冈·赖因霍尔德都堪称楷模。

我记不清在那段时间里曾多少次深入青年联盟的基层组织,在干部会议上、在会见青年时讨论到深夜。但我记得,那些讨论都是十分有意思的,有教益的。当时和平主义观点还相当普遍。这是对造成巨大破坏和损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对法西斯军队的罪行的自然反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人们两次被统治势力利用。我们耐心地向青年们说明,枪和枪不同,关键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为了什么目的和政策。我们解释了马列主义对战争和军队的看法,工人阶级对军事问题的态度,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我们指出,人民和工人阶级有进步的军事传统。

这就为威廉·皮克1952年5月1日的声明作了准备。他说,如果联邦德国和西方三国按照目前这种形式签订这个所谓的总条约,我们就有必要组织军事力量保卫我们的国家。1952年5月底,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四届议会决定巩固青年联盟与德国人民警察的关系。认为,为了说明德意志人民警察在武装保卫我们共和国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必须做好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自由德国青年联盟议会说明,必须使所有青年劳动者懂得,在武装力量里服役是我们共和国青年公民的光荣任务。因此,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最

优秀的成员应该到那里去工作。在联盟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我支持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建立军事体育组织的提案。1952年8月成立的体育和技术协会就是由这个提案发展而来的。

帝国主义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失败后，目标转移到欧洲，企图把“社会主义挡回去”，冷战在加剧。我们的敌人有计划地、日益明目张胆地等待着“某一天”的到来，伺机颠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拼凑了一个所谓“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研究委员会”，提出并吞民主德国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计划。他们利用柏林西区和两国之间开放的边界，企图在民主德国造成一种能够触发反革命政变的形势。间谍机构和地下组织大肆活动，柏林西区和联邦德国的广播电台放肆地进行反对民主德国的煽动，把大量颠覆性宣传材料偷运进来，破坏活动不断发生。

民主德国的敌人妄图利用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时所遇到的困难。由于战争的后遗症和帝国主义分裂德国引起的后果，由于建设和捍卫一个新社会的复杂性，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民主德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势力对复辟旧的权力和所有制仍不死心。使社会主义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生根，使每个人都感到有奔头，需要时间。为了使国民经济增长快一点，积累率高一点，党和政府作了一系列长期性的决定。价格和税收措施使劳动人民的生活下降了，特别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提高劳动定额证明是错误的。工人中产生了不满情绪，工人和党、政府之间的融洽关系受到了损害。

1953年6月初，统一社会党中央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了旨在纠正错误的决定，采取了稳定经济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措施。但是，在这些措施尚未见效之前，敌人就行动了。1953年6月17日，在柏林和民主德国其它一些城市发生了罢工和示威游行。社会主义的敌人利用劳动人民的不满情绪，开始了他们策划已久的、被帝国主义情报机构和特务中心操纵的反革命政变尝试，但是他们力图制造的“总罢工”没有发生。当工人们看到反革命挑衅分子象法西斯一样胡作非为时，工人们迅速地脱离了他们。在许

多工厂里，工人们还向挑唆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民主德国的武装机构采取了行动，并得到苏军驻民主德国部队的支持。这对迅速平息政变企图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个在欧洲中心地区可能导致一场军事冲突的隐患被排除了。

在那些日子里，最先进的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统一社会党的周围，工人战斗队出现了。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我也深入到劳动人民中间。1953年6月24日，我在波茨坦—巴贝尔斯贝格的“卡尔·马克思”机车车辆厂，向工人们揭露未遂反革命政变的原因和目的。我向工人们解释了解决存在的问题和改善居民生活作出的决定。在这之前的两天里，我和这个厂各个车间的工人进行了交谈，了解他们的想法、意见和希望，找到了他们不满意的原因。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始终从透彻地分析形势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务必保证党和工人阶级之间密切的信任关系，随时采取必要步骤，武装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党中央和政治局讨论6月17日事件对我们工作的教训时，我们特别强调发扬党内民主，保证集体领导，坚持不懈地巩固我们党的统一和团结。

在后来的几年中，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民主德国作为经互会的成员，自1950年以来，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稳定而有利的对外经济关系，保证了我们经济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从1950年到1955年差不多翻了一番，1950年到1960年增长了三倍。辛勤劳动的成果反映在劳动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上，也表现在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和医疗保健事业的扩大上。我国某国营工厂的一个名叫弗丽达·霍克奥夫的纺织女工，当时她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劳动者明天的生活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干活。”这句深入浅出的话道出了经济与生活的根本关系，一个经济活动的原则。直到今天我们仍要遵循这个原则。

在农村，五十年代农民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向社会主

义社会的手工业者、个体商贩和私人企业主指出了前景。手工业者成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主德国至今仍有许多个体手工业者，他们为居民服务，得到国家支持。

1950年，中小企业的生产还占民主德国工业生产的23.5%，这时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把他们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当时我们向这类企业建议让国家入股，使他们能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今天我们可以说，这对他们来说没有害处。这样许多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仍由当时的私人企业管理。1960年，这类企业的产品占我国工业生产的6.5%，这种形式存在到1972年。在合营的过程中，当年的企业主有机会掌握管理社会主义生产的知识，这是1972年他们把私人股份卖给国家的原因之一。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越来越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一致起来了。从前的私人企业主绝大多数成了新的国营工厂的厂长。除了一部分由于年龄关系放弃了他们的职务外，至今许多人仍担任着厂长职务。

民主德国的头10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10年。到六十年代初，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工农业方面已经形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确立。

第十五章

学习期间

五十年代中，我的政治活动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1955年5月底，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五届议会免去了我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我和我国青年继续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我放下了自己极为珍惜的工作。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党又一次给我提供机会，让我系统地充实自己的知识。我和党政机关及青年联盟的其他同志一起，于1955年8月底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去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一年。

这是我第二次到列宁的国家度过一段较长的学习时间。自从我1930年至1931年在列宁学校学习以来，世界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一次我是来自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一路上充满着欢乐和期望。我们时而探讨即将开始的学习，时而唱唱歌或玩玩纸牌。

对我们来说，学习就是更透彻地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共同努力，将对国际事务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为国际事务发展开辟新的可能性。这一切激动着我们的心。我们不是纯理论地研究社会主义的动力和优越性，而是着眼于实践，着眼于我们未来的任务。我们要重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尽管我们所有人对科学共产主义都不是门外汉，但是我们仍然发现，我们的经典作家的思想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给我们的政治行动以宝贵的启示。在苏联教师的指导下，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他党

的同志们在一起，我们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知识，对许多事情感到豁然开朗。经过学习，我更加坚信，不能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抽象的公式。它是一门充满活力的科学，因而要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运用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认识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对于夺取新社会的胜利和工人阶级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同时为了避免主观主义的臆断和错误，也必须精通它。

1971年12月，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科学和政策问题》的文章。不妨在这里引几段：“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使社会进程有史以来第一次按照意识和计划发展。正因为如此，党所代表的社会政治领导，必须从科学的基础出发。社会政治领导只有在掌握了规律性和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谨慎地照顾到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才可能把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造福于人民……就本质而言，党的领导工作是政策性的，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一门或那一门专门科学。政策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思想与理论、实际与组织工作的统一。政策要能阐明前进道路上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对一切前提和条件作必要分析，最终制定指导行动的准确纲领……政策越准确地体现劳动人民的利益，越有效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人们所理解，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象巨流一样迸发出来。”

一个社会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注意促进和发展科学文化。这是最为长期和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不仅仅是落后国家为了摆脱殖民主义遗留的文盲状态的特殊需要，更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整个精神和文化这一上层建筑所必需的。在保持和发展所有进步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繁荣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民族文化，使科学为人民服务。因此，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实现其领导作用也是工人阶级的任务。马列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观。

我们在民主德国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同时，在文化和科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资本主义国家那种艺术和人民相分离的现象在我们这里已基本克服，有产者享受教育的特权已被打破。这里仅以我们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为例：1951年，民主德国有大学和高等院校 22 所，1960 年已增至 44 所；大学生人数 1960 年比 1951 年增加了两倍，总数达 99,900 人。

老一辈科学家中当时曾有人认为，工人阶级管理教育和对劳动人民的子女敞开高等学府的大门将降低科学工作的水平。经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出身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大学生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学习认真、成绩优良，一支新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已逐步形成。他们与老知识分子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已经融为一体了。

1956 年 7 月，我满载着新印象和新认识返回柏林，重新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开始了我的工作。当时，我们正在就我们今后道路的原则问题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我们的基点是：民主德国已经克服了最初的困难，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已成为民主德国决定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在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越来越多的公民认识到，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民族阵线内各政党和群众组织的合作日益密切，更加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然而，外部条件并没有好转。1954 年 10 月巴黎协定缔结后，联邦德国于 1955 年 5 月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成立于 1949 年 5 月）。它不仅大力扩充军备，而且在内政方面反动倾向也在发展。明显的例证就是卡尔斯鲁厄联邦宪法法院经过多年诉讼之后，于 1956 年 8 月 17 日宣布禁止德国共产党。

如果说五十年代前半期我们曾努力和联邦德国的爱国力量一道，多次直接向联邦总统、联邦议会和联邦政府建议，在一个爱好和平和进步的国家里寻求德国重新统一的道路，那么现在实现这一政策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阿登纳政府既定的目标就是依

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充当美国的小伙计，以实力政策否定二次大战的结果。这位联邦总理曾不加掩饰地宣称，现在不是谈重新统一的问题，而是应该谈“解放东占区”的问题。这一方针对欧洲和平包含着严重的危险。

1955年5月，华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缔结，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是对一切妄图修改二次大战结果、把社会主义从地图上“抹掉”的计谋的明确回答。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这一防务条约的创始国之一，也得到了更多的安全，她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条件大大改观。同时我们的义务也相应地增加了，即站在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成员国一边，为从军事上保卫社会主义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我于1956年秋又回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任职。当时，国际反革命势力在匈牙利抬头，政治局势紧张。有关反动派野蛮杀害匈牙利同志和阶级兄弟的暴行的消息使我义愤填膺，使我想起法西斯的残暴。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欢迎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革命工农政府。她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在苏军的支持下保卫了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领导匈牙利人民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一时期我们全力加强民主德国。不少迹象表明，有人试图煽动我们这里的动摇分子，制造动乱，挑起武装事件。1956年10月底，阶级敌人企图引诱一些柏林洪堡大学学生上街时，我国工人阶级战斗队一出现就使他们的这一阴谋告吹了。甚至伦敦的《泰晤士报》当时也不得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这是报纸的话——实际上拯救了和平。

在这错综复杂的时刻，面对敌人的重压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某些不安情绪，我党几个领导成员也发生动摇。虽然1956年3月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该坚定不移地继续下去；但是，这些动摇分子仍然主张在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各个方面退却。

在1957年1月30日至2月1日举行的第三十次中央全会上，我代表政治局作了报告。我和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格哈德·格吕纳贝格、库尔特·哈格、布鲁诺·洛伊施纳、赫尔曼·马特恩、埃里希·米肯贝格尔、阿尔弗雷德·诺伊曼、阿尔贝特·诺登、海因里希·劳、维利·斯多夫、保尔·维尔纳、赫伯特·瓦恩克以及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一道保卫指导我们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总路线。在此关键时刻，我们确信党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将决定我们社会主义政策的成功。因此，我坚决主张彻底弄清楚现存的问题。到了这一地步，与以卡尔·席尔德万和恩斯特·沃尔韦贝尔为首的几个同志的一场斗争不可避免，直到解除他们的职务。

形势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此情况下，我更加经常地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和他们商量政治问题和政治任务。例如，我记得1957年4月，我去访问“黑泵”联合企业。这个联合企业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大的建设项目，工地附近有一家小酒店，联合企业就是沿用这家酒店的名字。在这里，一座庞大的企业拔地而起，它把褐煤精炼成焦炭、煤气、燃料、煤焦油及其它化学原料。因为民主德国除褐煤之外几乎没有其它能源，所以这个联合企业无论过去和现在对我国的原料和能源状况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此期间，我多次访问苏尔专区的劳动者。1958年，我在这个地处民主德国南部、有着秀丽山川的专区竞选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议员。

1958年2月，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任命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个月之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7月16日，在选举领导机构时，我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以这种身份负责军事和安全生产工作、青年和工会工作、妇女和体育工作。

这是我们尊敬的威廉·皮克同志最后一次参加党代会。他年

迈多病,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出席党代会开幕式。1960年9月威廉·皮克逝世了,这对我国和我个人都是沉痛的损失。在我们的干部刊物《新道路》上,我撰文高度评价这位伟人的生道路。他是伟大的工人领袖和劳动人民可信赖的人。我指出了他给我们留下的与世长存的政治遗产。我怀着对他崇高品质的敬仰心情写道:“他对党的态度,他一生中始终表现出的谦逊美德,表明我们的威廉·皮克同志品格的伟大和他对工人阶级事业的献身精神。”

第十六章

1961年8月13日

我从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我工作的重点是军事和防务问题。1956年秋，我担任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为首的党中央安全委员会的书记。1960年民主德国成立国防委员会，瓦尔特·乌布利希作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主持国防委员会的工作。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任命我为这个国家最高防务协调机构的书记。我的新职使我经常和当时的国防部长维利·斯多夫（现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国防部副部长弗里德里希·迪克尔（现民主德国内政部长）、海因茨·霍夫曼（现国防部长）以及海因茨·凯斯勒（现国防部副部长兼国家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接触。我也常常见到苏联元帅格列奇科。1953年至1957年底他任苏联驻德国武装部队司令。后来他担任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和苏联国防部长时，我们仍有接触。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于1956年1月18日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家人民军和国防部的法案。我完全支持建立我们的国家人民军。我在军事方面的工作使我相信，民主德国的社会状况要求、也能够建立本国的武装力量，并能使它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和最广泛的劳动者阶层的事业；应该有意识地使工人阶级、人民武装力量之间客观存在的团结成为从军事上保卫我们共和国的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与工人阶级的国际性和组成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相一致，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从军事上保卫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看作一项集体的国际主义任务。只有和苏联、苏联武装力量

和其它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及其军队结成极其紧密的战斗集体，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军队的性质取决于国家及其政策的性质。除此之外，高级指挥官的遴选，对一支军队的性质和目标是决定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以及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部长会议对此问题都极其重视。我的任务是为政治局或国防委员会在这方面的重大人事决定和有关决议作准备。建军初期，国家人民军三军将领中70%左右早在1933年前就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其中有许多人经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考验，近三分之一在希特勒独裁统治时期被投进了监狱或集中营。

我把人事工作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对于这项工作我非常审慎和耐心。我经常想起，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其他同志们是如何真诚地、无微不至地、必要时又是严格地帮助我成长。1956年底，当部队人员大体配齐时，各级军官的社会出身是：82%来自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约3%来自农民，12%来自职员，另外3%来自知识分子和其它职业。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是一支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军队；是一支和平的军队。她忠于和平事业，她的建立体现了与德国历史上一切反动派的彻底决裂，继承了1524年至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1812年至1813年解放战争、1918年至1919年的十一月革命、1920年工人自卫队和红色鲁尔军反对卡普暴动、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德国战士和1933年至1945年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等所有这些军队的进步传统。今天，国家人民军的许多单位、连队、军校、兵营、舰艇都是以革命先驱者的名字命名的。

社会主义需要具有政治经验和认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技能军官。他们必须和本阶级保持紧密联系，热爱士兵，关心每一个战士。有的人认为，军队里处理人的关系不重要，因为军队生活是建立在命令基础上的。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不难用实例说明，哪里指挥官和士兵关系密切，那里的任务就完成得最好，那里的备

战状态也就最好。正因为服役是艰苦的，军官就更要时刻关心部下的要求和福利，关心他们的问题和疾苦。

保障国家人民军能有这样一个领导系统，是军队中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我们从列宁的教导和苏共的经验中知道，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对于军队同样也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党政治局曾于1957年11月阐明了我们的军事政策：“用最现代化武器和技术手段装备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力量，在于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决议，和劳动人民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几个月之后，即1958年1月14日，政治局经过深入的讨论，作出了“关于党在国家人民军中的作用”的重要决议。决议是我们建军两年中所有经验的结晶。文件中的原则性内容，迄今依然是行之有效的准则。

当时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计划以及政治局在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都证明，加强武装力量和民主德国防务的所有重要问题，无一不是集体讨论、共同决定的。我们至今也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不会改变。

深入部队考察成熟的问题已成了我的习惯。我的工作经常人员在部队一呆就是几周，他们和将领、军官、下级军官、士兵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基层组织的干部讨论。他们讨论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效果，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我们通常也谈部队和社会主义大企业的工人和当时新成立不久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民以及和苏联战友的联系。军队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谈话中总是占重要地位。

我清楚地记得1957年春和国家人民军司令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和三军负责人的一次谈话。谈话前我们也作了调查研究，所以对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调查的情况是1957年6月12日至13日埃格斯多夫会议的基础。瓦尔特·乌布利希、维利·斯多夫、赫尔曼·马特恩和我本人以及党和国家人民军其他一些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加强人民军。我们经常邀请部队政委和司令员列席党中央安全

委员会会议，更直接地听取他们对将要作出的决定的意见。

当时，我还特别注意边防警察的工作。五十年代中边防警察发展成一支有战斗力的边防部队。边境挑衅和冲突可能很快酿成一场难以控制的军事冲突，这已是古往今来的老经验了。在我国边界上的挑衅活动并不少，之所以没有导致更大的冲突，是由于我们的边防战士处事冷静。这类挑衅活动的发生，说到底是因为挑衅者顽固地不承认和不尊重民主德国的边界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边界。

我们的边防警察和后来的边防部队有21人值勤时被联邦德国或柏林西区阴险地枪杀了。保证我国“边防人员”的装备和训练，随时对付各种挑衅，确保民主德国边界安全，这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致力于改善边防战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不论白天黑夜，还是刮风下雨都能履行任务。

在民主德国国防建设的同时，工人战斗队的作用也提高了。西方舆论对此有许多评论，有的持轻蔑的观点，有的认为是编外正规军。实际情况如何？如前所说，1953年夏，工人阶级为了保卫共和国，对付反革命的阴谋破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工人战斗队。企业中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在完成生产、工作任务的同时，学会使用武器，保卫他们的胜利果实。

从基层到中央，战斗队接受德国统一社会党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他们除直接保卫自己的企业之外，在五十年代末国防建设方面我们委托他们有效保卫市县地区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我们时常关心提高战斗队的战备水平，培养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不断改进百人队（即工人战斗队分队。——译者）的训练水平，提高指挥员的素质。不言而喻，参加战斗队坚持自愿原则。

我常常深入战斗队，观看训练和演习。所以有些指挥员我已经认识二十多年了。战斗队员的高度战备水平和他们对党的信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几年之后，1959年4月20日，在施麦尔维茨第七届指挥员训练班上我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战

斗队的高度政治觉悟,严格的纪律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保证他们将来也能光荣地完成肩负的使命。”

我们为民主国防务作的努力很快证明是必要的。五十年代后期,国际上曾出现一丝缓和的希望,但在1960年至1961年,战争的阴云却再度密布。

联邦德国国防军兵力已逾35万。联邦国防军和北约在1959年至1960年期间,曾以“迂回”、“坚持”、“冬天之盾”、“瓦伦斯泰因”等各种名称举行军事演习,矛头直指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出版的期刊《军事政策周报》1961年3月公然宣称:西方通过和平途径迫使东方让步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用尽,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以武力改变现状,要么放弃自己的原则。当时的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在美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扬言,人们需对某种形式的德国内战有所准备。

1961年7月初,波恩在“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研究会”的报告中再次提出有关“某日”的详细计划。该报告篇幅浩瀚,包括各种方案,例如:西德的垄断资本如何一步一步地控制民主德国的经济;如何取缔德国统一社会党;如何剥夺工会的权利,等等。1961年7月10日的《科隆周报》报道,“采用冷战、神经战和射击战等一切手段……不单单使用常规军事力量和装备,也要使用渗透、煽动内部抵抗、搞地下活动、瓦解治安机构、破坏、扰乱交通和经济、鼓动抵制和暴动……”。事隔几天,当时的联邦“全德问题”部长恩斯特·莱默尔前呼后拥地来到柏林(西),从那里操纵针对民主德国的心理战。北约驻欧部队进入紧急状态。

西方宣传机器发动了一场反对民主德国的喧嚣,利用“逃亡洪流”和“难民惨状”制造侵略气氛,其腔调酷似1939年8月。侵犯边界和边界挑衅与日俱增。为了在居民中制造混乱,破坏分子在柏林列宁大街火车站附近的屠宰场和市中心的洪堡大学煽动闹事。

在以往的12年中,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准确地说,当时整个社

会主义大家庭和资本主义世界毗邻的边界是一条开放的边界。这种状况对和平潜伏的危险日益显露出来。因为人们随时都能利用柏林西区及其周围的形势挑起一场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

地处民主德国境内的柏林西区和我们有 164 公里长的边界，其中 45 公里与我们的首都相连。截至 1961 年 8 月，这条边界既无安全措施，也没有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间，每天有 50 万人通过边界。然而，柏林西区绝非民主德国领土上的一块普普通通的地区，按柏林西区掌权者的话说，它是“一枚最便宜的原子弹”，是“东方的肉中刺”和冷战的“前沿城市”。至少有 80 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在那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大肆进行货币投机，试图瓦解民主德国的经济；成立机构，招募民主德国的劳动力。人们完全有理由称它为不折不扣的人口贩子的转运站。那些丧尽天良的经纪人从中捞取高额的人头金。1961 年中，联邦德国的侵略势力和他们在某些北约成员国的同盟者认为，在民主德国再次制造动乱的时刻已经成熟，他们打算通过一次以“德国内部警察行动”为掩护的联邦国防军军事行动，来“支援”肇事者。

我们以应有的警惕注视着这一危险的事态发展。难道我们能够坐视别人利用开放的边界，在一场无可比拟的经济战中把我们共和国吸干吗？难道我们能坐视西方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制造类似二次大战前夜的战争动员和战争歇斯底里的升级吗？当柏林西区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并且肆无忌惮地干着“扰乱活动”时，我们能坐视不管吗？如果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而纵容了侵略者，那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欧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会原谅我们吗？二次大战结束时我们曾发誓决不允许再从德意志土地上发动战争。我们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履行这一义务。

1961 年华沙条约国家不是没有发出警告。1961 年 3 月底，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召开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强调指出局势的危险性，同时表示决不在帝国主义侵略压力面前退缩。

民主德国也强调指出 1961 年对欧洲和平构成的严重危险。1961 年 7 月 6 日，我国人民议院还向联邦德国政府和柏林西区市政府提出了“德意志和平计划”，其中包括许多谅解建议。然而，波恩和柏林西区的当权派显然错误地认为这种谅解精神是软弱的表现，以为民主德国不具备对付冷战分子阴谋诡计的有效手段。

1961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会议，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与苏联共产党协商后，建议对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以及联邦德国的边界按一般主权国家边界实行检查。莫斯科会议一致同意这一建议。

当时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责成我负责准备和实施必要的有关行动。我们制订了必要的措施，起草了对国家人民军、国家全部和内务部机构、警察部队、人民警察和工人阶级战斗队的动员令，以及对中央国家机关、交通、建筑和其它经济部门的指示。事后我们满意地看到，在主要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疏忽。

为了直接领导这次行动，我把指挥部设在柏林警察总局。从那里我与武装部队司令和指挥部、柏林、（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波茨坦三个专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中央国家机关、柏林市政府以及（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波茨坦专区政府随时保持着联系。

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于 1961 年 8 月 11 日声明，欧洲和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因此责成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采取保障和平所必要的一切措施。部长会议于次日通过决议，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有效地控制起来。

当我 1961 年 8 月 12 日下午驱车前往德恩湖畔时，一路看到我们的国家人民军摩托化装甲部队已在道路两旁进入戒备地区。下午四点钟，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签署了我们准备好的关于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以及与联邦德国之间边界

安全措施的命令。当天深夜,开始行动前一小时,我所领导的指挥部人员在柏林警察总局各就各位。在场的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维利·斯多夫(兼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保尔·维尔纳;党中央委员中有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国家安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内务部长卡尔·马隆、交通部长埃尔温·克拉默尔以及内务部副部长维利·赛费尔特、柏林人民警察局长弗里茨·艾克迈埃尔和内务部指挥班子负责人霍斯特·恩德。零点发出命令,开始行动。随着新的一天——一个星期天——的开始,一个世界注目的行动开始了!

按照命令,国家人民军和警察预备队进入指定地段。工人战斗队也在柏林与柏林西区相邻的波茨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进入指定地点。我们的武装力量得到驻在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的支援。1961年8月10日,苏联元帅科涅夫接任苏联驻民主德国部队司令。

自1960年7月担任民主德国国防部的海因茨·霍夫曼忆及这段紧张的日子时写道:“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如何通过部队调动,声东击西,把部队调到指定地区。夜里埃里希·昂纳克打电话给我,通知我行动时间。他说:‘任务你清楚,行动吧!’我们刚到边界,埃里希·昂纳克也到了,他要亲眼看看,我们的坦克和部队是否占据着有利地点。他不仅和我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交谈,而且他习惯地和士兵们交谈,向他们阐述采取这些措施的理由。”

几小时之内,我国沿柏林西区的边界已经可靠地保护起来了。我建议,在边界上直接部署工人阶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也就是来自社会主义企业的身着战斗队制服的劳动人民。他们和警察部队一起,直接保卫沿柏林西区的边界。必要时,国家人民军和国家全部的治安部队作为第二梯队支援他们。只有在北约部队入侵的情况下,苏联驻民主德国军队才会采取行动。

整个过程表明,民主德国的武装部队出色地经受了考验。然而,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些安全措施要求在政治、思想、

经济、组织等方面采取行动。在事先没有公开谈及具体任务的情况下，我们把当时由保尔·维尔纳领导的统一社会党柏林党组织动员了起来。在短短几小时之内，调整了柏林的交通网，经过柏林西区的市区铁路和地铁停驶了。只有铁路和柏林公共交通企业的劳动人民完全信任工人阶级的党和工人阶级的政府，有纪律地执行所有指示，事情才可能顺利进行。而我们的劳动人民正是这样做了。尽管数千名劳动群众调去保卫边界或参加宣传工作，1961年8月14日首都的生产必须很好地完成，因为城市的供应应该照常。生活应尽可能保持正常。

我想，北约和联邦国防军的指挥部必然知道，象1961年8月13日这些措施表现了多么巨大的统一行动力量。这样的行动，只有得到无数自愿支持者的协助，得到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理解，才能成功。因而，在8月的这些日子里，不仅表现了我们的军事力量，而且也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和我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事后人们可以随便吹毛求疵，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尽管为保证成功，准备措施牵涉到相当大的范围，但是，反法西斯墙的建立出乎我们敌人的意料，而当时外国情报机构人员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通过开放的边界，在民主德国刺探情报。对我们的行动，他们却未能组织起重大的抵抗活动。

一再有人问我，我们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行动可能冒一场大战的风险。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对于仅仅发生在我们领土上的行动，北约难以用军事侵略来报复。我们的情报表明，没有北约中的头号国家美国参加，一次军事行动是不可想象的，而美国在柏林西区关心的是柏林西区现状保持不变，西方三大国留在柏林西区，确保柏林西区和联邦德国之间的交通安全。所有这一切都未受我们戍边措施的影响。华沙条约国家尊重柏林西区作为一块特殊政治领土的地位，对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可以从1961年8月初华沙条约各成员国党的第一书记会议通告中得知。我们方面不存在任何引起北约军事干涉的理由。还有，我们的行动无非是每一个独

立的主权国家的行动。我们不过是根据联合国组织当时和现在一直奉行的国际法准则把我们的边界控制了起来。这样和平得救了，同时也为民主德国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1961年8月13日以后的日子里，我仍然经常到坚守在边界的战斗队队员、人民警察和武装部队中去。我向他们阐述这一安全措施的必要性和意义，转达党中央和政府对他们的感谢。我还经常注意使柏林市、（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和波茨坦专区的居民们，尤其是工人、妇女和青年与驻守在边界的战斗队队员、人民警察以及人民军指战员保持密切联系。

对有些人来说，1961年8月13日的深远影响也许是在多年之后才真正理解。它的影响直至今日。那种以为用“有限的行动”就能消灭民主德国这个工农政权的图谋，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阿登纳的“实力政策”破产了。谈到1961年8月13日行动时，联邦德国有些人认为，这是“阿登纳时代”的结束。这种看法决非偶然。有些政治家并非我们的朋友，但是几年前他们也承认，我们的行动对德意志土地上的和平以及欧洲的和平都是一大贡献。

1961年8月13日这一天无疑有助于西方有影响的集团承认他们以往十多年拒不承认的事实：一个行使主权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国家，既不受讹诈，也不会被推翻。1961年8月13日，为此后实现由冷战与对抗转向谈判，以及初步的缓和步骤做出了贡献。在我看来，这条道路导致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该文件中特别强调尊重欧洲现有的边界以及边界的不可侵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柏林西区之间的边界，是两个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军事集团的分界线。这条边界决不应成为一条危害和平的“炽热的边界”。1961年8月13日的措施是促进和平与缓和的措施。正因为如此，每当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和能够现实考虑问题的政治家们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持同样观点时，我总是十分高兴。

第十七章

相信人民的力量

始终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的党员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居于领导地位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政治家来说，更应该成为生活的准则。就我来说，到劳动人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去接触他们，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需要，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汇报或会议都无法代替。这正是德国革命工人运动及其卓越领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奥古斯特·倍倍尔、恩斯特·台尔曼和威廉·皮克革命活动的传统。

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1917年他曾说过：“只有当一个国家能运用政府机构的全部威力，把群众派遣到资产阶级当局想叫他们去的地方的时候，资产阶级才认为这个国家有力量。而我们的力量概念却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我们就是遵照这一教导行动的。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密切联系人民是我们完成任务最正常和最理所当然的工作方法。这是因为“除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没有其他利益”。我们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和劳动人民共同努力，共产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所以，我们同人民接触，不是形式上履行义务，也不同于在选民面前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我们同我们的人民血肉相联。我们没有必要故弄玄虚，愚弄群众。我们的政策对每个人来说都是

一目了然的，我们对群众的信任是坚定不移的。由此产生了我们向党、工人阶级和人民报告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例如，政治局的所有报告、所有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的讲话、讨论发言、决议都发表在我们党的报纸上。每个公民都能立即了解我们的政策，并共同考虑，共同行动。几十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这种作法。

无论德国统一社会党委任我以什么职务，在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工作期间也好，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集体领导中任职也好，我总是利用一切可能，通过个人的直接接触，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他们关心的事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第一手”材料。

现在我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我仍然坚持和工人、城镇居民、国家人民军以及其他武装部队指战员保持个人接触。

我从这些交谈中得益匪浅。个人直接接触可以最深切地感受到劳动人民怎样理解党的政策，他们和党的政策是否一致。我常常能从这种接触中为新的考虑和决策取得宝贵的认识。每次接触，和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上、家中或街上的每次谈话，或者访问人民军战士，对我来说都十分重要。我作为一名党的干部，除了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外，访问我国的工业企业和农业合作社、中小学校和高等院校，以及在外国的许多会见，都是我活动的大学。我从中为管理国家大事获得的教益不少于学习科学文章或阅读有关我国发展问题的专家报告。

同我国群众、我党党员、其他党的党员以及无党派人士的接触，丰富了我的活动内容。可以说，同样充实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组织的工作作风。

这种思想和经验的直接交流，有助于我们现实地估价已取得的成绩，求实地、冷静地判断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确信依靠人民的力量和积极性能够实现的情况下，提出新的任务。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是一切成绩的先决条件。

我所访问的集体，主要是工业、建筑业、农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中的重点单位，他们的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在数以千计的会见中，我能够听取建议，同时自己也向其他人提出建议。

我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时常访问苏尔专区钾盐矿的矿工。苏尔专区地处民主德国西南，它包括图林根森林的绝大部分和雷恩山的一部分。记得1945年底我从柏林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时，曾艰难地翻越了雷恩山。过去，这里是贫困地区。居民在军工厂、机器制造厂、机床厂和汽车制造厂工作，还有许多人在玻璃厂、木材和玩具厂，以及采矿和农林业方面工作。他们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

如今，苏尔专区拥有可观的经济力量，对于满足民主德国国民经济和居民的需求、对于外贸出口都很重要。这个专区主要的经济部门有：机器和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电器配件、电子和器械制造。此外它的猎枪、玻璃和陶瓷制品、木材和文化用品也很驰名。那里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峰峦叠翠的高山和峡谷，是引人入胜的疗养地。每年都有数十万民主德国和外国公民到那里度假。

这个区的钾盐矿对我国有特殊意义，民主德国是世界上钾盐第三大生产国，主要出口国之一。因而，我们称钾盐为我们的“白色的金子”。苏尔专区的钾盐矿在我国钾盐生产中占重要地位，并向40多个国家出口。

我多次会见“韦拉”钾盐联合企业的劳动者。这是一个大企业，以流经苏尔专区的韦拉河命名。20多年来，我作为党的干部和议员同这里的矿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当我到纵横交错、绵延数千平方公里的矿井坑道网去时，我总为矿工们了不起的成绩感动。部分地段的地质条件相当复杂，矿工们在900米的井下，在摄氏40度的高温下干活。

青年时期，我对萨尔矿工及矿工家庭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有切身的感受。因此我相信，我可以对矿工的劳动和生活作出判断。

正因为这一点，当我看到我国矿工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时，我总是由衷地高兴。

1963年，采矿作业队队长特奥·舍费尔在人民议院选举前的一次大会上说：“我们作业队要我向全矿大会提议，再次提名你为人民议院候选人。我们提不出更适合的人选了，因为所有钾盐矿工都信赖你。这样说吧，这种信任是相互的。我们很注意你的讲话，无论是在企业党组织代表会议上，全矿大会上，还是在党中央全会上，从你的讲话可以看出，你看得起我们，这使我们觉得很光荣。你从青年时期起就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奋斗，我们以极其尊敬的心情看待你的功绩……我们把你看作台尔曼、皮克和乌布利希的勇敢战友。因此，我们提议你为人民议院候选人，因为你那清白的战斗一生是在最高人民代表机构里实现民族阵线提出的目标的最好保证。”

有人问矿工，他们为什么能做出越来越大的成绩？他们回答说：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所有人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正是这种认识鼓舞矿工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人民造福，为每一个人造福。这个回答表明，他们正确地理解了我们政策的实质。

我国劳动人民感到，国家领导人看望他们不是一种礼仪姿态，或是为了竞选摆摆样子。访问时各种问题都可以坦率地讨论，棘手问题也不例外。相反，我们的大多数讨论正是为了克服困难，寻找解决办法。当然我也很高兴，当钾盐矿的矿工们把我看作他们中间的一员，对我说：“我们愿意对你说心里话，也愿意把我们的忧虑和问题告诉你。你不仅耐心地听，而且能帮助我们。”

我认为这样的看法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赞扬，而且证明，在我们这里，人们的幸福是一切考虑和行动的中心。我作为工人的一员怎么会与工人的感情不相投呢？因为我过去是工人，而现在内心深处依然觉得自己是工人。

有一次，一位工人（我记不清是哪个企业的）对我说：“亲爱的埃里希同志，你每次来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我们摆一摆企业有待解

决的问题。这对我们的确不那么容易，但是这样的谈话有意思，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我提前考虑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同事们也这样看。”

这样同志式的讨论多么必要，多么有成效！因而，我要求所有国家干部和企业领导都要经常同劳动人民保持密切联系。

我和卡尔·马克思城、马格德堡和莱比锡等专区工业中心机器制造业的工人、工程师、科学家有许多个人接触。机器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的经济。工业中约30%的人集中在这一工业部门。在和马格德堡的“恩斯特·台尔曼”、卡尔·马克思城的弗里茨—黑克特这些重要的重型机器制造企业的劳动者讨论时，我们主要谈如何加速科技进步，如何发展和制造新的、生产效率更高、外型更美观的机器。

我现在的选区卡尔·马克思城从前叫克姆尼茨。这个城市过去对被剥削者来说是劳动艰苦繁重、生活艰难困苦的地方，但同时也是革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的城市。而今谈起卡尔·马克思城就想起一个现代化的市中心，就想起拔地而起的住宅区，就想起电子数据处理机、商用计算机、机床、纺织机械和电传机，就想起生产工业设备、仪表、控制和调节设备以及数控机床等产品的大型企业。这样，这个城市和它的企业就成为重要的出口基地，生产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这里的劳动人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使卡尔·马克思城的名字名扬四海。

象在苏尔专区一样，我定期会见卡尔·马克思城的选民，同他们讨论问题，向他们报告工作。我访问的单位绝不限于设备先进，工作条件好的企业。例如，我和该市的鲁道夫—哈尔拉斯铸造厂的工人保持着友谊。甚至到1970年这个企业的部分设备还陈旧不堪。酷热、粉尘、噪音、废气使铸工和翻砂工吃不消。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为了按计划完成任务，他们忘我地劳动，正因为如此，他们赢得了赞誉。在车间的一次讨论中，我自然也看到生产条件急待改善。我们一起商量，如何减轻繁重的劳动。讨论后，部长

会议决定采取广泛的措施，加速这家企业的现代化。如今，这个企业采用了新技术，工作条件有了根本的改善。

在这里我不惜笔墨写了我访问企业的事，当然我并不认为这就是党和国家干部联系群众的唯一形式。党托付给我更重大的任务，相应地带来了许多必要的和不容推辞的义务。因此，我在基层和群众交谈的时间可惜常常很有限。

我同工会、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保持着紧密的同志式的关系。近35年来，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是我国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最大的阶级组织，代表着一支巨大力量，拥有870万会员，占工人、职员、知识分子总数的绝大多数。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常常被称为当地统治制度的对抗力量。对这一点我不想表示异议。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已经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工会能够促进新社会，加强新社会，它是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这一点上，我的生活道路几乎和所有德国共产党人相似，参加工会是我们政治生涯的开始。我是在二十年代加入工会的，当时我开始学房顶修缮，参加木工工会。至今我参加工会已有半个世纪了。建筑和木材加工工会1969年成立100周年纪念时，把我和诺登、斯多夫、乌布利希等记入他们的荣誉册。在我加入工会50周年时，工会授予我荣誉证书，赠给我一把象征房屋修缮工职业的页岩锤。

根据我的经验，摆脱了企业主影响的工会对工人和其他许多劳动人民来说，是一所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提高阶级觉悟的必不可少的大学校。台尔曼和皮克这些国际上著名的德国工人领袖曾一再教导我，一定要把党和工会之间的同志式关系看作为工人利益而斗争的关键。对此我铭记在心。

我们共产党人把1933年法西斯独裁破坏自由工会看作对工人阶级的沉重打击。有鉴于此，1945年5月从法西斯统治下获得解放之后，我们立即克服重重障碍，从惨痛的历史经验中吸取了正

确的教训，主要是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她的统一。于是1945年6月15日，大柏林区工会筹备委员会就呼吁组织新的自由工会，这就是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诞生的时刻。我清楚地记得这个伟大的事件。工会的统一是工人阶级政治统一的重要基础。我引以自豪的是，从这一天起我们党和工会之间建立了真正的战斗团结，我曾为此做出了贡献。

我以我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不断推动工会全面代表和维护工人与职员利益。显然，这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同工会会员和干部接触是我了解生活中发生各种事情的最可宝贵的机会。他们每天都要代表工会各方面的利益；把推动竞赛和革新运动视作自己的任务；忙于劳动和工资问题；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分房、分配工会或企业所属疗养院的床位、食堂问题、职工子女假日活动以及职工的培训和文娱活动等等。我们交谈时他们直言不讳，他们是有责任心的人，关心社会主义兴衰的人、处理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的人。我鼓励他们要有顽强的劲头，代表工会的利益没有这种劲头不行，特别是在克服困难方面不能放松。

实地听一听，看一看，工会是怎样为劳动人民谋福利的，怎样帮助提高经济增长的，怎样推动社会主义竞赛，提高生产效益和质量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不会放过实地了解情况的机会。

常有人问，我们国家稳定的原因何在。我想，答案很简单，当然某些对我们不怀好意的人不会同意这个答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稳定的秘密主要在于我们的党同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休戚与共的关系。党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一部分。她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斗争。每个公民都能感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在和平、富裕、安定和安全的环境中生活。相信群众，而群众又以实际行动来回答这种信任，这就是我们稳定的根本原因。

第十八章

和体育运动密切相联

1968年2月,我们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个单独的奥林匹克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其情景我迄今记忆犹新。我国运动员终于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代表,平等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其它国际比赛。我们感到喜悦和满意。国际体育机构和北约各国的体育联合会,特别是联邦德国的体育联合会中某些人,在冷战思想的支配下,设下了无数障碍。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民主德国成立30多年来,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是举世闻名的,各大洲都以钦佩的口气谈论着我们运动员的成就。几乎每个月我都要为我国男女运动员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和赞扬。我以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或总书记(1976年5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将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译者)的身份,先后向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奖者、世界冠军、欧洲冠军以及国际性和全欧洲比赛的奖杯获得者发过约660份贺电。

我不仅想着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我们也尊敬和赞扬那些虽然也进行了艰苦训练、努力拼搏、却未能拿回奖牌的运动员。我们也同情那些受伤或其它原因而不能参加比赛、从而长年累月的努力未能取得成果的运动员。

我与体育的关系并非局限于为我国运动员比赛中的成绩高兴,也不限于发贺电。如前所述,我在青少年时期就参加体育活动。凡参加维贝尔基兴共青团的人理所当然地就是“橡树”工人体育协会的会员。在体育协会中我们参加体育活动,而在朋友中间我们

也讨论政治问题。我们“自然之友”协会在我们秀丽的故乡远足时也是如此。德国工人体育活动一向与无产阶级斗争紧密相联。许多年轻人就是通过参加工人体育活动找到了我们的革命运动。

我当时不仅学了体操，而且重要得多的是懂得体育锻炼对自身健康的价值。我没有创过纪录，也没有得过奖牌，我的目的也不在此。但是，我当年练的一些动作，至今我还会做。

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曾关押过一位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他就是欧洲摔跤冠军维尔纳·泽伦宾德尔。他不仅是运动员，还是共产党员。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他曾帮助过我们党执行揭露希特勒法西斯的政策。在奥林匹克村他向外国运动员散发传单，并通过秘密交通向奥林匹克村外的抵抗组织传递。后来，他参加了柏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1942年2月初，他落到盖世太保手里。1944年10月24日，即我们获得解放前半年，他在戈登监狱被杀害了。

在从法西斯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最初日子里，到处是废墟和苦难，许多紧迫问题急待解决。正象我们前面写过的那样，即使处于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刻，我也主张为青年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创造条件。在“青年一代的基本权利”中，我们建议采取措施，鼓励青年远足和参加体育活动。其中写道：“应该通过向青年提供服务设备、设施和器械，如青年客栈、体育设施、游船俱乐部等”，大力支持青年人的文娱活动。

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后来苏联元帅崔可夫这样写道：“我记得，埃里希·昂纳克在重建德国的困难条件下，以何等干劲和毅力安排体育活动场地。在那里小伙子们和姑娘们不仅增强了体质，也受到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教育。”开展体育运动不仅需要场地，也急需体育器械和运动服装。所以青年团也为此事奔忙。要解决问题是何等地艰辛，何等地劳累呀！重新恢复体育运动又需要何等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我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当我们克服了某些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我们又是多么心花怒放！我们

就是这样缓慢地、却是坚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前进着。

克服物质困难，仅仅是问题之一。想要建立新的民主体育运动，促进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很不容易。盟军管制委员会解散了法西斯的体育组织，不允许成立新的体育组织。起初，我们设法在青年联盟内成立体育队，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这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开展体育活动和比赛。

根据以往工人体育运动的经验，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在与工会负责青年工作和青年联盟负责体育工作的干部的谈话中，我反复提出如何有效地促进体育运动的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1948年8月1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和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共同呼吁爱好体育活动的劳动者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体育组织。1948年10月1日事情大体上有了眉目。德意志体育委员会在柏林青年之家成立。它的宗旨是开展体育活动，“保持身体健康，提高企业的生产，并给人们带来愉快、欢乐和休息”。

我以青年联盟主席的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还有我们青年联盟的干部和工会的干部，工人体育运动中有经验的人士，也有过去资产阶级体育组织的代表。我们记取了体育运动不断被利用来为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利益和目的服务的教训，开创了新的体育运动。我们之间尽管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即体育只能为和平、民主与社会进步服务。这一天德意志体育运动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它促进了我国的发展。

民主的新体育运动很快赢得了声望。1948—1949年冬，在奥伯霍夫举行了第一届冬季运动会。这里原是贵族、金融家和康采恩巨头的疗养地。此后不久，我们的运动员也应邀参加布达佩斯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运动会，我们派出了我们最强大的运动队来到多瑙河畔。但是等待我们的却是失望，因为我们的运动队还没取得国际上的承认，西方国家的大学生干部反对我们的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在我们未能参加的情况下开始了。然而，匈

牙利的朋友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们宣布，我们的足球运动员同匈牙利足球队以工会足球的名义举行比赛。因为我国工会当时已参加世界工会联盟，同时又是体育运动发起组织的正式成员，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这样，我们的运动员在布达佩斯第一次积累了国际比赛的经验。

1949年12月，苏联国际象棋协会征得国际象棋联合会的同意，准许我们的国际象棋大师埃迪特·克勒尔(女)参加世界大赛。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递交了正式邀请，克勒尔才得以去莫斯科参加比赛。在那里，她得了第五名。1950年7月12日，我们的国际象棋协会为相应的国际组织所承认和接纳，首先加入国际体育组织。根据国际规定，民主德国的体育事业享有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的体育运动应有的一切权利，则是20年后的事了。

战后初期，学校里的体育课也使我们伤脑筋。有近90%的体育教师都是纳粹党员。他们不能在新的学校任课，必须由反法西斯教师替代。1946年7月1日，第一个体育教学大纲强调说明，学校的体育课应“培养人材……使青年人协调地全面发展”。

1950年2月的第一部青年法包含了许多促进体育运动、远足和娱乐的措施。其中规定：设立体育奖章；增加体育用品生产；拨款2,050万马克修建19个体育馆、体育场和设施；把莱比锡体育学院的建设工工程定为最重要的工程，1950年10月22日招收96名学生，开始教学活动。同年规定人民教育部要培训700名体育教师和100名游泳教师。不久人民教育部决定体育和游泳是学校的必修课。从此，刚刚起步的体育事业和教育机构之间相互密切配合。

1951年夏，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在柏林举行，同时还举办了第十一届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这是当时在民主德国土地上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比赛。这次运动会的优胜者就是世界大学生冠军。苏联第一次派出世界著名运动员参加的代表队到民主德国来。通过友好的比赛，结下了友谊。这为我国和苏联运动员的友谊奠定了基础。我记得，当我在柏林东火车站为苏联代

表队送行时，上千名群众热情地向他们发出最衷心的祝愿。

那时，我国已有75万公民参加体育运动。我国的体育正在沿着真正的人民体育运动向前发展。当然也还要解决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代表权问题。

民主德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1951年4月22日在柏林成立。委员会章程强调其任务是：“本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人德·古拜丹男爵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通过体育竞赛，教育青年重视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并为民主德国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作准备。”

然而，这却成了最大的难题。起初，国际奥委会中的多数人借口只允许一个德国代表队参加比赛，把民主德国运动员拒之门外，实际上他们执行的是联邦德国政府的单独代表权。此后多年，这些人又采取种种手段阻挠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某些人特别不愿意让我国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民主德国的国旗和国歌。众所周知，几十年来，所有国家的运动员都是用本国国旗和国歌参加国际比赛的。当时，某些人（主要来自北约国家）以为用这种歧视性作法就能阻挠对民主德国的国际承认。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最后达成了妥协，从1956年至1964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组成联合代表队，用中性的标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但是，我们当时已与许多国家有密切的体育交流。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48年创办从华沙到布拉格的业余自行车分段赛。1952年，我们应邀作为第三个举办国参加该项比赛。从此，每年五月世界上最优秀的业余自行车运动员到这里参加比赛，数以百万计的人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比赛，形成了和平自行车赛。

我曾多次以民主德国的名义接见参加这一比赛的运动员。我很乐意到他们中间去，我一向钦佩他们的自制力和拚搏精神。1957年我在格尔利茨一家机器制造厂的俱乐部接见他们。比利时教练、曾两次获得法国专业自行车大奖赛的西尔弗·梅斯热情地

感谢比赛的组织工作和盛情款待。

马格德堡的古斯塔夫·阿道夫·舒尔因为在自行车赛中取得出色成绩，成了我国最著名的运动员。迄今，他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另外，多年来他在人民议院和我同属一个议会党团，我们先在青年联盟议会党团，后来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共事。

如前所述，五十年代末我在中央书记处主管党的青年和体育工作。由于这一原因，我同青年和体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个人交往。

1957年4月底，德意志体育运动联合会在柏林成立，从而在德意志体育运动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在民主德国成立这样一个全面统一的体育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个新组织已拥有100多万会员。

我代表党中央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转达了我们党对运动员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深信，随着这个联合会的成立，我国运动员能够更有效地参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社会主义体育的进一步发展。联合会章程中说，德意志体育运动联合会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运动员的组织，它最首要任务是争取全体人民、尤其是青年参加体育锻炼和各项体育运动，促进全面地培养和造就健康的、热爱生活的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的关键是保障居民各阶层参加体育运动和体育组织的领导。我还特别强调进一步发展青年和儿童体育活动。

1960年，当我们在庆祝青年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总结过去的成绩时，我们能够列举大量有说服力的事实：我们有19,000个运动场，莱比锡建了一个可容纳10万观众的体育场，柏林还有一个体育馆，罗斯托克有一个室内游泳池，克林根塔尔有一个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滑雪跳台。全国已有130多万人获得了体育纪念章；仅1959年就有420多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民主德国的田径运动员创造了24项世界纪录和28项欧洲纪录；古斯塔夫·阿道夫·舒尔两

次夺得自行车世界冠军；拳击运动员沃尔夫冈·贝伦特夺得了第一枚奥林匹克金牌；吉赛拉·皮尔凯梅耶和克里斯塔·斯图普尼克为我国女子田径运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运动，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和倡议。例如，我们的青年报举办了“奥林匹克聚会”活动，即我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同普通人的会见，和他们比赛，当然不是为了创纪录。不久，数以千计的人以极大的兴趣参加了这一活动。记得1959年6月3日，我也参加了这类活动。中央政治局代表队由乌布利希、瑙曼、维尔纳、另外两个年轻人和我组成，参加排球比赛，仅赛了一局，我们以15：8获胜。

举行大型运动会是我们体育运动的传统，甚至是整个国家的传统。这种运动会不是为了创纪录，而是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成为成千上万群众愉快的节日。

前面提到第一部青年法的成绩，这里还应包括民主德国的一个体育队到美国参加比赛。民主德国运动员1960年在北美斯库谷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当然还是以两个德国联合组队的形式。代表队启程时我们嘱咐说，我们把他们看作和平与谅解的使者，是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国家派出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望他们为发展新的体育关系作出贡献。尽管障碍重重，目标还是实现了。然而，美国当局拒绝民主德国的教练员和记者入境。我国滑雪协会秘书长不得不因此兼任广播记者，报道了我国高山滑雪运动员赫尔姆特·雷克纳格尔荣获奥林匹克奖牌的消息。美国和民主德国两国领导人日益增加的接触，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又经过两届奥运会之后，1968年在墨西哥城举行奥运会时，民主德国第一次派出了单独的代表队。这时正是我国运动员以他们的成绩开始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时候。

某些人声称，我们鼓励“追求奖牌”，借以实现与体育没有多大关系的目的。对此，我想说，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重视体育和娱

乐活动,主要是因为它能吸引人们健康地生活,延年益寿,更不用说参加体育锻炼常常省得去医院。开展体育和娱乐活动还有助于培养一个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所必须的素质。我们组织运动会、青少年运动会以及业余体育和保健体育等,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

从多种体育活动中尖子自然脱颖而出,如若没有广泛的群众体育运动,这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努力攀登体育的高峰,这是很自然的,而且我们全力支持他们。当他们有朝一日在世界冠军赛中或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得胜利时,他们就成为鼓舞他人的榜样。新的一代又被吸引到体育方面来。

总之,竞技性体育、群众性体育和学校系统的体育课,都对提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作出了贡献,为我们在国外赢得了不少好评。我们今后仍将既重视竞技性体育,也重视群众性体育。我们不仅要嘉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也要奖励青少年运动会的夺标者,以及优秀运动员的教练和学校的体育辅导员。

我们终于使体育事业在民主德国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可靠的地位。参加体育锻炼对于我国广大群众来说已成为生活的必需。我们共和国的宪法在这方面有规定,其中提到:为了全面造就社会主义新人,鼓励公民参加体育锻炼。

六十年代我常常会见我国男女运动员,他们向我讲起一些令人气愤的经历。联邦德国政府要求它的北约盟国一律拒绝民主德国运动员入境。这样,我国许多优秀运动员因此不能参加世界冠军赛。显然,他们在这里荒谬地把体育当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当时,民主德国的国旗在联邦德国和所有北约国家也被作为禁物,遭警察追究。在美因茨,曾出动50名警察对付我们的7名女运动员,强令她们交出随身携带的民主德国国旗。但是,所有这些阴谋诡计(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几十个)都无法阻挡民主德国体育事业的兴起。

正因为如此,任何人都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欢迎参加奥林

匹克运动会、世界锦标赛和欧洲锦标赛胜利归来的代表队时总是特别高兴。大家知道，1976年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上，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员第一次夺得了半数以上的奖牌，一半以上的总分。比赛结束以后，我们把民主德国代表队全体成员请到共和国宫，当然也请了没有获得奖牌的男女运动员、教练员、赛艇制造人员、护理人员 and 医生及其配偶。我感谢他们取得的成绩，并告诉他们，在我国，作为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序幕，约有98,000名青少年参加了青少年运动会，有数千名公民参加了体操表演。

此外，我们还邀请青少年运动会的优胜者参加共和国宫这次盛会，以体现群众性体育和竞技性体育的紧密联系。青少年运动会早已成为传统悠久的体育活动。我国所有县每年举办一次青少年运动会，开幕式常常是高潮。每两年全国各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到首都柏林或到节日之城莱比锡参加大型青少年运动会。莱比锡运动会同样富有传统。青少年冬季体育项目运动会在我国冬季体育活动中心举行。

我们以多种方式表达我们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卓越功绩的敬意。他们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生活，为民主德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在庆祝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时，体育联合会已有300多万名会员。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同运动员、教练员、辅导员以及体育干部围坐一起，回顾我们走过的历程。这次会见，是我同运动员接触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我们谈到起步时的艰难。对这一段，年纪比较小的人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过。回顾当年，使人油然想起苏联教练员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迈开步子，走上世界舞台。现在我们可以说，当年的“学徒”如今在许多体育项目上已成为“师傅”。目前，民主德国的教练员在许多国家帮助工作。来自许多国家，主要是非洲和亚洲的教练员和大学生在莱比锡体育学院深造，掌握体育科学的新知识。

常常有人问我是否参加体育锻炼，爱哪种运动。这个问题三

言两语讲不清。青年时期我是器械体操运动员，坚持锻炼，也喜欢玩手球。就是今天我仍然喜欢器械体操，但是，我现在除每日做操之外极少从事室外运动。我还喜欢打猎。

第十九章

为青年开辟新天地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 30 周年前夕，新的“恩斯特·台尔曼”少年宫在柏林的武尔海德落成。这是赠给我国少年儿童的一件美好的礼物。早在 1950 年，当我们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将第一座大型设施——“恩斯特·台尔曼”少年公园交给柏林少年儿童时我也在场。两年之后，即 1952 年 7 月，“威廉·皮克”少年城在绍尔夫海德的魏贝林湖畔揭幕，我们的总统出席了揭幕式。从此之后，每年来自我国各地区的少年儿童和国外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欢度丰富多采的假日。

今天，我能在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参加新的少年宫的落成自然感到高兴。看到孩子们以何等的兴奋和娴熟的接受这座少年宫，是美好的。这个少年宫为孩子们提供了安排自己时间的充分可能性。这里可以游戏、跳舞、唱歌和参加体育活动，可以排练话剧，模拟宇航，做物理和化学实验，养鱼或者制作飞机模型。

这一天，我思绪万千，想起我的童年和少年。我历来关心教育。往昔，我们这些无产者的子女强烈地感到，资产阶级的学校主要是为企业主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服务的。这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也认为工人子弟一般只能读完小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读文科中学甚至上大学，受这类更高的教育，社会情况和父亲的钱包都不允许。一般学校只传授给我们这些未来的劳工最起码的知识，使我们达到能为富人增加财富的程度。他们用各种方法，也常用“令人信服的道理”向我们灌输，让我们相信现有制度是

永恒的。为什么这种方法对我不灵，想必读者已经清楚。

我总算读完了八年制义务小学。尽管“德意志帝国”早已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但是从1918年至1945年并非在德国所有地区都已实现。我受的学校教育之所以还比较扎实，要归功于几位诲人不倦的老师，他们尽力让我们学有所得。特别要归功于我的父母，他们传给我许多知识和经验；也要归功于我们在少年斯巴达克同盟所得到的锻炼。

这和富家子弟所受的教育截然不同。对他们而言，不存在任何社会或经济障碍。他们读完四年制义务小学之后，如果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进了私人学校的话，就可以进入所谓更高一级的学校。高级文科中学毕业后，就取得了上大学的资格。大学和高等学校几乎完全是为这些富家子弟开办的。他们就在那里为步入上层社会、攫取高官要职作准备。

我自己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感觉到某些理论的伪科学性，譬如反动的“天才论”，它灌输说，只有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才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对于这一点我后来认识得反而更加深刻。在资产阶级的企业里和国家机器中人事政策也是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工农子女，除个别人外，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统治阶层牢牢地垄断了教育。

我在波美拉尼亚期间了解到，垄断教育的情况在农村更严重。虽然名义上是八年制义务教育，但很多村里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和一名教师。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由一个教师教。而庄园主可以根据农活情况决定什么时间上课，什么时候让学生到田里干活。梅克伦堡一个大地主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我只需要犁前一头四条腿的牛，犁后一头两条腿的牛。

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内，我们始终把教育问题看作我们反对剥削和压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整个政治斗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整个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依靠进步的教育思想办学，即对全体人民

的子女实行统一的科学的教育，在此基础上使人得到全面和均衡的发展。事实证明，德国革命的工人运动，在教育方面，也继承了德意志人民历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一切进步的遗产。

纳粹统治使所有教育机构服从于那个最反动、最具有侵略性和最反人道的制度。解放后，当我们共产党人开始工作时，在教育政策上也面临着非常困难的问题。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野蛮思想的长期影响，在青少年身上留下了灾难性的痕迹。困难还不限于此，还有纳粹政权仇视文化和教育的政策以及战争在所有教育机构中引起的一片混乱。1945年春，教育停了，没有教科书，没有作业本，没有文具。更严重的是，大多数教师都曾经是活跃的纳粹分子，宣传过法西斯思想，或为它辩护过。因而，这些人将来不宜再从事教育工作。

为了使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能恢复工作，至少为孩子们的学习创造最起码的条件，必须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方案，这个方案是1944年威廉·皮克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制定的。前面已经多次提到1945年6月11日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呼吁书也提到了教育方面的任务：“从整个教育方面消除法西斯和反动的垃圾。在所有学校和教育机构中发扬真正的民主、进步和自由思想。”

粉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剥夺大资产阶级的权力、实行民主土地改革和建立民主的行政管理机构，所有这些革命措施都是顺利实行反法西斯的民主教育改革的前提。这一改革是德国教育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变化。

1946年年中，苏占区各州和省管理机构都通过了学校民主化法律。这些法律在德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确定的教育目的是：“使青年从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用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思想和真正的民主精神教育他们致力于人道事业。”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波茨坦协定的要求，形成了一个新的统一的教育体制。这是国家办的非宗教性的八年制义务学校，然后是四年高中教育，以

取得上高等学校的资格；还对青年进行二至三年的职业教育。

1945年至1946年期间，曾为法西斯政权效劳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80%——须调离教育岗位。他们可以从事其它职业，其中部分人，几年后返回教育岗位。

必须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新教师。他们必须全心全意献身教育事业，用反法西斯精神教育年轻一代。早在1945至1946学年，就有15,000名“新教师”（当时是这样称呼的）走上了教育岗位；1946至1947学年又有25,000名“新教师”加入了这个队伍。他们属于第一批反法西斯的民主的新知识分子，后来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任教之余，他们还在夜校和函授大学里勤奋地进修。他们中间许多人如今已经是最有经验的校长、教育委员、党的干部、教育家。记得当时青年联盟曾派许多团员参加过教师培训。

在农村，通过将分散的学校合并为中心小学以及派新教师，提高了农村小学的教育质量，逐步接近城市小学的水平。

小学从五年级开始，设地理、历史、生物、化学、物理、数学、文学专业课及一门外语课——俄语。这在德国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中最有价值的作品，如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克罗卜史托克、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马斯和亨利希·曼兄弟、安娜·西格斯、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布莱希特、约翰内斯·罗·贝希尔、奥斯特洛夫斯基、高尔基、肖霍洛夫等人的名著成了普通的教材（在此之前，这些内容对劳动人民的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它们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建立统一的学校，给工农子弟及青年劳动者提供机会，使他们取得入大学的资格，是打破教育特权和实现青年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决定性步骤。

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克服了许多物质困难、犹豫观望和落后观念，终于成功地实现了1848年以来革命工人运动以及在此之前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们提出的教育为大家的主要要求：即教育国

家办、世俗办、统一办；教育思想科学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化。

每当我回首往事，扪心自问，我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错综复杂问题的，我必须指出一点，就是苏联驻德军事管制委员会主管文化教育的军官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他们以其丰富的政治和教育知识及国际主义态度随时向我们提供帮助。他们甚至帮我们搞到印刷第一批新课本的纸张、铅笔、学校修缮急需的建筑材料，或者向失去父母和被遗弃的孩子们提供生活必需品。从战后初期苏联朋友给予我们的支持，到今天民主德国同苏联国民教育部、教育科学院之间在教育政策和教育学方面的积极合作，是一条长期携手共进的道路上。

以往的发展证明我们的教育政策是正确的。我补充说明一点，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她始终关怀着青年一代。我们从一开始就给政治上参加少年先锋队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男女青年以机会，让他们尽可能自己安排生活。我们激励他们积极投身到我国社会革命的变革中去，通过多种方式获取新的知识。威廉·皮克当时曾对少先队员们说：“你们是我国人民的栋梁……谁在学校里学习努力，成绩优异，我们就给他提供机会，使他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成为优秀的技术员和工程师，成为伟大的发明家和革新者。”

30多年前第一次享受教育民主改革成果的青少年，那时候的少先队员和青年团员，如今已是40—50岁的人了，他们都成了国营企业中技术娴熟、政治老练的工人、工程师和设计师，社会主义的农民、农艺师和畜牧专家、在大学和科学院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科学家，以及教师和文艺工作者，还有忘我工作的党政干部和所有保卫我们成就的人。

有些遗老遗少怎样蔑视人民，可以从一个叫哈特纳克的人的自白中看出来。此人曾于1933年至1935年在萨克森担任过国民教育部长。1966年他在西柏林写道：“以为教育能使愚笨变聪明的观点是天大的谬误。还要看到其中的危险，如果人们超出了自己

的理解力,学的东西太多,就会因为囫圇吞枣,消化不良,成为一个糊涂人。”

为什么反动派随时随地反对在教育方面实行机会均等呢?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呢?威廉·李卜克内西 1872 年曾点透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也就是知识。我们逐步地、系统地并且持之以恒地建立起我们的教育体系,并且注意社会的需要和可能。我们总是把有关社会发展的重大决定和教育方面的决定联系起来。在五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基础在民主德国的建立,教育的内容和结构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使青年们能够有力地参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创造性地劳动并享受文明的生活。

我们努力使学校同生活日益密切结合,不断完善教育、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思想。马克思称此为“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唯一方法”。随着发展,作为基础教育的八年制教育已不能适应需要。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们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一再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胜利,民主德国的社会进一步发展了。因而,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发展教育事业,使之适应正在建设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

我们的教育事业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基础。第一批十年制的学校已经办起来,取代了八年制学校。增开了综合技术课,发展了多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从 1958 年起,七至十年级的学生每周在社会主义的工农企业中劳动、学习一天。这样,他们既了解了高级科学知识对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也能把他们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多种职业活动展现在他们面前,有助于他们选择未来的职业。此外,他们还可以熟悉科技的和经济的基本问题,扩大他们的政治和精神视野。

在职业教育方面,通过开办国营企业职业学校,为培养合格的技术工人创造了新的条件。这类学校把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需要,扩大了中等技术学校。

在大学和高等院校中，由于我们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课，并从内容和组织方面作了调整，教育的科学水平提高了。

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对迄今发展教育过程中所取得的结果、认识和经验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项全面的新教育法草案供讨论。几百万群众参加了讨论，提出了数千条建议，许多建议被采纳。民主德国人民议院 1965 年在群众性民主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法”。这一法律至今仍然是我们教育工作的重要基础。它涉及所有国家和社会的教育单位，力求保持它们的统一性和连续性，着眼于培养全面和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材。

按照新的教育法，我国教育是这样组织的：1—3 周岁的幼儿有托儿所；3—6 周岁有幼儿园；然后进十年制学校，十年制义务教育是教育的基础。现在十年制教育普及率达 90%。十年制学校毕业后，约 85% 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通过二至三年的学习，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另约 15% 的十年制毕业生进入高中，毕业后到大学就读。我的两个女儿也经过了这一教育途径。索尼娅毕业于德累斯顿工学院，现在是自控技术和自动化技术助理工程师。爱莉卡就读于哈雷—维滕贝格的马丁·路德大学，现在是法学士。在劳动中经受过考验的青年技术工人可以到专科学校进修。总之，各个社会方面都有各自的进修途径。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都有厂办学校和类似的教育组织，有一定学历的劳动者经过一定的实践后，可以在那里深造。

今天教育法关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的要求已经基本实现。教育内容已经提高到科学知识的最新水平。所有青少年不仅有权利、而且也有可能进十年制综合技术学校，这类学校现在是普及的义务学校。十年普及教育后，接受两年职业培训，走上工作岗位，这是我国青少年正常的自然的发展道路。

如果一个教育体制不考虑那些因身体或智力缺陷不能接受正常教育的儿童，那么这个教育体制就是不完备的。因此，我们拨出了大量经费，开办特别学校，配备了一大批受过特殊训练的教

师，使聋哑儿童和弱智儿童得到教育和医疗护理。我们现已能把所有这类儿童送进学校，并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接近正常学校的教育。我们对此感到自豪。此外，我们还有专门的儿童之家，照料失去父母或被家庭遗弃的儿童。

总而言之，我们的教育体制从内容和结构上能保障所有正常、健康的儿童全部完成其学业，不会半途而废。我国通过向青年提供物质帮助和奖学金，通过种种福利设施（例如寄宿学校）保证做到这一点。

我们是怎样鼓励天才和尖子的呢？我们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凡身体健康和智力正常的儿童均能顺利地通过十年制学校和职业学校以及进入其他学校深造。我们看到，基于我国普及教育大纲的要求很高，凡有才华和天资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促进他们的成长，学校、少先队和青年联盟还成立了许多校外活动小组。青少年可以在那里发展他们的爱好和兴趣。第九、十年的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在自愿的基础上每周抽几小时选学一门课程。在各县、专区乃至全国范围内，国民教育机构和青年团一起在学校组织科学和文艺竞赛，如数学、物理、化学和外语比赛，绘画展览，绘画比赛，合唱和器乐竞赛等。每年都有上百万青少年参加这类活动；参加数学竞赛和绘画展览的甚至达数百万人。此外，我们还为在数学、体育、音乐和舞蹈方面有特别才能的尖子开办了一系列专门学校。

任何教育制度都从属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教育史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也不讳言。我们在教育机构讲授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基础是马列主义。我们教育青年好好学习，扩充知识，勤奋工作，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在各自岗位上热情满怀和奋发有为地投入今天的革命斗争。

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企业相互配合，使绝大多数十年制学校的毕业生觉得毕业后进职业学校学习一种职业是完全正常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懂得，他们会满意自己的职

业,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保障的。以1978年为例,凡未进入更高级学校的,99%的十年制毕业生参加了职业培训。

由于30年来国家、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企业的培训,我国劳动人民的素质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取得技工资格的劳动者已超过60%。90%的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干部是1945年以后培养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由1961年的21.8%,增加到1978年的63.2%。同期,劳动人民中有专科学历的由39%,增至115.2%。我认为,这个成绩在国际上也是不算差的。

我们发展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和劳动人民,尤其是和学生的父母共同做出的。在教育民主改革的岁月里,作为“新教育之友”的进步家长总是给我们以帮助。1951年以来,每年都有数十万学生家长在家长大会上被选进全校的家长委员会和班级家长代表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我们意识到,人们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今后还需要更好地贯彻。对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关怀儿童的幸福,保障他们健康地全面发展,是全社会的事情,是社会人道主义性质的体现。爱护儿童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

1978年10月,民主德国召开第八届教育会议,会上国民教育部长玛戈特·昂纳克作了题为“我们学校的社会使命”的报告。会议提出:自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以来,学校新增教师68,000人;三分之一的校舍是新建的;在同一时期内,政府仅为现代化教育设备一项就提供了12亿马克经费。作为进一步深造的基础的全面普及教育和扎实的知识才能,对生产劳动、积极参加社会的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发挥人的创造性的必备前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扩大十年制普通综合技术学校的教育内容,重视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换言之,就是重视培养有知识的、政治上坚定的、积极献身社会的人。归根结蒂,今天正在受教育的这一代人,将在他们的华年继续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我国青年将继承我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曾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事业。他们将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进。我历来致力于为他们打开这条通道，同青年们一起铺平这条道路，和他们一同前进。

往昔的岁月是艰苦奋斗的岁月，教育也不例外。所有参加这一段教育工作的人们，如果他们和孩子们在一起，就会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感到幸福。

当1979年10月3日少年宫竣工时，我也感到幸福。我们可以对孩子们说：我们建设了一个社会主义祖国，我国人民和孩子们终于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里过上了合乎人的尊严的生活。

第二十章

担任党的最高职务

1971年5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六次中央全会一致选举我为党的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请求免去他的第一书记职务，因为他的高龄和他对中央委员会、全党和人民肩负的重任不允许他继续担任第一书记的工作。

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我在党的队伍里已经战斗了四十多个春秋，她是我全部生活的内容和意义。现在工人阶级的党委任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这是对我的巨大信任，这一决定使我深为感动。早在青年时期，我就在台尔曼的党的行列中战斗，经历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艰苦磨练，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呆了十年；1946年3月我担任德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联合党代会（指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民党联合组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那次党代会——译者）以来我历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执委会成员和中央委员；1950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8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委员会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20多年的工作对我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曾在威廉·皮克、奥托·格罗提渥、瓦尔特·乌布利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布鲁诺·洛伊施纳、赫尔曼·马特恩、海因里希·劳、赫伯特·瓦恩克等同志身边工作。在党的领导集体中，我担任过各种职务，为我肩负我党这一最高职务作了全面的准备。

自从德国共产党组成台尔曼式的中央委员会以来，始终保持着党统一的和有连续性的领导，这对德意志工人阶级和民主德国

人民是极大的幸运。我清醒地意识到新职务赋予我的重大责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稳定的、经过考验的集体领导，是我们党中央和全党能够胜任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向我们提出的更高要求的保障。

七十年代初，我们党正面临重大决断。发展中的新问题业已成熟，有待解决。必须根据这种情况决定统一社会党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方向，决定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和道路。

我们谈到党的领导，主要是指由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她的任务是，在两次党代会之间领导党的整个工作，组织决议的实施。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76年5月18日至22日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旁新建的共和国宫举行，选出中央委员145名，候补中央委员5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30名，候补委员6名。以总书记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有义务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定期审查党的机关和组织工作、审查有关建议、提案和批评信件及党的财务工作。中央监委选举库尔特·赛布特为主席。

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由政治局负责中央全会休会期间的政治领导工作，研究党和国家内外事务的一切重大原则问题、国民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其它方面的重大问题。党的这个集体领导机构包括了为作出正确决策需要参加的人士、国家机关和重要社会组织的代表。

1976年5月22日，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由19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组成。这个机构包括不同年龄的有经验的政治家，其中委员有：赫尔曼·阿克森、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维尔纳·费尔弗、格哈德·格吕纳贝格、库尔特·哈格、海因茨·霍夫曼、埃里希·昂纳克、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维尔纳·兰贝茨、埃里希·米尔克、京特·米塔克、埃里希·米肯贝格尔、康拉德·瑞曼、阿尔

弗雷德·诺伊曼、阿尔贝特·诺登、霍斯特·辛德曼、维利·斯多夫、哈里·蒂施、保尔·维尔纳。候补委员有：霍斯特·多卢斯、约阿希姆·赫尔曼、维尔纳·雅罗文斯基、京特·克莱伯、埃贡·克伦茨、英格·朗格、马格丽特·米勒、格哈德·许雷尔、维尔纳·瓦尔德。

这些同志中，有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在德共或社民党内参加政治活动、后来又参加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甚至为此被关进法西斯监狱和集中营的老同志。同时也有比较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在1945年5月解放以后，在社会改造中经受了革命洗礼，今天在工会或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居于领导岗位，或在党内、国家机关及社会其它方面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

1976年5月22日，统一社会党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书记处，领导日常工作，主要是贯彻和监督党的决议的实施，以及选拔干部。书记处成员有：赫尔曼·阿克森、霍斯特·多卢斯、格哈德·格吕纳贝格、库尔特·哈格、约阿希姆·赫尔曼、埃里希·昂纳克、维尔纳·雅罗文斯基、维尔纳·克罗利科夫斯基、维尔纳·兰贝茨、英格·朗格、阿尔贝特·诺登、保尔·维尔纳。

在政治局内，对一切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进行坦率的、同志式的和实事求是的讨论。讨论中摆出各种考虑和经验，以便为集体决议取得共同立场。

1970年政治局反复讨论经济问题。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一系列国民经济计划外的任务不得不下马，因为事实证明这些任务不现实，如果继续下去，势必严重地阻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保证按比例发展。必须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依靠人的，也是为了人的，物质生产是社会财富的基础。

当时，为改进党在社会各个领域内的工作，我们作了许多努力。在一系列党员大会上和我同许多工人的个别交谈中，讨论了许多有利于改进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指正。这一切都是为了巩固

统一社会党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紧密关系。

1970年12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四次中央全会上我提出，党的力量主要表现在：每个党员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党的集体中对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什么贡献。我们按照列宁的原则行事，党决不怕面对现实。我们特别强调，党的政策的中心是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发展人的个性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我们为1971年6月第八届党代会通过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党的八大开辟了民主德国历史的新阶段。

在筹备党的八大时，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已经取得的良好成果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中更坚定地确立和体现社会主义为人民谋福利的思想。我们当然清楚，即使经济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愿望和要求。因此，必须权衡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目标，使拥有的手段和国民经济可能的增长协调起来。

据此，统一社会党第八届党代会决定，把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作为主要任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发展，效益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此创造前提。

我们七十年代计划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落后。只有如此，社会关系和人的才能才会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为人们创造更好的可能性，也才能使人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尽人皆知，生活只有面包不行，然而没有面包就无法生活。我们不仅必须保障并进一步改善物质供应，而且还应满足不断增长的教育和文化需要。为此，制定了一项广泛的社会政策纲领。它的核心是住宅建设，这一点我还要详细叙述。我们制订措施，进一步改善居民的供应，并且保持我国20多年来基本生活用品、服务费、交通费和房租不变。我们尤其关心逐步改善企业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减少还不得不在艰苦条件下劳动的人数，到1980年已减少了25—30%，完善了工人的社会福利，加强了劳动医疗保护。

民主德国公民货币纯收入每年提高4%。国家财政中的社会

基金开支不断增加,主要用于扩大住房建筑;稳定消费物价、公用事业费和房租;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用于疗养、文化和体育事业。其他的措施是: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和伤残保险金;延长所有劳动者的基本假期、倒班工人的假期、产前和产后假;逐步实行40小时工作周。这一切对民主德国所有居民的生活状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简而言之,我们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种年龄的人都从中受益。

我们认为,对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言,经济政策的基本着眼点应该是,在经济长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既保证在短期内、也保证在长期内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随着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要自然也会相应地提高,要求也会多种多样。根据经验,只有绝大多数人支持我们的政策,全心全意地去贯彻这个政策,我们才能解决好这类问题。

党的八大代表再次选举我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这次党代会的政策在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在工厂和居民区参加讨论和收到的信件都表明,人们完全理解劳动成果对个人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归根结蒂,每个人生产成绩的好坏决定着消费的多少。

劳动人民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积极态度以及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果实属于劳动者自己,这对我们取得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的计划和目标能否变为现实,主要取决于群众对领导和计划的态度,和他们日常的积极性。我们认为,千百万人的觉悟是社会主义社会强大的生命力所在。我们的最大愿望是和大家共同努力,为了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民的力量就没有一切!我从自己切身的经验证明,工会、青年组织和作为技术知识界的科技协会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在这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

1972年初，在莱比锡专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已经看出，我们的经济正沿着党的八大路线顺利发展。我们的计划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推动力量，这种力量是来自经济的客观现实和我们的实际可能，生产继续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快经济增长的条件已经改善。在此基础上，党和国家的领导能够为进一步实现社会政治纲领提前采取影响深远的措施。在我的领导下，统一社会党中央、自由工会联合会全国理事会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关键问题是扩大社会主义工业、加速企业现代化和设备更新。必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并且最大限度地提高利用率。首先是增加化工、机器制造、特别是电气和电子及轻工业的生产能力。

七十年代前半期工业生产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各工业部门日益集约化的结果。我们把生产集约化看作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使工业固定资产现代化、更新和扩大。在1971年至197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对40%的工业设备进行了改造，设备的自动化程度由1970年的33%提高到1975年的42%。使科学技术更好地为集约化出力。在工业方面，首先表现在新产品和新工艺、发展和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大大节约原材料和提高产品质量。金属加工工业1975年一半的产值是通过1971年至1975年五年计划期间新设计和新研制的产品取得的。

我想强调说明，我们同苏联和经互会其它国家科技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的集约化意义不小。在科研和生产方面，民主德国参加了500项专业化协作合同和协议，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建立了一个电子计算技术统一体系。

但是，正如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前进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任何进步都不会不遇到困难和新问题。七十年代后半期我们又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使我回忆起，1974年前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失业人数急剧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下降。即使几年之后生产

出现某种程度高涨的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合理化,失业人数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些国家开始了一个社会动荡时期,世界市场的稳定遭到破坏。货币和财政危机又火上加油。能源和重要原料价格上涨速度令人吃惊。

在此,我想指出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民主德国的经济虽然高度发达,然而她是一个小国,对外经济联系极为密切。我们对外贸易的大部分当然是和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和苏联进行的。然而1971年以来,由于政治缓和,我们与西方工业国的经济交往也迅速增加。正因为如此,世界市场上的消极变化,对我们的经济影响更大,无论出口或进口都是如此。这种情况说明,必须加紧开发本国原料和能源资源。显而易见,世界市场的状况不佳,如不努力扩大本国能源和原料基础,就势必加重国民经济的负担。

我们再一次仔细研究了形势,党中央和政府为进一步改变国民经济结构、投资活动和进出口战略做出了决策。总的结论是:经济上继续执行我们的充分就业、全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方针。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能够克服困难,并通过提高生产实现预期的目标。显然,这不会象在林中漫步那样轻松愉快。

1975年中,当统一社会党中央筹备党的九大时,情况已经清楚,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一致的方针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已经结出了硕果。

劳动人民越来越高的积极性使党的八大决议得以完全实现。这使我深为满意。1975年民主德国的国民收入比1970年增加了30%,工业品生产增长了37%,对外贸易额增长了88%。所有这些都为大幅度提高人民的实际收入、为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创造了条件。

这些成就不仅向我们提出了下一步的发展问题,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就长期的社会发展作出规划。我们在政治局里深入地讨论

了这个问题。讨论的重点是如何突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和标准，以及重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我们必须把科技革命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鉴于新的社会发展问题已然成熟，我们认为需要制定一个新的党纲。为此，组成了一个由我主持的党纲起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各方面人士参与下，完成了一项重大工作。我们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普遍的、经过考验的有效原则运用于民主德国的具体条件，同时把当前和将来的任务结合起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借鉴兄弟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在回答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时，自然对社会政策方面的任务也需给予应有的重视。

即使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用行之有效的作法，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都拿出来和劳动人民商量。统一社会党纲领草案、关于民主德国 1976 年至 1980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指标以及党章，都交给党员和全体人民讨论。讨论中提出了上千条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件得到有益的补充和完善。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党的纲领是全体人民的作品。

1976年5月，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九大上不无根据地指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在民主德国的深入发展，将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根本前提。从已经达到的先进发展水平出发，我受党中央委托，建议继续执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一致的方针。同时，我又提请注意，经济和社会方面更高的新目标要求我国国民经济的更高增长。

九大一致通过的这一政治方针意味着八大政策的继续。我们一方面有意识地坚持那些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制订有利于我们继续前进的新政策。我们政策的最高准则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工人和所有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在社会主义与和平中的全体人民的幸福。

党代会一致通过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纲和其它文件。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定，这是管一个时期的方针，它将指导今后若干个五年计划。这样，民主德国有了一个明确的、可靠的前景。

我把当选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看作党对我的极大信任，同时也看作一项光荣的义务。我将不遗余力去贯彻党代会所确定的政策。我们的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向我们党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我们共和国建国30周年之际，我看到，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一条深刻的革命变革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是名符其实地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这是一条艰苦奋斗、不无牺牲的道路，是同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激烈斗争的道路。许多困难需要克服，许多新问题需要解决，有时又不得不忍受暂时的困难。然而，在德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象我们工农国家这样，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社会财富之源正在打开，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用于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福利。这一切在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一时期是民主德国历史上最有成效的时期。

我深信，鉴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在和平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乐观地展望未来。毫无疑问，八十年代的任务不会轻松，经济领域尤其如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将永远持续增长，因为我们的社会既需要质的提高，也需要量的增长，这样才能实现我们社会的目标。反过来，我们的社会不断有效地利用资源，而又不破坏自然环境，所以它能够保证经济增长。

我不愿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少矛盾需要解决。我们决不能把完成任务和完成任务的途径预想得比实际情况轻松。今后也同样如此。

资本主义世界的来访者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正为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大伤脑筋的时候，你们却能宣布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社会安定，诀窍在哪里？”是的，我们不仅宣布、而且

实现了这一点。答案在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在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于劳动人民由此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例如，合理化对我国公民来说也是一个熟悉的概念，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积极参与合理化，因为他们懂得，合理化可以增加劳动效益，改善劳动条件。合理化会带来失业，会使人丧失工作机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总之，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对于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这种现象也许是典型的。而我们生活在另一种制度下。我们这里没有人为劳动权、首先是就业担忧。因为有宪法保障，同时也是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提出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它已成为我国确定不移的社会现实。

在物价上涨的世界经济中，我国当然不是一个“孤岛”。但是，我们把保持居民的基本食品价格、日用生活品价格、服务费用、交通费用和房租的稳定，看作维护社会安定的因素。我们认为，通过提高物价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劳动人民的巨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解决。我们想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确保我们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并进而使之逐步提高。在这方面的前提是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盟，在各个领域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

在我谈了社会保障之后，还想说明一点。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所理解的人的受教育权、在工作和业余劳动中的创造性劳动也离不开免费医疗、充分的养老保险以及符合人的尊严的居住条件。

第二十一章

跻身于世界发达工业国家之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人口 1,675.6 万人,面积 108,177 平方公里。从我国最南端的巴特勒拉姆巴赫至北端的阿尔科纳角航程约 1,000 公里,乘飞机一小时就能纵贯南北。东西最大距离 600 公里左右,三刻钟即可飞越。因此,无论在欧洲或是全世界,我国都不算大国。然而,以工业生产规模、结构和质量而论,民主德国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十强之一。按主要食品,如猪肉的人均消费量,我国居世界第 14 位,蔬菜消费量居第 9 位;从穿着看,皮鞋人均占有量居第 8 位;人均占有电视机居第 5 位;从卫生角度看,每千人拥有医生数占世界第 12 位,病床数占第 11 位;幼儿和儿童入托率居世界之首。我国国民平均寿命同样名列世界前茅,据 1978 年统计,男性平均寿命 68.8 岁,女性 74.7 岁。

当然有限的几个数据远远不能反映我们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方面所达到的广泛程度,也不能反映这一切对人的全部含义。例如,人们享有的高度教育水平、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社会保障和光明前途。世界上许多人梦寐以求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对无数人来说,这只能是一个梦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却变成了现实。

民主德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速度也为世界瞩目。1946年,民主德国地区的工业生产总产值只及 1936 年的 42.1%;1949 年为战前的 87.6%。而从 1946 年至 1979 年的 30 多年里,工业生产总产值增长了 22 倍。如果 1949 年一个劳动日工业产值按一亿马克计算,则 1979 年已超过 10 多亿马克,是 1949 年的 10 倍多。民主德国的人

口仅为当时全“德意志帝国”人口(1936年)的四分之一，而工业生产几乎是当时的二倍半。

民主德国农业的发展同样可观。以牲畜存栏数为例，1938年有牛370万头，1946年仅剩280万头，1949年增至330万头，1960年460万头，1970年为520万头，1979年为560万头。1938年有猪570万头，1946年仅200万头，1949年430万头，1960年830万头，1970年将近970万头，1979年达1,210万头。再以每公顷粮食单产看，1934年至1938年，年平均2.1吨，1946年1.5吨，1949年1.81吨，1960年2.75吨，1970年2.82吨，1978年3.86吨，1979年由于天公不作美，加之由此带来的农业技术问题，减为3.6吨。

从这些实实在在的數字中可以看出，我国人民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此外，我国100%的工业生产和97%的农业生产是由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这也是显著的标志。

我们特别重视国民收入。它能反映人的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新产值。民主德国1979年国民收入绝对值已达1,666亿马克，是1949年的7.4倍。在过去10年中，我国国民收入共计14,000多亿马克，正好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仅在最近八年中，我国国民收入就增长了47%。

国民经济的其它方面，即消费额和投资额都来源于国民收入。由于国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居民人均月纯收入从1970年至1979年提高了58%。因为我国没有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人民生活状况的实际改善。这也表现在同一时期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以及人均商品零售额增长了50%。

1979年，我国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为512亿马克，而1970年为344亿马克，1949年仅29亿马克。1979年，仅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就达2,890亿马克，整个国民经济的固定资产总值为6,860亿马克。这是我国人民财产的重要部分。

在此巩固的物质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的能力。综合性的数字还不能说明一切，例如还必须指出，1979年工业品生产

总值达 3,506 亿马克（按当时价格计算），而且工业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其趋势是优先发展对科技进步有决定性影响的工业部门。若将 1970 年的工业生产定为 100%，则 1979 年电子工业增至 294%，化纤及塑料工业各增至 221%，机床制造业增至 222%，农业机械制造增至 217%。在此期间，工业生产平均增长了 166%。我们不仅重视扩大物质技术基础的量，而且也重视从质上改变它的结构。

1970 年以来，国民收入新增部分的 94%——绝大部分——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仅工业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 50%。创造 100 万马克的国民收入，1970 年需要 61 个就业者，到 1979 年仅需 42 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不断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我们看到，首先要把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能源及原材料消耗降下来。以 1970 年为 100，1971 年至 1979 年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已降至 76%，冶金工业中的轧钢甚至降至 64%。现在原料价格飞涨，因而降低消耗的趋势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提高效益，我们有意识地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根据经济学家的分析，1979 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90% 是依靠科学技术取得的，而 1975 年科技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只占 55%。由于我国劳动力的状况，我们清楚地看到，今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必须高于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

仅 1976 年至 1979 年，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业中就有 88 万个劳动岗位得到改善。这样，工业部门中劳动条件繁重的工作岗位由 1975 年的 25.7% 降至 1979 年的 20.1%。

提高劳动效益和劳动质量的途径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能把劳动能力与物质潜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取得明显的经济效果。众所周知，今天经济增长提高 1% 要比 10 年前困难得多。1% 的国民收入 1980 年是 16 亿马克，而 1970 年只略多于 10 亿马克。在物质生产提高的同时，必须不断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意义就更为重要。

这和我国的对外贸易有直接关系。1949 年民主德国外贸额为

27亿外汇马克(按当时价格),1979年达到1,088亿外汇马克,相当于1949年的40倍。应该考虑到,我国是一个以加工工业为主的国家。

对外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对我国国民经济产生巨大推动力。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占我国1979年外贸总额的68.8%,其中苏联占36.1%。由于这种贸易的社会主义性质,对我们是极为有利的。

纵观民主德国今天的经济,清楚地表明,数十年来经济力量已有巨大增长,七十年代以来更是如此。在这方面,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则是坚实的基础——而且长期以来就是唯一的生产基础。生产关系不断完善,达到了先进的水平。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建立起来,它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业部门,而且还有我国过去所没有的工业部门。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规模宏大的物质生产基础。他们是新的生产力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综合上述各项事实和数字,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我国的经济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活力。不管怎么说,例如资本主义的德意志国家联邦德国,它在七十年代就一直未能摆脱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经济能力未能充分利用,几年来,它的失业人数一直徘徊在百万人左右。几十万青年找不到职业。这在我们看来(也不仅是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脆弱性。

民主德国的经济成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我们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是充满了困难和牺牲的。从我们共和国的历史可以看出,工人阶级一旦打碎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枷锁,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同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结成联盟,能发挥出何等巨大的创造力。

众所周知,今天属于民主德国的地区,受战争的直接破坏比西德要严重得多。45%左右的工业,甚至70%的机器制造业成了废墟(德国西部地区只有20%遭破坏)。电力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每天只能供应几小时。5,000座铁路桥和4,500座公路桥全部遭破坏。

生产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起步的，因为当时既缺乏机器、能源、原料，也缺乏燃料和其它物资。

肆意割裂前“德意志帝国”范围内有机的经济联系，使我们本来就不利的条件更加困难，从而出现了比例失调。历史上，德国就存在工业化程度和生产率水平的东西差距。今天属于民主德国的这一地区，1936年占整个德国面积的30.4%，工业生产却只占17.9%，远远低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国家分裂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有待克服。首先是工业缺乏重要的原料基地，机器制造业又残缺不全。

十多年前，即1967年4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七大上，我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掉换一下，1945年德国东部地区有120座高炉，而西部地区只有4座，那么资本家先生们会是什么样子呢？同样，如果我们拥有93%的冶金工业，而他们只有7%，资本家先生们又该如何呢？

今天，民主德国跻身于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十强之一，主要不是因为从前的德国是一个工业国。人们知道，恰恰是西边常常散布这种论点。然而，事实真相却是，我们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苏联朋友的大力支援下，清除了二次大战的废墟，克服了贫困和混乱，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工业建设更是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民主德国的敌人千方百计阻挠我们的工业建设。在别的章节中我已经说过，冷战给我们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还有直到1961年前我们与联邦德国和柏林西区的开放边界。1948年，今天的联邦德国地区开始对民主德国实行无情的经济封锁，恣意破坏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引诱我们的劳动力，特别是高水平的专家离开民主德国，收买特务进行经济破坏活动。所有这一切目的都是想整垮民主德国。

一些有声望的西德社会民主党人——如最近去世的经济学家弗里茨·巴德教授，当时就认为，联邦德国通过经济战给民主德国造成的损失，包括民主德国替全德国支付的高达43亿美元的战争

赔款在内,联邦德国在“道义上欠了1,000亿马克的债”。按照我们的计算,1957年至1961年生产上的损失达1,120亿马克。被诱走的劳动力培训费超过160亿马克。

任何稍为客观一点的观察家都可以想象,为了补偿给我国造成的这一巨大损失,需要做出何等的努力!即使在我们同联邦德国和柏林西区的边界采取了安全措施之后,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政策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增长施加的种种影响仍然是明显的。由于蓄意破坏,民主德国尽管作出了努力,但是国民收入1960年至1963年仅增长了不足70亿马克。给我们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1950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的投资总额。如果这笔资金没有被掠夺走,我们就可用它建400万套住房,或者100座各为100万吨生产能力的钢铁厂。

倘若把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的话,还应指出一种情况,与联邦德国不同,我们的成就是在没有剥削外籍工人的条件下取得的。在联邦德国,多年来一直约有200万外籍工人。我国在边界采取安全措施之后,他们无法再从民主德国引诱劳动力,于是外籍工人人数急剧增加。这些外籍工人的国家为他们的生活和教育所支出的费用同样远远超过1,000亿马克。联邦德国的经济无偿地从中获利。无论过去和现在,这都是超额利润的重要来源,也是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外籍工人的工资压得很低,而且在许多方面受歧视。

不少访问我国的人,对七十年代我国经济生机勃勃的发展,对我们能够实现民主德国历史上最广泛的社会政策纲要,感到惊讶。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作决定时所遵循的原则: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把社会主义生产的最高目的视为不断地、更好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寻找符合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统一。

对我们来说，马克思的下述论断是决定性的，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第一次成为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的本身。卡尔·马克思把保障“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看作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但是他也指出，“生产力自由地、不受妨碍地全面进步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先决条件”。根据列宁的论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全体成员最大限度的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经济政策的成果完全证明了这些基本认识是正确的。成功的“秘诀”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领导，在于党的科学政策。

正如我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九大代表阐明的那样，我们将继续执行充分就业、人民富裕、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政策。我们不为任何“市场经济的建议”所迷惑。

在新的党纲中，我们把社会生产集约化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集约化能提高生产力，只有提高了生产力，我们才能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之现代化，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好必要的准备。

我们清楚，为此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主要是世界市场价格暴涨给我们的对外经济带来的负担和困难。然而，我们有经过劳动者讨论的明确的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一定能够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重点放在哪里？首先是继续执行经过考验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为此，我们努力提高国民经济的能力，尤其注意经济增长中质量的因素。为了集约化、为了继续推进工厂和联合企业的合理化、为了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了实现现代化工艺技术，必须加速科技进步。为此，我们需要加速发展微电子技术以及其它先进的工业部门，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我们要更有效、更节约地使用资金，挖掘一切潜力，以降低生产消耗，争取生产更多的终端产品，实

现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

我们要依靠科学、技术和工艺,使劳动生产率比迄今为止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节约劳动岗位,大大改善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我们清楚地知道,科技进步对于完成其它各项任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努力利用科技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

劳动人民参加的社会主义竞赛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这是倡议和革新精神的源泉。由此大大激发了公民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心。

我们认为,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牢不可破的团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和我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可靠基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正是有社会主义的盟友,尤其是苏联的支持,民主德国才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屹立在欧洲社会主义的西部前哨。

1973年5月13日,勃列日涅夫同志授予我列宁勋章时曾说:“从德国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第一天起,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就站在你们一边。我们把两国之间形成的全面合作关系和兄弟般的友谊看作是战后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各国人民之间真诚兄弟联盟的杰出范例。”

人们可以看到,民主德国的历史也就是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和加深合作的历史。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民主德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关系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过去和现在都是决定性的,是经过生活考验的,是稳定的。这种关系将会进一步加深。早在五十年代已经显示出来,同苏联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对民主德国具有何等重要意义。当时我们从苏联得到的生铁、钢材、粮食、拖拉机以及其它物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疑是雪中送炭。同时为我国制造业开辟了巨大市场,为我国计划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基础。

1950年至1978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加了约24倍。苏联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从苏联方面来说,多年来民主德国也是她的

最大贸易伙伴。我国所需的大部分一次性能源和工业原料都来自苏联。在1976年至1980年这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从苏联进口了8,800多万吨石油,21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2,100万吨硬煤,将近1,600万吨钢材,425,000吨棉花及其它各种原料。除了这些重要进口之外,从苏联进口的工业设备和先进的合理化手段对我国国民经济的作用正在增长。目前,从苏联进口的商品中,30%以上是机器,这反映了符合两国利益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几年来,民主德国向苏联伙伴提供的主要产品是:轧钢设备、锻压设备、船舶、渔船、客车车厢、冷藏车厢、农业机械、轻工和食品机械以及印刷设备和通讯器材等。例如,截至1979年,我国向苏联商船队和捕鱼船队提供了3,038艘船,总吨位达410万吨。从1960年至1979年,我国向苏联出口了21,615节客车车厢和77,500台工作母机。

我们的苏联朋友一再对我说,25年多来,民主德国的机械产品和电器产品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具有特定的地位。这些产品在苏联同行中享有盛名,这使我们感到高兴。

1981年至1985年间,我国与苏联的商品贸易总额将达480亿卢布,合2,400亿马克,其数额之高在两国贸易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在这五年中,我国将从苏联进口9,500万吨石油、325亿立方米天然气、2,100万吨硬煤、850万吨铁矿砂、480万吨生铁、65万吨铝、211,500吨铜、770万立方米板材、457,000吨纤维原料和44万吨棉花。同时,苏联同意提供的设备对我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我国将根据自己国民经济结构,向苏联提供相应的出口。

同苏联的科学技术合作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举世皆知的有用于地球遥测的宇宙多光谱摄影机、等离子熔解工艺、生产高压聚乙烯、聚脂纤维和聚酰胺丝的高效方法以及钢管连续冷轧设备。

经互会国家在实现多国宇宙计划中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有民主德国的一份。1978年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国宇航员参加的近地球轨道宇宙飞行。特别是我国宇航员西格蒙特·耶恩和他的苏联

同行在宇宙共同飞行的那些日日夜夜，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1975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又扩大了我们两国科技合作和经济合作的规模（关于这一条约我后面还要谈到）。1978年夏，我与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会晤时，商定拟订一项民主德国和苏联至1990年的专业化与协作长期计划，在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前夕，这个计划在柏林签字了。这项计划将在经互会长期规划的范围内实现。在计划中我们共同着手执行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项目。它将在互利的基础上使我们两国的物质和精神联系更加密切。

我想，大家都知道，经互会国家希望用长期规划解决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方面的基本问题，其中重要项目有：各国共同解决原料、燃料和能源供应问题；迅速提高农业生产；扩大经互会国家之间的交通联系和运输；共同发展工业消费品；首先在重要的机器设备制造方面采取共同的和分工协作的措施。

在我国国民经济与苏联等经互会国家的国民经济日益一体化的同时，我们也重视国际分工，扩大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不仅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也符合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当然，这种关系只能根据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发展，不能附加政治条件，必须排除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歧视和干扰。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丝毫不影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反而有利于这种合作。我们与苏联等经互会国家的密切合作扩大了我们与非社会主义经济地区贸易的可能性。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力量的增长。

最近几年的经验恰恰表明，合作的形式日益多样化。除单纯的商品贸易外，还有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和许可证生产等形式。这对我们有利，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发展。自然对方做这样的生意也要取得利润，这也是常理。总之，我们重视在互利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贸易。

目前,民主德国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一套现代管理体制,能完成当前和未来的各项任务。我们的国民经济是讲究效率的,是增长型的,是按照高度合理化组织和管理的。这些是保证现在和将来社会安定、充分就业和人民富裕的力量所在。一切关于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出发点,现在和将来始终是居民的需要,社会生活各方面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生产和消费、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这些内在联系的新质量是我们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项政策的中心环节。1974年10月7日人民议院通过决议,把这一内容载入民主德国宪法:“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效益提高、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

第二十二章

社会主义工业的现代化管理

如上所述，民主德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它是在党的决议、国家的指令和指导以及有约束力的计划任务的基础上运转的。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我们把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和计划同企业的责任、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劳动者参与管理和计划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每年都有80%以上的劳动者在企业里或各自的班组里参加讨论当年的计划。这样能够提高劳动者和计划任务的一致性，使劳动者决心不仅增加劳动成果，而且还要提高劳动效益和质量。

我们根据管理科学的最新知识，不断地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计划及其运转。我们的目的在于使人们更有效地、心情舒畅地工作。

我们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坚信能够在我国打碎大垄断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对我们来说，同样肯定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工人阶级能够自己管理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天才地预言，工人阶级能够发展一切精神和物质生产力，造福于人民。我们毫不怀疑，这一预言也将在民主德国实现。

我在工作中事实上每天都遇到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优秀干部，他们今天活跃在国民经济、联合企业、工厂和外贸机构以及其它一些领域的领导岗位上，他们中绝大多数曾是青年工人，或是工人子弟。他们是我们共和国的同龄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经过了深造，担

负着重要责任,这些单位往往拥有上万名职工,数十亿马克资产。

当然,任务不轻松。他们每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必须勤奋学习,不仅从书本中学习,还要从实践中学习,有时也从必要的批评意见中学习。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经济机构、联合企业和工厂的领导者成长起来了,作为共产党员,他们以崇高的献身精神和高超的专业技能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我们为他们骄傲。他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受到尊重。

事实一再证明,有了明确的政治路线之后,成败取决于组织。就本质而言,工人阶级对现代化的工业组织决不陌生。组织性和纪律性始终是她们的力量所在。因而不难理解,工人阶级培养出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我们需要自信心,并且证明有足够的自信心。为了胜任现代社会主义工业的管理、计划和组织任务,这种自信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有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又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给我们提供的最可靠的理论,这是我们自信心的基础。我们正是从马列主义的理论中取得了掌握现代工业大生产的基本知识。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达到了全面社会化。他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作了充分的物质准备。

马克思曾全面地分析了社会劳动的组织。他极为透彻地研究了劳动分工和联合、协作和集中的过程。他指出,有计划地运用这些知识、劳动组织,其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我们今天运用的正是这一点。另外,我们的社会制度不排除运用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新的组织形式虽然形成于旧社会,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却达到了更加成熟的新水平。

今天,民主德国的工业发展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作为效益杠杆的组织形式必须适应客观要求。在这方面,联合企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认为,联合企业是管理社会主义工业的现代形式。

让我们以国际上遐迩闻名的“卡尔·蔡司·耶拿”联合企业为

例,1980年42,000名职工生产了价值24亿马克的精密仪器、光学仪器、电子产品和科研设备等一流产品。

它由15家国营企业组成,其中多数企业职工在几千人以上。联合企业负责解决所有带根本性的任务,以保证生产高质量的终端产品,并不断提高产量。它有一个4,000多人的研究中心,人才济济,其中有高水平的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有一个生产光学玻璃的重要工厂耶拿“绍特和格诺森”。该企业有一家大型配件厂,生产各类配件,特别是电子元器件。有自己的合理化设备厂,保障联合企业的工艺流程经常保持最现代化的水平。此外还有自己的外贸企业。整个联合企业的管理是按照最现代化的方式组织的,包括电脑技术的应用。

总而言之,联合企业把科学技术、设计、配件和工艺设备制造等所有的关键环节统一了起来,这有利于顺利地统一组织再生产过程,生产优质产品。现在,联合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承担着重要责任,对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巨大贡献,同时它又依靠这个高效率的经济体制的力量。

我们一向重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这正是我们组织联合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本世纪初,列宁正是分析了德国大化学康采恩形成的例子后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技术发明及其完善过程也更加社会化了。我们今天在新的更高的阶段上遵循这一原则,因为我们要把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结合起来。

目前,民主德国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有129个联合企业。这些联合企业拥有约240万名职工,工业年产值2,600亿马克,占我国工业总产值83%以上;建筑方面的联合企业年产值180亿马克。

自然,这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联合企业中有施韦特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年产值180亿马克;曼斯费尔德的“威廉·皮克”联合企业,年产值70多亿马克;还有洛伊纳的“瓦尔特·乌布利希”联合企业,年产值67亿马克;以及年产值在60亿马克以上的

其他联合企业。

把我国这些国营联合企业的生产规模与最大的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例如联邦德国的)相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施韦特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相当于联邦德国五十家最大企业中的第9位。上面提到的其他联合企业均可列在前30名以内。其余36家联合企业的生产规模也可以与联邦德国最大工业企业相媲美。

这样对比,决不是要把资本主义的垄断同社会主义的联合企业混为一谈。这仅仅是从技术上和经济效率上作比较。至少二者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别”,作为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康采恩是庞大的剥削中心,它们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相反,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联合企业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其生产是为人民服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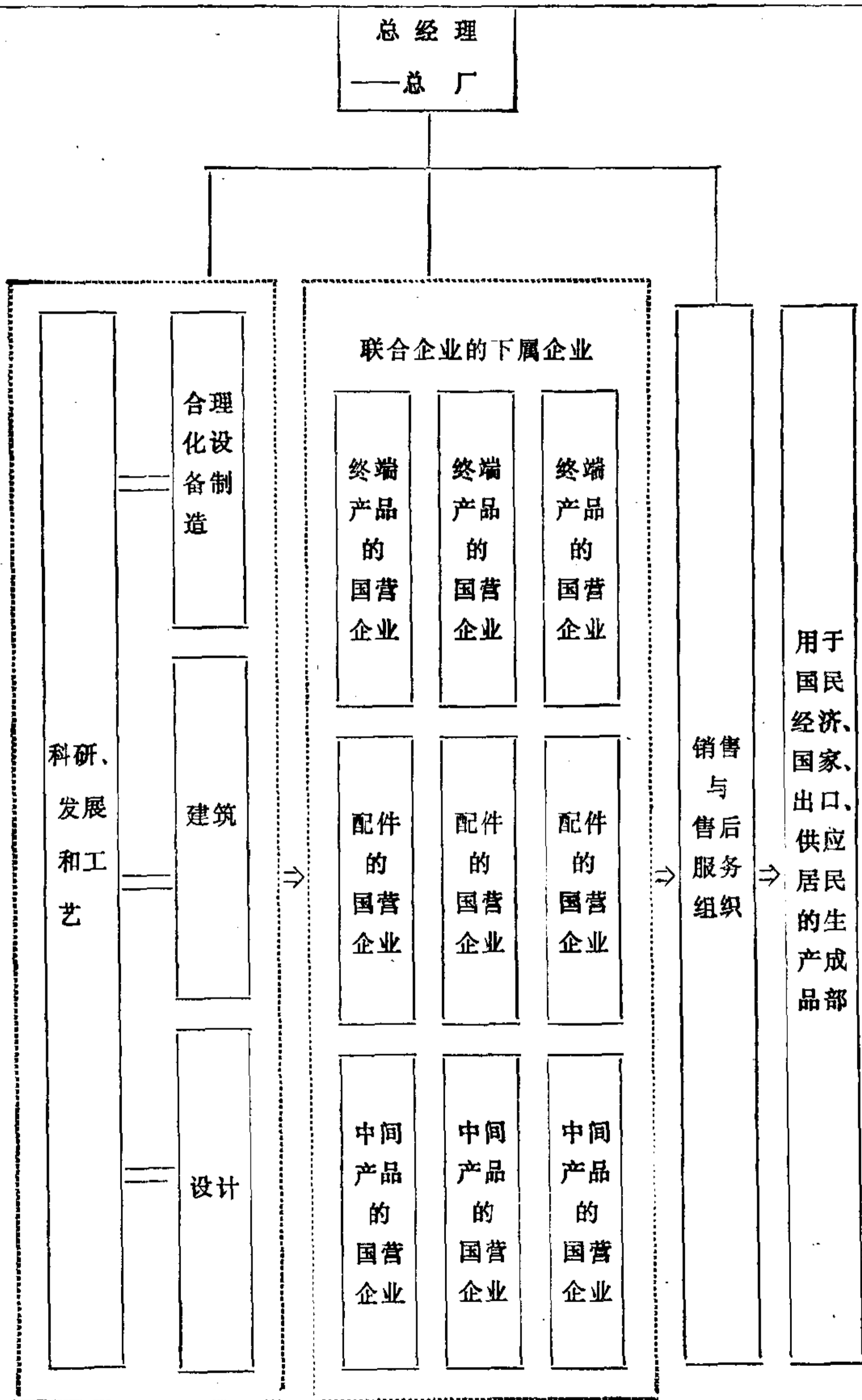
我们对自己在这方面的成就感到满意,无需隐讳。有人经常诬蔑共产党人只会组织政治宣传,不会组织经济。现在这类陈词滥调是一回事,而我们的生活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经济上的努力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我们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这一目的提供了一切可能性。联合企业是生机勃勃的社会组织,通过这样的组织形式,各大企业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按计划完成国民经济规定的重要任务。

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常常感到,联合企业以及企业的劳动者、研究人员、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表现出多么巨大的社会力量。

我经常想到在这条战线上的许多战友,如洛伊纳的“瓦尔特·乌布利希”联合企业总经理埃里希·米勒、施韦特石油化工联合企业总经理维尔纳·弗鲁恩、“卡尔·蔡斯·耶拿”联合企业总经理沃尔夫冈·比尔曼。他们都是中央委员。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多年的经验证明,它完全有能力以高效率适应社会主义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求。在这方面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来。

联合企业内再生产过程示意图



第二十三章

农业政策的丰硕成果

谁要想了解民主德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成就，应该看一看一年一度的莱比锡—马克勒贝格农业展览会。1979年的农业展览会是为了庆祝民主德国成立30周年，它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农村的变化，农民和农业工人生活的提高。

当我和政治局的战友们及许多农业专家参观1979年农业展览会时，我想起了农业方面艰难的开端。1945年4月底至5月初，我离开勃兰登堡—戈登监狱前往柏林，走过备受破坏的村庄，看到绝望的人们，深感农业损失惨重。纳粹统治和战争在农村也留下了灾难性的后果。

更为严重的是，法西斯的农业政策毁坏了无数小农和佃农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中农濒于破产。上万村民由于轻信纳粹“东方生存空间”的谎言而丧生。在今日民主德国这一地区，由于战争的影响，1945年的可耕面积比战前减少了18%。重新耕种这些荒芜的土地需要几年的时间！农业机器减少了30%。战争结束时，只有少数农户还有拖拉机或者大牲畜等。牲畜头数大大减少。缺种少畜，没有农业机械，尤其是没有男劳力——大多数农民和农业工人还在战俘营中，妇女们不知道怎样进行夏季播种，和怎样完成秋季的收获。

当时，对我国人民来说，保障食品供应是生命攸关的大事。从长远看，我们只有在农村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解决农业问题时，我们遵循德共曾经提出的农业政策，尤其是遵

循她在1926年2月14日发表的“面向农村”的号召书、1930年8月24日发表的“德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纲领声明”和1931年5月15日通过的“扶农纲领”中提出的要求。

1945年春，我们共产党人与工人、农民和农业工人一起，开始在农村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劳永逸地消除金融资本、容克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不顾反动势力的拼死抵抗，我们于1945年秋实行了民主土地改革。在农民大会上民主选举的地方土地改革委员会作为土地改革的执行机构经受住了考验。委员会的成员总计50,000名之多。他们都是产业工人、缺地农民、小佃农、农业工人以及从东欧和南欧返回的农民移民。后者由于法西斯的兼并政策失去了家园。这些土改委员会中有12,000多共产党人，9,000多社民党人和近1,000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人士，而一半以上是无党派人士。

7,000个耕种面积在10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法西斯骨干分子、战犯、垄断资本和银行的土地被全部无偿没收。其它的私有土地、包括教会和其它宗教团体的全部土地土改中没有动。

大土地占有者及其政治上的代理人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土改，从法律上的诡辩到蛊惑人心的鼓噪，从疯狂的诋毁到破坏乃至恐怖活动，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面对工人和农民的坚定决心，所有这些企图都失败了。民主土地改革中共没收330万公顷土地。把其中约220万公顷分配给20余万农业工人和移民以及125,000名缺地的农民、小佃农、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这些土地没有抵押负担，产权归个人所有，可以继承，但不准出卖、不准抵押、不准分配。55万多分得土地的人仅一次性地缴纳一点费用，其数额之小常常不足以弥补丈量土地的开支。约有100万公顷土地归社会公有。在这部分土地上建立了国营农场、国营试验基地及林场。

在我们这里，民主土改是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胜利的联合革命行动，是工农联盟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当时，还出现了由农民组织的互助委员会。在土改的过程中，这一组织形式发展成农民的

群众性民主组织——农民互助组。1948年底建立起来的国营农机站，在国家的资助下，以很低的收费标准把拖拉机、其他农业机器和农具租借给农民。我们已经开始实行一项新农民住房建筑的全面计划，在叙述青年团当年的活动时，我已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

这样，从1945年至1950年短短五年时间里，绝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状况已经稳定下来，对农村的政治生活产生日益明显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农业产量和牲畜头数已基本达到战前水平。一方面是战前状况，另一方面是可预见的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这都要求在农村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在1950年至1951年农民已经组织起耕种、收割、脱粒互助组之后，1952年春，在一些村里农民开始在自愿的基础上共同利用他们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地方为向农业合作生产过渡，建立了筹备委员会。这些农民请求党中央和政府帮助他们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支持他们向社会主义合作化大生产过渡。

这样，1952年7月9日至12日召开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党的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在民主德国的农业中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欢迎农民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走社会主义的劳动和生活道路——这一选择肯定是不容易的。

那时，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的所有实质性问题，我们都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一起开会加以讨论，后来在民主德国农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了讨论。会上讨论好的经验，作出结论，提出今后的任务。为吸收合作社农民参加对农业的管理和计划，根据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议，在县、专区和中央三级建立农业合作社咨询委员会。对于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严格执行逐步推进的方针，创造物质前提，无条件地尊重农民的看法和意愿。为此，建立了有农民和农业工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筹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数千次大会、座谈会和讨论会上，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

员、专区和县党组织的领导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的成员就我党的农业政策和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同农民建设性地交换了看法。

根据民主德国的具体条件，我们采用了多种农业合作形式。按照 1952 年 12 月第一次通过的农业合作社章程（后来章程根据新情况作了修改），初级和中级农业合作社只集体经营种植业，高级合作社则兼营种植业和畜牧业。农业合作社内部实行集体民主的原则。各级农业合作社中，农民均保留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

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向新生的合作社提供了全面帮助。到 1955 年底有 31,000 多名产业工人到农村去，用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支持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1961 年后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已经巩固，国家才把原来属于国家的现代化技术设备交给农业社，或者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他们。通过这样的价格政策、优惠信贷以及其它多项扶助措施，我们大大地推动了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

农业合作化的过程同样存在着同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受到他们的政治和思想压力，更不用说他们一再企图破坏农业生产了。然而，无论是纵火，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煽动都无法阻止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断涌现。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耕地面积、牲畜头数和整个生产所占的比例，逐年上升，它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长。

截至 1960 年春，所有农民都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如农民所说，这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春天。从 1952 年夏至 1960 年 5 月，有近 100 万农民组织了 19,000 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外，在此期间还建立了大约 500 多个国营农场和其它一些国营或集体的农业组织和机构。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稳固基础。

在德国农业史上，仅仅八年的伟大革命变革，就有上百万人开

始了新的生活方式。这是私有者向社会主义的劳动和生活方式转变的复杂过程,不仅要拔掉土地的界石,而且要清除数百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习俗。我们的农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习惯了新的生产关系,学会掌握集体生产的劳动方式并发挥其优越性,这是令人惊讶的。通过这样的途径形成了合作社农民阶级,他们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建设农村的新生活。

就这样,我们根据民主德国的具体条件,实现了列宁的合作化设想。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说中关于用革命方式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集中体现。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农民的一条最简单、容易和可行的出路”(列宁语)。工人阶级在不断巩固同全体农民的联盟过程中体现了领导作用。诸如全面支持合作化,以及经济、文化和社会进步要密切协调的原则均得到了创造性的贯彻。

多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很快巩固起来。集体劳动得以贯彻。科学知识和新技术在农业上得以推广。农业社内部民主生活十分活跃。合作社农民逐步积极地采用先进的生产方法,集中地使用人力和物力,完善农业社的生产结构。为实现这一目标,六十年代中合作社农民开始在农业合作社之间、农业社和国营农场及其它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农业社和国营农场统一使用它们的机器,共同购置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在一些重要的生产领域组织跨企业的机构。在党和国家的推动下,种植业和畜牧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向工业化生产过渡已初见端倪。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新阶段已趋成熟。

党中央和政治局根据这种客观必然性及时地作出了决策。这些决策包括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决定的、九大重申的主要任务之中。为了进一步建设民主德国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并有计划地提高我国人民已达到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农业方面尚需做出重大努力。

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参加了1968年6月和1972年6月在莱

比锡召开的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由社员大会和县农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的男女农民以他们的责任感和专业知识，同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一起研究提高生产、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以及农村社会发展等问题。这给我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县一级的农业和食品业委员会的活动也有助于吸收农业社社员参加县内的社会主义农业的管理和计划，促进社会主义民主。

工人阶级与合作社农民的巩固联盟是取得成就的最重要前提之一。自从我国人民从法西斯统治下获得解放之后，这一联盟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不可侵犯的政治基础。合作社农民紧紧团结在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周围，精力充沛地为完成主要任务而努力奋斗。他们具有高度的文化素质。现在87%的农业劳动者达到专业工人、技师、专科或大学毕业的水平，而1960年只占10%。这是重要成就，也是完成任务的可靠保证。

虽然农业劳动力在过去30年中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然而农村劳动者的生产成果却增加了许多倍。其中农产品增长了一倍；向国家交售的肉畜增长了8.5倍；牛奶4.5倍；交售的鸡蛋甚至增长了21倍。因此，自1973年以来，我国居民不断增长的人均基本食品消费大体上实现了自给。民主德国的每个居民，包括婴儿和老人，人均每年消费87公斤肉和肉制品，15公斤黄油，98公斤蔬菜，这种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肯定是不差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2年7月12日同“梅克伦堡村格罗斯斯蒂登村联合体”社员和农业工人的一次谈话。我利用这个机会参观了一个新型养猪场。格罗斯斯蒂登国营农场的场长埃里希·塔克在饲养场大门口迎接我。场内一排排铝制的饲养棚跃入眼帘。据塔克介绍，这个现代化饲养场的建设仅用了三年时间。从此，这个饲养场用工业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同时联合体伙伴之间加强了大范围的专业化分工。

埃里希·塔克顺便说起，他曾是梅克伦堡大公的马车夫，解放后他成了工人，后来当了工会干部，从1951年起一直是格罗斯斯

蒂登国营农场的场长。我祝贺他走过的生活道路。这对我国许多农业工人和农民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经历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给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和整个农民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为了创造条件，提高生产和发挥经济效益，我们从七十年代初起进一步加强农业的集中和专业化。主要部分首先仍然是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其中有1,400个从事种植业，约3,500个从事畜牧业。以它们已经达到的集中程度、积累规模和科学技术潜力，它们具有有利条件，进一步提高生产，完善集体的社会经济关系。

除此之外，广泛的社会福利也是胜利完成当前和将来任务的基础。农村劳动在消灭了剥削之后，明显地减轻了。高的教育水平，自由地掌握和运用最新的科技和文化成果、广泛参与民主管理企业和国家事务，以及社会保障和社会安定，也表现了农村生活的质量。1970年至1980年，仅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和园艺合作社就为40多万农村居民新建了住房或改善居住条件。今天，每千名幼儿中700—800名可以入托，适龄的儿童可以全部入幼儿园。这样有利于农村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就业。从七十年代起，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工人一样享受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此外，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生产的提高也为美化农村、改善供应和其它地方设施带来好处。这是有关全社会的大事，因为我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和农业地区。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目前和将来的发展是全社会必须关心的事情，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任务。我们的长期目标是不断地改善居民的优质食品供应，并为工业提供原料。同时我们希望使农村的生活条件能更接近城市的生活条件。我们认为，这是逐步消灭城乡主要差别的途径。

在民主德国，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0.37公顷。因此，我们除了充分利用每一平方米土地，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之外，别无选择。目前种植业和畜牧业中还存在的部分繁重劳动

必须逐步解决。

为了增加国民收入，我们正努力高速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益，关键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牲畜存栏数。实现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全面集约化，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长期目标。我们的主要方向是全面机械化、化学化和饲养机械化、改良土壤和机械烘干。这一切都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农业工人的素质。

在农业中掌握科学技术，扩大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也已成为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集中一切社会力量，因为物质生产及其效益的提高，决定着我们的社会政策的活动余地。

同时，农村正在发生重要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向工业方式过渡。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我们必须学会掌握农业生产中特有的经济和生物规律之间的紧密联系，改变迄今为止的农业生产方式，争取更高的社会效益。

这里再一次证明，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充满着悲观情绪，为了掩盖农民群众社会地位的下降，他们编造出一种所谓科学技术自动效应的荒谬理论。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则是乐观的和满怀信心的，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此提供了前提。

协作作为社会主义农业大生产的基本特点证明是有效的，逐渐在整个农业再生产过程中传播开来，不仅企业协作，而且包括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协作。目的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为国民经济提供终端产品——对路的食物。

在农业政策中，我们极为重视全面发挥协作的经验——即所说的“黄金基金”。特别要把集中和专业化中的进展转化为提高生产和增加经济效益，同时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民主。在这里我还想指出，随着协作的发展，一些重要的社会政策初具规模，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和工人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农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不断密切，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以便共同提高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除生产之外，各个生产集体还举办公共项

目，改变乡村面貌。这类合作由有关农业合作社和其他企业的代表组成协作委员会，进行民主领导和组织。他们组成的委员会为广大农业合作社社员直接参加管理和计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广泛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章程，新章程的实施已考虑到这种发展趋势。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协助实施新章程。从人民议院到地方议会，农民代表都积极参与这一工作。同时，社会主义的农业企业及其协作机构的各种形式的民主组织在管理和计划工作中依靠广大农业劳动者的才干。社会、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密切结合，证明是极为有益的。

我们认为，经济进步和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日趋密切。因此，我们对在农村实行社会措施方面的管理和计划赋予极大的注意，改善居住条件是中心环节。我们注意照顾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和村民的家乡观念。我们也努力完善农村的职业教育，改善农村交通，改善商业和医疗卫生设施，扩大文体活动场所。

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中规定的社会政策相互配合。它们包括合作社有义务帮助社员和其他农村居民修建住房，以及保护妇孺的各种措施到照顾老人等等。简而言之，为农村劳动人民谋福利，减轻他们的劳动，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美好，这就是我们在农村整个社会福利措施的目的。

第二十四章

鼓励发明创造

在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工业国里，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研究人员、发明家、革新者、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成果。在民主德国，我们创造条件，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科技知识和经验。我国劳动人民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平，他们很熟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生产。我们在注意提高生产时，首先注意扩大优质产品生产和采用较高水平的生产工艺，极为重视节约能源和原材料。特别是在我国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实际上已无法扩大，又鉴于世界性的原料和燃料紧缺和价格上涨，上述作法就更形重要。我们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归根结蒂，所有生产质量的改进和社会主义全面合理化都向自然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有计划地发展科学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对我们来说，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以及不断改善投入和产出比例的决定性前提。

事实证明，我们党的八大明确确定科技进步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多么正确！我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谈到，为了完成社会的各项任务，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寄予厚望。同时也要克服六十年代后期对科学提出的某些脱离现实可能性的要求（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我国）。1970年至1971年，我们克服了主观武断，一切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需要出发，客观地、冷静地和现实地确定了科技任务。

党的八大比以往更加明确地把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为此创造一切条件,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定地完成了面向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转变。只有这样的处理才使我们能够正确地判断我国今后科学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革命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求科学和政治的统一,要求更好地掌握它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同时对社会发展中的一切新现象给予应有的重视。上述思想在我1971年12月撰写的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和政治问题》一文中占有特殊地位。

党的八大后不久,越来越多的企业不仅宣布取得了科技进展,而且在实际上提高了经济效益。愈来愈多的企业领导人懂得激发和鼓励大家对科学技术及尖端成就的爱好和热情。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齐心协力,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本着上述精神于1972年5月会见了民主德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坦率和建设性的气氛中,他们谈了科学院在全面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具体目标。他们解释说,科学院是这样理解他们所肩负的崇高责任的,即同大学、高等院校、国民经济的研究和发展机构的科学家们协同一致,开展卓有成效的长期基础研究,争取以科学为先导,以便更有效地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认为,他们的义务是:不断地加深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研究合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科学一体化作出更大贡献。

我向参加会见的人保证,统一社会党中央重视科学家的成就,高度评价民主德国科学院的工作。我们还就进一步扩大科学院、科学密切结合生产以及科学在促进我国精神和文化全面发展中的问题、可能性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科学院主席团各位成员就如何在物质和技术方面保障研究工作的进行,向我提出了他们的问题和建议,同时我们又就如何把科学知识尽快地运用到实际中去这一中心问题交换了看法。大家一

致认为，恰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基础研究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有长远的研究目标。这就要求对长期的社会需要有透彻的了解，要求主管研究工作的领导周密地、有力地将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实际中去。大家一致赞同，对科研成果向生产过程的转化一定要采取既现实又灵活的态度。

我们党的科技政策的基本问题是这次同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谈话的内容。这次会见对我国所有科研机构、对巩固我国政治和科学的统一具有根本意义。这次会见无疑表明，我国的科研部门具有为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好先决条件的一切可能。

如果说我们当时就要求科学与生产更有效地结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那么今天，八十年代初，这个任务就更为紧迫。在民主德国，我们面临的形势是：生产的增长几乎只能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从长远来看，劳动力将进一步减少，总的劳动工时将随之减少，还有诸如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休假时间以及其它种种社会福利措施也将带来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必须在服务行业、教育和文化事业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我们也无需讳言，要解决我国能源、原料和资源的缺乏和局限性，要么靠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要么采用现代工艺技术。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源泉，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目标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我们希望依靠科学技术，在降低能源和材料消耗的条件下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

说到底，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外部市场上复杂的条件，都要求我们生产出更多质量高、性能可靠和式样美观的新产品。关键是我们更充分地利用有限的和昂贵的原料生产出优质产品。

为此，我们努力全面地发展技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尽一切努力，不断鼓励研究人员、发明家、技术人员和革新能手的创造性劳动。使他们能够探索到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保障把这些新的知识迅速地全面地应用到实际中去，特别是应用到生产中去。

党中央会议没有一次不讨论科技发展的基本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对我、对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来说，请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讨论我们面临的任务，讨论他们的计划与成果，以及他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已成为一种需要。

我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科学家、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地位、受到的尊重、参与决策和行使权力的程度之高在我国人民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想强调，我们对科学及其应用的态度，并非仅仅出自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渊源于我们世界观的原则立场及其人道精神。从马克思主义（即科学共产主义）诞生之时起，为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掌握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斗争就开始了。我国的经验也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深刻的科学和革命过程。

众所周知，我们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革命家、政治家，同时又是科学家。他们一再强调科学的人道性和革命性。他们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来看待科学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他们认为，在新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技术革新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马克思把科学称作生产力。恩格斯在谈及马克思时曾说，当一项发现“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时候”，他就感到特别高兴。

恩格斯在1893年致社会主义大学生国际代表会议的信中指出，资产阶级的革命主要要大学培养辩护士，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雏形。但是工人阶级的革命需要的是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以及其他专家。“问题是”，恩格斯写道，“不只是接管政治机器，而且也要接管全社会的生产，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的空话，而是扎扎实实的知识。”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卓有远见地看到，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的联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合作将使国家文化繁荣昌盛。

我们通过统一社会党的政策使这种科学预见在民主德国变成

了现实。如果没有工农政权与科学之间形成的历史新关系，没有工人阶级同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联盟，就无法解释我国上升为一个发达工业国的原因。这一联盟发展得如此卓有成效，是我党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从1945年5月解放以来，我们竭尽全力，消除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之间在帝国主义德国时期形成的很深的鸿沟。理解和照顾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利益，这就需要极大的耐心，要进行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战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党仍尽力为保证科学家创造性的劳动提供物质条件。我们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巨大努力、深明事理以及他们准备忍受物质匮乏的精神结果。

我还记得，当时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过激烈的思想争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因为必须抛弃某些旧的传统、观念和偏见。过去的反动思想、大日耳曼的妄自尊大、反共和反苏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恢复大学教育和科学院必然和思想转变相联系。这方面，开诚布公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争论使我们所有的人获益不少，使科学家和我们党慢慢走到一起来了。这种思想争论还有助于科学家与劳动人民建立新的关系。

然而，敌视社会进步的势力却想利用过去几十年中在垄断资本与知识分子之间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反对社会主义事业。他们不满足于引诱专门人才离开民主德国，更恶毒的是，他们让一些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效忠康采恩的科学家和专家留在我们的国营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岗位上。一旦重要研究和试验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这些从前的康采恩工作人员就会由于受贿而被讹诈，秘密出走到联邦德国。垄断资本用这种手段，多方面破坏我们的经济，窃取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同时，他们阻挠科研成果在我国工农业中应用，他们拉走高水平的专家，并在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挑拨离间。他们妄图迫使我们屈服，但是他们失败了。

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在完成国民经济的紧迫任务过程中，进行了无数次有成效的创造性合作，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盟证明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我们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垄断，铲除了障碍，使大多数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能够掌握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发明家和革新能手对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过去几十年中，主要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社员阶级中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多数，这的确是我党政策的一个伟大成就。由于阶级出身和实际工作，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和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们从而消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和依附并听命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之间特有的鸿沟，代之以创造性的合作、友谊和同志式的相处。

长期以来，具有人道思想的科学界人士，其中包括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亚历山大·冯·洪堡、威廉·冯·洪堡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杰出的德国科学家，不惜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科学服务于人民，有利于人民。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丰富的科学知识完全用来造福于劳动人民。“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把社会需要同集体和个人利益协调了起来。因此，社会主义特有的推动力在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科研成果和技术革新如同经济增长一样，都服务于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在将来我们也要努力更显著地、更有效地突出我国社会的这一根本特点。

可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成就是我们社会的基本要求。我特别高兴的是，这一点已经在我们全党和我国人民的意识中扎下了根。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收到材料和信件，报告科学家、工程师、设计人员、规划人员和工艺师为提高效率而采取的主动精神，并说明这些努力得到有经验的工人和青年人的补充、支持和鼓励。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把他们的精力和热诚贡献给这一时代的要求。各方面的经验使他们确信，科技发明和技术革新既符合

他们个人的利益，也符合他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特点。

我们密切地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为此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尤其注意能在各方面大大提高国民经济效益的新工艺的开发和运用。从长期看，这种新工艺可保证生产率高速发展，同时又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原材料生产出优质产品。

我们相信，我国工人、科学家、技术员和工程师、政府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者有力量和能力制造和掌握现代生产工艺，并使其在经济中发挥作用。我们为他们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并及时提出势在必行的任务。依靠科学技术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从而为实现我们的社会政策纲领，为在我国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

同苏联和经互会其它国家在科学技术的所有重要方面进行密切合作，是加速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可靠基础。1977年3月，当时的民主德国科学院院长赫尔曼·克拉莱教授向我报告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院长在莫斯科开会的情况。会议就加深科学研究、科学仪器制造及其它方面的合作达成了重要协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与会者。这表明，我们这些国家的党对科学以及科研工作一体化多么重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要解决的任务的错综复杂客观上也需要一体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相互接近的过程中，科学起着突出的作用，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我国科学家以其出色的成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占有受人尊敬的地位。这也是我党政策的体现。

我们党和国家总是力求把我们自己的努力同国际分工和协作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我作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直接接触到科技合作，当时要选派一批大学生到苏联大学去学习。苏联在为我国培养高级专家方面的无私帮助，为我国现代科研机构的建设奠定了基础，例如核研究、半导体技术以及参加和平研究和利用宇宙等方面。

从1951年民主德国和苏联签订两国政府间第一个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来，苏联对我国重要企业和工业部门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有东方钢铁联合企业、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发电站等。

如果说民主德国今天与国际上相比科学技术水平已颇为引人注目的话，这正要归功于这一合作。如果说到合作的特点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要强调这种合作的真正民主性质，没有任何形式的剥削和依附。

在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同苏联和经互会其他国家的合作已经转向共同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技任务方面，我们为此签订了相应的协定和合同。例如，在民主德国和苏联两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生产优质钢和合金钢的30吨等离子炼钢炉。

我和民主德国所有公民一样，为我国第一个宇宙飞行员西格蒙德·耶恩感到自豪。这生动地表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合作使我们有可能分享到苏联科学的先进成果。如果我国一家单干，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这当然也要求我们作出卓越成绩。

我和我的朋友勃列日涅夫一致认为，社会经济进步将要求我们两国在科学技术和生活方面更进一步加强合作。我们也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筹备并签署了民主德国和苏联之间至1990年的专业化和协作计划。

在民主德国取得广泛外交承认之后，我们同资本主义工业国的经济和科技关系规模扩大了，份量增加了。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精神，我们在最近几年，采取措施，发展互利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在长期的政府协定和公司合同的基础上，这种合作是大有希望的。我从许多方面，包括最近参观莱比锡博览会，了解到我国被公认为是可靠的合作伙伴。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将继续发展各种平等和互利的有效合作形式。

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对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访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过实地考

察，我发现，我们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科技关系起着重要作用。东道国的领导人把这种关系看作我国对他们的社会经济进步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有效支援。近几年来，民主德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并有计划地扩大了这种关系。

我们党和国家对科学技术提出每一项要求时，总是同时提出促进其实现的措施，这是我们领导作风的特点。我们把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作是我们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一点清楚地反映在科技经费上。从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至1970年，研究和发展经费达300亿马克。特别是党的八大以来，科技经费增加的幅度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1971年至1975年的五年计划期间，此项经费达250亿马克；1976年至1980年的五年计划期间，这项费用达350多亿马克。换言之，最近五年研究和发展经费比1950年至1970年20年的总和还多。我们在党的九大之所以能作出这样的决议，是因为在此前的几年中，科技的效益大大提高。效益的提高既表现在研究方面，也表现在研究成果向社会生产的转化和应用方面。

目前，民主德国有17余万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考虑到我国的面积、人口和国民收入，在这方面，我国在发达工业国中名列前茅。

我们有选择地把我们的人力和物力投向能够更有效地促进科技进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完整的正在扩大的科技系统。

民主德国各方面的科研机构均有基础研究。科学院和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50%集中于基础研究。民主德国科学院的前身1945年之前只有76名院士，现在已成为我国高效率的科研中心。该院目前在数学、控制论、信息处理、物理学、材料研究、核研究、化学、地质学、宇宙科学、分子生物学、医学和社会科学等重要领域集中了民主德国10%的科研力量。

我们始终认为，基础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任务是为未来的工业发展打基础，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生

活方式作准备。它探索带有根本性的新的认识，开发自然界和社会迄今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客观规律性的联系。因而，它给科技进步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新的科学工作方法，并影响整个精神生活。

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以及我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密切的合作，客观上使我们能够，也有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向我国科学家提出比以往更高的任务。

约三分之二的科研力量集中在经济方面，他们主要致力于加速科技进步、科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以及提高整个社会劳动效益等领域。我指的是：电器、电子、化工、精密机械、光学仪器、机器和车辆制造等。

前面讲过，我国每个联合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力量。我们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中心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例如：机床制造研究中心、“卡尔·蔡司·耶拿”研究中心、焊接技术中心研究所和机车车辆研究所等。这些研究单位与科学院、大专院校保持着多种合作关系，重点是研究如何提高我国产品水平和巩固我国产品国际声誉。我们一再强调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发展方向上来。

我们自然极为重视大学生的培养和使用。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求知欲是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每年都有数千个这样的人才成长起来。仅1978年，我国就有29,000名高等院校毕业生，41,000名专科学校毕业生。我们还不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有47万多高等院校毕业生和85万专科毕业生在经济部门工作。如果考虑到人口，我国在这一方面与发达的工业国相比也属佼佼者。使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负有重要责任是我们的基本要求。因为他们应该有机会把他们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把他们的智慧、立志发明和革新的决心用来造福于我们的国家。

1978年10月，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和精神生活的学府——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举行150周年校庆。我想起这所具有悠

久进步传统的高等学府战后的艰难。1945年2月，德累斯顿经过英美毁灭性的轰炸后成了一片废墟，苏联士兵和战后初期的许多积极分子作出了非凡的努力，使这所工业大学在1946年10月恢复了招生。正是由于我们的科学家和教职员工的顽强意志和创造力，这所大学如今又重新焕发出巨大的光辉和吸引力。

我率领党政代表团参加了该校150周年庆典。在许多交谈中使人感到，科学家和大学生们正在豪情满怀地献身于他们所肩负的科研和教学重任。我从工业和农业各单位了解到，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如同我国其他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一样，在国民经济、政府部门或其他领域的领导岗位上经受了考验。他们为提高我国的生产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许多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刚刚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的的大学生，在我们这里获得了扎实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知识。在我会见外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时，他们高度评价我国的国际主义支援，认为这是对他们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帮助。

科学技术进步不单纯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专家们的事，我们很重视调动全体人民的创造力，参加科学技术活动的劳动群众不断增多。人们可以自信地说，这确实是一场群众运动。人们的科学创新精神得到许多组织和机构的鼓励。这里我略举几例，如我国的工程师组织“技术协会”，它有会员23万多人；科学知识普及协会；促进我国青年科技活动的“未来技术能手展览会”以及大学生和青年科学工作者成就展览。

正因为科学活动有这样广泛的基础，自然为所有劳动者参加科技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有近180万劳动者即国营经济中在职人员的三分之一提出了有价值的想法、建议和专利，这样使我们在工业和建筑业中节省了约10亿马克的材料和9,000万个工时。每项革新建议平均创造价值为55,000马克，仅从1971年至1978年实现价值约290亿马克。

我们大力支持发明者的工作。发明者和他们申报的专利一样不断增加。近几年一些重大发明和技术开发获得民主德国国家奖。例如，有爆炸成型、气体分离控制设备、自动测量显微镜、新的拱形胶印机设备，以及焊接技术方面的突出成果。不言而喻，我们按各项发明和革新的效益给予发明者和革新者以相应奖励。

我们尤其鼓励青年人的创造性活动，让他们探索独到的有效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青年们又把科学和技术视为他们的用武之地，因为他们的想法得到重视，我们的青年发明者和革新者就更加意识到他们在为社会和自己做着有益的工作。前面提到过的1979年“未来技术能手展览会”有250万青年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大学生、企业和农业社的科学工作者共展出了70多万件展品，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才能。

进一步增加发明和革新的优秀成果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计划工作的一项主要目标。保证每个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能发挥他们高度的社会作用，同时鼓励他们的创造力、积极性和创新精神。首先是让科学工作者、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尽早参加到任务中来，深入进去，把解决这些任务看作他们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场所。

关键是，如何在严格的时间内，围绕共同的目标，组织好实现全部任务的战斗。要有热忱和激情以及真诚的合作气氛，要不断地关心工作的进展和及时作出决定。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经济制度的一大优点，即在整個国民经济范围内规划广泛的技术革新，为了人们的利益实现技术革新。我们强调要求不断提高科技工作的水平，更好地组织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科研活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使国民经济特别重要的产品，生产工艺和流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先要求敢于提出这样高的目标和任务，大大提高效益和质量。但我认为真正的目的是，鼓舞我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和革新能手充分利用现有力量。

生产力的高水平要求科学上有新思想，要求争鸣，更要求用世

界标准严格地衡量自己的能力和成果。这种要求和标准有助于扩大那些具有高度责任心和热情、愿为实现国民经济目标而努力奋斗的人员的队伍。

当然，只有在某一革新成果在生产中和市场上的使用价值得到充分证明之后，发明者和革新者的工作才算结束。科研工作、发明和革新运动的精干领导班子和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也首先是为了这一目标。

我们重视科研和技术领导工作中的预见性。我国一些成绩显著的联合企业和工厂，之所以能够稳定和持续地发展，正是由于它们的科学技术成就为保持生产的高水平作好了长期的准备。及时发现质量变化，并采取切实措施。在整个国民经济和每个企业中，人们逐渐统一地、长期地规划科学和技术，并把科研、生产到产品全面应用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

今天，我们对1990年以前的国民经济结构、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基础研究，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某些重要领域的发展，已经有比较明确的看法。我们正在执行这一长期方案，并且不断地加以完善。联合企业制定的科研、技术和生产发展长期规划充实了总的长期规划。由此可见，我们是把科技进步纳入统一的长期规划之内加以考虑的。

我们这样做，可以为发明和革新创造有利条件。这无疑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然而，今天可以说，我们是极为重视科技进步、发明和革新活动的，联合企业的经理们也不例外。

发明者和革新者不仅希望他们的成果受欢迎，更希望迅速投入实际应用。我们曾为探索科学与生产紧密结合进行过不懈的努力。联合企业的出现和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为科学与生产的结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今天的联合企业各个环节有机地联合在一起，从而在更广阔的领域内，以更大的力量实现发明和革新，这有助于加速科技进步，发挥科技在生活中的作用。

第二十五章

第100万套住房

1978年10月6日柏林建筑工人邀请我参加197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以来建成的第100万套住房的移交仪式。在柏林—马尔察恩建筑工地，我见到了多年来熟悉的先进建筑专家、工人、工地负责人、设计人员等。在新楼前会见时，流水作业线负责人贝诺·拉特克说：“昂纳克同志，我们遵守自己的诺言。一切工作完成之后，住户搬进新居，人们感到称心如意，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愉快。”是这样，在我们这里，工人说话是算数的。

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市市长艾哈德·克拉克象征性地把住房的钥匙交给工人赫尔曼·格罗斯考普夫，他一家显得兴高采烈。我高兴地应他们的邀请参观了他们布置雅致的新居。当我们坐在舒适的客厅里边喝咖啡边聊天时，我再次感到100万套住房的含义。这是100万个家庭的幸福。我从窗口向外眺望，楼下是巨大的建筑工地。这里，不久前还是草地和农田，不久许多人——五分之一的柏林家庭——都可以得到一套较好的住房。我们的首都扩大了。由于建筑工人勤劳的双手，首都的面貌的确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我们的政策已初见成效，目前我国到处生机勃勃。事情是如何起步的呢？

前面已经写到过，在筹备党的八大时，我们曾不得不对今后社会政策的重点进行认真分析和权衡。我们政治局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住房建筑应该是重点之一。问题是，当时住房建筑的增长速度够不够快，是否应该对住房建筑提出更高的和更长远的目标？

我们现在是否要把它作为具体的战略任务、作为我们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提到日程上来？

许多情况说明应该如此。在我们已经能够高水准地满足诸如食品和衣着、就业和教育等基本生活需要时，住房问题就成为最迫切的社会问题。我在同工人和地方官员的多次谈话以及从公民的来信中知道，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大家的期望。

我们党中央于1973年10月通过了住房建设规划，确实在1990年以前把住房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加以解决。我们这样做是实现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个历史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本着为人民的幸福负责的精神，我们把住房建筑作为中心环节纳入我党的社会政策纲领。恩格斯作为青年革命者，在他的著作《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一书中谴责了英国工业城市恶劣的住房条件。后来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指出了劳动人民在这方面受到的层层剥削和他们的依附状况。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论断。

在资本主义世界，住房条件从来就没有缓和过，而且还部分地尖锐起来。在这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也拿不出可行的办法。100多年前恩格斯的论断至今依然无可辩驳地正确：“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以致可能着手消灭城乡对立，消灭这个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弄到极端地步的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

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和下面的论断一样没有失去现实意义：“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掌握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同最难容忍的祸害作斗争。”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十分熟悉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萨尔的维贝尔基兴有足够的机会了解矿工和钢铁工人非人的居住条件。我父母的住房也不例外。在一幢小小的矿工住房里住着我们一家八口，有一段时间我的两个舅舅路德维希和彼得·魏登霍夫也和我们住在一起，舅舅彼得还带着他的家眷。

矿工不仅住得拥挤，而且房子的卫生设施极差，没有浴池，没有室内卫生间，有自来水的房子也罕见。

我后来的政治活动使我在德国许多地区奔波，在鲁尔区的埃森、波鸿和奥伯尔豪森工作时，常常在朋友和同志家中住，我目睹一些建筑质量极差的住房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直到二次大战以后，互不相识的人合住一套房子，甚至住地下室和园圃小屋也不罕见，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住房问题尤为严重。

1933年至1935年间，我曾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布拉格等地短暂停留，对那里工人区的住房状况记忆犹新。尤其是1935年我在柏林从事地下工作，威丁区无产者的居住条件令人难忘。例如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是工人和小职员居住区，这个区是在所谓经济繁荣年代（指1871年至1873年。——译者）建起来的，六层高的居民楼挨得如此之近，以致很多住房两面、甚至三面终年不见阳光。后院8平方米见方。在这样小小的住房里人们象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最可怜的还是多子女家庭和老人。正如柏林画家海因里希·齐勒所说，这样的住房如同一把斧子，可以置人于死地。

针对这种状况，德国共产党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为缓和住房困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德共当时在“共产党人和住房问题”的标题下提出了一项详细的计划，表现出理论上的远见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文件对住房状况作了透彻的分析，对如何反对建筑业的地产投机、房租盘剥、哄抬价格的斗争指出了明确方向。我党没有陷入改良主义的空谈，而是支持一切能够推动比较合理的住房和城市建设的作法。在这个基础上，威廉·皮克于1931年在柏林市议会要求“建立把解决劳动群众住房问题放在首位的工人国家”。

1945年我们解决住房问题的最初条件之不利是可以想象的。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住房状况糟到极点。房屋老化加之几十年疏

于维修，使房屋破旧不堪。特别是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为了追逐利润而出现的建房热之后，建筑业一直走下坡路，到纳粹备战时期，几乎完全停止了。

二次大战中，住房和公用建筑遭到大规模破坏，更加重了这种状况。英美的狂轰滥炸使德国五分之一的住房化为灰烬。破坏最严重的是大城市，如柏林、德累斯顿、克姆尼茨（今卡尔·马克思城）和马格德堡，这些城市将近一半住房和许多学校、医院、供应设施被破坏。

此外，战后初期还要为数百万移民提供栖身之地。因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地区的住房状况极度紧张。住房从1939年的510万套减到1946年的480万套；而同期居民人数则由1,680万增到1,850万。1939年，平均每千人可住房303套，1946年只有259套。1939年每套住房平均住3人，战后初期增加到4人。

这些数字本身还远不足以说明许多家庭的实际居住状况。被炸毁的房子里还有些房间住了人。一个套间里拖儿带女住几家的也有。尽管我国人民中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花了大力气清除战争废墟，推动住房建筑，但是要全面彻底地解决住房问题是难以想象的。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民主德国建筑部门为了解决最急迫的房荒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即便是这一时期我们的条件仍然有限，当务之急是恢复和发展经济，以满足居民的急需。特别要保障居民的日用必需品，并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地、按比例地发展。

在人民的食品得到可靠的高水平的保障、相应水平的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起来之后，建设和改造住房必然成为一个重点，应该把更大的社会力量转到这一方面来。

从1951年至1970年，我国共新建住房110万套，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新建55,000套。五十年代，柏林、马格德堡、罗斯托克的住房建筑以及象艾森许滕施塔特和霍伊尔斯韦达等新建城市的建筑发展格外迅速。在此期间，八分之一的投资用于住房建设。六十年

代虽然没有保持这样的发展速度,但是到1970年底,我国的住房总计约590万套。我国1,700万人,1970年每千人拥有住房345套。

七十年代初,我们的经济实力以及进一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使我们能够,而且也有必要,把生产同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要更直接地联系起来,也有条件制订一项长期的住房建设规划。因此,我们把这项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住房问题如此突出,不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留下的包袱。经过2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人们的要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需要更多的教育,追求更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同样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更高了。此外,由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人民业余时间增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定的住房条件对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对积极地搞好工作和有效地参加社会活动,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我们党还考虑到,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问题,将有利于增强年轻夫妇生男育女的愿望。这既关系到个人生活的美满,也是整个社会的需要。

我们自己所创造的整个生活水平,使解决住房问题成为我国进一步建设的头等任务。

正因为如此,解决住房问题在我们的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住房和相应的社会设施的建筑,城市、乡村和新居民区的建设,决定着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物质基础。我们党把住房建设看作是综合性措施,首先涉及到修建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假期活动站、医疗卫生设施、商店以及文化、休养和体育运动场所等。综合性的住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未来的社会结构、未来几代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

在我们的政策中,我们始终既重视住房建设的社会效果,也重视与此相联系的经济问题。所以我们在七十年代的计划中,不仅需要考虑住房建设工业化措施,如预制构件、安装能力和现代技术等,也要考虑其它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七十年代显著地改善占我国居民四分之一人口的居住条件的話,那么对消费品的需

求也必然要有很大的增长。据分析，迁入新居的家庭平均每家花6,000马克购置室内陈设。以1979年为例，单以16万套新住房计算就需要增加供应10亿马克的家具、陈设用纺织品和灯具。

除此之外，七十年代国民经济计划中实现住房建设规划和与改善居住条件有关的各种因素都要考虑进去。住房建设费用绝大部分由国家承担，这样国家预算中有关住房方面的投资总额就要大大增加。社会设施和房屋修缮费绝大部分也不是由居民负担。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尽管住房费用不断增加，但是房租保持稳定。房租的稳定是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因素。在我国，房租不超过家庭收入的2%到8%。这与资本主义国家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联邦德国的房租占收入的13%到35%，甚至所谓的福利住房的房租也不断上涨，仅1965年至1977年房租就上涨了约250%。

当我们确定优先建设住房时，我们当然知道其它许多紧迫问题必须逐一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为了人民的利益，既需要优先解决某些问题，同时又要保证整个社会的恰当比例。

在分析现有住房状况和住房需求的基础上，我们为住房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建筑业和附属工业所需的投资提出了详细的建议。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听取劳动人民的经验和建议，尤其是建筑工人的意见。在实现这些宏伟目标时最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不仅得到他们的完全赞同，而且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倡议和可贵的保证。

当我回顾那段时期时，我就想起1972年5月10日我视察柏林一科本尼克区的阿姆斯菲尔德新居民区（今萨尔瓦多·阿连德居民区）和柏林住房建筑联合企业混凝土构件厂的情景。建筑工人们豪迈地谈论着他们的工作，同时也指出领导和组织工作中一些有待克服的缺点，以便更快更好地挖掘潜力。

随后我访问了工人比特尔霍夫一家。他们搬进了刚刚竣工的房子。这位柏林游艇船厂的工人在交谈中对我说：“我们的四个孩子能在这样漂亮的房子里成长使我们格外高兴。”

这次视察性的工作访问结束前，我们同柏林建筑工人党组织进行了一次座谈，建筑队长弗朗茨·霍尔费尔德把建筑工人的基本看法作了概括，他说：“我们知道每一套房子就意味着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和欢乐。这激励着我们大家去精心施工、提高速度、降低造价。”我说：“我们今天看到，党的决议受到大家的拥护。我们在首都建设了一个这样漂亮的中心区之后，现在的问题是要为所有应该得到并且要求得到的人建住房。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是，1975年之后我们的任务要比今天所能想象的艰巨得多。我们的目标是为我国劳动人民创造更加符合我们社会主义观点的居住环境。”

1973年年中建筑部门向政治局呈报了一项改善我国居住条件的周密的调查报告。我们已经准备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新建和改建75万至80万套住房，到1990年，新建和改建280万至300万套住房。我应该说，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也有顾虑。因为这一住房建设规划在国民收入中要占很高的份额，从长远看可能束缚住我们的手脚。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解决社会问题总是要解决与全国人民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对经济影响极大，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在决定住房建设规划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必须更多地注意人们的劳动效率同他们受教育的可能以及居住条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如此，个性才能充分发挥，也只有如此，作为生产力主要因素的人，才可能创造出优异成绩。这就是我们把住房建设规划作为我们的社会政策核心的根据。苏联在这方面的成就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在我们酝酿规划时，苏联朋友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经验。了解苏联市政建设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在长期的科研协作范围内，我们双方目前就建筑设计、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研究等科技项目共同合作。此外，苏联还向我们提供了房屋建筑构件厂的整套设备，对加快我们建筑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两国的建筑工人、作业组和联合企业的频繁接触成了我们交流的主要渠道。

如前所述,1973年10月我党中央确定在1990年前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并为提高建筑业生产能力和效益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我们的住房建设规划规定,到1990年向每个家庭提供一套大小和质量合适的住房。重要的社会目标是克服历史上形成的居住条件的差别。这样我们就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使我们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逐步接近。显而易见,我们建房规划中确定要优先为工人家庭和年轻夫妇提供好住房。我们的口号是:不是为少数人营建豪华住宅,而是为每家每户提供好住房。好住房是指从任何方面来说都要实用和节约,同时又要有适当的标准。这样我们也就实现了建筑界许多人孜孜以求的人道目标:建设没有贫富对立的、使所有居民均感到愉快的居民区,使孩子们能在充满人情温暖和社会保障的环境中成长。

然而,住房标准大体相同,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住房平均主义。恰恰相反,我们的出发点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住房建筑,必须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应该有多子女家庭的住房、老年人住房和单身住房;有城市中心的住房和绿化地区的住房;既有适应倒班工人的和农村社员的,也有适应艺术家的特殊需要的住房。民主德国民法中规定了租房人的权利及其法律保护。其中规定新建住房的60%应分给工人家庭。加之房租低廉,每个公民都住得起新房。

1990年前的住房建设规划预计投资2,000亿马克左右,这是民主德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除住房建设外,规划还包括各种必要的公共设施,如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和伤残人之家以及商业、卫生、文化、体育和业余活动设施等。住房建设规划的综合性和社会效益,它不仅为每个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而已。

我们党的纲领提出:“住房建设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居住水平、有益的业余生活及社会关系。”我们想达到这样的目标:使人们在自己的居住环境中感到舒适满意,在充满人与人之间友爱

气氛中无忧无虑地发展自己的个性。

现在世界上有许多有关住房建设的宣传。而我们的住房建设规划不仅说明要为城乡所有人，特别是为工人谋利益，同时还有实施规划的基本战略。

这里把新建、改建和维修统一起来是一个基本的着眼点。我们在建设新的大型住宅区的同时，日益重视老居民区现有住房的维修和改造。1971年，我国所有住房中40%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建的。配备有澡盆或淋浴的仅占39%。所以我们认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1990年之前把现在的房子全部拆除重建。当然，住在老居民区的人同搬入新住房的人一样有权要求得到较好的居住条件。因此，要一步一步地改造老居民区。而且有计划地修复重要的有保留价值的建筑物，这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都很重要。这也是改造城市的现实途径。现在许多国家老城市的中心区都存在着奄奄一息的问题。我们这样做不仅解决了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保住了人民的财产，保留了有历史价值的各具特色的城市建筑结构。

我们的住房建设规划也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布局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有价值的古建筑和新建筑融为一体，造成一种富有人情味的生活环境，体现出社会的和谐。

我国首都柏林的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初，我们将实施这个计划。这样我们就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留下的这个可悲的烂摊子。我们将为首都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条件，使我们的首都能与她的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的职能更加相称。

战争结束后，我本人象其他人一样在柏林清理废墟。我自然对我们的首都、对勤劳的柏林人有点偏爱。所有有利于美化这个城市、提高她作为世界城市声誉的事情，我都支持。

我们的首都与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生活息息相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从1230年柏林建立到现在，她的面貌和历史深受工

农政权的影响。今天的柏林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有繁华的菩提树下大街，有新老居民区和新老商业街道。这些都是从废墟上建设起来的。今天的柏林日益成为社会主义在德意志土地上胜利挺进的象征。

在柏林过去几百年饱经沧桑的历史上，柏林人从未象今天这样享受到人的尊严和社会保障，生活在和平和进步之中。在罪恶滔天的法西斯统治下，40年前，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浩劫从这里开始了；而在35年前，苏联军队的英雄们经过浴血奋战，解放了这座城市。我们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建立。从此柏林成了我们工农国家的首都。这是我国人民创造力的象征。在这里，我国人民正胜利地实现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实现着社会主义的理想。

作为政治家，当然不能只满足于计划的数字，归根结蒂取决于质量，即人们对其居住环境是否真正满意。因此，我们要求设计师设计出漂亮的、宜人的居民区。设计应能加强人们的这种感觉：这里是我的家，是我的祖国，我在这里可以自由平等地生活。

土地归国家所有，杜绝了任何形式的土地投机，发展了非赢利性的住房建筑，这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大促进了居住环境的改善。过去30年我国建设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我国大城市的市中心没有出现破坏比例、毁坏有历史价值的城市结构的建筑及交通设施。当然，这样我国城市的市中心建设就需要耗费更多的钱。但这并没有给居住在市中心的居民增加经济负担。根据住房的质量，房租每平方米从0.9至1.2马克不等，首都市中心和郊区一样。

我们住房建设规划的决定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只有制定一项长期的政治战略，才能发挥我国的物质和精神潜力，解决住房问题。实现这一规划的关键是提高建筑业的建筑能力。因为我们基本上不得不在大体不增加劳动力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所以我们把力量集中在运用现代工业建筑方法和技术方面。

这个问题是1975年4月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召开的第六届建筑会议的中心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建筑、建材和有关行业的劳动者、科学家和各社会组织的代表，会上对未来的住房建设提出了解决办法。提高建筑业效率的主要出路是生产集约化和建筑工业化。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建立现代住房建筑工业，从生产澡盆到建设完整的住宅区，凡居住需要的一切，都能高效率高质量地生产。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自1973年以来已经投资70多亿马克。

我国制定各种必要措施，使住房建设规划从政治上成为整个建筑业、甚至全民的事业。我们党的许多干部和我一样，深入建筑工地、建材企业、研究所和设计院，解释我们的住房建设规划，推动它的实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党和建筑工人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当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展现在建筑工人面前。

住房建设规划从一开始就在人民中激起了强烈的和积极的反响。我本人就收到许多群众来信，他们衷心欢迎这一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几百万公民为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行动起来。中央政治局为我国最大的城市柏林、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制订了到1990年的长期市政建设规划，现在所有城市都有自己的解决住房问题的方案。为了制定方案，人民代表机构、全国阵线组织和居民之间召开过上千次讨论会。群众参与工作、参与计划、参与管理的社会主义民主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具体。

我国全国阵线组织的“大家动手美化我们的城乡”竞赛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这个活动中来。他们自己动手修缮居民楼、幼儿园和学校。工人住房建筑合作社的成员和私有住宅所有者都自愿地作了许多工作。通过这种办法近几年来也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这完全符合我们的原则，即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居住条件都要改善。

与此相联，我们大力鼓励私人建房，尤其在农村。这类住房占新建住房的11%。这对工人家庭和多子女家庭有利。国家无偿向

他们提供建筑用地和优惠贷款，必要时贷款额可包括全部建筑费用。而贷款的偿还则视他们的收入而定，偿还金额不高于国家建的类似的房子的房租。

由于采取新建、改造和修缮等不同形式，因此住房建设规划能够以高度的社会效益和国民经济尚可承受的费用在我国各地区贯彻。人民不仅是这一规划的主人，也是社会主义生活环境的建设者和营造者。

党和政府密切地注视着住房建设规划的实施。专区和县级组织的工作也是如此，对于该解决的问题，中央及时做出决策。1977年3月中央五次全会深入地研究了党的九大关于建筑问题的决议的实施情况。为了达到并在重要方面超过1976年至1980年住房建设的目标，会议根据实践中大量的好经验做出了一个全面的决议，特别指出了最有效的途径。强调住房建设的高效率和高质量是对实际工作的明确指导。现实发展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向。在此过程中，和建筑工人推心置腹的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所有这一切大大有助于逐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住房建筑规划预定的任务。

我们目前在实现住房建设规划的道路上虽然才走完了一段路程，然而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首先，由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共同努力，建筑业的工业基础已明显扩大。这使我们能够把住房建设比1971年翻了一番；同时约有80%的住房是在高度机械化的住房构件厂采用工业化方法完成的。每年新建和改建的住房数字由1971年的86,700套增加到1979年的163,000套。过去9年中总计完成127.2万套，比1945年到1970年的总数还多。1971年以来，已有360万居民，即五分之一的家庭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我国住房不断增加，现已达到670万套，与我国的户数相等。1979年，每千人拥有住房399套。

据统计，我国人均居住面积已达23.6平方米，在国际对比中，我们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改善。在衡量住房建设规划的设备时，还

应考虑到,大多数房租不超过家庭收入的5%。在我国,决不会有一个工人家庭由于房租过高而不得不放弃他的住房。

决定我国住房建设规划的社会福利性质、同时也决定城市建设规划和设计的一个基本点是,我们把住房建设和儿童的护理设施、学校、体育和娱乐设施的建设联系起来。社会设施中的四分之一是1971年以来建立的。世界上大概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象我们这样为正在成长起来的一代建设如此多的社会设施。

毋庸赘言,为保证和完善这样的住房标准,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大量的财政投资。在对外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最主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变和房租稳定。这项政策加深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一政策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物质生产的效益。正是良好的居住条件能够造成一种社会气氛,使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相互关系很好地协调起来,造福于大家。

当我们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住房建设规划时,有些资本主义新闻宣传机构试图散布怀疑和不信任。谎言命短,历来如此。我们城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是铁的事实。它清楚地表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造福于人民的住房建设规划是能够实现的。

第二十六章

人口出生率回升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喜人效果，也表现在民主德国人口增长上。象其它许多工业国一样，我们从六十年代后半期起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到1973年，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0.6‰，即年新生婴儿180,336个。原因是居民年龄结构不利，这是二次大战的后果。其它原因是：许多青年夫妇长时间等待分配房子；就业妇女人数大大增加；她们专门技能的水平迅速提高。同时青年妇女的职业培训期延长，而且几乎所有的青年妇女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进高等学校深造。结果，现在的青年妇女生头胎时已是从前妇女生二胎的年龄。近几年来，民主德国的婴儿出生率逐年回升。1979年新生婴儿235,233个，比1973年多55,000个，即增加了30%，活婴出生率提高14‰。

我国的所有公民，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对出生率上升感到喜悦。我国喜欢孩子蔚然成风。因为我国社会安定，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我们这里，人们说：谁向往未来，谁就盼望孩子。这话不无道理。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孩子们生下来就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他们享受着家庭和社会的爱抚和关怀。我们竭尽全力，使他们免受饥饿和战争之苦。从他们呱呱坠地起，就有良好的保健条件。我国发达的教育事业为他们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没有一个青年人需要为培训或工作而担忧。

从1972年起，我国妇女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怀孕或保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口出生率继续增长就更具有意义。德国革命的

工人运动以及许多医生、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历来主张妇女有保胎或堕胎的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女工和工人家庭的境况很艰难。我曾目睹他们的苦难，知道萨尔家乡的矿工家庭怎样为使孩子们和自己填饱肚子、有衣御寒和有处栖身而挣扎。那时一个“多余”的孩子常常是一场悲剧。

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话剧《氰化钾》上演深深打动了我这个年青共产党人的心。医生兼作家弗里德里希·沃尔夫的这部唤醒民众的作品表达了人民反对禁止堕胎的第218条款的呼声。早在1931年10月，德国共产党在国会里就提议在法律上允许堕胎。这项议案得到人民的拥护，但却得不到资产阶级议会的支持。于是一切照旧。由于严禁堕胎，许多穷人家的妇女因而弄得病魔缠身，甚至送命，也有些被投入监狱。但对富人来说不产生任何问题。那时，上层社会的妇女能够出高价堕胎，而且她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对我来说毫无疑问，这种道貌岸然的第218条禁止堕胎法必须废除！

因此，我极力主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与妇女在教育、就业、婚姻和家庭方面的平等权利紧密相连。根据我党的提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共同决议，我们于1972年3月9日向人民议院500名议员提出了堕胎法案，结果以14票反对、8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议员使我们的提案具有法律效力。于是，妇女们除了享有就业权、受教育权、休养权、同工同酬和减轻家务负担的权利外，现在又有权根据个人的情况、职业和家庭生活条件以及对未来的设想，自己自由决定什么时候生育。这符合妇女的权利和尊严，有利于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健康和生命。

有人认为，由于战争，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极不正常，采取这种措施为时过早，可能会导致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然而，我们认为，应该让妇女真正享有人权，这一决定有利于她们的幸福和家庭的巩固。总而言之，我想说，当时反对这一法案的所有意见统统站

不住脚。事实证明，我国新生婴儿逐年增加，1974年为179,127；1975年增至181,798；1976年上升到195,483；1977年增加到223,152；1978年和1979年分别上升到232,151和235,233。有人担心这可能会助长青年人中的伤风败俗现象。但是，结婚人数增加、出生率提高，足以批驳这种疑虑。

也有人担心，妇女们行使堕胎权利会损害她们的健康。这种担心也没有根据。相反，1971年法案通过前产妇死亡率为4.1‰，由于医生熟练的人工流产手术，1978年降到2‰。同期婴儿死亡率由18%下降到13%。同样，流产期间与病假一样享受劳保待遇、医院免费提供避孕用品的决定，也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这里偷偷流产已属过去。妇女们宁愿避孕不愿流产，这完全符合法律精神。从1973年起，人工流产大大减少，同时出生率增长。

这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的平等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男女平等早已作为最重要的人权之一载入民主德国宪法。这一原则后来也没有变。1974年的我国宪法第20条提法更加明确了，宪法说：“男女平等，他们在社会、国家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帮助妇女，特别是帮助妇女提高业务水平，是社会和国家的任务。”

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在宪法范围内保障男女平等。1950年9月27日，工农国家发布的第一批法律中就有“母亲和儿童的保护法及妇女权利法”。这为有计划地使宪法规定的权利和社会实际统一起来，为数百万妇女自愿而又平等地参加社会生产活动铺平了道路，为促进他们的求知愿望奠定了基础。法令规定国家给予母亲和儿童以帮助和支持，承认婚姻和家庭是我们社会的支柱之一，确定了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同等地位。

国家对劳动妇女负责，并保护她们的工作。例如法律规定：“在生产中，妇女的工作不限于传统的妇女职业，而应扩大到各个行业……应在所有职业中采取措施提高妇女的业务能力。”这项法律还要求有计划地提高妇女在国家和社会领导岗位中的比例。法律还

规定,地方政权机关和国营企业要修建社会设施,照顾劳动妇女的子女。总而言之,法律对如何进一步实现妇女平等权利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如果我们今天说我国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爱护儿童的国家,那么妇女们本身也以她们创造性的勤奋劳动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我们的经济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 87.6%的成年妇女都有职业、参加学习或从事研究。拿1979年来说,有410万妇女就业,63万在校学习。妇女在整个国民经济就业人员中的比例逐年提高,目前占 50.2%。

自然,妇女就业的动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发生了变化。粉碎法西斯之后,就业对许多妇女来说是为了糊口。当时我们有 1,160 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其中妇女人数比男子多200万。所有这些妇女都成了家中唯一养家糊口的人。当时她们中的大多数不论是参加清理废墟或是参加其它方面的民主重建工作,都还没有料到,一个对她们的平等权利至关重要的过程已经开始。后来,她们认识到,就业能使他们施展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益处超出了对自己的家庭。这样增强了妇女的自信心和经济上的独立。因而参加工作对绝大多数妇女来说成了真正的需要。正如她们自己所说,没有工作,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倘若我们今天对妇女参加国民经济工作做个总结,给人的印象将会是很深的。妇女就业、按劳取酬、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参加社会活动。所有这一切,无论对妇女还是对男子的思想方法和处世态度都产生了全新的影响。

在这方面,妇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尤其重要。我们认为,保障这种权利,可以造就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这对男女来说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与过去的一切社会制度不同,我们把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学校的大门向工人子弟和妇女敞开,他们也使用这个权利。这一事实使我能够在党的九大报告中说:“妇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自己可靠的地位。在青年一代中,男女几乎

可以没有区别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国家为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未来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女学生毕业后，99%不是继续深造，就是学习一种职业。

其结果是，现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妇女71.8%是经过职业培训的技工，或者有更高学历的人，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仅有5%；在劳动者中，二分之一的专科毕业生和三分之一的高校毕业生是妇女。高等学校的女生比例占52.5%，在专科学校中甚至占到82.6%。这就是妇女平等在教育领域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妇女的平等权利不是停留在书面上，而是成为生活中的现实。并且还要求逐步创造条件，使就业和作母亲妥善地统一起来，因为这个任务不是妇女或家庭所能够解决的。所以特别在我们的党纲中作了规定，“各地都要创造条件，使妇女能够更好地享受其社会平等地位。要进一步改善妇女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为巩固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个性发展，就要把妇女的工作和作母亲的家庭责任更好地兼顾起来。要想做到这一点，需要孜孜不倦的努力。”

为了帮助劳动妇女，建立了广泛的社会服务网，如托儿所和幼儿园、洗衣店、企业和学校食堂。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使用于生育、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费用和劳动逐步由社会承担起来。这也体现在我们专门为就业的母亲们所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如把孕期假和产假延长到26周，工资照发；国家对每个孩子的一次性补助提高到1,000马克；对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满16周岁子女的全日工作妇女，每周工作时间缩短到40小时，不减工资，以及根据孩子多少，每年休假时间延长到29天。另外，还为学龄前儿童增建了社会设施。

据我所知，我国儿童设施的容纳能力在世界上已居领先地位。现在3岁以下的儿童已有60%入托儿所，3岁以上至6—7岁的儿童已有92%入幼儿园。他们在生动、欢乐的环境中受到经过良

好培训的专业人员的精心照看、训练和教育。77%的学生在学校就一顿餐，学校每天供应一顿热餐，每人还有四分之一公升牛奶。下午1—4年级的小学生在辅导员和老师的带领下，在学校学习和从事课外活动。少先队和青年联盟也帮助学生安排有意义的课外活动。

我们国家经常注意新建、扩建和改建这些儿童设施，今后将继续这样做。因为这是我们统一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对有四个以上孩子的多子女家庭、或抚养三个孩子的单身公民给予照顾。除每月国家发给儿童津贴外，他们还从经济上和物质上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他们优先得到住房，而且房租不超过家庭收入的3%。此外，服务和交通费等还给予优惠。

这一切都为就业的母亲们创造了条件，使她们能够爱护、照顾和关心孩子们，这自然也是孩子们期望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们工农政权通过立法，创造了优越条件，我们可以坦然地说，出生在我们国家的孩子是幸运儿。我这些说明想必可以解答国外多次提出有关我国出生率上升的原因的问题。

男女实际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源泉之一，是社会主义优越于其它社会制度的证明。妇女就业、受教育和作为母亲的社会作用得到完全承认，使她们成了真正的国家公民。妇女过去受歧视、没地位、不独立。今天在我们这里还有痕迹吗？一点也没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妇女有自己的见地，她们也懂得如何坚持她们的立场。她们在工作岗位上、在人民代表机构里是同事，她们象男人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观察、判断国内外形势发展，并且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我们的共产主义未来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妇女不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集团，例如在我国，要占人口一半以上。保障她们的平等权利需要可观的物质费用。然而，仅仅有物

质还不够，这也对社会、对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必须在实际中消除对妇女及其社会地位的许多根深蒂固的陈腐落后观念。我们党不倦地、耐心地推动这一思想转变过程。我们联合各种社会力量，深入家庭，说明妇女就业、在政治上和业务上受教育以及参与社会生活是必要的、正确的。列宁曾正确地指出，只有“变成文化、日常生活和习惯的一部分”才能称得上可靠的成就。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取得了许多成就。在日常生活中，妇女新的社会地位是有目共睹的。在许多国家里，妇女的平等地位至多不过在形式上载入了宪法。而我们的情况不知要比它们强多少！

我对这一方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多年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多年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有一位妇女领导这方面的工作，她就是英格·朗格同志，在五十年代她曾是青年联盟书记。我们党总是把与妇女平等地位有关的任务及问题视为全社会的事情。它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精神文化的深刻变化联系在一起，因而不能让妇女单枪匹马孤军奋战。

我回想起六十年代中在我国工业中心卡尔·马克思城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我曾批评某些经济管理干部，他们虽然承认男女的平等地位，然而实际上却又认为妇女不如男人。即使对党员来说，尽管在理论上完全赞成男女平等，但是对妇女的能力得出相应的结论也不那么容易。如今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克服。妇女已经开始参加工作、参加计划、参加管理。例如，在1979年地方选举中，有72,301名妇女和姑娘当选为代表，占代表总数的36%。在人民议院和专区议会中，妇女所占比例也和上述数字差不多。

由于我曾负责妇女工作，我常有机会和妇女交谈，她们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贡献给我国发展的负责精神使我深为感动。例如，我访问新建的博克斯贝格发电站时，认识了高度现代化的电站控制中心的一位青年女主任，她对电力问题讲得如此头头是道，部长也不见得会讲得更好些。当人们看到受过教育的精明能干的妇女

正在成长起来时，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

即使在领导岗位上，妇女也不比男子差。目前，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岗位上，有近三分之一是妇女。其中，在工农业领导岗位上妇女占六分之一；在高等学校和专科学校的教育系统占三分之一；商业系统占二分之一。此外，半数的法官、四分之一的市长、五分之一的县级医生是妇女。这些比例数字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妇女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早已不是凤毛麟角，而是一种发展趋势，而且今后几年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家庭发生的变化。有人诋毁我们共产党人不喜欢家庭，甚至说我们要破坏家庭。众所周知，对这种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早已作了回答。甚至130年后的今天对他们的回答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国结婚人数增加，不仅反映了人大当婚的通常社会现象，它还说明，青年人在我国感到安定、幸福和有社会保障。婚姻和家庭，在我们这里早已不再是妇女和儿童的供养所。其基础不是由于经济上的逼迫，而是爱情、互敬、互谅和互助以及对孩子的共同责任。大多数丈夫也正是为孩子着想，才更珍惜妇女就业。因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喜爱儿童是民主德国的同义词。我党党纲指出：“夫妻之间完全平等，妇女经济上的独立以及平等地参加社会生活，为结婚和建立家庭中的相互关系创造了新前提。孩子则是婚姻的幸福和意义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已为多方面所证实。

我国有一个优良传统，每年国际妇女节我们都要在中央委员会大楼为有贡献的妇女举行招待会。大家知道，正是克拉拉·蔡特金70年前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全世界妇女争取和平、民主、社会进步、平等的日子。我作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每年3月8日接见我国的先进妇女和姑娘们，这决不是例行公事。

参加招待会的既有战后初期在斗争和生活中历经考验的积极

分子，也有优秀青年女工和出色的农业社女社员；既有建国初期的老一代，也有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既有出众的女工程师和能干的女教师，也有世界著名的女运动员、女艺术家和每日操劳的母亲们。

令人难忘的还有1975年我会见前来参加国际妇女年世界代表大会的142个妇女代表团的情景。民主德国的首都是这一重要会议的东道主，我荣幸地到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代表。这次国际性聚会变成了重要的国际大事，会议的结果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各大洲2,000多位妇女代表云集柏林。据我所知，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世界观和信仰的妇女走到一起，共同表达她们争取平等、发展和和平的心愿，是前所未有的。她们鲜艳的民族服装和不同的肤色呈现出人类共存、美好和乐观的景象。她们的决心清楚地表明，依靠妇女的力量能够实现数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世界和平。又有谁能比她们更懂得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幸福和富裕只有在和平环境下才能实现？因为正是妇女和儿童受到战争的后果和创伤最为深重。

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们亲身感到，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的宿愿。这一点可以从她们的讲话中听出来。她们很高兴有机会看一看我们的国家。毕竟有一半以上的代表是第一次来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许多有悠久传统的国内和国际妇女组织的代表，这些组织长期以来把实现妇女平等作为她们的宗旨。特别是从她们口中听到，她们钦佩民主德国建国以来为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所作的工作，这使人感到欣慰。我深信，各国妇女满载着从我国获得的深刻印象和新的认识回到了她们负责的工作岗位。

必须考虑到，我在这里所说的我国生活的变化，都是指第一代赢得平等地位的妇女。不难想象，我们的后代将会为我国的进一步繁荣昌盛献出更大的力量。如果说我们党唤醒了妇女的力量，保证了她们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那么单就这一点也足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人道性和进步性。

第二十七章

带领青年为共产主义前途而斗争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前夕，数十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云集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参加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火炬游行开始时，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和一名台尔曼少先队员从革命的德国青年工人运动老前辈手中接过一个点燃的、象征革命之火的火炬，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与此同时，各处游行的人们举起拳头，致以台尔曼式的敬礼。

这情景使我回忆起 1949 年 10 月 11 日那次历史性的火炬游行。那时 20 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对德意志土地上刚刚诞生的第一个工农国家和她的总统威廉·皮克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30 年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男女青年们重温 1949 年民主德国青年们发出的誓言：拥护社会主义祖国。

这也使我想起 1932 年 11 月我和恩斯特·台尔曼的一次会面。当时他把共产党人争取青年参加革命称之为革命运动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当我们分手时，他叮嘱我们说，没有青年参加的革命只能是半截子革命，革命是不会胜利的。我们一直努力按照他的思想去做。我们成功地把革命工人运动的阵地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把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爱护和发展青年人和老年人结成的战斗集体看作共产党人最光荣的职责。

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我们的青年政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七十年代初期，民主德国的内部和外部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形

势进一步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两大社会制度在思想上的争论，特别是在思想上争夺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的斗争越演越烈，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也影响着青年的思想意识。于是对青年的教育、业务能力、思想和道德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代人了解社会主义的途径不同，不会和他们的父辈一样，通过同一条途径，同一种形式和同一种环境。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和现实的社会主义休戚与共，他们从实际中和自身的经历中体验着社会主义。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国现在的青年再也不用通过亲身的感受去认识剥削、法西斯和战争，他们在安定的环境中成长。

1973年夏，来我国首都柏林参加第十届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的客人们可以亲眼看到我国青年既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对我国青年来说，反帝团结极为重要。我作为民主德国联欢节全国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了活动的安排。来自140个国家的25,000多位代表来到我国，他们代表着1,700个国际的、地区的和国家的青年组织。50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和台尔曼少先队员同他们一起观看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联欢节开幕式是令人难忘的高潮。在世界青年体育场，我和上万名男女青年一起观看了联欢节代表团入场式，我的思绪回到了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那次联欢节也在这个体育场举行开幕式。现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那时我们的国家刚刚走上自己的道路。如今世界青年代表们看到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一个深受世界尊重的主权国家，在这里，社会主义已经不可逆转地获得了胜利。经过首都居民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的首都柏林已从一片废墟中再次复活，发展成一座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城市。许多参加过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成员，如今作为优秀的工人、党的干部、议员、部长、将军、科学家和总经理欢迎这次来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代表们。

1973年8月3日下午，我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来到首都中

心的亚历山大广场，那里能够最清晰地感到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脉搏。不一会儿青年们把我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由衷地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行列，参加他们的交谈。我们彼此说说笑笑、唱着歌。我们几乎左右不了我们要去的方向，最后我们来到电视塔旁边的“团结中心”。一个长得十分俊秀可爱的越南姑娘站在我的面前，她梳着两条过肩的长辫。她叫武氏莲，是山美村大屠杀中唯一的幸存者。她对我们共和国在越南人民解放战争中给予越南人民的巨大支持表示感谢。过了一会儿，我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决定把过去几年中给予他们的贷款改为无偿援助。

第十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形成了世界青年代表反帝团结、要求和平和友谊的激烈宣言，发展成世界青年一代对和平、安全和各国人民之间合作的不容忽视的支持，表现了他们要求社会进步和行动团结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同时也证明了我国青年在世界青年中赢得了巨大的威望。

我已写过我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新党纲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活动，与此相联系，我也深入地研究了青年政策的理论问题。把共产主义教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时刻已经成熟。在这方面我们基于这样的认识：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紧密相连的，在我们继续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我们同时也就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因此，以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青年就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我的经验，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对青年所起的榜样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总是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和台尔曼少先队的青少年努力按照模范共产党员的思想去工作、学习和生活而感到高兴，我鼓励他们学习恩斯特·台尔曼的榜样。因为台尔曼热爱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他是一位热诚的国际主义战士，是苏联的朋友，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人类最崇高的事业——把工人阶级从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奉献给了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1973年12月10日，当我把第一批红领巾交给我们最年轻的人——台尔曼少先队员时，我请他们记住，要以恩斯特·台尔曼为榜样。红领巾是工人阶级旗帜的一角，工人运动的许多先辈小时候都曾系过它。红领巾把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对和平未来的希望连在一起。我们把红领巾交给孩子们，因为我们确信，他们将把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传统、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儿童运动的传统继承下去。

我和少先队员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想起这样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孩子们是真正享受特权的那部分人。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代青年能象我们今日的青年这样得到爱护。我们这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红色少先队员当时所梦想的东西，今天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变成了现实。社会时刻关怀着儿童和青年。

我们党的纲领中，提出要对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信仰和品行教育。对这件事共产党员都要有特别的责任感。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诚然，对青年人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决非一项新任务，早在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期我们就为此进行过斗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从一开始就已重视这个工作。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曾一再热烈地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加里宁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文章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在我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不仅肩负着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使命，而且要开始为建设发达的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这对他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未来的需要。

在研究青年工作的方法问题时，我总是求教于马列主义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党卓有成效的、经过考验的青年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在我建议青年们掌握马列主义时，我是基于个人的经验。为了充分发挥青

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在斗争中始终站在正确的一边，青年们需要工人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

正如列宁正确地指出的，从书本上得到的共产主义知识，如若没有工作，没有斗争，则一钱不值。我们党坚持这样的原则：只有信任青年，使用青年，青年才能顺利成长。在我们社会里，无论解决什么任务，我们总是把任务和青年一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联系起来。因此，我总是尽力让青年发挥他们的进取精神，使党依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巨大社会力量。

没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民主德国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社会各部门很多胜任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曾在青年团的行列中经受了革命的第一次考验。政治活动的第一步对一个人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我们青年政策的所有经验都说明，只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才能代表男女青年的根本利益，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人生的意义问题；才能有效地组织青年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为友谊和反帝大团结而斗争。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从她建立之日起就忠实地站在我们党的一边。在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上，她对加强和保卫我们的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自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我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时起，我深深地懂得，各级党组织的党员对青年团的政治领导和思想支持是何等重要！因此，我总是极为注意给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提供各种帮助。只要有可能，我就同青年团的干部一起商量。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的每次讨论都会产生有益的启发。现在，埃贡·克伦茨领导着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书记处，他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我一起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总是尽可能找机会会见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并同他们商量。我根本不能想象，不接触青年，我的工作将会是什么样子。就如同我了解的恩斯特·台尔曼、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那样，我经常参加青年团组织的活动，向年轻人解释党的政策。

党和青年团之间的关系是信任的和为了共同事业进行同志式合作的关系。把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作为统一社会党的积极助手和后备军,把我们党的纲领作为她的活动基础,是我们青年政策的一个重要成就。我们以极为喜悦的心情注视着这一发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党历来从青年团中选拔接班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政治上的成熟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

把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项目交给青年去做,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好的经验。目前,我国各个领域共有9万个青年项目。1974年10月,我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建议青年团把从奥伦堡到苏联西部边界一段由民主德国负责铺设的天然气管道作为青年项目承担下来。这是一项关系到满足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九十年代能源需求的重要项目。民主德国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参加了开发奥伦堡天然气和铺设2,750公里输气管道的建设。

在经互会对这项工程作出决定后,从一开始我就相信我国青年的力量。今天我们可以说,结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料。6,000多青年工人和比他们年长一些的同事在异常困难的地理条件下创造出了真正的英雄业绩,到1978年10月7日,主体工程的进度比计划规定提前了3个月。青年人的成就是我国经济力量的源泉之一。

现在,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们在进一步美化社会主义首都柏林的工作中正在完成一项民主德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青年工程,它包括住房建筑、水电供应、交通及电讯项目。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已有12,000多青年工人来到首都,参加“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柏林倡议”。1976年以来,他们和柏林的青年人以及比他们年长一些的工人一起建设了住房、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商场和新工厂。

同民主德国各个历史阶段一样,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青年工人再次表现出他们是我国青年一代中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近几年中,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所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主要是青年工人的功劳。在企业的主

义竞赛中，青年工人集体常常是尖兵。他们的口号是，每天都要有好成绩，显示出青年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干劲。

最近几年中，我们党对工厂中的青年突击队特别重视，从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目前有33,000个这样的青年突击队。他们从每天的劳动中汲取共产主义思想和情操。无论是在工厂和教育机构，或是在军事单位，这是我和青年们交谈时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印象。我对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他们的集体活动、休养、教育、业余生活或者体育活动都感兴趣。青年人对他们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这使我感到高兴。他们不必为找不到学徒岗位、或者找不到工作而伤脑筋。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我们的青年政策应该使每个青年都能不断丰富他的知识，开阔他的视野，负责地完成他的社会任务。我们创造条件，以便每个人都能发挥其天赋和能力。

早在1972年，我受我们党中央的委托，向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建议，和政府共同制定一部新的青年法，在经过公开的广泛讨论后，1974年1月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通过了新的青年法。该法已经是民主德国历史上的第三部青年法，它不仅帮助男女青年好好地工作和有成效地学习，而且帮助他们有意义地度过业余时间、休养、锻炼以及艺术欣赏。在制定青年法的过程中，首先是吸收青年人自己参加这项工作。在24万多次活动中有500万人发了言，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提出了近5,000条建议，对青年法草案提出了200处修改意见，这说明青年人政治上的成熟。

我们常常听到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报道，大批青年失业、吸毒、酗酒和道德败坏，我们这里没有这类抱怨。诚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个别青年人的举止有时也令人担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的确立，我们彻底地消除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我历来反对只从外表浮浅地评价年轻人。关键是他们基本的政治立场、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态度、他们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他们的整个生活。

1979年圣灵降临节期间，70多万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成员和

少先队员聚集在我们首都，参加全国青年联欢节。这次活动使我受到鼓舞。当青年们的游行队伍兴高采烈地经过主席台时，他们高呼“德国统一社会党——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民主德国是我们的祖国”。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前景在这些青年人的手里是可靠的。

我们有一大批青年战士，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政党血肉相连，他们自豪地拥护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并以国际主义精神行事。我们的青年是一代有政治教养的青年。他们讲究效率、满怀信心、富于乐观精神。他们忠于社会主义革命，并随时准备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们的任何任务。

党同青年的紧密联系产生于我们的目标和正在成长的一代的切身利益的一致性。青年们过去和现在总是愿意选择先进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体现这种先进力量的就是统一社会党。在过去30年中，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之间、社会主义和青年之间，一代一代结成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

我国的乐团、剧团、合唱团和歌唱家小组在世界许多地区成功地登台演出。我国画家的画展、作家写的著作，或者我国收藏的文物珍宝吸引着数以万计的观众和读者。从中的确可以看出人们对民主德国文化生活的巨大兴趣和重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达，为人们提供了社会保障。但是正如所说的那样，人们的生活中光有面包还不够，我们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是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不是把文化看成美味的佐料，而是把它视为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基本因素。这些尤其能表现出人的社会主义面貌。

我们正是从这种思想出发制定和贯彻我们的文化政策的。这项政策鼓励作家、画家、导演、演员、作曲家和音乐家，以及所有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创作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使之具有鲜明的特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主德国的文艺工作者在德国文学艺术史上揭开了新篇章。

过去的30年中，我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和平的责任、反法西斯的思想、反帝团结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都在思想文化生活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中，内容、主题和创作方法都得到了充实和发展。这很好。凡是社会主义社会里大量的社会现象，我们的文艺中就应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所以我多次强调，只要从坚定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艺术来说没有什么禁区。

我国不少艺术家努力以党的立场和艺术的方法令人信服地表现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冲突和矛盾。如果抓住了问题,并按照可能去解决问题,那末,这只会有益于社会进步。众所周知,生活是在矛盾中前进的。并且早已证明,矛盾和解决矛盾是发展的最深刻源泉。我们对于探索新的主题和创作方法总是理解的,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是教条。

然而,我们的所有经验表明,艺术家在人民生活中间需要有一个立足点,在我们时代的斗争中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一个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艺术是赞成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艺术决不会满足于一知半解,而会着力去刻画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处于辩证的和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的社会成员。我同艺术家的接触和与他们推心置腹的谈话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我们把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与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看作社会主义艺术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艺术家很敏感。所以我注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进行诚挚的同志式的合作。在同艺术家讨论政治和世界观问题时,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耐心,同时也要理解艺术创作的特点。

这些是我长期与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事的经验。在这里我想起一个例子,例如,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1948 年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写的一支《建设之歌》,保尔·德绍为它谱了曲,这首歌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建设之歌》因为歌颂新社会和新国家明确的政治方向,以它那催人发奋的曲调正是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当然,布莱希特写词决非偶然。早在三十年代初,我就知道这位诗人是《团结之歌》、《统一战线之歌》、以及一些有说服力的政治诗,特别是根据高尔基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母亲》的作者。他历来愿意用他的艺术支持进步政治力量。

1954 年民主德国政府请布莱希特主持“席夫鲍尔达姆”剧院,从此这家柏林剧院赢得了世界声誉。布莱希特作为国际著名诗人

和导演可以在新天地里实现他的思想。由于他的艺术作品的深刻的政治特点，他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休戚与共的关系以及他那炉火纯青的艺术，使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当我们 1978 年举办科学和艺术活动纪念布莱希特 80 诞辰时，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把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和他的夫人著名演员海伦娜·韦格尔的住所改为布莱希特中心；以此来表达我们同这位伟大艺术家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布莱希特中心揭幕时，我同诗人的女儿巴巴拉·沙尔—布莱希特、演员埃克哈特·沙尔、导演曼弗雷德·韦克韦特、国际上有名的歌唱家兼演员吉泽拉·梅以及柏林剧院的其他成员的交谈使我确信，他们将遵循其导师和榜样的思想，继承和发扬他的事业。

五十年代我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的身份参加文化协会主席团，常常见到约翰内斯·罗·贝希尔。青年时代他是表现派诗人，背叛了他的资产阶级出身，后来成为工人阶级的忠实战友。二次世界大战后，贝希尔于 1945 年 7 月 3 日在柏林成立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知识界民主人士代表加入了这个协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歌词就是出于这位诗人之手。歌词中的第一句就贴切地描绘出我们艰难的起步：“从废墟中站起，转向未来。”汉斯·艾斯勒为国歌谱了曲。贝希尔也是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的工作为民主德国艺术家们直接参加国家领导工作树立了榜样。我们一直十分重视艺术家和文艺作家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启发并加深他们对我们斗争的具体条件和发展中提出的新任务的了解。

贝希尔为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写了许多新的歌曲。其中有汉斯·艾斯勒谱曲的《蓝旗歌》。1950 年举行的第一次自由德国青年联盟全国会议上和一年以后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放声高唱这支优美曲调的《蓝旗歌》。在这届联欢节上我认识了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我对他和年迈的丹麦作家马丁·安德逊·尼克索都很尊敬，因为他们坚定地赞成和平。他们

两位的作品都是社会主义文艺同人民大众及其斗争紧密结合、并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范。

那时歌曲不少,但戏剧界情况却使我们担忧,因为没有几部对青年观众有积极教益的剧目。所以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中央考虑如何改变这种状况。1950年初,我们委托剧作家古斯塔夫·冯·汪根海姆为圣灵降临节的青年聚会写一个剧本。然后和他以及后来的导演汉斯·罗德贝格一起讨论了剧本的初稿。这次谈话对双方都颇有收获,结果证明:如果一个艺术家所接受的任务与他自己的基本愿望相一致,那么他就会从中得到鼓舞。《你就是主人》这部剧作获得了明显的成功,民主德国的青年从剧中人物中认出了自己。

在青年艺术家会议和代表会议上,我们讨论青年组织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文娱活动。阿诺尔德·茨威格在给我的信中祝愿1951年4月召开的青年艺术家代表大会能“通过新的创作使古老文化年轻化,并使大胆表现我们社会问题的艺术创作放出光彩”。在同库尔特·巴特尔(古巴)、维利·布莱德尔、卡尔·格林贝格、斯特凡·赫尔姆林和扬·科普洛维茨等作家的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我们表示期望看到反映新的生活和劳动的书。由于我负责青年团出版社,所以我常常和作家们在一起,至今我仍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在筹备1955年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时,我们得到了象托马斯·曼、赫尔曼·海塞和阿尔伯特·施魏策尔这样的伟人的支持。1955年1月我们召开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第二次文化代表大会。在开幕式上我说,我国青年重视和保护我国人民的文化遗产,他们把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而发挥自己的所有创造力看作生活的意义。

1973年和1978年我作为来宾参加了作家代表大会。我看到了我国艺术家协会中活跃的思想,当然不会没有意见分歧,相反,有时争论还相当尖锐。也必须考虑到,我们的艺术家不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每个作家,只要其作品有利于和平、人道主义、团

结和现实社会主义，那他在我们民主德国的文化生活中就会有他的位置和空间。约翰内斯·博布罗夫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虔诚信奉基督教的作家从他的立场出发，能够做出多么了不起的成绩。

个别艺术家没有和我们同走一条不平坦的、有时是艰难的道路。布莱希特早就及时指出，他们畏惧铺路人的艰辛。依我看，这样他们就没有忠于他们的艺术道德。在阶级斗争中人们必须做出抉择，这边是革命运动，那边是反革命；这边是社会主义，那边是资本主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谁想走中间道路，他的艺术就会停滞不前。

每当我参加作家代表大会时，到德累斯顿中央艺术展览会、或到美术学院参观时，我就为我们在艺术家中赢得了许多战友而自豪，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我见到了革命工人运动的歌唱家恩斯特·布施；坐在从前的贵族菲特·冯·戈尔森瑙和世界闻名的共产党人作家路德维希·雷恩（他曾作为国际纵队的军官参加过支持西班牙人民的自由斗争）旁边。我看见那白发苍苍的老人安娜·西格斯，坐在她身边的是从前的电工赫尔曼·康德，现在他接替伟大的女作家西格斯担任作家协会主席。维利·西特给我解释他那些表现民主德国工人阶级的画和弗里茨·克雷默的具有鲜明斗争性的雕塑。美术家协会主席康拉德·沃尔夫、米夏埃尔·捷斯诺—黑尔或者托恩迪克斯等给我看他们制作的电影。对我来说，听彼得·施赖厄尔或特奥·亚当唱歌是一种享受，他们的歌声在许多国家的歌剧院和音乐厅里激励着听众。

1972年8月，当保尔·德绍把他为贝尔托特·布莱希特的《海伦堡的报告》中的“孩子们的请求”谱曲手稿交给我时，我感到高兴，这是他们两人1951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和大学生联欢节时献给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的一支歌。保尔·德绍给我这件宝贵礼物使我们回忆起1951年的合作，并且告诉我，通过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他的艺术创作受到了巨大鼓舞，此后，他一直

把他谱的新作寄给我。我新收到保尔·德绍的第五合唱曲，包括混声合唱、低音部、独唱和大型乐队，曲名叫“迎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年轻作家和艺术家们继往开来，通过他们成功的书、画、电影、戏剧、音乐会、交响乐和歌曲把老一辈的事业继续下去，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巨大成就。

同作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包括关心他们工作的物质条件。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艺术家完成责任重大的工作设立了一切必要的机构。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的经济可能，不能满足所有的愿望。但是与国际上相比，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还是相当好的。培养艺术新生力量方面情况也是如此。

七十年代，我们党的政治局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作出进一步改善艺术家生活和创作条件的决定，特别是关于培养人才，病老保险以及为他们提供住房和工作间，提供休假地和安排考察访问等。艺术院在柏林赫尔曼—马特恩大街——我国最高人民代表机构过去开会的地方——得到了一幢新房子。在准备民主德国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过程中，我会见了作协主席团的成员。虽然我们主要谈了艺术和政治问题，但同时也谈及书籍出版方面的物质条件问题。两者是不可分的，经济和文化属于一个整体。我国国民经济的效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决定性的。

在我小的时候，对工人子弟来说，想要掌握文化艺术知识是多么困难！父母那空空的钱包就是一个限制；在小学里，我们只能学到必须学的一点东西。还是参加了少年斯巴达克同盟和共青团以后，我才有机会了解一点文学艺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我们的国家里情况相反，我们消灭了受教育方面的垄断，向人民的孩子传授知识，使他们能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为公民们创造较好的条件，使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为了社会的利益运用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充分发展他们的个性。德国统一社会党党纲中规定的明确目标是全面增加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和精

神财富。这符合我们的经验，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既要有一个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又需要有高水平的文化和教育、社会觉悟和人的内在的成熟。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文化政策作为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推向前进的总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继承了台尔曼的德国共产党的传统，始终把思想和文化生活问题看成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核心问题，夺取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核心问题。这与我个人的经验也是符合的。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中，在对付威胁生命和文化价值的法西斯危险的殊死斗争中，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改造世界的学说中汲取了必胜的信心，我们也从文学和艺术中得到了强大而丰富的力量，振奋了精神。正如弗里德里希·沃尔夫曾说的那样，从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条件中形成了最基本的认识：艺术也是武器。

我也很高兴回忆共青团组织的晚会和青年工人之间的社交聚会，回忆为掌握丰富的艺术的认真精神，回忆我们演唱优美的德意志民歌时的欢乐与沉思。于是我们逐渐重视伟大的文化成就，努力掌握它，负责地保护它，以便这些伟大的文化成就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世界里能争芳斗艳，百花怒放。

我坚信，不尊重人民的创造性成就及伟大诗人和思想家的著作的人，决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列宁在1920年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苏联青年一代的一段讲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列宁说：“一个人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成为共产主义者。”正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使我越来越透彻地懂得，我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生活的革命性变革必须建立在人类文化迄今所创造的广泛基础之上，并使全体人民了解这些成就。保持人类和本国人民的人道主义文化遗产，创造性地继承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进步的东西，都属于我国今天文化政策中行之有效的原则。

当德国人民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出来之后，我们面临克服几

百万人头脑中的迷惘和不知所措的艰巨任务，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和艺术固有的强大动员和教育作用。艺术作品对人类尊严、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突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人民在其丰富的文化中创造了真正的人道价值，但是它被法西斯独裁统治最无耻地玷污和歪曲了，我们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我们经历了我国人民及其青年如何把德意志古典艺术的传统著作，如莱辛的《智者纳旦》、歌德的《浮士德》和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作为人道使命和社会责任继承下来，并把它和我们为实现新社会的斗争最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克服民族之间的仇恨和对人的蔑视方面，德国反法西斯艺术家和其他各国人民中的进步作品起了重大作用。

我担任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主席期间，深切地体会到人道主义文化遗产在实现思想和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作用。我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无数次青年联盟组织的晚会上，年轻人第一次感受到海因里希·海涅的诗的感染力；听到了在法西斯德国遭迫害和受放逐的文学家的名句。在我国，歌德、巴赫、贝多芬和席勒受到全国和全社会的极大尊敬。当时，自由德国青年联盟通过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把全国的年轻人团结起来，在民主德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影响。最近几年，我们通过对贝多芬、莱辛、爱因斯坦以及对人类人道主义遗产的其他重要代表人物的积极评价继续了这一进程。每年举行的“亨德尔节”和“莎士比亚日”在我国的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我还记得，1945年后，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在许多青年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反共反苏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到为他们打开新天地的书。我想，我在书中其它地方已经提到过来自列宁故乡的书，其中包括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和卡塔耶夫的《白色孤帆》，这些书在澄清思想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通过这些书和其它国家的进步文学和艺术作品，增强了对各国人民文化成就的尊重，克

服了民族偏见。

今天，马列主义思想、人道主义与和平思想对我国公民的思想方法和处事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文学和艺术也帮助我国千百万人理解，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同全世界一切为和平、自由、民主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力量的国际团结，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我国，文化已不再只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劳动群众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整个工作从一开始就执行了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第一次为形成真正的人民文化创造了前提，而这个文化的主力是社会的进步力量——工人阶级。

1959年，比特费尔德电化学联合企业的一个青年突击队向所有生产单位发出倡议，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工作、学习、生活。这件事有重要意义。那时很多人把它看作一次短命的政治宣传运动，然而经过我们党、工会和青年团的推动，它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数百万劳动者在他们的集体中都参加了这一运动。

按照社会主义方式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将决定今后社会主义新人的发展。决定人们文化生活的不只是艺术，而且主要不是艺术。从根本上讲，决定性的是一个社会对人民的创造性和能力，对人才的培养和活动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是狭小的还是广阔的。因此我们党主张广义的文化观，它既包括传播马列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劳动环境和创造文明的环境，也包括人与人关系的文明、保护和传播人道主义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化创作以及接触世界文化财富。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当我到周围的邻国或遥远的国度访问时，或是在各大洲逗留期间，我总感觉到，人道主义的艺术和文化使各国人民之间更加接近。只要有会，我总是喜欢看一，听一听，艺术怎样表现人民生活方式和内心深处的追求。

无论在何处，我通过接触别国人民的文化和艺术、现代的创作和世界文化的遗产都加深了我对他们成就的敬佩和对劳动人民创

造力的坚信不移。无论在何处，那里的人民总是通过艺术表达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他们的欢乐、他们的忧愁和困难，以及他们要求建立符合人类尊严的社会的坚强意志。

我从接触苏联等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人民的文化和艺术中知道，我们这些国家的文化对促进各国公民在我们大家庭这个更大范围内的友谊、思想交流和休戚与共之感有巨大的作用。我敬佩地欣赏了印度的文化古迹，观看非洲人民的舞蹈，听到了他们歌声中那古老的节奏和旋律，表示出对新生活的向往。在过去30年里，我有幸两次经历并参与领导世界青年联欢节。这是各国人民的艺术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的大检阅。在我的一生中，我曾多少次在不同地方和各国劳动群众一道，用我的母语唱起《国际歌》。这是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歌，它已成为工人运动的一大特点。

在当代世界范围的争取和平和社会正义的斗争中，各国人民的艺术和文化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不可缺少的推动力。进步的人道主义的文化交流有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理解，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新气象。

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向一切适合我们的和有价值的优秀文化开放，我们对世界开放，同时我们也用自己的文化支持人类开拓通向未来的道路。

第二十九章

我们的民主

迄今为止我已经写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业已回答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想再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几点看法。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舆论工具千方百计地象诽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诽谤民主德国，把她说成是“反民主的”，“极权主义的”；却把资本主义社会打扮成民主的化身。他们总把资产阶级制度与民主等同起来，并把它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

我国人民与法西斯打交道的惨痛经验，加强了我们的并非是从1933—1945年期间才获得的认识，即在垄断资本统治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我只想提醒一下，法西斯政权来源于魏玛时期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当然，这个魏玛共和国与帝国相比肯定是一个进步，但是继续保留旧的所有制和权力结构则是魏玛共和国覆灭的根本原因，它容忍极端反动派在几乎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挖了民主的墙脚，最终推翻了魏玛式的民主。

当然我并不否认，资产阶级民主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实现他们的某些要求，并对资产阶级政府敌视民主的阴谋和反社会的措施表示他们的不满。然而，这只是允许工人阶级争取较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仅此而已。我们马列主义者也不否认，与其它统治形式相比，无论是法西斯统治、军国主义统治或是其它反动独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是有其长处的。它的长处就在于，虽然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会遇到最大的阻力，但他们仍可

以保护其切身利益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合法地支持和平、民主和社会保障。然而，这丝毫也改变不了资产阶级民主最终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这个事实。民主问题同国家的政权问题始终是紧密相连的。谁掌握政权，谁就决定这个国家的性质，并决定民主的实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与迄今为止的所有德意志国家的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们这里，从一开始就把康采恩势力、银行家、大土地所有者、法西斯分子、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者从政权中排除出去了。我们想要做的和要达到的目的是让全体劳动人民参加对社会发展的一切基本问题的讨论和决定，直接参与领导国家、经济、教育和文化；直接参与完成各项任务和监督共同决议的贯彻。

我们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并将继续走下去。我们的民主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相联系，我想再次提及1945年到1946年进行的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以及关于没收纳粹和战犯财产的公民投票。我还想指出为制定宪法和其它根本法典所展开的公开讨论。由此可见，民主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我们认为，决定性的方面是物质生产。我们尽一切努力，保障创造社会财富和为未来创造物质基础的人能真正行使政治权利，他们就是工人、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这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所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到工厂大门前为止，任何共同决定之类的漂亮话丝毫改变不了这一点。

在鼓励全体劳动者参加民主活动方面，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工会，发挥了巨大作用。记得1972年6月26日至6月30日我在柏林召开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曾对许多兼职工会干部的工作和对全体工会会员取得的成绩向代表们转达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谢意。我说，只有和强大

的、积极的工会一起，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的话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197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柏林召开第九次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大会，我欣然应邀参加。这次大会的气氛极好。它显示了工会的统一和团结，显示了她的战斗力。2,967名工会代表代表着16个专业工会和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830万名会员。我高兴地注意到，与会代表中多数是妇女。大会的报告和讨论反映了工会组织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一切生动地证明，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方面，工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

大会代表们对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特别是对进一步实现总任务的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正是这个总任务向工会展示了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新的巨大可能性。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一致支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说明了我国工人最大的阶级组织支持迅速提高民主德国经济力量的政策。许多工会会员对我说，这项政策决定并扩大了我们的社会政策的活动余地。

我们的生活实践证实了这一认识。数百万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都有了这种认识。在生产班组、劳动集体、工段、部门、工厂和联合企业里，对五年计划和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民主讨论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生产计划的讨论都在工会领导下进行。1979年对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讨论与工会选举联系起来决非巧合。

在39万余次选举集会上，对民主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问题也进行了创造性的讨论。大约750万劳动者参加了讨论，约占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全体会员的86%，讨论中发言达200多万人次。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批评意见，并就民主德国有效地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建议。近四分之三的建议和意见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经济能力。长期以来，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公开表示个人的看法是理所当然的事。

工会不仅组织有关生产计划的讨论，还组织劳动者参加实现我国经济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包括不断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通过与劳动者的多次谈话我了解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大大促进了创造性的劳动，使劳动者感到需要和同事们一道进行有意义、有成效的劳动。同时，劳动竞赛也为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性，为革新和发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人们这样做，除了深信是在参与行使权利，决定今天的和平与安全，决定更美好的明天，还会有别的什么动机呢？广泛地参加讨论生产计划和劳动竞赛，表明他们积极参加社会民主活动。可以说，在我们这里，每天每时都在发扬民主。

正因为工会如此重要，所以在1974年10月颁布的宪法中给予工会以更加广泛的权利。宪法规定，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作为劳动人民最大的群众组织，有权积极参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有权提出法律动议和对维护受法律保护的劳动人民的权利实行工会监督。

在这方面工会有效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例如前面提到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向人民议院提出了制订一部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法的建议。当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兼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哈里·蒂施向最高人民代表机构说明法律草案时，他能够证明，草案是工人们自己提出来的，符合工人的要求和利益。有将近600万劳动者参加了工会组织的对该法律草案的公开讨论。收到了147,806项建议、意见和询问，其中包括39,000条修改和补充意见。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了认真的考虑，结果对法律草案作了390处内容上的和144处文字上的修改。这样民主德国的劳动人民制定了他们自己的劳动法。

1975年6月19日颁布的民主德国民法法典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有重要分量。它的制定自然而然地引起许多公民的关心，因为它关系到他们的权利和义务。为此，有过多次数讨论。制定新的民法的部分原因是，旧的民法法典是资本主义立法时期制定的

仍在执行的最后一部法律，由于社会的发展，它早已过时。26万公民参加了 8,500 多次完善社会主义民法问题的讨论会。提出了 4,000 多条建议和意见，结果对草案作了 260 处修改和补充。

劳动人民这样积极地参加立法活动，这样参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切重大决定，显而易见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质量。社会主义民主本来就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继续和扩大。更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权利和自由决不会自动导致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先决条件。

社会主义民主形成了自己全新的形式和传统。归根结底，它们是以参加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级和阶层的根本利益与社会进步的主力工人阶级的利益相一致为基础的。

列宁指出，如果有人以为，政权第一次从少数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多数被剥削者手中这一人类史上最深刻的革命能在旧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范围内完成，而无需建立新的民主形式和体现新条件的新机构，那就是最愚蠢的胡说八道。列宁讲的完全正确。所以说，把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作形式上的对比是错误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我把这一点理解为高度的民主责任。所以，作为党的干部、人民议院的代表和国务委员会主席，我经常尽力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使人民能够真正地、随时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权力。无论是乡镇、城市、县和专区一级人民代表机构，还是人民议院本身，通过代表的社会成分，为人民行使权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979年5月20日选出了地方人民代表 201,570 人，就他们今天的社会地位看，144,802 人，即全部代表人数的 71.8% 属于工人阶级；44,284 人，即 21.9% 属于农业、园林和渔业合作社社员；70,431 人，即 34.9% 具有高等和中等专科学校文化程度。妇女代表 72,301 人，占 35.9%；18 岁至 25 岁的青年代表 29,592 人，占 14.7%。从人民议院的社会出身来看，373 名议员是工人和职员；53 名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个体农民、园林工人和渔民；28 名来自知识分子阶层；31 名是独立手工业者；8 名来

自商业和自由职业；7名来自其它行业。

在各级议会中，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议席外，民主联盟的其它党派，如德国民主农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都有民选议员。我国的民主群众性组织——工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民主妇女联合会和文化联盟也是如此。

人民代表机构在其活动中实现了作决议、执行决议和监督决议的统一。无论是法律和决议的制定或者是贯彻，人民代表机构都不委托国家管理机关，而是和公民一道，在国家机关的协助下保证自己的职能。所有这些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代表机构能够制定法律并监督法律的执行。它对选民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我们这里，如果一个议员严重地违反了劳动人民对他的信任，在选民和他们的劳动集体以及政党和群众组织和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一致要求下，可以提出罢免他。罢免议员由相应的人民代表机构作出。

对我国的议员来说，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不只是选举期间的要求。正如我前边写到的，我常利用访问城市和地方的机会，了解居民的供应、上下班的交通和服务设施等情况。我注意商店的货架，关心街道和房屋的状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与当地党政领导会面之前，我已收集了许多情况，这样就便于对某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在我们这里，人民代表有义务对居民提出的愿望、批评、不满和建议进行调查，并认真地加以研究。因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口头地或书面地向人民代表机构、国家和经济机关反映情况。社会组织也有这种权利。法律规定，每个公民都可以要求有关当局在四周之内对呈文作出有根据的答复。这给我们的人民代表和国家干部带来了不少工作。同时，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也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加强公民的合作提供广阔天地。

与1945年我们开始时相比，我国公民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各方面的活动。他们或者在社会法庭、调解和仲裁委员会里工作，或者

作县、专区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参加学校的家长代表小组和家长委员会，出席人民代表机构的委员会和全国阵线的委员会；参与国营和集体商业咨询委员会和工农检查委员会或人民监督委员会等等。自愿在业余时间参加这些机构活动的公民人数就有几十万，并且还在逐年增多。

我国公民以多种方式，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需要，利用可能的机会，参加工作、参加计划、参加管理。这是有目共睹的。同样清楚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仅局限于选举，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选举也是社会生活的高潮。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每个公民的政治和社会积极性，它也促进每个人的积极态度。我们时刻不放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它还决定着我国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

我认为，企业集体和劳动者个人反映他们对政治问题和对我国社会发展看法的信件，以及有关个人私事的信件是党同人民关系密切的证明，也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去年约有15,000名各阶层的人给我写信，他们的建议常常对国民经济有巨大作用，因为这些建议包含着有益的启示，采纳这些建议，我们能够更快地发展经济。但是批评国家机关官僚主义现象的也不少，或者抱怨对他的个人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对这些问题我们都设法加以解决。

在给我的信中也常有令人高兴的内容，例如，施韦特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工人在给我的信中说，他们刚刚携家属乘我们的“各国人民友谊”号客轮从列宁格勒、里加和塔林休假归来，告诉我，他们在友邦的日子是难忘的。这次旅行是企业为取得优异成绩的工人组织的，他们强调，现在他们要以新的劳动成绩来报答。

大多数来信表明，公民很了解我国的法律，并支持实施这些法律。不少写信的人表示愿意帮助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为了迅速妥善地解决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同有关单位的代表、部长、大联合企业的总经理、或者同工会、民主妇女联合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及民主党派的主席一起研究。

向我反映自己愿望的人一年年增多起来。我们敦促大家不要轻视牵挂着人心的日常生活问题,更不要对此熟视无睹。1972年1月,马格德堡“恩斯特·台尔曼”国营重型机器制造联合企业的劳动者代表团来到柏林统一社会党中央大楼访问我时,我听铸工约瑟夫·克勒姆和女工海尔加·朔尔茨说,在新建住房分配中对企业职工照顾不够。然而恰恰应该是工人、农民先享受到他们创造的价值和生活条件的改善。马格德堡工人和其它专区的劳动者反映的情况足以促使我们作出根本改变。我们采取措施,使大企业更多地参与住房建筑,明显地改善农村社员和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我们还决定,60%的新建住房分配给工人和多子女家庭。

我们党的第八次党代会决定完成和超额完成1971—1975年五年计划的政治方针产生了深刻的积极效果,生活证实了我们的考虑和计划是正确的。所以1974年我受统一社会党中央委托,建议修改和补充民主德国宪法。宪法必须与我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相一致,必须适应我国的社会关系。宪法记载了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联盟,第一个德意志工农国家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它也记载了这样的事实,即民主德国得到了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承认,成为联合国内平等的一员。人民议院一致通过了统一社会党议会党团提出的一项法案,在这个法案的基础上,修改和补充后的宪法于1974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时开始生效。

自1949年以来,我一直是最高人民代表机构的成员,从1971年起任国务委员会委员。1976年10月29日,根据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并征得其它党派和民主联盟群众组织的同意,我被人民议院各议会党团的议员一致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把担任民主德国最高国家职务看作是自己的崇高义务,应该把我的全部力量奉献给我国人民的幸福。

作为主席,我要主持国务委员会的全部活动;任命和召回我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接受各国驻我国使节递交的国书和他们的离

任拜会。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还使我比以往更经常地会见外国领导人和政治家。我利用这些机会为我国的和平和安全，为各国人民的友好及和平共处而工作。

国务委员会履行宪法和人民议院的法律所赋予的任务，为加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巩固工农国家、加深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做出贡献。在国务委员会中，我同其他党派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们进行着友好而密切的合作。这种信任关系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我定期会见民主联盟和全国阵线的领导人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部分。我也邀请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会面。在这些讨论中，我们商量我国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讨论如何通力完成面临的任任务。

我们国家鼓励每一个人对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献计献策，谁也不会受到忽视，大家都有用武之地。也就是说，捍卫我们的民主，反对企图侵犯甚至破坏我们民主的势力，在这一点上我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一致的。在全国阵线中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合对此提供了保证。这是在过去 30 年中形成的，今后也将会经得起考验。

第三十章

克里米亚会晤

倘若一个人有可以信赖的同甘共苦的朋友，能与之坦诚相见地讨论最复杂的问题，遇到问题能够得到朋友的理解，那么他应该感到高兴。这种相互间的友谊有助于共同前进，努力建立这种友谊总是有益的。同样，这也适用于人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人民和我们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朋友是极大的安慰。

30年来，我们同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就是这种友谊，并经受了考验。这是我们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和我们盟国的领导人在柏林、在莫斯科、在另一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或其它地方会晤，总是我们关系中的高潮。我的朋友和战友们一定和我一样感到：这种会晤是日益密切合作的灵丹妙药。

在一系列会晤中，自1971年以来每年夏天在克里米亚与勃列日涅夫的会晤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些会晤的气氛是诚挚的、坦率的和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观点和共同的目标。这些会晤激励着我们为各国人民的幸福及其光明的未来，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新努力。

最初几年我们在克里米亚集体会晤，共产党、工人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各国领导人每次都讨论当前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勃列日涅夫和兄弟党的总书记或第一书记之间在夏天进行双边磋商。这两种形式各有长处。

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在比较大的集体里讨论最重大的国际问题。这种会晤和每两年轮流在缔约国首都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有些相似之处。双边会晤自然讨论得更深入一些。和勃列日涅夫的会晤一再为详尽地和不拘形式地交流看法和经验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从而拟定新的共同行动。

对于彼此联系密切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工人党的领袖们来说，从他们所肩负的政治任务可以理解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同志式关系。勃列日涅夫是一位热情的和平先锋、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干部和政治家，他体现了苏联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和最崇高的目的。他那坚强的性格和正直的作风一再给会晤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号人物来说，没有比和平更崇高的目标了，他不断地为和平努力，不懈地提出保障和平的新建议。他了解战争，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他为苏联人民战胜纳粹的野蛮统治战斗在最前线。因此，他对和平的热爱对每个人来说就更加可信。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和二十五大会上主动提出和平纲领，这些和平倡议在全世界已为人们所理解。他运用自己的影响，顽强地维护着共产主义的和平哲学。他把对人类的幸福的态度作为衡量每个国务活动家的最高标准。这是政治方面的最高道义。

我们会晤时，我每次都感受到这一点。勃列日涅夫惯于注意倾听对方的意见。在谈话中社会发展的新问题和国际政治问题一样得到重视。他不但为苏联人民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且看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即使探讨当今的复杂问题，他也是放眼未来，看到伟大的远景。

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战斗团结，民主德国同苏联的友谊，是我们成就的基础，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我国宪法的组成部分，是我们政策的中枢。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欧洲处于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界线上，华约和北约的前沿地区，但是她

的联盟关系保证她的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

那些历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国家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的人也知道这一点。过去他们曾想方设法要把社会主义德国从地图上抹掉，虽然他们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然而他们依旧死抱着这个无望的梦想不放。难怪他们总是攻击民主德国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因为这个坚实的屏障使他们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不过，他们迟早总会接受这个事实，民主德国同苏联的结盟是不可动摇的。

在我和勃列日涅夫的会谈中，民主德国同苏联的经济关系通常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国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一是同苏联进行的，反过来说，民主德国是苏联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两国经济和科技合作不断扩大。两国专业人员的协作、技术工人和青年突击队的交流、大型企业和科研中心之间的联合研究，在两国关系中已属司空见惯。

正如读者所知，我国加工工业的原料和燃料绝大部分是从苏联进口的，供应是按计划的、稳定的，总的说价格是便宜的，鉴于民主德国国内几乎没有原料，这种原料供应也就更形重要。

我献身共产主义运动已经50多年，遵循恩斯特·台尔曼的思想，对我来说，对列宁缔造的党和对苏联的关系永远是检验你站在哪一边的决定性的试金石，我总是站在苏共和苏联一边。在过去的30年中，我尽一切努力从各个方面加深民主德国同苏联的联盟关系。

这个联盟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上的。首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理想和价值观，即共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既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没有少数垄断资本家追逐利润；既没有失业，也没有通货膨胀。其次因为两国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的原则是“一切为人民，一切同人民商量，一切通过人民”，既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民族蔑视。再者就是我们共同致力于确保和平。最终我们还有共同的斗争传统，使社会按照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思想发生革

命的变革。

我每次到苏联都体会到这种共同点，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1971年4月，在马克尼托哥尔斯克那次经历丰富的访问中我就有这种感觉，当时我是出席苏共二十四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成员。当有人建议我把欧亚大陆交界处的乌拉尔山麓的这座城市列入旅行日程中时，我热烈地期待着这次访问。前面提到过，40年前，也就是1931年我曾第一次到过那里。

再次来到马克尼托哥尔斯克使我心情激动。那时我们曾热烈地讨论过，把这里建成一座没有资本家的、属于工人的、由工人管理的冶金巨城，这个理想如今已变成了现实。昔日安装简易活动房、搭帐篷和工棚的地方，今天已是一个拥有34万居民的交通繁忙的现代化大城市。居住在那里的冶金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都是受过高等或中等专科教育的人，交谈中他们既关心民主德国的科技状况，也关心国际问题。当时我们用镐、铲和锹挖地基的地方，如今已用电脑处理复杂的生产过程。马克尼托哥尔斯克已成为苏联最大的冶金联合企业，其钢产量占全世界的2%。

与联合企业的青年一代和老一代工人会面更有意思，青年一代已着手建设企业的未来，老一代工人还记得40多年前的德国年轻同志。在一次隆重的集会上，人们赠我一枚“马克尼托哥尔斯克老工人”勋章。这是美好的时刻。对马克尼托哥尔斯克的访问生动地体现了德苏两国工人携手并进的好传统，说明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进程。

1975年10月7日，我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着条约的签订，为扩大我们的联盟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我们之所以签订这一历史性条约，是因为我们确信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兄弟联盟和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之中是我国生存的基础。

这个友好条约是继1955年9月和1964年6月之后民主德国同苏联之间签订的第三个条约，它符合当前两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

义建设的内外部条件。它为联合我们两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潜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个条约是建立在普遍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关系的原则和准则基础上的，它合乎两国人民最切身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大家庭。它确立了直至2000年以后我们合作的原则和主要任务，包括了我们关系的各个方面。这样就把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提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友好条约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既包括严格遵守平等、独立、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也包括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以及保卫和平方面同志式的相互支援和亲密合作。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签订了建立在同一原则基础上的条约。通过所有这些条约，加强了社会主义德意志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

在缔结新的友好条约时，勃列日涅夫认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接近是条约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的接近是一个具有历史影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的、相互联系的和类似的因素日益强烈地显露出来，同时，国民经济和民族文化也进一步繁荣和充分发展。当然，在接近的过程中不会没有问题，也不会一帆风顺。因此，在踏上新的道路时要谨慎从事，不可忽视有关国家的历史差别和民族特点。我们同我们的伙伴——苏联和其它亲密的友好国家一致认为，成功主要取决于共同的努力和每个国家各自的贡献，即共产党如何引导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我们党意识到由此产生的义务，并全面地履行这些义务。

在过去30年中，包括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相互接近的进程具有多么重要的甚至是史无前例的意义。在签订新的友好条约之后，我前往伏尔加格勒（以前称斯大林格勒）以及其它苏联城市参观时，特别清楚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座伏尔加河畔的传奇式城市。1942年至1943年，在这座城市进行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大会战。如前所说，1947年我带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代表团第一次访问

了这座城市。那时它还是到处残垣断壁，一片废墟，但是生活的脉搏已经开始跳动。在我1975年访问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城市。在这里，人们深深地感到苏联人民的和平意志，这里的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特别是马马耶夫山争夺战。今天这里是一座庄严的纪念碑，它表现了苏联各族人民在战胜法西斯和拯救人类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是：应竭尽全力，使各国人民在和平中建设他们的未来。今天向所有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提出的要求是，无论他们持何种世界观、支持何种社会制度和对未来作何种设想，都必须努力维护和平，反对新的世界战争。

无论是在列宁的故乡乌里扬诺夫斯克和50年前我第一次去过的乌拉尔附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区，还是在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首都喀山，1975年10月访问期间我们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苏联人民的和平建设工作。他们希望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苏联人民由衷的同情和友谊，即使在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们也总是把法西斯分子和德国人民区别开来。

我们的会见表明，1975年10月7日签订的条约是两国人民之间真正的友好条约。

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经验、成就和问题，同样能扩大视野，从而对本国的事情看得更清楚。特别是与盟国和友好国家领导人开诚布公地对未来负责地交换意见和经验是极其有益的，每当我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如爱德华·盖莱克、古斯塔夫·胡萨克、亚诺什·卡达尔、托·日夫科夫、菲德尔·卡斯特罗、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尤·泽登巴尔、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或者黎笋会晤时，情况总是这样。长期的友谊和战斗团结把我和他们从各方面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高一级会晤当然只是我们合作的一种形式，必要时，我们还通过外交途径或其它途径取得一致。一星期不会见友好国家的大使、党政代表团团长和团员、部长、科学家或者社会组织代表，对我来说那是罕见的。

所有这些会见不仅是美好的，内容丰富的，而且已经成了一个传统。这些会见虽然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每一次又不同寻常。因为这些会晤中的不少想法后来在两国有关机构之间签订的协议中，在各部之间、企业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实际合作中，在日益扩大的旅游来往中，在文化科学成果交流中得到了反映。

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国家不分大小，享有平等权利。每个成员国既要履行共同的义务，也要履行由于自身的不同条件和可能产生的特殊义务。以共同的理想、世界观方面的共同立场和目标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没有使交换意见、对执行的结果和政治前景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成为多余，相反，它是我们取得成就不可缺少的前提。

从民主德国30年的经历看，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交流经验是最省钱的投资。若是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就是说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他人的经验，常常可以节约可观的人力和物力。借鉴别人的经验还有助于决策，能避免错误，有可能更好地利用一切物质和精神潜力。我们会晤时常常也对成绩进行正确的估价，这能使我们找出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会晤时，经济和科技合作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问题占有突出地位。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经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如何通过共同行动巩固和平、缓和国际局势并促进裁军，现在和将来都是会晤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自然特别关注欧洲大陆的形势，但又不局限于此。例如，在中近东、在南部非洲一直是孕育着严重危险的地区。某些帝国主义势力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造成国际局势恶化，这提醒我们，捍卫和确保世界和平是关系到

人类生存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持久解决需要勇气、冷静、建设性和持之以恒。

今天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昨天。随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壮大、殖民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和各国人民奔向新的未来，世界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除了和平共处之外，没有其它理智的办法。这种认识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正是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在与勃列日涅夫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磋商中，和平、缓和进程和裁军始终是中心问题。当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按照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的利益行事，但是贯彻这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应该损害别的国家。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一样，必须考虑对方的利益，在互利的情况下，为了和平的利益发展合作。社会主义国家不懈地致力于平等的谈判，不断提出具体建议、条约和协议草案。

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完全的权利，决定本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决定本国内部发展的一切方面。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拒绝革命输出，同样也拒绝反革命输出。维护这一原则不能有任何例外。不久前才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获得政治独立的年轻的民族国家的人民，也必须拥有充分的权利，决定自己选择的政治制度和自然资源的利用。我们同样支持建立公正的、民主的世界经济秩序。

我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部分人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1968年2月底到3月初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有65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的协商会议。我率领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共产党讨论会。在布达佩斯我们讨论了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计和共产党人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鉴于对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要求，我支持立即开始筹备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今天我仍

记得我在布达佩斯会议期间和许多老朋友的多次谈话，我和他们是战后从事国际青年运动时认识的，其中有意大利现任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有可惜过早离开人世的佐尔坦·科莫克津，他当时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还有其他很多人。同时我也结识了新的朋友，他们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大会决定召开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我党派出以瓦尔特·乌布利希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1969年6月5日至6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性会议，我也参加了代表团。我一生中多次去莫斯科，每次都给我留下了对人和事的回忆，然而，最深刻的是这次国际会议。众所周知，这次会议是要确定共产党人的共同目标，但是也有看法上的分歧。最重要的是，处境千差万别的共产党人在对国际形势发展进行了共同的认真分析之后认识到，为了和平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解决当前最紧迫问题的现实条件已成熟。后来证明这个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同样，会议共同文件指出的其它问题也得到了验证。

会议是在诚挚的、实事求是的、坦率的和相互谅解的、而且是满怀信心的气氛中进行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多年过去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尽管不得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在某些方面还不象人们本来所希望的那样好。但是把和平、缓和和裁军作为最大心愿的共产党人不会放松指明实现上述目标的新途径。

自然，在这里我也要提到1976年6月在柏林召开的29个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德国统一社会党同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在长达20个月之久的筹备工作中，我和参加会议的兄弟党的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经常交换意见，这种兄弟式的交换意见有助于会议的成功。

我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指出，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德国统一社会党决心继续尽一切努力，使和平

政策得以坚持下去。我表示确信，会议的结果将会越出欧洲的界限，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支持。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与会的共产党通过了继续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行动目标。四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文件，就会清楚，这些目标丝毫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一向是西方阵营各种攻击和粗暴诽谤的对象，我们之间同志式的合作最有力地驳斥了这些攻击和诽谤。我们各党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信任和亲密的团结。同志式地交流看法和介绍别人的经验可以不断给我新的重要启发。当然，在有些问题上也会出现不同立场。面对当今世界发展的复杂性、问题的多样性和各个党所处环境的不同，产生这种情况不是很自然的吗？然而，我们的目标和观点根本上的一致将使我们为了共同利益对复杂问题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在最近这10年里，缓和为各国人民带来了明显的好处。但是，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毁灭性核武器堆积如山，对人类的未来仍然是严重的危险，再没有比制止这种危险更重要的任务了。世界人民希望生活在持久和平之中，而不是处在一场核灾难深渊的边缘。30年来，我们在第二次大战废墟上建设起来的一切，决不允许毁于一旦。这就是我们民主德国公民的看法。所以，民主德国尽最大努力，永远不许再从德国土地上爆发战争。

不幸的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的本性就是冒险、挑衅、侵略成性、谋求霸权和过高估计自己。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这些国家不得不把防御力量始终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上。这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在这方面也是苏联肩负着保卫和平的重担。苏联的防御力量，还有驻扎在民主德国领土上的苏军战士，是我国安全不可缺少的因素。

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同苏联军队和华沙条约其它成员国的军队结下了亲密的战友情谊。受过国际主义和各国人民友好精神教育的我国战士懂得，他们的任务是可靠地保卫和平和我们共和国

的安全。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样一支军队，她只懂得保卫和平，尽一切力量防止侵略战争，这支军队的许多高级指挥官曾经积极地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我国人民军随时准备保卫工农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国家，也就是完成为反法西斯和为和平而牺牲的先烈们的遗愿。

自从我党把军事政策的重任交给我以来，我一直同苏军和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军事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军事代表团团长直接讨论联合武装力量保卫欧洲社会主义和和平的基本问题，讨论社会主义军事联盟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本问题，是我经常性的工作。这些接触和视察部队、参观联合武装部队在民主德国领土上的训练和演习，加深了我们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我指的是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如苏联元帅和苏军驻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朱可夫、索科洛夫斯基、崔可夫、格列奇科、萨哈罗夫、雅库鲍夫斯基、库涅夫、科什沃伊和库利科夫。库利科夫是华沙条约国联合部队最高司令。还有大将库尔考特金和伊凡诺夫斯基以及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防部长、参谋长和其他重要将领。通过共同的工作，我们成了朋友和战友。

作为党中央安全委员会书记、民主德国国防委员会书记兼主席，我一直对盟军军事合作的主要方向、形式和方法以及对社会主义军事联盟的加强发挥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军队共同训练的最高形式是根据联合司令部的计划进行的，其中一些演习在民主德国领土上进行，我和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一起观看演习。这些演习显示出参加演习的盟国部队的战斗力量、统一和团结以及高超的军事技能。我们大家感到满意的是，我们国家人民军部队、联合部队、指挥机关都出色地完成了联合司令部分配的任务。

例如，我想起1965年10月在“十月风暴”演习开始之前的一次会议，我在致辞中指出：针对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的任何军事挑衅和侵略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及其武装力量的战斗友谊面前必将失败。更有象征性意义的是，这次演习是在魏玛附近过去

的法西斯集中营布痕瓦尔德开始的。在埃尔富特专区一万公民参加的集会上，我对演习部队说，他们的任务就是通过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和平的共同行动，来完成被法西斯杀害的56,000名伙伴和同志的遗愿。我的结束语是：“我们重申布痕瓦尔德志士们的誓言：‘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21,000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和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的共同誓言。20年前他们获得了自由。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兄弟部队的战士们庄严宣誓，要用他们的身心、知识和技术保卫社会主义、保卫和平、进步以及人类的安宁，作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随时准备并肩保卫工农政权。他们的誓言是：“面对神圣的火焰，忠于死者的遗愿，把对生者的义务铭刻心间，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与和平是我们的誓言！”这个誓言响彻广场上空。在这个时刻，我和其他与会者一样更强烈地体会到深深扎根于历史和传统的国际主义军事政策的力量。它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可靠的集体防御的擎天柱。

我认为，不断加强我国人民军战士同苏军驻民主德国的战友之间的联系是一项特殊的任务。人民军和驻德苏军的团结在不断巩固。1972年，我曾指出：“我们共同的军事政策的最大成就是，在司令部一级，在兵团与兵团之间，部队与部队之间存在着信任合作、诚挚友谊和亲密团结的气氛，并继续顺利发展。”

今天，在部队、兵团、兵种、军校和我国其它军事机关与苏联友军之间存在着大量具体的合作协议，它们包括军事工作的各个方面。从指挥官到最年轻的士兵，与苏联部队的合作已经成为我军的夙愿。尤其是野战训练是考验战斗团结的场所。

在国际主义军事政策的影响下，军民的团结已经越出了国界。无论是苏联的炮兵，还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摩托化部队；不管是波兰军队的伞兵，还是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的坦克兵，或者是华沙条约其它成员国的军队，我国各地都称他们为“我们的战士”，这就是一个证明。这种军民团结将来也是保卫社会主义与和

平的力量源泉。

同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国领导人会晤时，我们总是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鉴于北约方面的扩军，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我们的安全？倘若我们在这方面投资太少，我们的防御系统就会出现难以弥补的缺口。反之，为提高防御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势必加重国民经济的负担。因此，我们把裁减军备看作当前的关键问题，它有关各国人民的幸福。

政治缓和必须继续下去，并且还应以军事缓和来充实。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政治中最迫切的课题之一。为此，我们将不遗余力，并欢迎任何人提出的每一项建设性建议。

第三十一章

出席赫尔辛基欧安会签字仪式

1975年8月1日，我代表民主德国人民在赫尔辛基欧安会最后文件上签字。此时只听见摄影机和照相机的声音。按照礼宾顺序，我坐在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美国总统福特之间，这样我就成了第二个在文件上签字的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是最后一个签字的。他刚签完名，就爆发出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身临其境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这个历史性文件的伟大意义。这个文件是经过三年多时间艰苦复杂的谈判之后，才由35国领导人签字的。

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欧洲各国领导人和美国、加拿大领导人一致认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结果不仅对进一步巩固本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孜孜不倦的、始终不渝的努力变成了现实。

这时苏维埃政权不懈的努力一幕一幕掠过我的脑际：早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就主张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后来在国际联盟中一再对欧洲集体安全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以及在联合国中提出无数次倡议。随着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字，这一多年的政策达到了目的。

1945年反希特勒联盟中的主要国家达成的波茨坦协定本来应该成为稳定和平秩序的基础，但是西方的所谓“遏制”战略带来了相当长时期的冷战。自1954年以来，苏联一次又一次地为欧洲安全采取主动，并得到华沙条约国共同建议的积极支持。直到六十年代末期，当最顽固不化的冷战分子也不能否认国际力量对比的

变化时，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思想才逐步在西方世界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头脑中发挥了影响。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1949年以来，为了在我们大陆上实现稳定的和平秩序，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曾多次讨论过各种建议和考虑。民主德国为赫尔辛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积极的、建设性的贡献，而且付出了重要的代价。我们这样说并非不谦虚，我只想提一下1972年12月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签订的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和民主德国对1971年9月有关柏林(西)四方协定的贡献。

我们从一开始就关心和平和安全。在民主德国，我们从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灾难性的扩张欲望和毁灭性的侵略中总结了历史教训。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规定，我们将尽一切力量，决不许再从德国土地上爆发战争。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我们党代会决议中提出的目标决定了我们对赫尔辛基会议的关注。

我重申：和平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需要一个有利的、也就是和平的外部条件。赫尔辛基会议使这样的条件得以形成，使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在欧洲实现和平共处。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怎么评价安全会议的结果。它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会议的巨大耗费和它的结果相称吗？我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安会最后文件对于改善欧洲政治形势的意义就更加清楚了。人们可以明确而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从实际情况出发，会议确认和肯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领土和政治结果以及我们大陆上战后的发展。它承认并强调所有欧洲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尤其是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赫尔辛基会议强调了由冷战趋于缓和的明显转折。整个最后文件可以说就是一部和平共处原则的法典，普遍认为，其核心是国家关系准则。

这样，最后文件的条款构成了欧洲缓和过程不可逆转的开端。我把这个文件视为巩固欧洲安全、发展互利合作的长期纲领、基础

和范围。在赫尔辛基，某些势力不得不再次承认，他们对战后欧洲的设想没有得逞，他们不得不使其政策适应现实状况和力量对比。

对民主德国来说，保障欧洲边界安全特别重要。因此，难怪我们在谈判中对这一点尤为积极和坚持。为了确保和平状态，尊重和承认边界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这是从我国人民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本世纪两次席卷欧洲的可怕战争都是从侵犯现存边界和不尊重别国领土完整开始的。从萨尔“合并”、奥地利“回归”到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苏台德地区、鲸吞剩余的捷克领土、“收回”梅梅尔地区和日益嚣张地要求取得但泽、上西里西亚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最后公然袭击波兰，一步一步谋划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不应忘记，在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领导的政府到七十年代初还公开提出领土要求和修改边界。直到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分别同联邦德国签订了双边条约，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签订了双边关系的基础条约和其它协议之后，才为多边解决，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按国际法承认现存边界铺平了道路。

历史教训和政治现实要求我在赫尔辛基强调指出：“欧洲国家的安全过去是、现在仍然主要是边界的安全。”我们坚持不渝的努力最终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成果。人们甚至可以大胆地认为，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第一次为打破欧洲的恶性循环（战争——战后——准备战争——战争）创造了前提。本世纪以来欧洲第一次经历了这么长的和平时期，这个时期必须继续下去，并得到持久的保证。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经过长期复杂的谈判达成的边界协议，也考虑到赫尔辛基会议要求保障欧洲边界安全的愿望。我也把这个协议看作是对和平的重要贡献，因为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直接对峙地区最敏感、最危险之点。

赫尔辛基会议是反希特勒联盟之后欧洲国家最大的一次集体

性行动。在德国人民解放35周年临近之时,我想说,我们深感满意的是,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又看到了反希特勒联盟的精神。这个文件应该并且能够帮助实现波茨坦协定力求达到的原则和目标。

我把赫尔辛基会议看作欧洲第一次真正的和平会议。因此,对我个人来说,会议首先意味着完成了1971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民主德国人民所承担的义务。那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声明说:“我们对一切有助于欧洲各国人民和国家和平共处的建议和想法都感兴趣……。我们方面永远有着建设性的态度和良好的愿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张尽快召开一次欧洲安全会议,并准备作为平等的参加者努力使会议成功。”在四年时间内,在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间,这个任务顺利地完成了。

在我看来,赫尔辛基是我同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同样也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会晤和交换意见的重要场所。民主德国和参加赫尔辛基会议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可以同许多出席会议的国家或政府首脑讨论扩大双边关系,或就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交换看法。同时也为民主德国平等地参与解决各国人民的切身问题揭开了新的一页。

我同勃列日涅夫、铁托、胡萨克、卡达尔、日夫科夫和齐奥塞斯库在赫尔辛基的热烈会见再一次强调了我们将为和平进行不懈的努力。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领导人的会晤表明,外交上的协调如同我们合作中的协调一样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事。

从我在赫尔辛基的日程表看,我会见的政治家有:挪威王国首相布拉特利,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德斯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福特,芬兰共和国总统吉科宁,比利时王国首相廷德曼斯,瑞典王国首相帕尔梅,梵蒂冈教会公共事务理事会秘书卡萨罗利,葡萄牙共和国总统戈麦斯,瑞士联邦主席兼政治部长格拉贝尔,意大利共和国总理莫罗,丹麦王国首相约恩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我同特鲁多总理就民主德国同加拿大建立外交

关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还有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

在同西欧、北欧和南欧以及同美国、加拿大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中，我们通常进行颇为深入透彻的、实事求是的和实质性的交谈。我和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结识无疑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促进了信任和更好的了解。

此外，我还会见了由秘书长鲁梅什·坎德拉率领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

所有的对话伙伴一致认为，缓和进程应坚定地继续下去，并使双边关系服务于这一目标。对我们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中的某些问题，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或至少向解决前进了一步。有的对话伙伴利用机会提出人道方面问题，我则根据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则大度宽厚地对待这些问题。我当时的所有对话伙伴几乎都能证实这一点。

我清楚地记得同美国总统福特的会谈。会议的座次，特别是在芬兰总统吉科宁为国家和政府首脑们举行的宴会上的座次，使我们有可能详尽地交换意见，从双边合作谈到美苏联合太空飞行。我向福特总统祝贺阿波罗号—联盟号在太空对接成功。他则以祝贺民主德国游泳健儿在当时世界冠军赛中取得的成就来回答我的祝贺。

在此以后的几年中，我在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芬兰总统吉科宁、奥地利联邦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法国外长让·弗朗索瓦·蓬塞，以及同民主德国本国人士会晤时，能够继续赫尔辛基开始的有益的思想交流，特别就最后文件对欧洲缓和进程的作用和实现最后文件的问题交换意见。

世界舆论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同联邦总理施密特在赫尔辛基的会晤。交换意见是有益处的，我们看到，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出现了积极的变化。我们的共同结论是，已经取得的成果要巩固、扩大，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要排除。当时在赫尔辛基我就

一再强调，在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干扰和倒退的危险。遗憾的是这一点也应验了。

在从赫尔辛基飞回柏林的途中，我们考虑最后文件在实践中怎样执行的问题。所有签了字的人都会遵守文件的精神和条文，还是企图只按自己的利益解释赫尔辛基会议的结果？事情很快证明，对预期出现的消极倾向给予适当的注意不是没有道理的。

最后文件墨迹未干，西方舆论就在某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企图歪曲这个文件，片面解释这个文件，断章取义，特别在人道问题上大作文章。看来某些人以为，他们可以利用会议的结果达到他们过去未能实现的目的。

我们坚决驳斥这类企图，最后文件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它是整体，应该全面实施。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种责任，所有签字国都必须遵循最后文件的精神和条文，谁如果异想天开，幻想可以择其所需，那他就离开了在赫尔辛基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基础。民主德国遵守所有参加国共同承担的庄严义务，即全面地、完整地、相互联系地遵守和运用最后文件，当然，民主德国也期望其它国家持同样态度。

西方舆论工具，甚至资本主义国家负责的政治家也不厌其烦地硬说民主德国和社会主义各国在人道方面似乎还需要补课。他们这样讲未免太无的放矢了！无论是在一般的“人道”方面，还是在某些西方集团特别吹毛求疵的人权方面，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需要补课的地方。

缓和、最后文件原则和人道问题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联系。缓和的进展越大，人道方面的进展也就越大。不断放肆地干涉我们的内政，肯定不会有助于人道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民主德国非常严肃负责地对待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今天对我们来说，文件的各个部分不是早已实现了，就是已经采取了措施。在这方面很久以来就有可供查证的材料、事实和数字，这些是见得人的，不怕和别人相比的。

这也完全适用于人们称为最后文件第三篮子的内容。对此我只想略举几个例子。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以及贝尔格莱德续会文件在我们这里发行了上百万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最后文件的内容已纳入民主德国普通学校、大学和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通过报纸、杂志、故事片、纪录片、书籍出版、电台和电视节目，民主德国转发资本主义与会国的材料是这些国家愿转发我们的材料的六倍。自赫尔辛基会议以来，旅行来往呈现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从1976年到1978年到民主德国来的外国人平均每年达1,700万，这相当于民主德国的人口；每年有1,200万民主德国的公民到外国去，其中300万到非社会主义国家。

这些事实一目了然地说明无论在信息交流方面，还是在人员交往方面，民主德国都不欠别人什么。要想在人员往来方面赶上民主德国对外开放的程度，美国每年必须让22,000万人、联邦德国必须让6,000万人、法国必须让5,400万人入境。

就人权而言，事情也是一清二楚的。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是，人始终居于一切努力的中心。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和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德国统一社会党八大和九大决定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措施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些措施在其它地方我已写过。

在西方舆论对赫尔辛基会议结果的贬责看法中，常有这样的论点，赫尔辛基会议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对资本主义国家不利，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的得益者。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只要人们注意一下8个社会主义国家和27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谈判这一事实，那么这种所谓欧安会单方面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论点就会象肥皂泡一样不击自破了。结果的妥协性质是人所共知的，当然，妥协并没有模糊了会议参加国在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区别。但这个妥协对与会各方都是有利的，有益处的，它的内容是利益得失的平衡，这也是与会者的一致看法。自从赫尔辛基会议以来，我同欧洲、亚洲、非洲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谈话中一再证实，他们同意我们的看法。欧洲要想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生活，除了赫尔辛

基会议的结果,除了缓和之外,别无选择。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德国来说,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从一开始就是争取和平、安全和裁军。德国统一社会党党代会的决议、政府的措施、外交政策的文件、我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以及在联合国的活动,都证明民主德国在国际政治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尽力履行她对和平和安全所承担的责任。

赫尔辛基会议是一个重要阶段,它不是欧洲国家和平合作的终结,而是大有前途的开端。最后文件作为欧洲安全的长期纲领,为进一步采取积极步骤指出了主要方向,并确定了道路。赫尔辛基会议促进了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会议的结果已经显出端倪,对民主德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此,我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和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曾一再声明,我国现在和将来都将严格地履行最后文件,我们遵守1975年8月随着我们的签字而承担的义务。

赫尔辛基谈判证明,即使是棘手的问题也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拟出适当妥协方案和取得一致的。可惜的是,迄今为止政治缓和还没有带来军事缓和,尽管最后文件也为实现军事缓和提供了重要机会。

应该象对待政治缓和那样,以同样的干劲和决心推动军事缓和,这一点在欧洲的条件下更显得必要。在赫尔辛基时我曾说过:“我们担心地注视着,军事缓和落在向前发展的政治缓和之后,军备竞赛的继续会危及来之不易的政治缓和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认为,在裁军和限制军备方面也必须采取坚定的和有效的措施。”事态发展证实了这一观点完全正确。

赫尔辛基会议之后,世界上围绕和平共处政策的实质、内容及其前景的争论不是在减弱,而是更加激烈了,敌视缓和的势力加强了他们的抵抗。不能忽视,破坏公认的国家关系准则、严重威胁和平、妄图恢复冷战的尝试不断发生。

早在1975年,北约国家在完全了解其危险后果的情况下,决定

更新他们在欧洲的核武器，并于1978年通过了所谓的长期计划。鉴于北约1979年12月决定生产美国新式中程核武器并在西欧部署这种武器，所以坚决捍卫和平的任务就更加紧迫了。

现在需要敞开通往和平的道路，巩固并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而不是通过扩军使这条道路更加艰难，甚至堵塞。社会主义国家希望为了裁军而谈判，不是为了谈判而不扩军。

当欧洲的前途面临着抉择关头时，勃列日涅夫于197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在柏林向各国人民提出了苏联的倡议。这是一条确保和平、结束军备竞赛和实现裁军的建设性的道路。要么是用军事缓和补充和巩固政治缓和，要么是开始新一轮对各国人民孕育着沉重负担和危险的军备竞赛。这是问题的核心。

不顾大家的警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决定部署新式中程武器，这可能破坏谈判的基础，对东西方关系产生消极影响。这使我们决心和华约组织其它成员国一起，为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今天就可以断言，北约组织力图取得对华约组织的优势是不会得逞的。自然，我们不会受北约组织国家，特别是美国搞的既成事实所干扰，我们仍将尽一切努力，使缓和与裁军的进程，简言之，使确保和平的进程继续下去。

民主德国仍然准备同所有愿意维护欧洲安全大厦基础并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合作的人共事。为此召开一次赫尔辛基会议与会国参加的欧洲军事缓和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如能商定具体的信任措施和步骤，以减少欧洲武装力量和军备的集结，那将是有益的。

第三十二章

两个德意志国家

正如我已强调指出的那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也适用于她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此事绝不仅仅涉及双边关系。现在和将来，欧洲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方面的许多问题与此相关，两个德意志国家毕竟是处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紧张地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别牢固地扎根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各自与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结盟。

民主德国党和政府深感由此产生的责任之重大。在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整个欧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所以我们努力使两个德意志国家通过相互关系正常化，为欧洲稳定的和平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2,000万苏联人失去了生命。波兰、南斯拉夫、法国、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失去了许许多多优秀儿女。他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粉碎了法西斯暴政。然而，他们战斗决不仅仅是为了胜利，而是要一劳永逸地铲除德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祸根，为一个和平的欧洲奠定基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自己的外交活动致力于维护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她和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一致的，并同它们共同行动。

回顾一下七十年代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关系的变化，把它和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那时联邦德国统治集团一再把复仇政策和侵略政策推到战争边缘的情况作一番比较，那末就没有理由小看这

些积极的变化。1971年，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方案，事实证明这个方案是好的、正确的、现实的和成功的。那时我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声明，愿意同所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的出发点是所有国家一律平等，我们遵循的原则是：每个国家都要尊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就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完全尊重它们的主权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继续主张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同联邦德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在前“德意志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完全不同的、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他们之间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只能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按照国际法准则来处理。对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问题更是如此。因为联邦德国颇有影响的势力把宝押在一些历史因素上，如同一个民族、同一种语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在旧德国形成的千丝万缕的亲戚联系，妄想抹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我们看来，为了缓和、睦邻合作和持久和平，在国际法及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同联邦德国发展平等互利合作是可能的，社会制度的对立不应构成障碍。

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明确指出战后在民族问题方面出现的新情况。在分析1945年以来在德意志土地上发生的情况时，我说明一下：“关于民族问题，历史已经有了定论……联邦德国继续存在着资产阶级民族，那里的民族问题是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同联邦德国相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国家里正在形成着社会主义民族。”

通过两个德意志国家的成长，这一点得到了肯定。如果想使欧洲的和平和安全稳定而持久，就不允许给任何新的“大德意志野心”留下可乘之机。在这一点上，那些饱尝德帝国主义苦头的各国

人民肯定会同意我们的看法。

我们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的出发点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使两国关系转向缓和与和平共处，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同时还要考虑到，1970年苏联和波兰人民共和国已同联邦德国签订了条约，以及关于柏林(西)的四方协定也已完成，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正处在筹备之中。这些重要步骤有利于缓和，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具有重大意义。

不解决这个问题，欧洲缓和的过程就难有进展。然而，按照国际法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战后在德国土地上发展的现状是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条件。这种动机决定着我们的行动。在关于柏林(西)四方协定的筹备中，我被授权同苏联谈判，谈判中我们对协定的签订做出了有力的贡献。1971年12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签订了过境交通协定，同月民主德国政府和柏林(西)市政府达成了协议。同样根据我们的倡议，1972年5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签订了第一个国家条约和交通问题条约。这些协定使双方的局部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除此之外还有必要处理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为此，我于1972年4月18日以民主德国的名义提出了具体建议。我声明，在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分别同联邦德国签订的条约批准之后，我国准备就两个德意志国家建立正常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并签订必要的有国际法效力的协议。我提出的远景是，这一发展可能导致“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和平并存，导致正常的睦邻关系，最终为了和平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实现共处”。

联邦德国国内竞选时，极其复杂的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我们方面的善意姿态使谈判重新活跃起来，终于在1972年12月签订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条约的意义在于，随着它的签订，为按照和平共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两国承担义务，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尊重独立、自主和领土

完整、尊重自决权、保障人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根据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法准则,发展彼此的关系。双方强调他们之间的现存边界不可侵犯。双方表示,缔约一方在国际上不能代表另一方,或以另一方的名义行事,将尊重对方在内外事务中的独立和自主。在条约及补充文件中,双方表示,愿在一系列专业方面发展和促进合作。双方承诺促进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对欧洲的安全和合作做出贡献,并努力支持限制军备和裁军。

基础条约中的这些原则和协议是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关系不容置疑的基础,这是无法回避的。如果双方严格遵守和运用上述原则和协议,那么为合作采取进一步的积极步骤是可能的。如果妄图回避甚至破坏这些原则和协议,就必然会使问题复杂化,进而出现困难。

我们主张在排除尖锐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所以我一再努力推动事情的发展。尽管对方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常常是模棱两可的,令人失望的,对我们方面的让步不合时宜地提出新的要求,但我们初衷不变,坚持不懈。

这里我回忆起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期间我同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第一次会晤。我也利用其它机会和方式会见联邦总理、联邦部长、联邦议会党团主席(如1973年会见魏纳和米施尼克)以及联邦德国其他重要政治家,提出关系正常化的新步骤或者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在我回顾同联邦德国建立正常关系的结果时,我不能避而不谈联邦德国某些并非无足轻重的势力对取得的进展常常报以对民主德国公开的攻击、诽谤和挑衅。由于他们的缘故,同联邦德国实现友好睦邻关系的可能性未能充分利用。

在197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纲中,再次概述了我们同联邦德国关系的战略方案。党纲中写道: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在

和平共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文件接着说,鉴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只有相互尊重主权的政策才能促进关系进一步正常化和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才能为了和平的利益促进实事求是的、平等的和互利的合作。

这种态度是从现实出发的。同时它也明确要求那些仍然以为可以无视民主德国主权和利益的人止步。

由于长期冷战,两个德意志国家关系中堆积如山的复杂问题不可能一下消除,这是自不待言的。考虑对方的合法利益是取得进展的先决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协调利益。和平共处政策的目的是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地、实事求是地解决争议问题,在这方面应该注意对方现实主义的考虑。尽管两个德意志国家诸如在裁军方面的合作还有待加强,然而也已取得了不小进步。

我对于1978年11月28日两国签订的标界议定书十分重视。严格尊重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可侵犯,是和平、安全及睦邻合作不可或缺的前提,对于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这类情况的邻国关系来说尤其是如此。鉴于我国西部边界长期以来遭到复仇主义势力的公然破坏,以及联邦德国某些集团至今仍想入非非,希冀有朝一日能修改边界,所以对边界的标界协议的政治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和其它所有解释相反,这条边界的性质已经清清楚楚地被强调为一条国际法意义上的边界。这样就可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较好地保障它们的安全。

今天关于具体的合作协议已经包括相当广泛的方面,其中有过境交通协定和交通问题条约、卫生协议、邮电通讯协议和其它问题的协议。有一些还正在谈判之中。两国对口部部长的初次互访预示着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根据国际法原则解决交通问题对睦邻合作有巨大影响,对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关系来说也是如此。有关协议的先决条件必须是

彼此严格尊重缔约伙伴对过境通道的主权。以此为出发点，1975年商定联邦德国出资参加从民主德国柏林环城高速公路至马林博恩的扩建工程。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柏林(西)和前往柏林(西)的过境运输要通过这条高速公路。现在这个协定已经如约实现。1978年又就交通问题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其中有联邦德国出资参加修建通过民主德国到汉堡的高速公路以及民主德国过境内河交通的疏浚工程。1979年我们还达成了其它方便机动车辆交通的协议。

联邦德国有那么一些人昧着良心声称，这些协议对民主德国单方面有利。事实却并非如此。所有协议都是建立在得失均衡原则上的，在维护双方利益情况下达成的。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会资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那未免太幼稚了。联邦德国肯于为民主德国的项目提供资金，显然是因为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也不小。这些项目中的部分工程在民主德国国民经济计划中本是没有的。联邦德国提供的资金只能弥补我国要承担的可观费用的一部分。即使是由此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负担，我仍然认为协议首先是对缓和、对双边关系的贡献，对睦邻合作的促进。

正如近几年经验证明的那样，按照基础条约和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原则发展关系，对实现两个德意志国家公民的愿望和利益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七十年代来往人数猛增，且稳定在相当数量上。从1976年至1978年，平均每年来民主德国旅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达750万之多，其中300余万来自联邦德国，330万来自柏林(西)。民主德国公民每年亦有300多万人到非社会主义国家去，其中约140万人到联邦德国和柏林(西)旅行。

这些数字说明，民主德国的有关机关在处理公民探亲申请，包括因紧急事务的探亲申请时是宽宏的。尽管恰恰在所谓的人道问题上存在着敌视我们的宣传，不断破坏我们国家及人民的安全，我们还是做到了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

我们为了解决与家人团聚有关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仅1977年7月1日至1978年6月30日，就有15,000名民主德国公民获准

迁居联邦德国和柏林(西)。这些都是我们主权范围之内的事，任何一个外国也不例外。

近几年我们同联邦德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得不坏。从1972年至1979年，商品成交额，包括劳务费用，由52亿外汇马克提高到大约90亿外汇马克。从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联邦德国成为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联邦德国大约有6,000家公司参与了这一贸易，我们感到它们对向民主德国稳定供货有强烈兴趣。普遍的经验表明，在补偿贸易的基础上长期提供包括冶金和化工在内的大型设备对双方都是有益的。正如联邦德国多次证实的那样，通过这种贸易，数千就业岗位有了保证。

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我同联邦德国重要的康采恩代表谈话时曾反复强调，我们对扩大贸易和对双方有利的成熟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形式以及在第三国市场上的合作感兴趣。为了扩大经济关系，联邦德国需要采取步骤，保证两国出口的对等和均衡。我确信，同联邦德国的经济关系也象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样，在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对各方都有好处。

倘若把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方面迄今为止取得的结果概括一下的话，那么可以说，沿着和平共处的方针取得了重要成果。这对欧洲的和平和局势的缓和有重要意义。然而，看一下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样必须现实地看到，我们离全面正常化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另外，两国关系不断受到完全不必要的强烈干扰，这决不是我们政策引起的。自从1973年基础条约批准以来，联邦德国曾多次企图片面地曲解条约的原意，抽去条约的实质，破坏条约的执行。1973年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的说明和解释在核心问题上都是明目张胆地针对条约的，例如，不承认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国界，违背国际法准则把我们两国之间的国界等同于联邦德国各州之间的州界。尽管这种复仇主义的立场丝毫改变不了条约的内容和现实，然而它却不断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复杂化。

只有基础条约及其附件和后来签订的其它协议才有约束力，任何单方面的解释，包括那些“德意志特殊的内部关系”之说和“保持德国问题悬而未决状态”方案都绝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只有国际法原则对条约的解释才有效。众所周知，国际法高于国家法。

联邦德国有些颇有影响的势力，他们绝不甘心民主德国的存在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要在短期内修改这一历史事实绝无可能，所以他们作长期打算。但是，只有从现实出发，只有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现实存在，从民主德国是一个主权的、平等的并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出发，才有可能既在短期内又在长期内保持和平。我们共和国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成员，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我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过去30年中，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在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区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两个国家又分属两个根本不同的联盟。因此，它们之间除在国际法及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毫无保留地发展关系之外，别无它路可走。其它一切图谋均属幻想。

再对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问题谈几句。对这个问题不熟悉的人对争论的内容和意义不容易理解。若按我们的想法，这方面根本不存在争论问题。只要联邦德国严格地从存在着两个独立的德意志主权国家出发，承认两个国家中各有各的人民，各有各的国籍，那么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我早就主张，把这一点写进两国“关系的基础条约”中去，但对方不干。那时候我们曾希望，条约能对这个问题有个满意的澄清，然而至今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进展。联邦德国仍然坚持它的所谓统一的德意志国籍的歧视性立场，企图用“保护、照顾所有德意志人”的论点为他们的立场辩护，他们不打算承认民主德国的国籍。这已不是什么理论问题，或纯法律问题。实践表明，这涉及到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藐视我国主权和干涉我国内政的问题。面对这一情况，民主德国从多方面采取步骤，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合作，这难道不是民主德国表现了惊人的克制态度吗？

进一步发展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当今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任务，即努力结束军备竞赛和采取具体步骤实现裁军，是密不可分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邦德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推行扩军，旨在使东西方的军事均势发生有利于西方的变化，迫不及待地更新武器，必然加剧军事对抗。这只会给和平招来严重的危险，这一点大概是清楚的。反之，减少对抗，通过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已提上国际议事日程。这种发展的根本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气氛。

我对欧洲和平和安全的忧虑促使我在民主德国成立3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无论是民主德国的公民还是联邦德国的公民，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在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内部署中程导弹，而是需要两个德意志国家在裁军问题上和在和平共处方面进行合作。”根据这一看法，民主德国表示，愿意同联邦德国政府讨论确保和平和裁军问题。两个德意志国家对解决此问题的贡献，也将同时为扩大他们的关系开辟新前景。

不是停止军备，不是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不是加强信任，而是加速军备竞赛，肯定会严重地危及政治缓和，破坏信任的进程。如果整个政治和军事战略形势恶化了，它将不可避免地对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产生消极影响。

关于所谓东方威胁的叫嚷无非是企图迷惑世界公众。这种“威胁”是虚构的。苏联、民主德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目标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人们为自己、为后代、为国家、为欧洲去争取和平和安全。与此相一致，民主德国主张同联邦德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进一步扩大合作。

我们时代的所有经验，特别是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关系的经验证明，除了和平共处，没有其它选择。象过去一样，今后我们仍将坚持这一路线。我们将致力于使两个国家在长期和平和互相尊重中相处，并实现睦邻关系。我们将从我国的利益出发，如果于事有益，我们也准备做出让步。

第三十三章

从马尼拉到哈瓦那

七十年代我访问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经过几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民族和种族压迫，终于获得了解放。访问再一次证明，从分析、报道或其他资料中得到的认识不能代替自己的亲身体会。

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在第四个大陆上站住了脚。我在非洲的所见所闻坚定了我的这一信念。1979年11月，我和社会主义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在亚的斯亚贝巴为非洲大陆上的第一座卡尔·马克思纪念碑奠基。这是历史进程势不可挡的象征。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先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预言了它的进程。这条道路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青年时代，特别是在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中和被监禁期间，我体会到团结意味着什么。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她和世界上一切主张自由、人权和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团结，从来就是革命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因此，30年前我们把这一无产阶级传统作为我们建国的根本政策之一，这是理所当然的。我国人民的历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德意志国家，她不追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目的。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她就坚定地站在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一边。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全世界的尊敬，因为她全心全意地从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非

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

我对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的访问使我获得了许多重要经验，对它们在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加强了我的下述看法：不管各国的起点、历史和地理因素如何不同，文化传统和政治背景如何纷繁，这些国家人民的切身问题只能通过坚定不移的社会进步才能最终求得解决。已经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仍要对付内部的反革命阴谋和外部的新殖民主义进攻。这一事实使他们认识到，只有消除一切形式的剥削，才能保障和巩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其中大多数国家正在建立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那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把摆脱了数百年来的殖民主义枷锁、进而为创立新生活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看作我们争取人类新生活的同盟军。我们认为，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运动之一。社会主义世界和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是天然盟友。维护和平和争取独立、自决及社会进步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我们发展和加强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就是支持他们的经济独立。我们认为，必须消除旧的国际分工，因为这种分工使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沦为多国公司的剥削对象，所以我们主张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我们加强了与不结盟国家的团结，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在为和平、安全与和平共处的斗争中，它们是一支积极力量。

我们的这一立场在我率团访问菲律宾和印度这类国家时再次得到确认。1977年12月，我应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邀请，对菲律宾共和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尽管访问是短暂的，我还是对这个东南亚国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所做的努力有了初步的印象，它在建设民族经济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子。诚然，复杂的经济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严重的失业问题。正因为如

此，我们的东道主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表现出强烈兴趣，特别是对我们经济的高水平、稳定性和生机勃勃的原因感兴趣。

我们受到马尼拉市民的热烈欢迎。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作为马尼拉市长向我们介绍了把首都建设成现代化城市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和遇到的问题。我们参观了文化和社会设施以及著名的露天博物馆“菲律宾乡村公园”。博物馆向我们展现了菲律宾7,000个岛屿的不同风光、生产方式、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访问结束时，马科斯总统对我们讲了许多赞扬的话，这些话超出了一般的客气。他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我们代表团卓有成效的会谈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我们代表团不搞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菲律宾共和国几年前才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次会谈后，我们签订了经济协定，这无疑是对加深和扩大两国合作的重要贡献。

1976年7月，印度共和国总理英迪拉·甘地对民主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她把这次访问称作“友谊之行”。访问期间，她强调主张和平共处、缓和局势与裁减军备，主张加深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1980年1月，国大党（英迪拉派）在大选中获胜，她再次出任总理。我对她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对她再次肩负重任表示最良好的祝愿。英迪拉·甘地在复电中说：“我和您一样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在今后几年中将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将从我们的合作中得益。我向您保证，我的政府将为此、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1979年1月，我应印度总统尼兰·桑吉瓦·雷迪的邀请，访问印度共和国。早在二十年代，我作为一个青年共产党人，就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在我们两国人民的关系史上，德国人民中的人道和进步力量同印度自由和独立志士之间的合作范例不胜枚举。在多次会见和会谈中，我们一再感到，印度各阶层人民都对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生动的体会。

印度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和历史业绩令人倾倒，罪恶的殖民主义留下的血证令人发指。殖民主义虽然束缚和扼止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力，但不能消灭它。孟买附近的巴巴原子研究中心的尖端技术成就即是一个例证。圣雄甘地使印度人民懂得，殖民主义绝不是一个“历史的不幸事故”。在拉杰加特我拜谒了他的陵墓。

在与印度领导人的会谈中和在该国旅行中，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巨大的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并不妨碍我们发展互利的有益合作。尽管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表明，不论在加深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国际形势的主要问题上，我们都达成了一致的立场。

1979年2月，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开始访问一些非洲国家。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到的第一个伊斯兰国家。多年来共同斗争的传统早已把我们和这个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卡扎菲的会谈为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长期的互利合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今天，这些都已实现了。

利比亚朋友们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对阿拉伯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和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建立独立国家的立场。阿拉伯各国人民再也不愿作帝国主义侵略、兼并和欺凌的牺牲品。我们重申完全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不难理解，为什么利比亚人民把社会主义国家看作他们谋求民族发展的战略盟友。

我们在利比亚逗留期间，利比亚利用石油财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面貌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我们看到，首都的黎波里简直是一望无际的工地，住宅、学校、工厂和文化设施拔地而起。昔日的利比亚沙漠“死亡之谷”，而今通过灌溉和开垦，通过现代化的村庄建设，已经变成“生命之谷”。

在我和卡扎菲的联合声明中，我们商定准备起草一个民主德国和利比亚之间的友好合作条约。此后，两国经济代表团、科学

家、技术人员、艺术家、运动员和医生的交流大大加强了。可以说，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回顾 1979 年 2 月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至今对阿戈什蒂纽·内图总统过早的去世深感沉痛。早在他领导反殖民主义统治斗争时期，我们之间就已经建立了个人友谊。他的政治远见、政治家的智慧、他对人民的苦难和对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所抱的深厚感情、他对进步事业的热情支持都表现在他的诗篇中。阿戈什蒂纽·内图为安哥拉的独立、为捍卫自由、反对外国侵略和对付国内反革命、为建设新生活建立了丰功伟绩。

我们亲眼看到，年轻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为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参观工厂和罗安达港时，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国家中发展经济多么艰巨。殖民主义者推行愚民政策，阻挠殖民地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当殖民主义者末日来临时，他们一夜之间撤走了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

安哥拉无疑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为了开发利用资源，迫切需要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材。因此，当东道主告诉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专家和青年友谊队（我们有时称青年团的友谊队为身穿蓝衬衣的使者）培养安哥拉人员的工作做得扎实而有成效时，我们感到特别高兴。

民主德国和非洲国家交朋友没有经济利益和民族利己的考虑，这种友谊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早在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之前，我们就站在他们一边了。

我们所说的“发展援助”是真正的发展援助，我们帮助友好国家人民增强他们自救和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们现在主要帮助他们培养各方面的专业人材。昔日备受压迫的人民最懂得真正的友谊，最善于辨别谁真正尊重他们的利益，谁伪善地标榜这种尊重。他们受殖民主义欺骗太久了，他们能区分谁只是侈谈人权，谁真正实现人权。这是全部秘密所在。

象在安哥拉一样，我们在非洲南部其它前线国家也受到各国

领导人和人民的热情接待。我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卡翁达博士一见如故。虽然我是这次访赞时才第一次见到他，但我觉得我们仿佛早就认识。不论是在加深双边关系方面，还是在国际事务方面，我们的会谈都是十分有成效的。联合声明和多项协定说明了这一点。

赞比亚的经济对铜依赖很深，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没有出海口，没有自己的对外交通联系，因此，赞比亚的独立、民族发展和进步不断受到敌人的讹诈。在这种情况下，卡翁达总统始终支持南部非洲、特别是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立场更加令人敬佩。

在赞比亚逗留期间，我们参观了自由大厦，这是联合民族独立党的总部。人民以非洲人特有的热情在自由大厦前欢迎我们。我在简短讲话中向他们保证，我们坚定地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卡翁达总统和独立党总书记迈因札·乔纳后来对我说，这次自发的集会给卢萨卡市民一个重要认识：如果一个白种人国家的元首如此坚决地支持非洲人民的自由斗争，那么，人们就不能再以肤色来辨别敌友了，而是应该根据他们的政治行动。

1979年2月访问前线国家时，我们会见了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他们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我们向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萨姆·努马乔、向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兼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两主席之一罗伯特·穆加贝、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主席兼津巴布韦爱国阵线两主席之一乔舒阿·恩科莫以及南部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表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自决的正义斗争。

我们看到被种族主义政权赶出家园的人们的艰难处境和复杂问题。难民营的人告诉我们，民主德国向他们捐赠的食品、衣服、药品和其它物品改善了他们的境况，增强了他们继续斗争的勇气。我们愤怒地谴责种族主义的暴行，谴责他们不断侵犯安哥拉、赞比

亚、博茨瓦纳和莫桑比克的主权。

为了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决，民主德国坚定地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争端。同时我们认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自卫，用一切手段为他们的民族和社会解放、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是各国人民神圣的权利。

在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我们受到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和首都马普托市民极为热情的欢迎。这次访问的高潮是两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这也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和人民之间长期传统关系的必然结果。

在莫桑比克逗留期间，首都的巴罗斯·夏曼库洛区为我们举行的由数万人参加的友谊大会最使我难忘。在简陋的茅草棚居民区，他们用解放斗争时期的歌曲欢迎我们。我极有兴趣地观看了这些简单的、容易记忆的、然而节奏优美的歌曲演唱。这些歌曲在这些国家的群众政治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我的讲话首先译成葡萄牙语，然后再分头译成各种地方语，萨莫拉·马谢尔总统（早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成立之初我们之间就建立了友谊）再把我讲话的要点用隆加语（Ronga）重复一遍。这样我们之间的思想就沟通了。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为向全体人民宣传她的政策，动员人民解决民族发展的艰巨任务，作了巨大的努力，我们所到之处都感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的而且是初步的成就。和其它非洲国家一样，莫桑比克的关键问题是培养人材和扫除文盲。

几年来，我们为民主德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多方面合作创造了条件。在这里和在其它非洲国家一样，我国的专家、机械产品、车辆、农业技术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设备深受欢迎，得到好评。

我们的非洲东道主都对我们民主重建初期的经验特别感兴趣：我们是怎样彻底铲除法西斯的；是怎样实现民主改革、农业改

革、教育改革、剥夺康采恩和银行的；是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组织管理和计划的；又是怎样从根本上建设反法西斯民主国家的。我们必须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且不回避我们的困难和问题。

1979年11月，我们访问了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这是对一年前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对我国友好访问的回访。同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三个这类条约，这一条约证明我们对非洲政策的连续性。在这个非洲最古老的国家里，一场深刻的人民革命正在引起社会大变革。这场变革的主体是由进步军人领导的农民群众。他们自身的经验使他们倒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使他们确信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从他们来说，企图鼓动旧势力，复活旧的从属关系的人就是他们的敌人。

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内地，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工人、农民、士兵和青年人消除沉重的封建主义烂摊子的冲天干劲，看到他们保卫革命和建设新生活的决心。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我们多次看到这样的口号：“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是的，我们在埃塞俄比亚革命最困难的时期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帮助他们自卫，向他们提供食品。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切切实实地支持了他们。埃塞俄比亚人民不会忘记这些，这就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可靠基础。在访问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组织秘书处时，我阐明了我国政策的原则和我们对非洲重大问题的立场。在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使节在场的情况下，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埃德姆·科乔赞扬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非洲解放斗争做出的宝贵贡献”。

友谊和团结的悠久传统把我们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可追溯到也门人民反对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初期。1979年11月，我国党政代表团访问了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在与我们的老朋友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和也门其他领导人的会谈中，在访问工厂、农村和教育设施的过程中，我们耳闻目

睹了这个属于世界上25个最穷国的南阿拉伯国家所取得的进步。复杂的历史和地理条件证明，一个具有科学纲领的先锋党——如也门社会主义党——在克服灾难性的过去和为劳动人民创造符合人类尊严的未来时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

我们两国之间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决定了我们在各个领域的长期关系。条约显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阿拉伯各国人民斗争的支持和声援。

我国外之行的高潮是访问那些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生活现实的国家，它们是：美洲大陆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在亚洲代表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这些友好国家里，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斗争已转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已经初具规模。亲密的兄弟关系和有效的合作传统每天都在表现出来。

各国人民通往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道路各不相同，在这些国家里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一点。对自由的要求和争取社会进步的意志激发了人民中沉睡的力量，使他们能够做出最大的牺牲，去克服看来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试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象古巴那样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或者又有哪一个国家象越南那样经受了外国占领者长达30年之久的造成严重破坏的战争？朝鲜人民不仅重建了被夷为平地的首都，而且建设得比以前更加美丽。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充分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1974年春，我访问了古巴。当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两年前第一次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我和他就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友谊。现在，他和他那豪爽的人民在自由之岛上——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最伟大的成果——欢迎我们的代表团。访问使我有机会接触了不起的古巴人民。对我来说，和卡斯特罗的会谈十分重要，每次会谈都使我们的友谊不断加深。

虽然我们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古巴革命和古巴人民建设新生

活的干劲，但实际情况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面对旧政权遗留下来的难以估量的破烂摊子这一背景和美国封锁这种复杂条件，新古巴所取得的成就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不论是新的工业企业、新的住房建设，不论是农业改造或者是卫生事业和国民教育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如此。只有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这颗“安的列斯群岛上的珍珠”对劳动人民来说才真正象哥伦布所说的那样，变成了“从未见过的最美丽的国土”。

我们在古巴访问的过程中，处处都感到古巴人民对民主德国人民怀有的兄弟情义。人们一再表示，尽管古巴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条件各不相同，但她们的共同点是：两国都在建设社会主义；都与苏联紧密结盟；两国都直接和帝国主义对峙；两国都不得不与那些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势力的外交和经济封锁以及反革命的进攻作殊死斗争。

看到科学社会主义在古巴独立和自由斗争的先驱马蒂的祖国正在变成现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伟大的经历。古巴革命生动地证明，在不发达的国家中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它表明，这是拉美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道路。

对我和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来说，1977年深秋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访问是激动人心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公民（包括最年轻的在内）的心目中，越南是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和坚强不屈的象征。我们曾满腔热忱地关注过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过去30年中所进行的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曾尽一切力量支持过越南朋友。我们看到美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可怕伤痕，这使殖民主义留下的烂摊子更加不可收拾。同时，不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我们都感到越南人不屈不挠的生活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在工厂和农村，我们看到友邦的人民正在群策群力地克服着重重困难。

在河内，我们瞻仰了胡志明主席的遗容。灵堂边是他的名言：“没有什么东西比独立和自由更可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国际

主义者、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人和自由越南的第一任国家主席的遗志活在全国人民心中。

越南兄弟党的总书记黎笋在越南人民赢得最后胜利的前夕，曾经访问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现在我可以在河内向朋友和战友转达我国人民对这一历史性胜利的祝贺。在胡志明城（从前的西贡）我们会见了不久前还在丛林中领兵打仗的人。在他们的领导下，越南人民打垮了阮文绍政权，赶走了外国支持者。

我们访问结束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签订了一个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到下个世纪初的主要合作目标。这为我们两国人民极为亲密的兄弟关系又增添了新的一页。访问期间，我们处处受到越南人民的热烈欢迎，就证明了这一点。

1977年秋末，我还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以来，我们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着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始于五十年代初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年代。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努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和重建家园。

在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的会谈中，和劳动人民的多次会见中，到处都感到我们之间的传统友谊。我们民主德国人民怀着敬佩的心情谈到朝鲜人民的勤劳。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最好的见证。人民随时准备抗击任何进攻。到处都可以感到他们保卫劳动果实的决心。

平壤的市政建设是很感人的，这个城市是战后重新建设起来的，住房建筑和公共设施的布局把古老传统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有许多新颖别致的设计。朝鲜党和政府对儿童的亲切关怀也值得大书特书。

访问中，友好的人民、秀丽的河山和丰富的文化传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满载而归。在人民中间，在人民休养生息的星球上蕴藏着巨大的财富。社会主义将使这些财富得到充分的发挥。

第三十四章

对当前政治问题的看法

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1980年7月4日在党中央大楼接见了培格曼出版公司董事长兼《世界领袖丛书》发行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

问：您如何估价两个德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您认为这种关系发展的前景怎样？

答：总的看来关系不错，当然还应该更好一点，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因为在德意志土地上毕竟存在着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

问题在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某些阶层、特别是舆论工具还没有认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他们经常想扮演德意志政治中的唯一代表。显而易见，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签订基础条约时谈得清清楚楚，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相互尊重对方在内外事务方面的独立和自主。有时联邦德国忘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民主德国全面行使她的主权和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的精神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经常考虑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对两个德国的公民，而且对欧洲的和平具有重大意义。

我认为，两个德国发展关系具有良好前景。关键是在尊重相互

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各种可能性。我们争取改善两个德国间的气氛，这将有利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多方面的交往，其中包括旅行往来。

问：作为各自军事联盟的成员，两个德国能为缓和东西方在中欧的紧张采取哪些具体步骤？

答：当然，判断联邦德国在她的联盟范围内能为此采取何种步骤不是我的任务。从不久前我和联邦总理施密特先生在贝尔格莱德交换意见的情况看，要想使东西方在中欧的紧张关系明显缓和，还必须清除许多重大障碍。

就我们方面而言，我想说，我们对减缓紧张和继续缓和进程有很具体的设想，如在华沙筹备一次有关军事缓和与裁军的欧洲会议。最重要的是，愈是在复杂的情况下，愈需要进行东西方对话和南北方对话。华沙条约国家在它们的宣言中向西方提出了建议，在我看来，这是各方均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如果这些建议能够实现，不仅有利于缓和欧洲的紧张，而且能在确保和平方面取得真正进展。

我想要特别认真准备马德里续会和建设性地对待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召开军事缓和与裁军的欧洲会议。加强信任措施有可能使某些北约成员“增补军备”的癖好失去土壤。人类最不需要的莫过于军备竞赛的轮番升级。另外，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一致认为，批准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二阶段条约将有助于第三阶段谈判的起步。

问：您认为欧安会马德里续会在扩大欧洲信任措施方面可能性和前景如何？

答：我看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和前景。关键是各方对马德里续会的预备性会议都应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众所周知，民主德国通过与多方面的协商，其中包括与西方国家政府的协商，谋求把有助于加深欧洲的相互信任、有可能取得积极结果的问题提出来谈判。

问：最近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的和平和秩序不象一年前那样可靠了，政治紧张的危险可能会扩大到欧洲。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这个问题涉及到当今国际形势的核心。事实上，较长时间以来，国际形势一直趋于紧张。许多人对和平受到威胁感到关切，是完全有道理的。原因在哪里呢？事情很明显，因为美国有些人一直试图把缓和推向对抗，所以世界政治局势变得紧张了。他们企图把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拉入他们的“实力政策”和霸权主义漩涡中。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中某些有影响的集团企图改变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规定的世界事务发展方向。缓和政策的方向不合他们口味。所以，北约理事会早在 1978 年 5 月就作出了长期的扩军计划，也就是说比苏联帮助革命的阿富汗的行动早一年。早在去年，美国政府就宣布要谋取优势，自称有权主宰世界，有权对别国——如对伊朗——实行军事“惩罚”。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的长处，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

问：我认为，最近几星期政治家在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会晤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形势。您同意这种看法吗？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您说政治家们在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莫斯科的会晤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我同意您的看法。不管怎么说，明显的是，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为了和平，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对话必须继续下去。

问：尤·列·勃列日涅夫在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访问时说，苏联愿意就中程导弹问题举行谈判，而不再坚持北约必须撤销增补军备的决议。您有何看法？

答：尤·列·勃列日涅夫在联邦总理访问期间确实提出了几点建议，这些建议有助于克服北约布鲁塞尔导弹决议在裁军谈判中造成的僵局。还提出就中程核武器开始预备性谈判。这一建议已由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转告华盛顿。建议说，这些讨论

可以先开始,而无需等待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批准。自然要考虑到美苏之间可能达成的协议只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批准之后才能实施,但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能获得批准。

问:您怎样评价施密特总理最近一次的莫斯科之行?

答:尤·列·勃列日涅夫和联邦总理施密特的会晤是积极的。显然,访问的结果对继续欧洲缓和进程十分有利。遗憾的是,我不能肯定是否能得到美国的响应。

问:民主德国是否认为北约成员和华约成员之间能就中程武器举行谈判?或者您认为只能由美苏来谈判?

答:我认为,如果要使这些谈判取得成果的话,谈判只能在苏美之间进行。

问:您是否认为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批准之前,能够举行中程武器谈判并取得积极成果?

答:我已经提到这种可能性。但谈判取得的结果只能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批准后才能生效。

问:您认为东西方关于暂停生产和部署新型中程武器的谈判会取得成果吗?

答:这首先取决于苏美关系的发展和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的批准。但愿苏联的最新建议能得到美国的响应。

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只有减少紧张才有安全,东西方只有在欧洲军事力量均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裁军”。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您刚才引用的那句话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更有理由认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去年12月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部署导弹的决议时,他们所依据的前提就是错误的。谁如果当时相信支持这个决议有道理,以为这样美国可以立即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接着开始限制战略武器第三阶段谈判,现在也可能发现他们错了。

问：去年12月北约理事会作出决议，要求华约国家就限制在欧洲地区部署中程武器举行谈判。特别是联邦总理施密特建议东西方就进驻中程武器一事进行谈判。您对这些建议有何看法？

答：1979年12月，北约理事会在布鲁塞尔决定生产并在西欧部署美国新型核导弹，这个决议破坏了中程武器谈判的基础。为了掩人耳目，提出一般的谈判要求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请允许我提醒一句，尤·列·勃列日涅夫在柏林参加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庆祝会上曾向北约国家提出了一个慷慨的谈判建议。同时他还单方面地宣布裁减苏联驻民主德国的部队，这一计划已经实现。对苏联提出的就一切有待解决的问题立即进行谈判的建议，西方当作耳旁风。正如我在电话上对赫尔穆特·施密特说过的那样，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但愿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能够批准，以便与此相联系的限制战略武器第三阶段谈判的预备性会谈能够开始。最重要的当然是批准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

问：您对联邦总理施密特坚持同意在联邦德国领土上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导弹有何看法？

答：我始终认为这一决定是灾难性的。

问：尤·列·勃列日涅夫在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庆祝会上宣布撤走苏联驻民主德国的部分部队的计划实施了吗？撤了多少部队和坦克？

答：根据苏联单方面的主动，已经撤走了20,000名士兵和1,000辆坦克以及这支部队所属的装备。遗憾的是，西方至今对苏联单方面的步骤没有作出积极响应。

问：最近西德报纸说，民主德国军队新增了两个师。如果消息属实的话，这一步骤怎样促进欧洲裁军？

答：您知道，联邦德国的舆论工具不断散布关于民主德国的错误报道。如果逐条否认，那我们什么事情也甭干了。

问：关于西柏林四国协定的执行情况是否令人满意？您如何评

价西柏林和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答：总的说，1971年9月3日关于柏林（西）的四方协定的执行情况是很好的。这个协定不仅排除了一个紧张的根源，而且给柏林（西）和它周围的关系，包括它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系提供了许多方便。只要比较一下1979年和1969年的客货运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协定对柏林（西）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由于这一原因及其它种种原因，我不理解，为什么总有些人想试一试协定的承受力。这样做孕育着葬送掉柏林（西）生命力的危险。我指的是有些人企图破坏四方协定的核心条款，即柏林（西）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不由她管辖。这类企图不会得逞。凡是主张缓和和与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人都应该注意严格遵守和全面运用关于柏林（西）的四方协定。

回顾一下，可以有充分理由认为，柏林（西）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关系有了积极的发展。每一个柏林（西）的常住居民都可以用事实来证明，与民主德国的合作，如交通问题、污水处理或经济关系都对柏林（西）的居民有利。无论在交通方面，还是在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方面，或者其它方面，民主德国都愿意继续采取对双方有利的建设性步骤。

问：我认为，联邦总理施密特访问莫斯科时，公报中关于柏林和四国协定的措辞比原来的提法程度减弱了。您认为这里有政治原因吗？

答：由于这方面的报道五花八门，我特意重读了公报。我没有发现关于1971年9月3日柏林（西）四方协定的提法减弱了。双方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和充分运用这一协定。特别在遵守协定的核心条款，即柏林（西）不是联邦德国的组成部分、也不由它管辖这一点上是如此。

问：虽然民主德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但是你们的运动员获得的奖牌比美国的还多。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最近经常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请原谅，考虑美国体育

运动的发展自然不是我的任务,美国也有很好的运动员,可惜我国运动员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没有机会以奥林匹克精神与他们比赛。

对美国体育成绩的敬佩并不妨碍我们为本国运动员而自豪,他们证明,一个小国的人民同样能够在体育方面创造出优异成绩。我国体育运动取得了好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点是,通过青少年运动会和相应的选拔激发了许多新秀。我认为,这是我国体育运动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问:贵国和其它主要依赖从苏联进口石油、其它能源和原料的国家一样,必须多付许多钱,面对这种情况,民主德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

答:这里我必须说明,长期从苏联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原料,对民主德国十分有利。众所周知,经互会内的原料价格比世界市场上低得多,例如1979年我们从苏联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平均比资本主义市场上低30—40%,这对民主德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当然,这不是民主德国经济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唯一原因。正如我对您说过的,我国人民十分勤劳和努力。此外,我们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以及高水平的教育制度。从1949年我们共和国成立以来,已有150万人完成了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业,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读中学。这是民主德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我们能够执行社会福利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谁也不能否认,今天民主德国是世界十大工业国之一。

在提高国民经济效益方面,我们愈来愈依靠智力资源的开发。今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90%来自科技进步,而1975年只有55%左右。国家把越来越多的投资用于发展科技,1980年投资76亿马克,这一年的科研经费比1951年至1960年科研经费的总和还多。

问:贵国从苏联购买的能源和其它原料价格不断上涨。据经济学家们估计,民主德国购买她所需要的能源、原料和食品不得不出口三倍于1970年的制成品。

答：我不知道您引用的是哪些经济学家的材料。因为您是一个严肃的人，我不能认为您会引用那些所谓“民主德国占星学家”的材料。根据这些人的预言，民主德国今天应该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了。您自己看到，情况并非如此。相反，民主德国是世界上工业十强之一。

我们和苏联的贸易是互利的。今年的贸易额将超过 450 亿马克，还不算科技方面的多种合作。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同西方的贸易。由于民主德国坚定地置身于我们的联盟之中，由于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经济力量，我们不依赖资本主义世界，更不受它们的讹诈。众所周知，这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问：为了支付昂贵的进口，贵国需要西方的技术，以便以较低的成本、较少的劳力和原材料消耗生产出尖端技术产品，是这样吗？

答：您知道，我们并不想破坏偶像。莱比锡博览会是在开放贸易的气氛中进行的，究竟谁向谁提供了更多的设备，事情远不那么清楚。民主德国是世界上第二大机床出口国。认为只有西方才能制造尖端产品的神话早已破产了。

问：前不久您访问了几个非洲国家，对您的接待如何？访问有什么具体成果？

答：可以说非洲拥抱了我和我的陪同，我们受到了极为亲切的接待。我认为，这是非洲人民对一贯声援和支持他们自由斗争的民主德国的友好表示。在利比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各次会晤，在亚的斯亚贝巴非洲统一组织会见非洲各国使节以及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领导人的会见，增强了我这种信念：非洲大陆正在走向新岸。

有不少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德国和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会有如此亲密的关系？有些人不理解。我的印象是，非洲人民热情欢迎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原因是我们之间没有种族隔阂。非洲各国人民感到，我们对他们平等相待，真诚团结。如

果您问我访问非洲的具体成果,那就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为我们关系的进一步发 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问:联系到目前加勒比海地区的局势,您如何评价您不久前的古巴之行及结果?

答:我对古巴共和国的第二次访问和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交换意见,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民主德国和古巴的良好关系。您知道,我们在哈瓦那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这一条约规定了我们在各个领域合作的轮廓,其影响超出本世纪。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相互支持。

我的古巴之行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时刻进行的,这种紧张也反映到加勒比地区。会谈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我一致认为,最近几个月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挑衅是某些帝国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这是它们企图改变国际力量均势、破坏和平行动的一部分。面对这一发展,我们坚决主张继续缓和政策,特别是军事缓和政策。

我们再一次亲眼看到,古巴人民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休戚与共。这个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进步,在经济领域,在文化教育领域,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进步举目即是。我们处处感到这个“自由之岛”对民主德国所怀有的深厚情意。许多外国评论家认为,这次访问表明古巴在保卫其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不是孤立无援的。这种看法有道理。古巴随时都可以指望得到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支持和声援,特别是那些经常威胁古巴的势力不应该忽视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古巴将会一如既往地走她自己的路。

问:可以说您最近与齐奥塞斯库总统的会谈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对两国有益,并具有重大国际意义。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是这样。通过交换意见,我们在国际关系的一切基本问题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联合声明就反映了这一点。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为把我们两国之间 1985 年的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采取了广泛的措施。

问：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法国政府商定在柏林开设文化中心。您认为和英国也能达成这种协议吗？

答：在柏林开设法国文化中心和在巴黎开设民主德国文化中心的协议是法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得到积极发展的结果。如果我对您说，我们认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对缓和欧洲及欧洲之外的紧张局势起了很大作用的话，这不是什么秘密。这一点对民主德国决定与法国签订您提到的这个协议自然是有影响的。

民主德国和英国关系发展正常，可惜在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达到象法国和民主德国之间这样广泛的一致。随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排除英国在柏林和民主德国在伦敦互设文化中心的可能性。我们也有兴趣在考虑上述各点的情况下与西方其它国家互设文化中心。

问：国家和教会的关系现在和将来将沿着什么方向发展？

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向每个公民，不论其年龄、性别、世界观和宗教信仰如何，提供安全和保护。她保障每个公民都有美好的前景和参与建设未来、充分施展才能、发展个性的机会。我们也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处理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在民主德国，有约束力的准则是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不受歧视地参加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1978年3月6日，我会见新教理事会成员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民主德国实行政教分离，宗教自由得到宪法保障，并在实践中受到保护。在宗教问题上我们非常通情达理，今后也将坚持这一点。我国的教会有多种可能性为社会主义的人道目标和和平服务。我们主张全体公民参加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既符合社会利益，也符合个人利益。我想，这大致就是您问的方向。

问：目前贵国只允许到了退休年龄的公民访问联邦德国。为了进一步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证明贵国政府在民主德国公民中享有信任和威望，您是否考虑批准年轻一点的人访问

联邦德国？

答：联邦德国对进一步放宽年龄限制设置了严重障碍。我们多次要求消除这些障碍，均遭拒绝。这里指的主要是承认民主德国的国籍问题。至今我们已经和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奥地利、芬兰、塞浦路斯、墨西哥和印度在内的 32 个国家签订了领事条约，但是与联邦德国还没有达到这一步，因为联邦德国死抱着违反国际法的作法不放。所以在提供司法帮助或旅游方面不可能取得进展。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人道问题上大度行事，因紧急的家庭原因去联邦德国访问的人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每年已有 150 万民主德国公民到西方国家探亲。我们宽宏大度是一回事，在联邦德国得到国家财政资助的所谓同乡会的猖狂活动可是另一回事。他们要求在民主德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居住权，并公然从事复仇主义活动。

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情况可能和现在不同。但是联邦德国的情况显然不允许采取进一步的步骤。

问：战后德国不幸的分裂被认为是欧洲的一个不安全因素。但是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好象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您的问题实在包含了无法协调的内容。我第一次听到德国分裂被看作是欧洲的一个不安全因素。据我的回忆所及，1945 年，西方国家就有意造成德国的分裂局面，它们一直把分裂德国看作是自身安全的一个因素。不安全因素是因为在西方三国占领区没有执行波茨坦协定，同时也是它们扶植“第三帝国”要员的结果。

我们从一开始就主张在所有占领区贯彻波茨坦协定。但是西方占领区的反动势力及其幕后支持者害怕关于新制度的民主讨论，害怕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因为战后西方占领区也出现了统一运动，而西方不希望出现反法西斯的变革，要复辟康采恩和军国

主义的权力，让人忘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邦德国这个分裂国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面对此种发展，30年前在德国土地上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理所当然的。在西方国家中，把民主德国在欧洲中心出现看作一件大好事的也不乏其人。民主德国的出现使那些想把各国人民推入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漩涡的企图难以得逞。事实也是如此，两个德国的存在和她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对欧洲局势起着稳定作用。

问：有人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地理位置和民族利益，联邦德国必须既执行一项西方政策，又执行一项东方政策。您是否认为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民主德国？

答：我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是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相一致的。因此，发展同苏联及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国家兄弟般的关系，实现我们共同的外交目标，自然摆在第一位；维护和平在我们的活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问题的核心是，要为我们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创造最有利的外部条件。我们把这些努力和支援世界上已经赢得民族和社会解放或者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显然，这一方针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问：参加铁托总统葬礼时，您和施密特总理举行了会晤。当时您们两位都认为您们两国在维护欧洲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民主德国正在采取哪些维护欧洲和平与缓和的具体步骤？

答：民主德国的和平政策旨在永远不再从德国土地上爆发战争。这是从历史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方针，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们利用外交上的可能性，优先推动军事缓和和裁军，目前这无疑是在维护本大陆和平的中心问题。我们建设性地参与一切旨在召开一次关于军事缓和和裁军会议的活动，并加速筹备这次会议。关于我们对欧洲条约体系方面采取的步骤，特别是关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关系的步骤，前面我已经谈过。

问：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贵国政府和施密特总理的政府都希望防止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欧洲取得的稳定和缓和；目前贵国政府和施密特政府的关系虽然还有种种敏感问题，但比起两国建国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要热一些。

答：自然，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关系比两国建国之初要好。至于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这是不言自明的。近10年来毕竟是建立了一个条约体系，在国际局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这个条约体系和莫斯科条约、华沙签订的条约、关于柏林（西）四方协定和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一起，证明是经得起考验的。

虽然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存在着种种看法上的分歧，但最重要的是都愿意尽力保持欧洲这个和平中心。阐述联邦德国总理的政策不是我的任务，但是，从我和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贝尔格莱德的最近一次会晤看，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存在着一致的看法。

问：今年秋末大选后您打算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会晤吗？

答：如您所知，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我商定在适当的时候在民主德国会晤。具体时间还有待确定。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我还不能谈确切日期。这一点您一定可以理解。

问：您和联邦总理施密特的会晤也将具有世界政治意义。您能对此谈几句吗？

答：我不喜欢谈论德国人的世界政治意义，因为从德国土地上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已经够严重的了。我想，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对和平所能做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根据国际法原则，继续使两个德国的关系正常化，并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当前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

问：许多欧洲人认为，欧洲局势取决于您和联邦总理施密特的关系。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已经说过，两个德国关系正常化是欧洲缓和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能按照条约，双方相互尊重主权和独立以及遵守国际法的普遍准则，将对欧洲局势产生积极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国

际局势的尖锐变化，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我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同时声明，我们将设法使德意志土地上永远不再爆发战争。

问：施密特总理和联邦德国社民党的最大成就是缓和以及两个德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大改善。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答：缓和和改善经济关系至少需要双方的努力。具体到两个德国的情况，缓和及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改善对双方都有利。

问：有人认为，贵国对保持欧洲的缓和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因为贵国的经济也受到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同西方贸易的扩大。这种看法对吗？

答：我非常重视世界贸易，也不讳言我十分关心进一步提高民主德国人民的生活。然而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却是维护和平。我国人民意识到和平和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和平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都是有利的。

此外，我还想请您注意，民主德国70%的外贸是与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包括同联邦德国的贸易在内，我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只占我国外贸的10%。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打算继续扩大对西方国家的贸易。

问：您认为两个德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前景如何？

答：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得不错。今年的贸易比往年更趋于平衡。如果这种发展势头保持下去的话，1980年双方贸易额将超过100亿马克。

问：您认为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最近的莫斯科之行能使两个德国之间的对话和世界政治危机脱钩吗？

答：我想不是为了脱钩，而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当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都竭力防止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影响欧洲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将是一场悲剧。不让美国目前推行的对抗政策蔓延到我们大陆，保持本大陆正常的局势，对一切欧洲人，包括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公民以及他们的左邻右舍，都是生命攸关的

大事。

如您所知，我们主张保持和扩大这些年来以欧洲为基点在国际关系中所形成的一切积极的东西，主张八十年代继续缓和进程，使它成为决定国际事务的主流。

问：我和许多西德人都对联邦总理施密特和外交部长根舍的对外政策感到满意，他们决心少照顾点美国，多强调一点西德对欧洲裁军和缓和的兴趣。当然，他们不会危及联邦德国的北约成员资格。我们可以指望民主德国对苏联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策也能形成这种趋势吗？

答：我把您提问时对联邦德国政府态度的解释看作是您的个人的评价。民主德国和苏联以及其它华沙条约成员国在基本目标和当前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

我们执行共同制定的和相互协调的外交政策。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各自担负自己的责任，开动脑筋，把共同的事业推向前进，不存在任何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既代表民主德国的民族利益，也代表我们联盟的利益。在我们这里寻找其它地方由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带来的矛盾，是徒劳的。

问：有人说，苏联的战略是使西德脱离美国，转而采取一种较为中立的立场，从而在西方联盟中打入一个楔子，这是为施密特总理设下的一个圈套。

答：这个神话显然来自北约的“毒品店”。那里设有专门混淆视听的机构。

问：民主德国的地位在于她对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联盟的绝对忠诚；没有军事力量方面的均势，缓和是不可能的。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答：如您所知，民主德国坚定地扎根于我们的联盟之中，没有理由怀疑她对盟友的忠诚。我们主张在低水平上保持军事均势。这的确是缓和的支柱。正因为如此，我们坚决反对北约某些集团企图在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取得优势。这种企图威胁着和

平。我们认为，要保持均势必须停止军备竞赛。

问：西德公民（虽然他们相信他们的安全取决于美国的保护）惧怕俄国人，现在又十分担心美国不可靠，或者美国可能会轻易地失足陷入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您的问题包含了不属同一个范畴的两件事。联邦德国的公民没有必要害怕苏联，苏联既不威胁联邦德国，也不威胁别的任何国家。但是几十年来的反苏反共煽动在联邦德国大部分居民中产生了极严重的后果，这也不是秘密。许多人已经分不清真伪了。

您说联邦德国公民中普遍担心美国会失足陷入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联邦德国有些人问得有道理：为什么计划在西欧部署美国新型核导弹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安全呢？这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美国某些势力希望发生军事冲突时不打美国本土，而是打联邦德国。我很理解联邦德国的不满。

问：您是否认为，在基本上由美国和苏联单独负担保护欧洲边界和对欧洲至关重要的市场和原料通道的情况下，欧洲会成为和平与缓和的孤岛吗？

答：我说欧洲应该保持和平中心的地位，是指我们应该在这里保持缓和的成果，继续缓和的进程并为改善整个国际环境作出贡献。能否作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舆论。

对苏联和华沙条约其它成员国来说，都不存在用军事手段保卫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西方思想方法。

至于西欧国家，我想，保证原料供应的最好办法是与原料生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关系，屏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蛮横。有些政治观察家认为，美国派军事力量去波斯湾，对产油国和原料生产国进行威胁，举行恫吓性军事演习，是与和平的国际经济合作背道而驰的。我很同意这种看法。

问：最近一个时期，世界上许多领导人乃至消息灵通的一般公

民都不相信苏联和美国能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理智的谈判。您的看法如何？

答：认为苏联已经没有能力为和平的利益进行理智的谈判是缺乏任何根据的。最近几个月，苏联领导对一系列煽动和挑衅采取冷静的态度表明她对人类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对和平与缓和坚定不移的努力。试想，如果苏联也象对方近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那样，采取冒险态度，情况将会如何？挑衅事件不乏其例。

苏联对国际关系各个领域提出的建设性的、有助于解决现存问题的和平建议几乎不胜枚举。前不久尤·列·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重申，决心努力维护缓和及七十年代取得的成果；在裁军方面实现转折；保卫各国人民自由、独立、发展的权利；维护和巩固和平。

如果有人曾经相信美国能为维护缓和与和平进行理智的谈判，那么面对华盛顿目前政治上的实际作法一定会产生疑问，推行对抗方针，拿过去多年通过谈判和协议所取得的有利于和平的成果作儿戏，能算有理智吗？今天世界上的问题真不能说不复杂。我们认为，关键是以和平共处的精神坚持政治解决和进步的方针。

问：您认为苏联在限制军备和阿富汗问题上有让步的迹象吗？

答：迹象不止一个。关于限制军备方面，我只想提一提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达成该条约反映了苏联建设性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为了实现和平她准备做出让步。苏联还表示愿意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条约批准前，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第三阶段的谈判举行预备性会谈。我想，这是一个重要信号。问题是理解这个信号，同样作出谅解的表示。

阿富汗问题存在着政治解决的可能性。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在这方面提出过建议。民主德国支持这些建议。

问：您对解决由于苏联占领阿富汗引起的危机有何设想？

答：首先我想告诉您，不是苏联占领阿富汗，而是制止帝国主

义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派出有限的军队前往支援是符合苏阿友好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的。这是一点澄清。

和我们的盟友一样，我们主张政治解决，这一点我们在华沙声明中已经表示过。关键是必须停止外部对阿富汗政治和人民的不宣而战、武装侵略和一切形式的敌视活动。必须切实保证不再发生外国的颠覆活动。

众所周知，苏联和阿富汗政府协商后已经撤出了部分部队。如果说这个地区出现了危机的话，那么从外部派武装力量进入这个国家的人应对这场危机负责，是他们顽固地拒绝支持完全尊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政治解决办法。

问：施密特总理提出，把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步骤和苏联承诺撤出阿富汗联系起来。您赞成这一政策吗？

答：对缓和欧洲紧张局势提出条件，只会人为地制造障碍。不过我不知道您对联邦德国总理态度的解释是否贴切。

问：联邦德国反对党总理候选人约瑟夫·施特劳斯公开反对施密特总理的缓和政策。您对他评价如何？

答：我不想介入联邦德国的竞选。

问：如果施特劳斯出人意外地赢得了大选，您认为这将对普遍的缓和，特别是对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他出任总理，您打算和他会晤吗？

答：我们赞成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由谁来领导政府，这是联邦德国人民主权范围内的事情。

问：您同意欧洲经济共同体最近的声明吗？共同体在声明中表示打算介入中东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坚持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谈判。您能谈一谈您的看法吗？

答：多数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认为，您刚才提到的西欧共同体对中东问题的声明是成问题的，本质上是不能接受的。只有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中东问题才能解决，如果有些西欧国家支持这一立场，那肯定是受欢

迎的。但在您提到的那个声明中看不出这样的立场。

问：自从民主德国成立以来，统一社会党和政府不断表示，它们已经和德国的过去彻底决裂，认为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共产主义经典思想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历史的楷模和英雄。出于何种原因，民主德国不久前把两位出身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德国人——宗教领袖路德和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将军——尊为民族英雄？最近这两位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上的伟人在民主德国受到通常只有共产主义运动的英雄们才能享受的待遇，您本人也很支持。如您所知，克劳塞维茨将军是一个君主政体的炽热拥护者，而马丁·路德在民主德国多年来一直被指责为农民起义的叛徒。可是不久前您亲自主持了一次为筹备1983年纪念马丁·路德诞辰500周年的活动。

答：从您的问题可以看出，您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古今的虚构和真情。德国工人运动一直十分重视历史，可以说，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没有创造性的吸收，就很难想象会形成他们的思想体系。

我们不只保护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您可以理解，我们自然特别珍惜托马斯·闵采尔和16世纪农民革命斗争的遗产、1848年德国革命的遗产，首先是我们世界观的经典作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产以及德国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丰富遗产。

如果我们赞扬马丁·路德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历史成就，那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德国工人运动和1945年以来我们的历史传统是一致的。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德国历史上这个或那个伟人的局限性、他们的消极面、他们的矛盾面或者他们陷入的历史悲剧。这和我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我们主张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辩证地了解历史，这就包括看到历史上英雄豪杰的伟大之处和他们的局限性。

问：如果我说这方面的突破是从英格里德·米特茨威夫人的

腓特烈大帝的传记开始的，这种说法对吗？您不是在冒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推崇同一个民族英雄的风险吗？

答：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什么风险问题，而是我们对历史的基本态度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业的杰出的继承人弗·伊·列宁1920年对青年说：共产主义吸收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知识财富。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从这些知识中产生的——就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由此可见，我们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和联邦德国完全不同。

我很欣赏英格里德·米特茨威写的腓特烈大帝传，当然不是说每句话我都同意。从这个观点看，这本书不是“突破”，而是我们对历史遗产的态度的归宿，这也包括对普鲁士历史的看法。您说得很对，在我们首都柏林市中心就有克劳塞维茨、香霍斯特、约克和格乃泽瑙的塑像，不久也许还会增加一尊腓特烈大帝的塑像，这样柏林市中心塑像群就完整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历史上，每个州都是进步的塑像和反动的塑像并存，而且塑像大都出自著名雕塑家之手，这是人民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不担心和联邦德国推崇同一个民族英雄，您在我们这里肯定找不到和当年纳粹要员名字相联系的设施。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